

俄国文化的一个意外

——别尔嘉耶夫论维·伊万诺夫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维·伊万诺夫是俄国文化里一个独特的现象,他具有文艺复兴式的全才,尤其在希腊文化领域造诣精深,并引领了俄国狄奥尼索斯宗教流派,对众人产生了影响。别尔嘉耶夫凭借自己与伊万诺夫的密切交往和锐利的哲学眼光,阐明了伊万诺夫的混合性的精神特质:“亚历山大诗派”的诗人,古希腊语文学家,希腊宗教专家,思想家,神学家,神智学家,政论家,青年人的导师;揭示其作为俄国文化的意外的地位。

关键词:别尔嘉耶夫;维·伊万诺夫;俄国文化;古希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01-06

在别尔嘉耶夫对同时代俄国文学的评述中,对维·伊万诺夫的零星点评在其众多著作中随处可见,而较为集中的论述出现在其晚年的两部著作《俄罗斯思想》(1946)和《自我认识》(1948)中。不过两书中的论述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这里主要以《自我认识》为观察文本。别尔嘉耶夫对伊万诺夫的关注不无道理。如果局限在文学领域来看,伊万诺夫是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家,曾发表《关于象征主义的思考》《运用象征的美学原则》《象征主义的遗训》等重要论述,其处女诗集《导航行》亦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开山之作,因而他确立了象征主义作为应运而生的艺术流派应有的地位。实际上,他还是那个文化复兴时代最有特色、最杰出的中心人物之一。别尔嘉耶夫说,“他是俄罗斯最有文化的人,西方也不曾有这样的人”^{[1]228}。

别尔嘉耶夫在彼得堡与文学界有着密切交往。在《自我认识》中别尔嘉耶夫讲道:“在我的彼得堡时期,我与文化复兴时期的文学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维·伊万诺夫。”^{[2]401}他与伊万诺夫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但也有不少紧张的冲突。他认为,维·伊万

诺夫是那个充满天才的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俄罗斯出现如此非同寻常的高雅、敏锐,如此广博的文化修养的人,实属意外。在俄罗斯的19世纪没有那样的人物”^{[2]401}。由于俄国文化长期与西欧文化的浸染,甚至改变了俄国人的精神血缘。但是,伊万诺夫长期居住国外,作为被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回到彼得堡时,“已经被希腊和欧洲文化全副武装,无人能比”^{[2]401},却是“血缘上完全属于俄罗斯的人,完全出自我们本土的精神阶层,不断地建构俄罗斯的思想体系,它们有时接近斯拉夫主义和民族主义”^{[2]401}。同时,“维·伊万诺夫是最出色的古希腊语文学家。他是一个涉猎极广的人——诗人、语文学学者、希腊宗教专家、思想家、神学家、神智学家、参与政治的政论家。他能与每个人进行专业性谈话”^{[2]401-402}。别尔嘉耶夫说:“这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杰出、最具有艺术天赋的人物,具有真正的魅力。”^{[2]402}

伊万诺夫属于那一类人,“他们有一种唯美的需求,需要与环境 and 周遭人和谐相处。他给人的印象是适应能力很强,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2]402}。这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一点总让别尔嘉耶夫退避三舍,也因此经常发生冲突。在苏维埃时期,别尔嘉耶夫完全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最终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救赎式的生活中的变化,“他始终是他自己。他总是诗化周围生活,伦理范畴很难适合他。他是个全才:保守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在意大利当过法西斯分子,曾是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通灵术者和正统宗教的维护者,是神秘主义学者也是实证主义学者”^{[2]402}。别尔嘉耶夫承认他巨大的天赋,但却是“一个学者型的和吃力的诗人。作为诗人他在勃洛克之下”^{[2]402}。作为作家而言,“他首先是个出色的随笔作家,研究掌握人的心灵比任何东西都更诱惑他”^{[2]402}。

在别尔嘉耶夫的三年彼得堡时期,他与伊万诺夫及其妻子(早逝的莉·德·季诺夫耶娃—安妮帕)来往甚密。伊万诺夫家的“星期三”是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典型现象,在被称为“塔楼”的伊万诺夫家,每个星期三都聚集着当时最有才华最出色的人——诗人、哲学家、学者、画家、演员,有时还有政治家。谈论许多敏感话题,涉及文学、哲学、神秘主义、通灵术、宗教、社会学,还有关于社会前景的世界观的斗争。伊万诺夫主张不分党派,不分宗派,致力于各种观点的求同,各种政治思想、志向的求同。“别尔嘉耶夫这位‘塔楼聚会’的坚定代表对这个创举的试验性质和这种创建‘上乘文化实验室’的尝试也心照不宣”^{[3]197}那三年里,别尔嘉耶夫成了“伊万诺夫星期三聚会”的不更换的主席。别尔嘉耶夫回忆说:“有时我不想去参加,不去主持讨论时,维·伊万诺夫根本不答应。”^{[2]402}在聚会上,诗人们朗诵自己的诗歌,而“维·伊万诺夫是一位无可替代的诗歌导师。他十分关注新崭露头角的诗人”^{[2]403}。

伊万诺夫与人交往的能力令别尔嘉耶夫惊叹不已,他说:“他总是花费许多精力和人们交往,对别人予以很多关注。他的交往才能,与他的专横、他掌握人的心灵的渴望有关。”^{[2]403}“维·伊万诺夫是掌握人们心灵的大师,他蛇一般锐利的目光对许多人,尤其是对女性,具有不可抗拒的作用。但最终人们都离开了他。他对别人的态度是专横的,有时甚至像吸血鬼一般,却是关切的、善意的。”^{[2]403}伊万诺夫善于主持公众座谈和单独的私密性谈话,他的这种交往方式深刻影响了众多人的精神取向。例如,托洛茨基就是“塔楼”座谈的常客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经常‘觐见’维·伊万诺夫,于是对精神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产生了求真求深的欲望。”^{[3]197}不仅

如此,“在‘塔楼’氛围中产生许多思想和艺术首创,如格·伊·丘尔科夫的‘神秘无政府主义’理论,莫·柳·果夫曼的‘聚合性个人主义’,戈罗杰茨基的模拟古罗斯多神风格的诗歌……勃洛克的狄奥尼索斯‘风暴’”^{[4]194}。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识》中的记述文字与其在1915年的文章《伊万诺夫家的星期三》接近,该文也成为研究伊万诺夫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如果说这些文字十分感性地讲述了他们的交往,以及伊万诺夫在晚年的别尔嘉耶夫印象里的整体面貌,那么,他的另一篇文章1916年的《反映文化的魅力:关于维·伊万诺夫》^[5],则十分学理地论述了维·伊万诺夫包罗万象的文艺复兴式才能。

一、作为诗人的维·伊万诺夫

别尔嘉耶夫首先指出,伊万诺夫的多才多艺令人惊叹,“他既是诗人又是学者,既是神秘主义者又是政论家,既是宗教哲学家又是批评家和上流社会的贵族——他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集于一身并使之和平共处……但是,他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诗人,不但以罕见的天赋写作诗歌,而且还以诗歌创造生活”^{[5]265}。尽管这与别尔嘉耶夫自己的另一种说法——“吃力的诗人,作为诗人他在勃洛克之下”,有些抵牾,但并不妨碍他揭示伊万诺夫作为诗人的独特之处,即“维·伊万诺夫的诗作以其沉甸甸的思想、复杂的体系结构、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感觉而令人惊叹,从中可以看到整个文化时代和其各层面的特征。这种诗作不加注释很难读懂,它缺少直率平易,也不令人激动,但却以形式的高超和内容的丰富取胜。在后期,维·伊万诺夫甚至做到挥洒自如,而在复杂的思想结构中,在这种旧文化造成的沉重负担下一般是很难做到的”^{[5]265}。故而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在其诗作中总是思想家,在那里总能发掘出有趣的思想的神话成分”^{[5]265}。

在伊万诺夫的时代,现代派或“颓废派”诗歌盛行。伊万诺夫常被人归为“现代派甚至颓废派的诗人形象中”^{[5]266}。但是,别尔嘉耶夫认为,在这种形象中“有某种古怪的甚至陈旧的东西”^{[5]266}。这是因为,他发现伊万诺夫经常被各种频繁更替的影响所左右,经常改变自己的信条:“他时而鼓吹多神教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癫狂,时而鼓吹神秘无政府主义,时而鼓吹天主教,时而又鼓吹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5]266}但是他内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他能够存在于所有时期”^{[5]266}，“他总是难以捉摸,不适合所有定义,他想成为所有人”^{[5]266},甚至他身上有某种

不合时宜的宫廷时代的特性。这些“古怪”的属性，使他并非是那个时代宗教哲学探索和精神危机的典型，因为在那个“一切都应该变得尖锐化，都被揭穿、被分化的时代”，“伊万诺夫不喜欢尖锐化、揭穿和分化”^{[5]266}，“他希望生活在最高意义的宫廷生活的魅力中”^{[5]266}。

二、作为语文学家的维·伊万诺夫

别尔嘉耶夫认为，索洛维约夫推崇并认为尼采是超语文学家是有失准确的，却说“可以完全有理由称维·伊万诺夫是超级语文学家”^{[5]265}。但是人们很少谈论他的语文学天赋。别尔嘉耶夫特别倾心于伊万诺夫的这一特质，认为伊万诺夫的形象中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学院派气质，这种温文尔雅往往只有天生的语文学家才具备，这是一种令人倾倒的优雅学识。别尔嘉耶夫把他的渊博的学识视为一个独特的美学现象。伊万诺夫的语文学范围非常广泛，涉及诗歌、神秘论、宗教、政治等领域。别尔嘉耶夫认为，“最高意义的语文学是艺术，而不是学术专业。维·伊万诺夫把这门艺术掌握得完美无缺”^{[5]266}。

伊万诺夫对希腊文化尤其精通，“具有某种完全特殊地对希腊语文的灵感。他的生活始于希腊并遵从希腊的方式”^{[5]266}。但这并不是原始的生活，伊万诺夫不是生活在第一性的存在中，而是在第二性——语文的存在中，他活在语言这种独立封闭的存在魅力中，并从那里获得一切。伊万诺夫是希腊悲剧专家，在这方面尼采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的悲剧从不给人留下生活的、存在的悲剧印象，这是第二性的存在——语文的存在悲剧。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就其精神来讲，他是希腊化时代而不是古希腊时代的人，是第二性而不是第一性存在的人；他的希腊是狄奥尼索斯的希腊，而非阿波罗的希腊。他甚至给俄国带来了狄奥尼索斯宗教，他的诗歌充满了狄奥尼索斯主题，同时他的诗歌也是狄奥尼索斯式的。他喜欢说，对于尼采而言，狄奥尼索斯是一种审美现象；对他而言，是一种宗教现象。但是，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本人并不具有狄奥尼索斯的禀性，与其说是“禀性”，不如说是“文化”，他生活在往昔文化的映像中。在当时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即狄奥尼索斯情绪，追求超越日常性的、非同寻常的感觉，使得作家们尝试去创造某种与“狄奥尼索斯神秘剧”类似的东西。维·伊万诺夫、罗赞诺夫、尼·明斯基、费·索洛古勃等都是这种神秘剧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因

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的“狄奥尼索斯是反映的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原生的狄奥尼索斯”^{[5]267}。他的希腊直觉不是原生的本体的直觉，而是再生的语文的、经过文化、艺术、语言的复杂化处理的直觉。他的语文学的希腊取代了本体论的希腊，因而他认为任何悲剧都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而不是生活的悲剧。希腊诸神和英雄总是取代了活生生的生活。任何狄奥尼索斯现象对于他都不是我们永恒生活的现象，而是希腊文化、希腊宗教和神秘主义、希腊文学和艺术的现象。

在伊万诺夫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绕不过去的文化高山。伊万诺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悲剧小说》（1911）、《俄罗斯悲剧——论〈群魔〉》（1914）等，在当时关于陀氏的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关系上，别尔嘉耶夫认为，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致力于存在的启示，那么伊万诺夫则是致力于文化的启示。他精通的是文化的启示。这是因为，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伊万诺夫具有一种“亚历山大诗派”风格和超级语文学风格。在他的抒情诗中极少有心理刻画，完全缺乏心理层面，不关注人和文化创造者的心理悲剧，却经常使用深奥的语文学和文化史知识。“亚历山大诗派”、超级语文学主义和优雅的学院派的特点是，不是直接完成创作，而总是通过旧文化、别人的创作、过去时代这些媒介来完成；伊万诺夫的创作即充满丰富的旧文化题材。别尔嘉耶夫指出：“与心理相比他更偏爱思想，他认真对待每一种思想，视其为真正的存在。因此，他从心理上和生活上完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格格不入，而在思想上他却总是喜欢把自己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在一起，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再生的思想而不是原生的本体论、心灵深处。”^{[5]267}这一点在伊万诺夫的早期诗歌如处女诗集《导航星》中得到体现，其中即是将人的精神和思想作为诗歌的美学观察对象。但是，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维·伊万诺夫的语文学主义的对立面，前者完全致力于存在的启示而不是文化的启示。”^{[5]267}在伊万诺夫的意识中完全没有文化与存在、文化与生活尖锐关系的问题，他感觉不到文化的悲剧。在这一点上，他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对立；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俄罗斯人，他是西方人、欧洲人。但这是他的教养，而非血缘，尽管教养侵蚀本性之深，似乎已成为本性。他对文化心满意足，陶醉于它的丰富多彩，希望留在其中。他不愿牺牲任何文化性，文化对于他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圣性。他相信集体性的宗教文化的可能

性,这一点,别尔嘉耶夫认为有瓦格纳影响的影子。即便他谈论通灵术,他也总能把通灵术放在艺术范围、文化范围中进行思考。伊万诺夫不接受任何启示录,在那个启示录情绪浓厚的时代同样也是个异数,其生活感也是古典主义的。他相信这个世界的艺术和文化,他的信仰同样有着希腊文化的根源。在他的意识中,似乎没有“变革”的地位,没有什么“末日”的结束,没有“新天地”的开始,一切皆在文化中。这些与希腊文化相关的特质构成了他的文化观。

在伊万诺夫的气质中,我们似乎总能感觉到一种神秘主义。但这种神秘主义恰恰与他的超级语文学有关。他的神秘主义是第二性的,而非本体的;是通过语言、文献和文化来研究神秘主义,而非神秘主义本身。但这种研究却给他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光晕,迷人。他的神秘主义,源于他以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的身份同希腊狄奥尼索斯偶像打交道,因而才会忽然间被从来不把神秘主义当回事的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所接受。

三、他是颓废派吗?

前述我们讲到,伊万诺夫常被归入“颓废派”诗人之列。乍一看,这不无道理。在那个颓废情绪盛行的时代,伊万诺夫何以能独善其身?又何以能置身世外?但是,别尔嘉耶夫给了完全相反的指认。他说:“伊万诺夫完全不是‘颓废派’,他喜欢强调他在克服颓废,他不喜欢颓废。他小心翼翼地同法国‘颓废派’划清界限。他不是病态的,而是健康的,他没有丝毫颓废派的精神沮丧、心理主义和主观主义。”^{[5]268}

之所以如此,同样与他的“亚历山大诗派”气质和语文学家的身份有关。别尔嘉耶夫认为:“他的抒情诗是宇宙的抒情诗。病态、颓废是存在的事实、存在的危机,而他完全处在反映和再生之中,在那里战胜一切病态和危机。他之所以轻而易举地克服一切消极,原因在于他是通过再生的、反映的、语文学的存在来实现的。这种语文学的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存在的辉煌壮观的外壳。”^{[5]268-269}在这一实现的过程中,会产生惊人的魅力和美感,会出现优美非凡的艺术成就。“在这个环境中的文化创造不会陷入文化危机。它不是那个伟大俄罗斯文学赖以生存、伟大俄罗斯作家经历自己生活悲剧的环境,不是狂热追求终极真理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王国。语文学的王国是一个自有其规律的独特王国。”^{[5]269}

但是,在这一点上,别尔嘉耶夫再一次指出了伊万诺夫的“非俄罗斯性”,或曰“俄罗斯的意外”。他说:“伊万诺夫这位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王国最杰出的代表,给人以精神上非俄罗斯人的印象,尽管他造的俄罗斯词语和斯拉夫主义思想不会让任何人产生误解。他是西方的、过于文明的人,他对形式充满西方的过于文明的爱,他充满形式感和形式的天赋。”^{[5]269}我们记得别尔嘉耶夫曾经界定俄罗斯人的心灵,是缺乏形式感,没有边界,总具有冲出界限的冲动。而伊万诺夫的“精神与俄罗斯人狂热的真理探索,与俄罗斯人牺牲一切外形,摆脱一切形式的渴望格格不入”^{[5]269}。这种强烈的形式感,当然与其希腊直觉、古典主义分不开。

四、维·伊万诺夫的古典主义

伊万诺夫的希腊直觉,决定了他的古典主义。但这一古典主义却也有着青春的狄奥尼索斯狂热与成熟的阿波罗理智之间的转换。但无论怎样,在那个具有颠覆和革命意义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喧嚣的时代,他的古典主义是一剂温平泻火的良药。伊万诺夫1916年出版了新作《垄沟和地界》。别尔嘉耶夫认为,这部汇集他近年经验的文集,和他的处女诗集《导航星》不同。那里有更多的青春、果敢、大胆、反叛,更有首创性、更敏锐。在新文集里更多的是平和、成熟,总结动荡的生活,将一切自发性彻底纳入古典形式。这本书就其精神来讲,完全是温文尔雅学院派的,没有文学和美学的党派斗争,它的一切都是温良谦让的。这里不再是革命精神,而是保守精神;这里阿波罗主义压倒了狄奥尼索斯的狂热。别尔嘉耶夫在这里发现,好战的象征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表现出针对青年、针对新的危险——未来主义的预防措施。所有旧的文学学派的“沉默的真理”得到承认。伊万诺夫充当起导师,他首先是艺术导师、新型院士和古典主义者。他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不再号召敢作敢为的爱和诉诸狄奥尼索斯式的癫狂。他探寻和解的依据。他害怕过于灾难性的新事物,希望人们留在某个出类拔萃的文化中心,遵循古典规范;渴望语文学的第二性存在的古典主义,并显然始终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然而,热血激荡的岁月,总是拒绝似乎温吞的文雅。别尔嘉耶夫在这里坚决指出,正是由于俄罗斯的无知、俄罗斯的粗俗和落后,才不能彻底承认伊万诺夫,不能将其当作不容争辩地丰富文化价值、美化俄罗斯的文化生活的途径而纳入俄罗斯文化的怀抱。别尔嘉耶夫发觉,一如19世纪的激进知识分

子,当今广大的俄罗斯知识阶层同样不能接受与过去文明时代紧密相关的美轮美奂、精巧玲珑的形式,因而无法辨认伊万诺夫丰富的面孔,却把他当作颓废派、文学革命派、某个好斗的文学派别的代表。实质上,他是包含近十年一切价值的新型的古典派和学院派。他同新一代革命文学流派进行斗争,但斗争是温和的,并把某种新东西纳入他的古典主义怀抱。伊万诺夫有一个建立其艺术理论的宽容学说,他祈求宽容,宽容这个世界和它的各种各样的美。他的这一敏锐的学说,是他的古典主义的根据。而这种特征也不是俄罗斯精神的,同样是个意外。

五、维·伊万诺夫的艺术理论、混合性与女性因素

伊万诺夫在文集《垄沟和地界》中收录有一篇《关于艺术的界线》。别尔嘉耶夫对其加以专门论述,阐释其艺术理论。别尔嘉耶夫认为,在文中伊万诺夫发展了一系列艺术理论,但有一个主要观点,即人是向上走,而艺术家永远是向下走;艺术形式总是下降的结果。上升本身不能创造艺术。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的理论有很多正确的东西,这是艺术创作的最好的现象学。伊万诺夫的艺术原理甚至可以扩展和推广到整个文化,一切文化创造。一切文化都是下降。文化创造的背后暗含着人的上升,但是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存在这种创造性上升的阻力,都是向下的,倾向于此世。无论科学、国家、经济、家庭,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是下降,都是通过适应此世而形成有限的形式。科学是认识的下降,家庭是爱的下降,国家是人类沟通的下降,等等。别尔嘉耶夫认为,伊万诺夫关于下降的全部学说不是别的,而是永远巩固此世的文化,赞美它的美好形式。一切客体化都是下降,是学者、艺术家、国务活动家的下降。持续的升华就是突破此世的界限,走出文化、艺术和科学、国家和家庭等的界限。这是英雄的道路,是神圣和天才的大胆志向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经典”,没有一种经典的形式。突破到这条道路上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尼采和易卜生以及所有那些造成世界文化危机的人,所有那些渴望创造新生活、新存在而不仅是新的“科学和艺术”的人。这些人预感到旧的一切的结束,新事物正在诞生。他们敏锐又病态地感觉到创造的悲剧:向上的创造的激情总是向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突破,但是这种突破受到阻力而坠向旧世界,只能创造“科学和艺术”,国家机构和家庭形态,诗歌、哲学著作、法律改革。别尔嘉耶夫认为,坚持文化的古典形式魅力

的伊万诺夫,不了解这种人和艺术家、生活和创造完全合一的令人神往的热烈渴望。这是一种非常俄罗斯的渴望。伊万诺夫想要的宗教文化、宗教艺术,是一种仿古的向往,面向的是倒退而不是前进。他的这种对聚合性和希腊圣礼的渴望,借助的是文化反映,是第二性的哲学的存在。他希望当代艺术也能发挥古希腊时代的作用,而为此他又不愿作出任何牺牲——一切都应该通过古典美的形式。他没有彻底理解,具有精神聚合性的人要经过个人主义的分裂。古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聚合性只有在反映中、哲学中是可能的,而不是在原生活、原存在中。

伊万诺夫与同代人完全不同的是,他没有新的全球化时代来临的恐惧感、灾难感。他把所有事物都纳入自己语文学的第二性存在中,兼收并蓄、比较一切。别尔嘉耶夫认为他精神上是混合性的,然而却非常不幸地停留在外表,没有深入到实质。一切表现为他,他又表现为一切。他的表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美轮美奂,充满魅力。对于俄罗斯,拥有伊万诺夫简直是一种奢侈,比起他来,俄罗斯人就是一群乡巴佬。

但伊万诺夫身上有某种隐秘的、暗示他个人的原生活的、最真实的东西。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就是他个人、他的全部创作对女神宗教的向往。伊万诺夫的创作面貌使人有理由认为,他的生命之根深深扎在这种女性神秘主义的自发性中,他只能通过女性因素,通过引入女性天赋进行创作。别尔嘉耶夫认为,其引人入胜的《悲剧的实质》就是证明。“他对待女性的亲密态度不是男人的态度,更多是感觉到自身的女性基底——作为自己固有的松散却是存在的基底。他身上缺少男性的人类学的因素,人的精神。他本能地反感人的问题、人的主动性、人的男性创造的问题,这对于他是过于严峻、过于承担责任的问题。”^{[5]273}

伊万诺夫曾创作长诗《人》,按照其构思,《人》要写成但丁《神曲》那样。此诗缘于他对人在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艺术以及宗教中的体现的思考。其中的核心形象“一统的亚当”体现了全人类一统的宗教思想,似乎类似于弗·索洛维约夫的“全宇宙人类”思想。我们的这一推测也许可以在别尔嘉耶夫那里得到支撑,他在提到对伊万诺夫产生影响的人中,认为除了叔本华、瓦格纳、尼采外,俄罗斯的就是“与他有直接交往的弗·索洛维约夫”^{[1]202}。另有研究者也指出,他的处女诗集的面世也是得到索洛维约夫的提携和赞赏,并且索洛维约夫成为他的“缪斯的庇护者”和“心灵的牧师”。他

自己也称自己是受了神圣的“索洛维约夫的洗礼”^{[3]201}。因而他的长诗中的宗教思考也有着自己“牧师”的影子。伊万诺夫的长诗写得气势恢宏,也深得别尔嘉耶夫的肯定。但即便如此,别尔嘉耶夫依然认为,他的这一优秀诗篇也仅仅标志着他的混合性,他的兼收并蓄,他的撼动一切的女性的非凡能力。实际上,别尔嘉耶夫不止在伊万诺夫身上发现了这种女性因素,还在罗赞诺夫身上发现了“村妇性”,甚至俄罗斯民族精神也具有阴性特征:其圣母宗教,大地母亲宗教,都是女性的宗教信仰。^{[6]9}

伊万诺夫的时代是宗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但是他更多的是在多神教本能和多神教文化中操心人的基督教问题;因而他在俄罗斯文化和艺术中占有显著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俄罗斯宗教运动中却未能占一席之地。不过他是一个多成分混合、多层次、综合的人,精致而优雅,充满魅力——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意外。

(更正:笔者在本刊2019年第3期发表的《俄国文学的几场争论》中,第2页“凡此种种都意味着

1947—1948年间”,由于笔误,“1947—1948”应为“1847—1848”,特此更正,文责自负,与刊物和编辑无关,并特向读者致歉。)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M]. Москва, 2000.
- [2] Бердяев Н. А.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M] //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4.
- [3]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III) [C]. 谷羽, 王亚民, 等译.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
- [4] Келдыш В. А.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Книга 2)* [M].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1.
- [5] 别尔嘉耶夫. 文化的哲学 [M]. 于培才,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文中参考该译本, 个别处根据原文有改动)
- [6]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 [M]. 汪剑钊,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n Accident in Russian Culture

——Berdyayev Comments on Vi Ivanov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Vi Ivanov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Russian culture. An expert in Greek culture, especially, he was a versatile person with Renaissance style, and he has led the Dionysus religious school in Russia, which has an impact on many people. By virtue of hi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Ivanov and his sharp philosophical vision, Berdyayev expounds Ivanov's mixed spiritual qualities—that Ivanov is a poet of “Alexander Poetry”, ancient Greek linguist, Greek religious expert, thinker, theologian, theosophist, political commentator, and mentor of young people—and reveals his unexpected importance as an accident in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s: Berdyayev; Vi Ivanov; Russian culture; ancient Greece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谭旭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外少儿图书大量引进,原创儿童文学发展受限;儿童阅读意识增强,但商业性儿童阅读推广减弱了其力量。儿童文学市场化、类型化、娱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的文体不平衡和作家队伍“阴盛阳衰”的现象;儿童文学理论跟不上创作,对创作无法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转变儿童文学的立场,改善儿童文学的环境,调整儿童文学的价值尺度。

关键词: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对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07-05

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前夕,全国有30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并且在全国560多家出版社中,有130多家出版社设有少儿读物编辑室或出版少儿图书,为全国少年儿童提供各个年龄阶段需要的图文并茂、品种齐全、制作精良的图书天地。^[1]到了2017年,少儿图书占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比重达到24.64%,依然是图书零售市场规模最大的细分板块,动销品种数为25.93万个,参与少儿出版的出版社共有556家。少儿出版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对整个图书零售市场增长贡献最大的细分类别,2017年图书零售市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少儿图书。^[2]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少儿图书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占比25.19%,而在20年前,这一数据还不到10%。^[3]可见,少儿图书出版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特别是2012年以来,“儿童文学”一直是一个热词,随着少儿图书出版的急剧升温而频频成为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对象。无论是每年元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四月的世界读书日,还是八月份的全国书展等,少儿图书出版尽显风光,儿童文学作家往往是书展上最忙碌也最风光的角色,儿童文学市场空间越来越大,儿童文学创作让人

不得不刮目相看。

一、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问题

应该说,儿童文学创作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取得了可贵的成绩,出现了几代优秀的作家、研究者和出版人,涌现了曹文轩的《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沈石溪的《狼王梦》、黄蓓佳的《中国童话》、刘先平的《圆梦大树杜鹃王》、彭学军的《腰门》、伍美珍的《巧克力味的夏天》等一些质量比较高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认真审视,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推广,都存在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少儿出版迎来了高峰,但原创儿童文学发展还受限制。据业内数据,从图书品种上来看,少儿图书出版自2012年起连续5年保持在3.6万—4万种之间;从市场规模来看,少儿图书已成长为每年120亿元的大市场,并且连续16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从市场份额来看,2016年少儿图书的零售渠道销售码洋占比首次超越了社科,成为图书零售市场(除教辅外的一般图书)的第一大板块。现在纸媒出版总体在往下走,但少儿图书出版逐步升温。出版行业内的人都知道,纯文学出版目前在整个出版里占的份额也就2%左右。但少儿图书出版却占

收稿日期:2019-06-02

作者简介:谭旭东(1968—),男,湖南安仁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意写作与儿童文学。

了24.64%，且2018年少儿图书出版零售也增长了13.74%，这种持续增长是非常惊人的。^[4]少儿图书出版里，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少儿图书一半的份额，可见儿童文学创作赢得了极大的市场空间，也给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靠写作致富的诸多机会。明天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苏少儿出版社、湖南少儿出版社等30多家专业少儿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的原创儿童文学图书，而且市场效益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少儿图书出版也有一些问题，即引进国外版图书很多，投入很大，尤其是童话、儿童小说和绘本的引进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儿出版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是版权引进。据统计，1995年至2004年10年间，我国引进国外少儿图书的版权从1664种增加到10040种，平均每年增长25%，引进版图书占少儿图书总量由2.29%增加到了20.5%。而这期间，全国少儿图书品种每年增幅只有5.37%；版权引进输出比多数年份在10：1左右，最高时为15.5：1。^[5]2017年少儿图书引进和输出之比为1.9：1，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引进少儿图书相对还是主角。很多从欧美和日韩引进的少儿图书，都打着“经典”的旗号，有过度宣传的嫌疑。过度引进欧美和日韩少儿图书，使得图书市场很热闹，但对原创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造成了空间挤压，阻碍了原创儿童文学的快速发展。

第二，儿童阅读市场开始形成，但主要是依赖商业阅读推广。进入新世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的大城市，民间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越来越多，而且商业化阅读推广机构越办越多，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与作家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虽然从客观上推进了全面阅读，但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如一些少儿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包括发布的少儿图书榜单，其实就是变相帮助出版社卖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推广。大家都知道，少儿图书馆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也是公益阅读空间，少儿图书馆参与商业阅读推广是违背图书馆最基本的办馆宗旨的。还有一些出版社和书店合作，带着作家进校园签名卖书，这也是不合适的。郑渊洁多次在博客上批评校园签售，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儿童阅读文化的建设不能单靠商业阅读推广，而要依赖政府、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商业阅读推广很难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因为商业阅读推广首先是要考虑赢利，在赢利思维下，推广的标准就不会按照好书或经典的标准。

第三，儿童文学市场化、类型化、娱乐化现象越

来越严重。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来看，市场化、类型化和娱乐化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从2017年开卷公布的实体店和网店少儿畅销书TOP100的榜单中可以发现，两大榜单均以“系列图书”为主。网店方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米小圈上学记”系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天才宝贝早教系列”丛书等占据榜首；实体店方面，“米小圈上学记”系列、明天出版社的“笑猫日记”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系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占据畅销榜多个席位。“系列图书”的畅销也印证了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儿图书出版类型化与市场化、娱乐化的一体化趋势。现在少儿图书出版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出版社和出版机构为了迎合小读者的流行趣味，出版“植物大战僵尸”等系列网络游戏故事书；而一些作家为了市场开始写各种搞笑的故事和网络游戏故事，使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品位越来越低，这种现象值得警惕。还有各种童书排行榜，都是模仿社科畅销书的市场化策略和娱乐化形式，来推动少儿图书商业化的。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上每年有多种商业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其背后都是出版社的营销在助力，而不是从文学审美和语文教育需要的层面来推动儿童阅读的。商业化、类型化和娱乐化现象值得高度警惕，因为这会导致过度娱乐的、缺乏想象力和诗意的少儿图书大肆横行，从而拉低儿童的阅读水准，也会导向少儿图书出版失去追求经典的品格。

第四，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的文体不平衡现象。从儿童阅读来看，应该要追求多元化，也就是说，孩子不但需要读童话、小说、生活故事，也需要读散文、儿歌、诗歌、寓言和科幻文学。但现在像“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米小圈上学记”系列这样的小学生“生活故事”成了儿童小说写作的主体；不少作家知道小学生偏好读故事，尤其偏好读校园幽默生活故事，于是，他们认准读者需求，完全为市场写作。目前，全国专心创作适合亲子阅读的幼儿文学和写适合初高中生阅读的少年小说的作家不多，且出版的儿童诗集和儿童散文集则非常之少。为了推动儿童诗阅读和儿童诗教，王宜振、邱易东和谭旭东都主编过一些儿童诗集，他们也创作儿童诗，但有限的儿童诗创作和出版不能满足儿童诗教。因此，书店里出现了成堆的儿童生活故事，尤其是幽默、搞笑和网络游戏故事，却很难见到儿童诗、儿童散文和幼儿文学的图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很少有人专门

为小学低年级学生写作,所以适合小学低年级孩子的读物相对欠缺,书店里多是《三字经》《弟子规》和唐诗、宋词的拼音版;原创绘本和桥梁书创作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难以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

第五,儿童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所谓的“阴盛阳衰”现象。目前,国内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女作家占比例很大,尤其是中青年作家中,势头很旺、市场反响好、且风格鲜明的大部分是女作家,如彭学军、伍美珍、郁雨君、杨红樱、汤素兰、萧萍、谢倩霓、晓玲叮当、庞婕蕾、王勇英、商晓娜、殷健灵、王一梅、杨筱艳、徐玲、曾维惠、李姗姗、保冬妮、李秋沅、葛竞、章红、李丽萍、陈梦敏、毕然、魏晓曦、胡巧玲、王蜀、李秀英、王玲、喻虹、陈丽虹、黄宇、王立春、张菱儿、龚房芳、汤汤、米吉卡、金朵儿、闻婷、邹华英、雨兰、许诺晨和王璐琪等。每次全国图书订货会,儿童文学女作家往往是最风光的,杨红樱、伍美珍、晓玲叮当、汤素兰、郁雨君和庞婕蕾的儿童小说和童话,很多都是畅销书,且特别受到小读者的追捧与喜爱。相比之下,男作家数量要少,在畅销书榜单里,虽然有郑渊洁、曹文轩、沈石溪、杨鹏、薛涛、伍剑、余闲和彭绪洛等,但绝大部分儿童文学男作家的作品的读者效应难以和女作家作品相比,于是,儿童文学创作显得过于阴柔,缺乏刚性之美。

第六,儿童文学出版和营销生态出现新变化。21世纪初,就有人预言少儿图书出版因为市场空间极大而进入到了“群雄争霸,你死我活”的局面。^[6]2017年,儿童文学在整个少儿图书市场中占比为29.59%,尽管比2016年下降了3.87个百分点,但依然是少儿图书市场的最大细分门类,也是出版机构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2017年儿童文学图书的增长率为7.16%,低于少儿图书市场整体21.18%的增长率,在少儿出版各细分类别中增速最低。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其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儿童文学图书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线下渠道(地面店销售和校园签售),特别是进校园直接与读者面对面营销,而线下渠道增长明显低于线上渠道(网店销售);另一方面,许多非专业少儿社和民营文化公司通过高流量的引进版图书和IP改编图书大举进击少儿出版市场,抢占了儿童文学的部分市场份额。由此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出版和营销发生了生态变化。特别是微博、微信和微信公众号出现后,儿童文学出版和营销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融合了,而更多的是融媒体的行为。

第七,儿童文学理论跟不上创作,对创作无法起

到应有的引导作用。目前,全国高校中文系专门从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专家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朱自强、温州大学的吴其南、上海师大的梅子涵、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卫平、安徽大学的伍美珍、上海大学的谭旭东、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晖、东北师大的侯颖、湖南师范大学的汤素兰、兰州大学的李利芳、咸阳师范学院许军娥、昆明学院的余雷等十余人,其中,朱自强、梅子涵、吴其南等年逾六十,而大学中文系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生的导师则不到十人。其他还有韩进、安武林、李东华、萧萍、李学斌等几位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全国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总共不超过二十人。在80后中,真正愿意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极少,基本上是为出版写书评。令人惋惜的是,有几位年龄大的研究者进入新世纪后不再专心于理论研究,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性阅读推广活动中,对最新的创作不了解,不跟踪,也难以有独到的见解。还有的评论家热心于写书评,只要出版社给钱就说好,有的甚至成了劣质童书的推销者。这些,都令人担忧。真正的儿童文学理论应该有探索精神,有原创意识,更要有独立的品格,还要对童书创作和出版起到引领作用。

二、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对策

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看似繁荣,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视。某种程度上说,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以上问题不解决,即使一时取得了市场的繁荣,最终还会走下坡路,而且随着读者越来越具有阅读智慧和鉴赏能力,原创儿童文学必然进入一个瓶颈。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角度来看,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业的发展是与国家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紧密相关的。发展原创儿童文学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精神成长,也直接关系到母语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建构。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有儿童立场,要正确认识儿童。这是儿童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创作区别开来的一个审美关键词。有专家如此说:“认识儿童是理解儿童文学本质的关键,没有对儿童的认识就没有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一方面会忽略儿童的感觉、知觉、情感、心理和精神,另一方面也降低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个体童年期的存在价值,把丰富复杂的儿童个体个性化概念化。”^[7]儿童的立场,就是要有儿童视角。换句话说,就是要用孩子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用孩子的头脑来思考世界,来理解成年人的社会,来实现童心的交流。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从骨子里理解童心,敬畏童心的,它不但要关注儿童成长,还要

表现儿童成长,更要有助于儿童成长。大家都知道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这篇作品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经典,不是因为它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愚昧和荒诞,而是因为它礼赞了童心。当皇帝、大臣、裁缝和国民都愚昧无知、自欺欺人之时,只有孩子说了真话,揭穿了成年人世界的虚伪、无知和荒唐。因此,与其说《皇帝的新装》是批判皇帝,不如说它是在礼赞童心世界之纯净,讴歌孩子之纯真,告诉人们:世界即使再荒唐,再可怕,只要有孩子,就有希望。因此,儿童的智慧可以点亮这个世界。安徒生之所以成为世界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也是因为他的作品里对童心有着敬畏和呵护。

第二,儿童文学的语言一定要纯正,要能真正表达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对世界的想象,对世界的期待。儿童文学的语言不一定是孩子的语言,它更不是扭捏着嗓子学孩子说话,但儿童文学的语言一定是孩子很喜爱、很愿意亲近的语言。现在儿童文学界有些作家刻意追求优美,把语言写得很花哨;有的作家笔下的语言很粗糙,这都是对儿童读者不负责任的。童年的阅读会影响一生。给儿童的读物,都要尽可能语言规范,符合语法,而且还要朴素、流畅,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如冰心的《寄小读者》,这部现代儿童散文集语言亲切、质朴,没有过多的修辞,都是本真的、诚恳的与儿童交流的方式;英文版的《王尔德童话》,语言非常纯正,是最标准的英语;还有英文版的《哈利·波特》的读者,语言也很通畅、简洁,符合儿童阅读。阅读其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也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好的作品,语言越流畅,越朴素,越适合朗读;而且越是好的作品,想象力越丰富,情感更深沉。

第三,儿童文学要有基本的价值关怀,要有爱,有希望,有教育意义,有生活指导性。有些儿童文学作品语言很美,但内容空洞,显得矫揉造作,给小读者“虚伪感”;有些儿童文学一味地搞笑,其实是“段子文化”“快餐文化”;有些儿童文学迎合市场,像劣质产品一样,让孩子很容易购买,也很容易消化,但并不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儿童小说《窗边的小豆豆》,一直高居当当网、京东网的童书排行榜第一名,不少人感到很奇怪,其实只要读了一遍,就明白它为什么会如此畅销了。因为,《窗边的小豆豆》写出了儿童想要的生活,里面的巴学园,就是孩子想上的学校。可以说,黑柳彻子以这部佳作道出了儿童文学的真谛。真正的儿童文学不是简单描绘孩子身边的生活,把校园的、家庭的故事很浅地叙述出来,而是要展示一个儿童想要的世界,

一个给孩子希望和理想的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一定不能偏离基本的价值尺度,既然选择了为孩子写作,就要真正呵护童心,而不是利用孩子,更不能欺骗孩子。

第四,儿童文学对儿童生活的反映不能太平面化,太简单化,而应是多层面的。自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界普遍把儿童生活和儿童幻想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儿童来说,幻想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应该说,儿童的生活有三个层面:一是他们的幻想生活,即每个孩子都有幻想,都爱幻想,都会过幻想的生活;二是他们身边的生活,这是儿童所处的现实生活,即亲身经历的生活;三是他们向往的生活,即儿童的理想世界。现在有些儿童小说只写了儿童身边的生活或身处的生活,虽然语言和情节生动活泼,但没有展示儿童的幻想生活和他们向往的生活,因此对儿童生活表现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其精神召唤力自然也不够。从《窗边的小豆豆》《秘密花园》《夏洛的网》等西方儿童文学经典来看,基本上都有对儿童生活三个层面的表现。

第五,要善于向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学习、借鉴。欧美儿童文学的发展比我国至少早 200 多年,19 世纪就涌现了大量的童话、儿童小说经典,也涌现了优秀的儿童诗作品。今天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胡桃夹子和老鼠王国》《秘密花园》《水孩子》等,都创作于 19 世纪。20 世纪欧美不少经典如《彼得·潘》《青鸟》《假话国历险记》《小王子》《童年》《长袜子皮皮》等,也滋养了中国几代人的童年。叶圣陶回忆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时说过:“我写童话,当然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8]分析现当代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经验,不难发现,他们一般从小就大量阅读了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加上大学或工作后主动学习中外儿童文学经典,对英、美、日儿童文学有比较多的了解。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有很好的阅读积淀的,一定对经典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看不到更开阔的风景的。

第六,要规范少儿图书出版,加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新世纪少儿图书出版非常热闹,前述数据显示,全国 558 家出版社中已经有 556 家出版社从事少儿图书出版,还有数以千计的民营文化公司也做少儿图书并涉足儿童文学出版。业内

人士研究表明,我国图书零售市场有超过 1/3 的增长来自少儿图书。然后,在各大电商和年终畅销榜上,除了少儿文学市场,其他细分版块里,引进版图书比例依然占据了 80% 以上,另不到 20% 的原创产品里,仍有 50% 以上是同质化严重的公版书,真正有策划思路和出版价值的作品凤毛麟角。^[9]可见,少儿图书更需要规范,以避免重复出版,也避免恶性竞争,同时,也能做好原创资源的分配与挖掘;要加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鼓励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程,有基础和实力的高校要组建儿童文学和少儿图书出版研究团队,招收儿童文学和少儿图书出版研究生,培养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人才,形成学术影响力。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上,少儿图书出版、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教育及理论研究一直是其最大的支撑性力量。因此,儿童文学创作要发展,一定少不了少儿图书出版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支撑。

三、结语

回顾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自然不能否认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其发展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迎来了新的变革,出版业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传统的少儿出版走向知识付费服务的正途,儿童文学作为文化创意产品,有着诱人的市场前景与经济价值,但我们还

要看到儿童文学还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因此,社会各方面都应该行动起来,抓好原创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重视儿童的阅读和儿童阅读文化的建设,为儿童赢得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不但有助于推动国家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助于保持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 [1]海飞.童书海论[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1:11-12.
- [2]2017年童书板块持续增长,成图书市场主要推动力[N].出版商务周报,2018-01-22.
- [3]余若歆.少儿出版持续火热背后的几点冷思考[N].出版商务周报,2019-03-11.
- [4]海飞.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N].出版商务周报,2019-03-19.
- [5]李学谦.把握新趋势 发力走出去[N].北京: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3-22.
- [6]谭旭东.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290.
- [7]侯颖.论儿童文学的诗性品质[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8:3.
- [8]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C].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4.
- [9]张萌.新市场环境下的原创童书的研发与运营[J].出版广角,2019(4):33-3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al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TAN Xu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igi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ulting from the vast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that commercial children's reading has on children's awareness of reading. The marketization, typif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re are serious stylistic imbalanc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more female writers" among the writers;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creation, and neither can it play a proper guiding role in the crea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posi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djust the value scal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centu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developmental countermeasures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文学风貌

施新佳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要: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思考着如何自处与他处,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文化救国的自我期许使他们延续了“五四”思想启蒙传统,具体表现在:他们发出救亡宏音,也不忘体恤个体生命;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又思考着生命存在的样态;赞扬农民、拷问自我,又对农民与知识分子爱恨交加。种种言说彰显出抗战文学中的学院派风貌。

关键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份定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12-05

战争年代,抗战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知识分子迎着时代的吁求,承受着自我的拷问,西南联大人此刻也焦虑着如何自处与他处,动荡不安的战时生活曾激发起他们投笔从戎的热望,一些师生提倡实行战时教育,增设战时课程,甚至走到了十字街头,奔赴了抗战前线;即便没有走向沙场,无数师生也热烈地为抗战呼号,努力从华夏历史和民族精神中攫取激发抗战热情的因子,创作了大量高扬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和国民政府发布的“战时如平时”的要求,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文化救国的自我期许,使他们在闭塞的内地致力于笛吹弦诵,兢兢业业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随之,知识分子自近代社会以来习用的审视与个人的声音未在战时消失,师生们延续着“五四”启蒙话语,在抗战时期依然执着于个体诘问、现实批判与精神玄想,对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书写,也展现出战时文学中的学院派风貌。

一、抗战呼号中的个体诘问

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激发起中华儿女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坚定昂扬的战斗精神,师生们以文学作品表达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赞叹民众的觉醒与反抗意志。穆旦的长诗《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赵瑞蕪的诗歌《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表

现了空袭时人们的愤慨、勇气和反抗;辛代的小说《九月的风》、秦泥的诗歌《碉堡与白云》、萧荻的诗歌《最初的黎明》歌咏战争中人们奋勇前进、斗志昂扬的精神;袁可嘉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表达了人们英勇、决绝的抗争姿态,传递出战争必胜的信念……西南联大师生们的作品表现人民众志成城的反抗决心,努力从民族精神中寻求抗战的力量,但在紧贴现实、群体救亡的宏大话语中,他们也对个体生命表现出了难能的人性体恤,对个体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执着的诘问,某种意义上,这部分文字更具特色。

李广田的小说《活在谎话里的人们》讲述两个老人在儿子离家后,整日盼望儿归,老头子得知儿子在战争中死去,为安慰老太婆,他编织了儿子娶妻生子幸福生活的图景,老太婆以此为精神支撑,获得了短暂的心理安慰,但儿子迟迟不见,让她再度绝望,最终抱憾而死,丧妻后的老头子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中,认真细致地为儿子归家做着准备。同样,向意的小说《许婆》,林元的小说《海河庄》也表现战争对人们灵魂的戕害。此外,在刘北汜的小说《山谷》里,伢子爷爷隐瞒了儿子因修筑防御日军的飞机场而被炸死的事实,试图保护孙子的幼小心灵;在白炼的小说《恨》里,留下了因战争失去家人的小女孩会

收稿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南联大与‘鲁艺’文学思想研究”(18ZWD439)

作者简介:施新佳(1982—),女,黑龙江鹤岗人,文学博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走向何方的问题；在田塍的小说《这就回到家了——纪念春妹》里，讲述着父亲在逃难中失去爱女是何等的撕心裂肺……这些作品没有表现血雨腥风的战场，而将着眼点放在了普通人身上，触及战争环境下个体生命存在问题，着重思考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灾难乃至死亡。

如果说战争给无数老百姓带来了难以抹除的心灵创伤，那么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意味着什么，杜运燮的诗歌《命令》给出了答案。战争中，“命令是必要满足”^[1]，士兵必须服从命令，等待他们的也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死掉，要么残废成为英雄。如果说，作为鲜活的个体，士兵只能宿命地接受或死或残的结局，那么，死了之后，又会遭遇什么，杜运燮持续地关注士兵的存在状态，诗歌《埋葬》勾画了战争时期无数人死掉，悄无声息地腐烂的情景，死后若是有幸被埋葬则几乎成为妄想。诗歌《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里的“死老总”想到死后要被狗、野兽、黑鸟等撕扯吞食，便感觉彻骨的寒战，于是恳切地希望：“给我一个墓，/随便几颗土。/随便几颗土。”^[2]¹¹³⁻¹¹⁴“死老总”对死后肉身被吞噬的恐惧是如此强烈，请求的口吻又是如此哀切，足以见出人们对最基本的人性需要难以实现的痛苦与悲哀。穆旦也以在滇缅大撤退中退入野人山的经历与感受，创作了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该诗以直面战争的勇气，书写残酷的野人山战役，真实地再现了1942年在滇缅大撤退中，士兵在原始森林里由于饥饿、毒虫、痢疾、疲惫、恐惧而成群死亡的惨状，诗人自身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炼狱。在抗战情绪普遍昂扬的时期，穆旦真实地展现了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饥饿、恐惧和绝望感受，揭露了极端情绪对人的伤害，也对战争的残酷性做了客观的估计。毋庸置疑，穆旦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坚定的正义感，他反对日本侵华，为此走到了抗战的前线，但战争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又使他厌恶战争，流露出反战的情绪。

战争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士兵，也牵涉到汉奸与日本侵略者，出于对普泛人性的正视与尊重，师生们还描写了他们，并可贵地深入到其内心深处。辛代小说《纪翻译》表现出汉奸的内在悲哀；卞之琳的小说《一，二，三》讲述日本兵、朝鲜人、“皇协军”人性的相通。王佐良的小说《老》中的田中少佐强撑着胜利者的姿态，却难以掩饰内在的恐慌。西南联大师生描写日本人，多将其放置在战争的非常情境中，描摹其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展现其内在的悲哀与惊悚，突破了一般小说对侵略者凶神恶煞的形象刻画，呈现出真实、丰富的人性图景。一些小说，

甚至显现出一定的怜悯与同情，如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中的《春回即景二》，便流露出对侵略者生命个体的精神关怀。

西南联大人的创作展现了抗战英雄的壮举，关注群体的抗战热情，更注重思考个人的存在状态，关注普通人在战事下的生活变化与精神感受。他们延续着“五四”人性书写的传统，从个体的角度介入战争，尊重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关怀人在战争中的血泪创伤，体恤人在极端状态下的本能感受。他们揭示出战争对生命个体的伤害，表现出对战争负面效应的认识，一些作品还流露出反战的意味，这在需要调动全民抗战情绪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某种不合时宜。但是，毋庸置疑，这种深蕴着人性关怀的思考，体现出了浓郁的人文情怀。

二、批判现实与精神玄想的合流

康德认为，启蒙不仅是人类要从“不成熟状态”中成长起来，同时要敢于认识、敢于批判。福柯也认为，“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3]⁴⁴²，可见，启蒙与认识、反思、批判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五四”文化先驱开启的启蒙传统，促使知识分子发挥引导民众、认识社会、批判痼疾的效能，由士大夫入世传统而来的担当精神也推动师生们义无反顾地指斥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师生们也在自然中发现了生命的律动和万物的关联，思考人类的存在形式，追求理想的、合乎本性的生命样态，这些偏于精神玄想的话语与批判现实一道，共同指向了理想社会的构建。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尚能赢得民众的信赖，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日益暴露出了腐化堕落的面目。1941年开始，物价飞涨使广大民众的生活陷入窘境，西南联大的师生也一贫如洗，生活已经濒于绝境。李广田的小说《欢喜团》《木马》、散文《悔》《两种念头》表现了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灾难。一方面是广大师生无衣无食，另一方面却是国民党官员营私舞弊，大发国难财。杜运燮的诗歌《追物价的人》写道：“‘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腿走，/现在不但有汽车，还有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提拔他，搂他，/他的身体便如灰一般轻，/飞，但我得赶上他，不能落伍。”^[4]¹⁰⁷此外，王季的散文《纵横篇》、俞铭传的诗歌《金子店》、萧荻的诗歌《不要春天》，也抨击着社会的贫富悬殊。国民党不仅在经济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政治上也是独断专行，官员腐化堕落、胡作非为。军事上，国民党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消极抗战，节节败退，使大片国土落入敌手，这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普

遍声讨。李广田的《古国的传说》、穆旦的《悲观论者的画像》、罗寄一的《珍重——送别“群社”的朋友们》、沈叔平的《欺骗》、王季的《雾季的悲哀》、王景山的《颂扬之类》等,都表示要争取民主与自由。在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中,闻一多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冯至的《招魂——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卞之琳的《血说了话——悼死难同学》,更是严厉谴责暴徒的恶行。

作为引领民众的启蒙者,知识分子天然有着道德优越感,有着发声批判的冲动,尤其是面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更强化了他们与外界的紧张对峙情绪。师生们持守着这种心理定位,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和“五四”批判现实的精神,以大量的作品描述社会的黑暗落后、民众的艰难困苦,也批评着国民的麻木冷漠。如果说,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是师生们积极介入现实的表现,那么这一时期大量思考生命存在的形态的作品,则是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的探询,显现出形而上的精神追问。

在亲近自然中,知识分子发现了宇宙万物的生机和活力;在与自然生命同一律动的过程中,他们认识、理解了自我,找到了灵魂的家园与归宿。穆旦的《我看》根据内迁征程中的所见所感而写,诗人描绘了他眼中的自然:春风揉过青草,飞鸟吸入晴空,面对这幅充满了青春气息的画卷,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勃发与张扬。相比而言,人的欢乐、忧戚、迷惘、哀愁又是多么微小!自然浩瀚无边、永恒存在,短暂的生命只能“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5]39},让生命融入自然之中,“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5]40},由此,个人的生命才能超越物理意义的生死界限,获得永恒。在诗歌《园》中,穆旦吟咏着园子的自然景物,在大自然的明媚与幽静的景色里,生命随之舒展欢畅,但心中的忧郁使这秀美的景色又变得色调多元。景色的变化与永恒,人生的迁徙与停留,让诗人感慨:“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6]41}如果说,穆旦在蒙自吟咏自然的诗篇还有青春的欢歌与忧伤,那么,诗歌《春》在对春的描绘中,表达着年轻人心灵的躁动与不安。在春的召唤下,他渴望打破冰冷的桎梏,实现身心的舒展与自由。面对自然的浩瀚无边、生生不息,人类不可避免地感到自身的渺小、生命的有限。沈从文此时也创作了小说《赤魔》与《虹桥》,将自然与人类放在阔大永久的时空中加以体察,认为以谦卑之心尊重自然、崇敬自然是人类应有的态度。

人类在自然中可以实现身心的舒展与张扬,增

进生命的韧性与耐力,这合乎人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需要。40年代,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校园氛围和昆明乡郊的静谧祥和,激发起沈从文的生命思索。在每周往返于昆明和呈贡的乡村小路上,在一次次看云的山坡上,沈从文感受着战乱时期难得的心灵安宁,他沉潜到了精神深处,思考生命的样式。《看虹摘星录》便显示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形而上的哲思意味。当然,沈从文并非只是指斥社会上的情欲不净观,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思考人性、生命、存在的一个方面。他始终倾听着内在的心灵话语,追寻独特的生命体验,《烛虚》《潜渊》《七色魔》就通过人事的变迁感慨世事的无常,借具体事件寄托抽象的哲理思辨,希望借助美与爱,重铸人类的生存家园,唤起人的尊严和使命感。在《美与爱》中,沈从文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7]359}这种对于“美与爱”的倚重,不觉让人们联系起了蔡元培。一定意义上,沈从文继承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努力通过“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情,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7]362}沈从文以美、爱和理想的人性,构筑着文学世界,以期重塑民族精神和品格,这种精神追求与当时的批判现实之作共同指向了美好社会的重建。

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积极批判现实的同时,不断进行着哲学、心理学的思考,这些深邃丰富的体验,彰显出在多元文化思想的渗透下,知识分子自我认知与外界感悟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精神幻想,二者共同着眼于对社会现状的观照与省思、纠偏与整合,致力于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以及人的终极解放与自我实现。如果说,前者批判现实,是要打破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么,后者对美的倚重,对人的觉醒的企盼,也是以美育来解决国民性滞后的问题,最终也是面对社会人生,二者共同面向建设美好社会的旨归。沈从文便希望以健全人性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他说:“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力量的。”^[8]不可否认,那些拥有崇高理想、追求人性自由的作品,确实能使读者感受到生命力量的丰盈和民族新生的可能。

三、农民与知识分子的辩证审视

启蒙的核心内容是立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自“五四”以来,文学启蒙的对象首先是占人口

数量最多的农民。千百年来,农民一直被压迫、被奴役,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农民在思想上也烙着难以去除的“精神奴役创伤”。西南联大人以启蒙的视角审视农民的精神痼疾,但由于战争的缘故,批判同情之余,又不乏赞赏与敬佩。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笔下知识分子也呈现出或雄伟挺拔、或软弱无力的多副面孔。

千百年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抗战爆发后,数百万农民又走向战场,成为抗战的主力。随之,农民在社会的认知与评价体系中也发生了变化,形象逐渐高大起来,走上战场、壮烈牺牲的农民更是受到知识分子由衷地赞美。杨振声的《荒岛上的故事》、李广田的《子午桥》、向意的《兽医》、林蒲毕业后创作的《二憨子》等小说,都表现出了农民的觉醒与成长。尽管知识分子深知为战争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理应得到尊敬,对农民的觉醒及其无所畏惧的抗日精神也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但是在启蒙者的审视下,农民的保守、麻木、蒙昧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穆旦在诗歌《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中,描绘他在各地看到的“广大的中国的人民”^[9]，“他们流汗还挣扎、繁殖!”^[9]向意在散文《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痛惜老百姓吸食大烟、遭受匪祸,感叹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的苍白、孱弱和瘦削?”^[10]¹⁴⁴知识分子延续着“五四”书写农民的传统,以启蒙的眼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结合战争时代的变化,赋予其悲剧以新的表现形态。按照现代启蒙思想,知识分子发现农民兵缺失基本的人格尊严,对其处境和遭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悲悯。杜运燮在《草鞋兵》《一个有名字的兵》中,悲叹中国农民兵从未获得基本的人的权利与尊严,终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奔命。穆旦在离开西南联大后的1945年创作了诗歌《农民兵》,认为他们是被欺凌与压榨、沉默的一群。同时,知识分子又难以忽略农民兵肮脏、愚昧、无知、麻木等缺点。这种矛盾、纠结的态度流露在王佐良的作品中,他的诗毫不掩饰对农民兵“直立的身子”^[11]⁵¹²的鄙视,在作者看来,这是思想愚笨的表现,而“愚笨是顽强/而不倒的,固执地,像你我的怪癖”^[11]⁵¹⁴,愚笨是民族不可遗忘的历史,“那点愚笨却有影子,有你我/脆弱的天秤所经不住的/重量”^[11]⁵¹²。事实上,正是依靠农民兵走上战场、保卫家园才换来人们的和平生活,历史也正是依靠这些愚笨的战士才有所开创,“于是你的兄弟和我的丈夫/愚笨而强壮的男人,昨天/还穿了蓝布褂去叩头,今天/给虫蛀,人咬,给遗忘在长途,/背负着走不完的山,和城镇的咒骂,/给

虱子和疥疮,给你我吞灭”^[11]⁵¹³。农民兵的这种献身精神令知识分子自叹弗如!诗人一方面称这些农民兵是“贱命的”,另一方面又将他们视为亲人,称其为“兄弟”“丈夫”,矛盾纠结的态度可见一斑。

以启蒙的光亮照耀世人的知识分子,引领农民从愚昧麻木中走出,但战争也使知识分子自身遭遇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思考着如何自处与他处。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使师生们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与古人产生了“南渡”飘蓬的情感共鸣,忧国忧民、感时忧世的人文情怀也使他们自觉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以坚韧的姿态和必胜的信念汇聚成鼎盛的气象,努力从古圣先贤身上寻找精神资源。冯至此时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讲的方式接近了杜甫,在冯至看来,杜甫超越了100个王维,因为相较于王维的隐逸,杜甫更加关怀民生、积极入世。冯至的散文《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和诗集《十四行集》之十二,盛赞杜甫对人们的精神引领。在诗歌《我们的时代》中,冯至认为在战争年代,知识分子仅仅延续人类的文明是不够的,还要分担人类的命运。

如果说知识者以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予民众以信念和力量,那么筋吹弦诵、著书立说则切实体现了他们文化救国的理想。此时,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致力于教学与学术。从1941年到1945年,教师们的科研成果最为突出,纷纷贡献出了自己重要的学术成果。冯友兰、金岳霖此时构建个人的哲学体系。身处南岳时期,冯友兰感慨:“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12]³基于这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解决当下社会实际问题的使命感,冯友兰凝聚成集人类、社会、自然、历史、思想、文化、哲学等多方面思考的“贞元六书”;金岳霖此时致力于写作《论道》,期望以此张扬中国之道,弘扬民族士气^①;闻一多、朱自清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闻一多完成《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楚辞校补》;朱自清写作了《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冯至致力于歌德、杜甫研究,完成了《歌德论述》《杜甫传》;卞之琳专攻莎士比亚……在研究撰写的过程中,他们寻找到了学者报国的路径。

一方面,知识分子能在扰攘的时代中寻求到学者的报国路径,传导给民众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展现出刚毅卓绝的精神气度;另一方面,师生们又和其他地域的知识分子一道开启了自我审视与质疑之旅。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鼓舞知识分子走向抗战;1939年1月,郭沫若在重庆文化

工作座谈会上作《战时文艺工作》的讲话,号召“文化人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13]12}。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深入抗战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趋势,西南联大的一些师生也对知识分子发出了严厉的责任。1941年,穆旦创作了诗歌《鼠穴》,将知识分子比喻为“鼠”,以鼠在外界环境下苟且偷安、软弱妥协的做法,暗指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严峻的语调隐含着诗人对知识分子的诘责。自我无力感和道德上的罪恶感在战争的映照下分外突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既无法走上战场与敌人厮杀,也不能在战争大后方起到救援作用,因此,他们真诚地否定自我,崇拜大众,试图改变过去悠闲的生活方式,身体力行地效仿工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思想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但随着战争的深入与长期化,文化人对自我的身份与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即知识分子是与军人不同的社会角色,话语方式具有独特性,具有与武装势力同等重要的力量。这种自我定位在西南联大得到高度的重视,使得知识分子升华起崇高的精神气度。

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观照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时,“五四”开创的思想启蒙传统得以延续。他们发出救亡宏音,更不忘体恤个体生命;他们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又思考着生命存在的样态;他们升腾起自身的精神气度,走向文化救国,指斥农民的落后与愚昧,又在战争的特殊氛围中对知识分子与农民爱恨交加。与同一时期的延安“鲁艺”文学相比,西南联大文学无疑是文艺紧密联系现实,服务于政治、革命的文学之外的另一种范型,呈现出抗战文学中的学院派风貌,其艺术探索与实践也显示出战时文学的多样风姿。

注释:

①冯友兰说:“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冯友兰. 怀念金岳霖先生[J]. 哲学研究,1986(1).

参考文献:

- [1] 杜运燮. 命令[N]. 大公报,1943-03-14.
- [2] 杜运燮. 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M]//诗四十首.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 [3] 福柯. 什么是启蒙? [M]//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4] 杜运燮. 追物价的人[M]//诗四十首.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 [5] 穆旦. 我看[M]//穆旦诗全集.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6] 穆旦. 国[M]//穆旦诗全集.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7] 沈从文. 美与爱[M]//沈从文全集(17).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8] 沈从文. 短篇小说[J]. 国文月刊,1942(18).
- [9] 穆旦. 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N]. 大公报,1940-10-21.
- [10] 向意. 横过湘黔滇的旅行[C]//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11] 王佐良. 诗·六[C]//闻一多全集3诗选与校笺. 上海:开明书店,1948.
- [12] 冯友兰. 新理学·自序[M]//贞元六书(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3]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Literature Styl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SHI Xinjia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thought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e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the self-expectation of cultural salvation of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made them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y issued the grand voice of salvation and did not forget to show solicitude for individual life; they criticized the unreasonable social reality and thought about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ey praised the peasants and asked themselves, and they both loved and hated the peasants and intellectuals. All kinds of statements showed the academic style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identity orientation

社会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惯性

——以墨白《局部麻醉》和汪曾祺《陈小手》中的人物为例

饶丹华

(河南省文联《南腔北调》杂志社,河南 郑州 450008)

摘要:墨白的中篇小说《局部麻醉》和汪曾祺的经典小小说《陈小手》,均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书写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局部麻醉》中的白帆和《陈小手》中的陈小手,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对其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均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墨白;《局部麻醉》;汪曾祺;《陈小手》;社会转型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17-04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其复杂人性的艺术魅力,以及由各种人性的交织而产生的不同的命运轨迹。循着他们的命运轨迹会发现:同一类型的人由于思维方式相同,命运也往往相似。这是因其生活环境相同而形成的相似的惯性思维所导致的。

社会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受大环境的影响而变得捉摸不定,缺乏明确的方向感。他们受困于出身决定的命运,又无能为力改变命运,于是,寄希望于通过终南捷径改变命运的人比比皆是。负累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底层小人物的生命负累尤其沉重。他们一旦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就像抓住自我救赎的稻草,急于卸下生活的负累,也会迷失曾有的人生的方向感。他们不明白:抓住机遇不等于没有负累,并且机遇永远伴随着风险;一旦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感,终究会被卷入命运的深渊,无力自拔。

这在墨白的中篇小说《局部麻醉》^[1]和汪曾祺的经典小小说《陈小手》^[2]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局部麻醉》中的主人公外科医生白帆,《陈小手》中的主人公产科男医生陈小手,都生活于社会转型时期,都是外表柔弱的男医生;作为医生,他们都医术高明,受人尊敬,尤其是陈小手,更是善良而侠义,堪称名医,但最终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们命运的

复杂多变,与时代及他们自身的性情和思维方式等均有一定的关系。

一、白帆的负累分析

白帆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后的医科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镇医院任外科大夫,由于家在农村,在镇上工作面临没有住房的尴尬,无奈之下与家在镇上并拥有多套住房的柳鹅结婚。小说中,母亲这样劝白帆:“我安排你跟柳鹅结婚,你要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咱乡下人,在镇上安个家不容易,只要人家不嫌弃咱,到头来,那片家业不就是咱白家的吗?”母亲想当然地把白帆妻子的“婚前房产”据为白家所有,这种隐性利益婚姻给白帆造成的精神创伤,使白帆失去了与柳鹅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他在这个家庭的存在感随着不和谐的婚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游离于肉体之外,魂不守舍。

白帆的母亲是底层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都被当作“外人”,她没有经济基础保证她的精神、人格的独立。她被迫把婚姻看作一生唯一的“事业”,不得不谋求以母凭子、老有所依的方式,巩固其在丈夫家的地位。白帆的母亲无意识地把这种惯性思维方式传递到白帆的精神血液中。依赖婚姻主宰命运的传统生活方式,影响了农耕社会中一代又一代人。这种惯性思维就像一条河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饶丹华(1964—),女,江西抚州人,河南省文联《南腔北调》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流,从白帆的母亲一直流淌到白帆的人生十字路口,白帆无力也意识不到母亲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或左右了他的命运,他甚至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来不及思考自己今后的命运,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母亲灌输给他的思维模式,无意识地接受了与柳鹅的隐性利益婚姻。这是白帆的宿命,也是白帆母亲的惯性思维导致白帆为了住房而结婚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镇里就业的农家子弟白帆,仅仅有了令人尊敬的镇医院医生这个工作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安居是他进城就业以后最大的奢望。住房是白帆和柳鹅结婚的基石,他们的婚姻处于实利主义背景下精神和肉体的游离状态。白帆本来是为了卸下生活的负累,享受生活的安逸,企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结果,他生活的负累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精神和肉体游离的状态下越来越沉重。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压得像白帆这样的农家子弟喘不过气来,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来安放游荡的灵魂。但是,依靠婚姻而获得的定居,给白帆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寄人篱下的苦涩和寒凉,心灵也得不到寄托。外表柔弱的外科医生白帆,钱不如邻居袁屠夫挣得多,与肥胖的妻子柳鹅神离貌不合,经过多年奋斗盼来单位分配住房,却被单位领导和竞争同事以他妻子有多套住房为由,剥夺了他享受分配住房的权利。白帆苟且获得了由婚姻带来的“定居”,却丧失了等待单位分配福利住房的机会。

时间跟白帆开了个玩笑,假如他当初没有为了住房与柳鹅结婚,而是耐心坚持过几年“流浪”的租房生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城镇住房的供需趋势,期待单位将来分配福利住房,也许他起码可以在镇里安身立命。白帆太受困于自己是否在镇上有住房,这是他和母亲的惯性思维酿成的急功近利式的死局。他们没有能力看清时代生活的发展趋向,无力挣脱模式化的人云亦云的生活。

二、白帆习以为常的自恋的精神状态分析

《局部麻醉》中这样介绍他人眼中的白帆:“瘦弱的外科大夫在这个镇子上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多少弥补了一些他在其他方面所丧失的自信。”

白帆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游刃有余,走下手术台的他,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处处碰壁,无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应对自如。白帆的命运格局太局限于小小的手术台,使他难以释放生命的活力和张力。身体瘦弱的白帆偏偏找一个身体肥胖的妻子,这显然是作家墨白对于这个人物接受实利主义婚姻的讽刺。

“定居”不是一定要居有定所,如果心不定,怎

么能“定居”?我们固然要直面小说中的“城镇住房等导致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这个时代背景,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个体对自我心理的调整,则需要当事人在困境中有取舍之间的担当。如白帆在小小的“手术台”游刃有余,走下“手术台”之后,也应把自己融入现实生活中去。

《局部麻醉》中,在时空交错下对白帆的心理和生活情景描写,呈现了白帆无法解脱工作和家庭的双重精神困境。“清冷的空气使他(白帆)渐渐从麻醉状态里清醒过来,他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出他在那个大都市里度过的一些快乐时光,那些美好的日子常常使他忘记自己所处的闭塞而偏僻的乡间。等他清醒之后他就会发出无奈的叹息。他知道,这里和远方的都市有着天壤之别,但远方的都市往往只存在于他的梦境之中。在他忧郁和伤感的时候,他都会深深怀念花园似的校园和慈祥如父的教授们。他知道,他今后无论怎样努力,自己的身心再也无法达到那种如梦的境界了,这或许就是他忧郁和伤感的根源。”已经走向社会的白帆,心智还停留在大学时代,精神上与单位和家庭都处于游离的状态。

小说中还有一些对奇怪病症患者的描写。比如,镇医院四号病房有饥饿症患者,瞌睡症患者。镇医院院长66岁的母亲怀孕5个月了要流产,这位“66岁的母亲”竟在手术台上哭着说要生下来。“医院里的四号病室,历来都住一些得了奇怪病症的患者,这在颍河镇一带,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往往用一种神秘的口气来讲述住进四号病室的患者。可白帆却对此感觉麻木,这或许是他见过太多奇怪病症的缘故。”白帆对奇怪病症的患者“感觉麻木”耐人寻味,“感觉麻木”与“见多不怪的淡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一个感觉麻木的人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时,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白帆在为院长母亲做引产手术时就感觉麻木,没有意识到更没有观察到院长在他面前处于尴尬、羞耻的境地,他居然“面带笑容,端着装有手术器械的瓷盘来到那位已经作了局部麻醉的女人身边,他看了院长一眼,但由于光线强烈,他没有看清院长因为他的笑容而变得发青的脸。那个早晨里,在白帆端着手术器械走近院长老娘两腿之间的时候,他面部的笑容使院长产生了不容解释的误会,那笑容像一把刀在院长的心里狠狠地割了一下。而年轻的外科大夫对此却全然不知,他十分从容地来到手术台边,开始了他的工作。”

由于白帆这一感觉麻木导致的疏忽,使得他在单位分配住房的资格,随后被院长找个理由取消了。

白帆能治疗人身体的病,但不了解人的心病。这样的人很容易自恋。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很难跨出这个“中心”去回头检视“自我”的不足和局限。这就是所谓的性情决定命运吧。白帆的心愿——在镇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就这样破灭了。

白帆大学毕业后在镇医院工作,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被领导误解和玩弄,而寄人篱下的婚姻生活摧毁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他在家和单位都没有归属感,很难融入家庭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大氛围里。他唯一感到亲切的是医院的手术台和那个声音像铃铛一样的女护士。没有归属感产生的孤独使白帆产生逃离这个镇的念头,“因为有一些南方的生活经验,他从心里瞧不起这里的人和物,尽管他曾经被这里的土地所生养,但他却把自己暗暗地视为一个南方人,他甚至盲目地用一个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来要求自己,使自己尽量做得与众不同。因而,他总觉得自己和这里的人格格不入。因而,他总觉得自己孤独无助,总觉得身边的这些人离他十分遥远”。白帆这种习以为常的自恋的精神状态,导致他经常精神恍惚。“这时他突然想到了麻醉,他想,或许麻醉这种方法能使他失去痛苦的感觉,这使他欣喜若狂。”麻醉自己可以帮助白帆暂时解脱眼前的失落型精神困境,甚至产生幻觉,但幻觉终归要消失,无法帮助他解决现实问题,更改变不了受他母亲的惯性思维影响而酿成的不幸命运。

三、陈小手的自负与不幸

19世纪以来,西风日渐,中国人学西医者日渐众多,男产科医生陈小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诞生了。在中国,医生从古至今基本可以说是高危职业。医生不仅要医术高明,还要有高超的为人处世的本领,不然,一遇到蛮不讲理的,就危险了。陈小手是“悬壶济世”的医生,但他为团长的太太接生却惹来杀身之祸。陈小手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可嘉,但也难免遭受思想观念陈旧者的非议。陈小手学产科时大概没学过“男性产科准则”,比方说“有权有势的男人的太太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任他医术再高超,他却不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男人心理,也没有认真领会中医前辈流传下来的金科玉律。如果他了解了,带一女助产士,或可免于死。陈小手之死的根本原因是:以团长为代表的男人们骨子里的封建男权思想——把女人当成男人的附属品。

陈小手为什么行医?这个问题在小说里讲得比较清楚,即产科医生少,都请“老娘”,“老娘”水平低不可靠,而女人学医几乎没有。靠“老娘”的土办法接生,对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健康安全非常不利。鉴

于民间对男产科医生的蔑视和陈小手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可以看出,陈小手不为名利,他当产科医生就是为了救人性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侠客。

《陈小手》开头是这样的:“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产科医生。”由此可看出当时的时代风俗,请“老娘”还要请熟悉的、固定的,除了熟知,还有吉祥的因素在内,因为“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会“接生顺当”。人们封建、迷信,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接受男性医生来接生的。对这种时代习俗,显然,陈小手是视而不见的,或者是忽略的。

在《陈小手》中,作为医生的陈小手是这样的:“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

陈小手和白帆都是身体瘦弱的医生,是产妇和病人可信赖的医生。作家这样设置他们的体格,也许是因为怜惜他们,希望给予他们同情与保护。

陈小手有时候会忘乎所以,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从他当产科医生那一天起,悲剧就已经注定。“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

人到了,一番忙活,大人孩子双双平安,陈小手不推辞主家奉上的报酬,也不计较报酬多少,洗净手,骑上马又走。“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

棱’……走远了。”不仅一般人有偏见，同行医生同样有偏见。但是难产的产妇离不开这样一位医生，他“活人多矣”的医术更是成为传说。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可以看出，陈小手成为传说的理由，他不仅医术高明，还医德罕见，把接生视为救人命，而且是两条命，专门喂一匹步伐又快又细又匀的“走马”。可以想象，陈小手骑着这匹浑身雪白的白马去接生，不仅是去救命，还是一道罕见的风景。在赶路 and 急救之外，陈小手应该还是很享受自己的医术人生。

可是，“悬壶济世”“活人多矣”的陈小手，在给难产的团长太太接生后，却惹来了杀身之祸。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陈小手相信自己的医术，况且对于他这样的医生来讲，救命第一，他好像不在意这种威胁。

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保了母子平安，而且“是个男伢子，少爷！”到此，一切大吉！

陈小手喝了两盅喜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团长觉得怪委屈。”

这个结尾，急转直下，非常令人意外，甚至令人震惊，有些契诃夫小说结尾的味道。这里所采用的

是团长的感知视点和世界观观点，从团长的视点看，这个结局是合乎逻辑的，符合他的身份和心理，是他的内心真实。这篇小说和汪曾祺小说中常见的“温情”“温暖”格调不同，它把人性的自私与“残酷凸显出来，令人感受到凄凉的美感”^[3]。

陈小手显然对那个时代的世事人心、尤其对权势之人，缺少了解与判断。这是酿成他命运悲剧的个人性因素。当然，陈小手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三、结语

文学即人学。汪曾祺和墨白都是具有底层意识与人文精神关怀的作家，他们关注社会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境况，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底层小人物悲悯和反省的创作态度。他们笔下的人物白帆和陈小手的人生经验，值得现实生活中试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底层小人物借鉴。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决定的，但机遇与挑战也给每个人带来机会，你的命运如何，与你自身的判断力和理性应对能力等，有一定关系。底层小人物要磨炼自己的意志力，摆脱惯性思维的桎梏，改变思维方式，认清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从生命困境中解脱出来，为自己的人生架设一座超越自我的“桥梁”，以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参考文献：

- [1] 墨白. 局部麻醉[J]. 花城, 1998(1).
- [2] 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精选[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 [3] 梁鸿鹰. 执子之手[J]. 上海文学, 2017(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Inertia of Fate of Low – class People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Taking Mo bai’s *Local Anesthesia* and Wang zengqi’s *Chen Xiaoshou* as Examples

RAO Danhua

(*Nanqiang Beidiao Magazine*, Henan Literary Federa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8, China)

Abstract: The stories of Mo bai’s *Local Anesthesia* and Wang zengqi’s *Chen Xiaoshou* both took place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hina, depicting the fate of low – class people. The living philosophy and the ways of thinking of the main characters, Bai fan in the novel of *Local Anesthesia* and Chen xiaoshou in the novel of *Chen Xiaoshou*,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s of their tragic fates.

Key words: Mo bai; *Local Anesthesia*; Wang zengqi; *Chen Xiaoshou*;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 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程 慧,徐 琼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以我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8—2017年中国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及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揭示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8—2017年,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主要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协调状态良好,其中东部地区主要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且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而中西部地区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前期平稳上升,后期波动剧烈,起伏发展。研究期内,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不大,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规律,2012—2016年空间演变较大,大多数省份均有所上升,分布集聚,而2017年又剧烈下滑,空间分布分散。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因素按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地理位置。

关键词:城镇化—旅游—生态;时空耦合协调;地理探测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5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21-07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化面临着重要转型。城镇化已成为政府工作的关键词,是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旅游业作为综合性和关联性产业,在促进产业联动、城乡发展、结构调整上具有极大的波及效益和辐射作用。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旅游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新时代下旅游业与农业的完美结合物,是乡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极点。但在旅游业作为促进城乡交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手段,与实现以人为本、城乡协调、绿色低碳为目标的城镇化相互交织,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的同时,环境污染,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接踵而来,给生态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在新时

代的背景下,探索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促进三者耦合协调发展应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科学命题,不仅有利于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加快城镇化进程,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耦合协调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丰富。而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问题是新兴热点问题,目前研究还较少。“城镇化”一词最早来源于国外,澳大利亚学者Mullins首次提出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为案例地,分析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城镇化产生的一系列影响。^[1]早期国外很多学者从多种视角研究旅游城镇化对传统文化、土地利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2-3]Zhang等^[4]和Tao等^[5]研究旅游城镇化背景下景观格局的规划与分布及旅游景观的生态影响。很多学者在城镇化对区域旅游

收稿日期:2019-05-05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背景下矿业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价与开发对策研究”(16YBQ052)

作者简介:程慧(1985—),女,贵州都匀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资源经济。

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展开研究^[6-7],Ding 测算我国关中地区城镇化与旅游业的耦合度,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8]。国内在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关系方面相较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但取得了丰富的实证成果。一些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对城镇化与旅游业二者的相互影响展开研究分析。^[9-10]张广海等^[11]、钟家雨等^[12]、唐鸿等^[13]学者对我国城镇化与旅游业协同关系效应评价、空间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王凯等^[14]、张玉萍等^[15]、周成等^[16]分别选取不同的案例地,对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吕越等^[17]引入城镇化系统,研究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经济—环境耦合发展的关系,高杨等^[18]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探索旅游业—城市化—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的关系。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的关系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案例地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取得一定共识,即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研究内容上,多数关注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业的影响或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虽然一些学者关注到三者的协同发展效益,但大多数集中于旅游—经济—环境的三者耦合协调,而缺乏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耦合系统研究,探讨该复合系统的耦合度时空演变趋势。在研究案例地上,多数关注某个地区或者单个省区市,以中小尺度区域为主,缺少大尺度宏观层面研究。在研究层次上,大多侧重于耦合协调阶段与类型的测度与评价,而缺少对影响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因素的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基础,以我国 31 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在对其 2008—2017 年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者系统的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处理,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借助地理探测器,进行空间匹配,追踪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以期更好地协调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的资源分配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的健康、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为三者和谐共生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评价指标

借鉴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与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研究成果^[19-21],严格遵守科学性、整体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分别构建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与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其中:①基于城镇化内涵,从资本、劳动力、土地 3 个层面构

建城镇化效率投入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口效益、环境效益、生态效益 5 个角度构建城镇化效率产出指标。②旅游效率投入体系中,由于旅游业的土地投入很难测量,因此主要从资本和劳动力两个方面来考量旅游业的投入情况,从旅游业的根基与三大支柱着手,选取旅行社数量、旅游景区总数、星级饭店数量及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旅游业的资本投入,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旅游业的劳动力投入;在旅游效率产出指标方面选取最直接关联的旅游总收入与旅游接待人次。③生态效率从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着手,选取 7 个投入指标,以经济发展总量作为产出指标。文中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公报等,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通过推算与均值趋势获得。

表 1 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城镇化效率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非农就业人口数量(万人)		
		土地投入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资本投入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经济效益 非农产值(亿元)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 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生态效益 建成区绿地覆盖面积(%)		
		人口效益 城镇化率(%)		
		环境效益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旅游效率	投入指标	旅游景区总数(个)
				星级饭店数量(个)
资本投入 旅行社数量(个)				
产出指标	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万)			
	劳动力投入 旅游从业人员(人)			
	直接产出 旅游总收入(百万)			
生态效率	投入指标	旅游接待人次(万人)		
		环境污染 废水排放(万吨)		
		废气排放(万吨)		
		固废排放(万吨)		
	产出指标	能源消耗(万吨标准煤)		
		土地消耗(万公顷)		
		资源消耗 水资源消耗(亿立方米)		
		人力消耗(万人)		
	经济产出	经济发展总量(亿元)		

(二)研究方法

1.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是效率评价中的经典方法,由美国运筹学家 Cooper 等人于 1978 年提出的一种多投入、多产出效率评价方法,将其用于判断决策单元是否有效。1984 年,Banker 等人进一步提出了规模收益可变的 BCC 模型,它与 CCR 模型相比较,进步之处在于它将总体技术效率分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可进一步追踪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采用 DEA 中经典

的 BCC 模型测算 2008—2017 年我国 31 个省区市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与生态效率,模型构建如下:

$$\begin{cases} \min \theta \\ \text{s. t. } \sum_{j=1}^n x_j \lambda_j \leq \theta x_0 \\ \sum_{j=1}^n y_j \lambda_j \geq y_0 \\ \sum \lambda_j = 1, \lambda_j \geq 0, j = 1, 2, \dots, n \end{cases} \quad (1)$$

(1) 式中: s, t 分别表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的个数, x_j, y_j 分别表示指标投入量、产出量, λ_j 表示各省区市投入与产出的权向量, θ 为决策单元到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即效率评价值。效率值 $\theta \in [0, 1]$,当 θ 趋向于 1 时,表明效率越高,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趋于合理,反之亦然;若 $\theta = 1$,说明决策单元有效,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若 $\theta < 1$,表明决策单元效率低下,该决策单元无效。

2. 耦合协调度

文章借鉴耦合协调度的概念来描述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效率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C_n = 3 \sqrt[3]{(\mu_1 \times \mu_2 \times \dots \times \mu_n)} / \prod (\mu_i + \mu_j)$$

$$D = \sqrt{C \times T}$$

$$T = \alpha \mu_1 + \beta \mu_2 + \delta \mu_3 \quad (2)$$

(2) 式中: C 表示耦合度, T 表示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μ_1, μ_2, μ_3 分别表示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生态效率,因为三者系统同样重要,地位相同,所以取 $\alpha = \beta = \delta = \frac{1}{3}$, D 表示耦合协调度, $D \in [0, 1]$ 。当 D 越接近于 0 时,耦合协调度越小,表明系统之间各要素处于失调或无关状态,系统趋向于无序发展;当 D 越接近于 1 时,耦合协调度越大,表明系统之间各要素处于协调或相关状态,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趋向于有序发展。耦合协调度等级与类型细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与类型细分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类型
[0, 0.1]	极度失调	失调衰退类型
(0.1, 0.2]	严重失调	
(0.2, 0.3]	中度失调	
(0.3, 0.4]	轻度失调	
(0.4, 0.5]	濒临失调	中间过渡类型
(0.5, 0.6]	勉强协调	
(0.6, 0.7]	初级协调	协调提升类型
(0.7, 0.8]	中级协调	
(0.8, 0.9]	良好协调	
(0.9, 1.0]	优质协调	

3.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时序与空间维度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借鉴王劲峰等^[22]提出的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对其耦合协调度与各因素进行空间匹配,该方法受其他假设限制较少,结果较客观与真实,其模型如下:

$$P_{D.V} = 1 - \frac{1}{n\sigma^2} \sum_{i=1}^m n_i \sigma_i^2 \quad (3)$$

(3) 式中: $P_{D.V}$ 表示影响因素 D 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与决定力; n 为研究区域的样本数,本文 $n = 31$; σ^2 表示研究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离散方差; m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sigma^2 \neq 0$,则模型成立。 $P_{D.V} \in [0, 1]$, $P_{D.V}$ 越趋近于 1,说明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越大。

三、实证分析

(一) 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时间变化

基于 DEA 模型,运用 DEAP 2.1 软件,首先对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城镇化、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原始数据进行逐年计算,得到 2008—2017 年我国各省区市的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及生态效率值,再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东、中、西地区,分别测算 2008—2017 年各地区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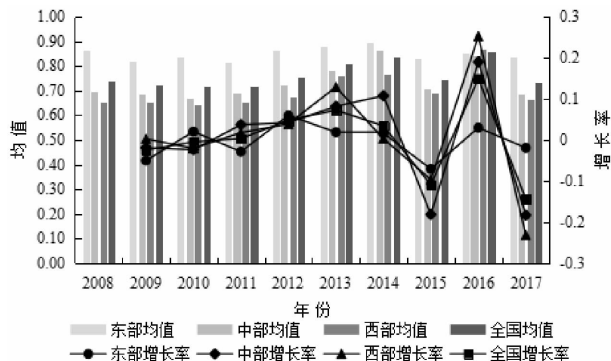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变化

从图 1 可见,①2008—2017 年我国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都达到 0.8 以上,均位于良好协调阶段,整体水平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平稳波动发展,其中 2014 年最高,2011 年最低。从增长率来看,5 个时间段为增长阶段,其中 2011—2012 年间增长最多,达到 5.94%,而 2008—2009 年间下滑最剧烈,下降了 5.05%。②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在 2009—2011 年以及 2017 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 2008 年、2012—2013 年以及 2015 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2014 年和 2016 年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主要处于协调提升类型的前三个阶段,整体

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出前期缓慢上升,到2014年后起伏较大,呈“下降—上升—下降”反复发展;2011—2014年间以及2015—2016年间耦合协调度属于正增长率期间,其中2015—2016年间增长率最大,上升最快,达到18.97%,其余年份为负增长阶段,2015—2017年间下滑最剧烈,增长率为-18.35%。③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大多数年份位于初级协调阶段,仅2013—2014年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和2017年位于良好协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均值,发展趋势与中部地区趋同,先缓慢上升至2013年,后波动剧烈,反复发展。在2008—2009年、2011—2014年以及2015—2016年间位于上升阶段,其中2015—2016年间增长率最大,上升迅猛,达到25.21%,其余年份为下降阶段,其中2016—2017年间下滑最为剧烈,达到

23.20%。④全国均值的的增长率在2011—2014年间以及2016年属于上升阶段,其中2015—2016年间最为急速,达到14.89%,而其余年份均为下滑阶段,2016—2017年间下滑最大,下降14.44%。总体来看,东部地区一直以来平稳发展,起伏较小,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耦合协调度均值均呈现出先缓慢上升,后波动剧烈,反复发展,在2015—2016年间实现最快增长,而在2016—2017年间下降最为剧烈。

(二) 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空间演变

本研究选取了2008年、2012年、2016年、2017年4个时期的耦合协调度为代表,根据耦合类型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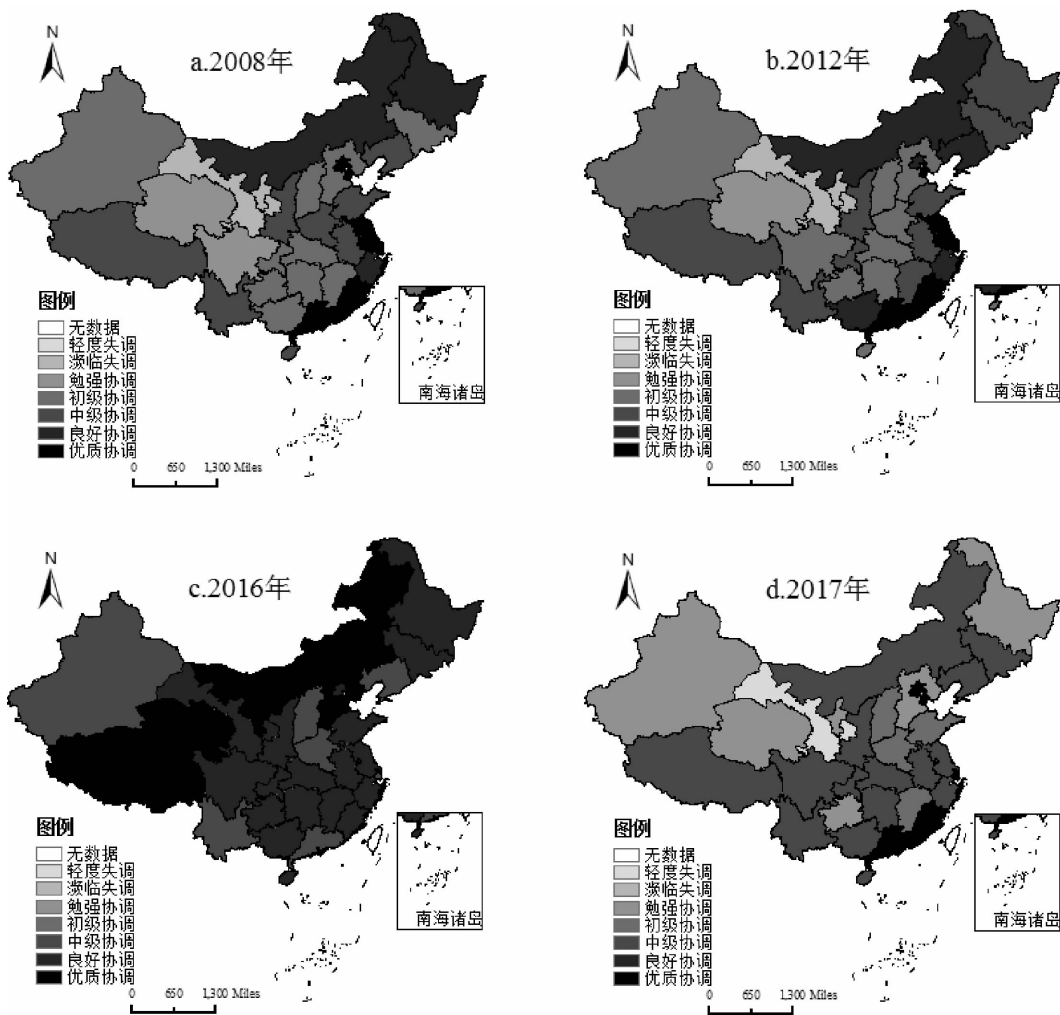


图2 2008—2017年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注:地图使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通过的标准地图底图绘制

2008年(图2-a)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上呈现出由东—中—西阶梯式递减规律,其中东南地区最高,其次为东北地区,

而西北地区最低,分布比较分散,集聚度较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为上海和广东,耦合协调度达到1,处于优质协调阶段,表明二省市城镇化、旅游

业与生态环境三者相互促进,共振发展,与二省市经济发达,产业结构合理密切相关。而各省域耦合协调度最低的是甘肃和青海,位于濒临失调阶段,三者系统处于失调的边缘,磨合发展,由于二省位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相对落后,科技力量相对薄弱。中部地区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一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2年(图2-b)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趋势与2008年趋同,空间分布层次分明,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其中广东省最高,耦合协调度为1,达到最佳状态,而甘肃省最低,为0.43,耦合协调度较差,中部地区仍以初级协调阶段为主。从2008—2012年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上看,其中重庆、广西、江西、辽宁、吉林、四川6个省区市上升了一个等级,而河南和黑龙江二省下降了一个等级,总体变化趋势不大,相对稳定发展。

2016年(图2-c)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变化最大,西部地区最高,其次为东中部地区,分布集聚。其中西部地区主要位于优质协调和良好协调两个等级,中部地区除河南与山西省外,均位于良好协调等级,东部地区除吉林、广东省外,均位于良好协调等级,全国仅新疆、云南、广东、河南、山西、吉林6省区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其中云南省最低,耦合协调度有待增强,天津市耦合协调度最高,达到最优值1。从2012—2016年空间演变来看,整体上来说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其中青海、宁夏上升最为迅猛,直接从濒临失调阶段上升至优质协调阶段,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的政府政策的鼓励、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有关,河南、

山西二省耦合协调度等级未变,仍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而辽宁、广东、广西三省区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说明政府工作还需加强,产业结构还需升级。

2017年(图2-d)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分散,由东南—西北递减,东南地区最高,其次为西南和东北地区,而西北地区最低。天津和上海两市耦合协调度最高,表明其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互动良好,优质协调发展,而甘肃省耦合协调度最低,首次跌入轻度失调阶段,表明甘肃省在2017年三者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结构失衡,三者系统失调发展。从2016—2017年空间演变来看,除北京和广东二省市耦合协调度保持不变外,大多数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出现下滑,特别是甘肃省下滑剧烈,空间演变较大。

四、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且各因素各年的影响力大小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础^[23-26],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地理位置、思想意识以及技术创新6个指标,对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系统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探测,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法,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力。其中各因素量化指标表示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征,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总值比重表示,地理位置用游客周转量衡量,思想意识用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代替,技术创新用R&D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表示。各因素的影响力计算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8—2017年我国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测度

年份	经济发展水平	开放程度	地理位置	思想意识	产业结构	技术创新
2008	0.6109**	0.4307***	0.0810***	0.2021*	0.1453***	0.1957***
2009	0.5841**	0.4448***	0.1349***	0.3037	0.2826***	0.2025***
2010	0.6652	0.4315***	0.1734***	0.3036**	0.3812***	0.1788***
2011	0.4983**	0.4952***	0.2146***	0.2412***	0.3072***	0.3589***
2012	0.3687***	0.3263***	0.1365***	0.2259***	0.1041***	0.1443***
2013	0.4758**	0.2439***	0.0357***	0.0357***	0.0557***	0.3043
2014	0.1981***	0.1133***	0.0924***	0.0618***	0.1182***	0.1588***
2015	0.0592***	0.2394***	0.0481***	0.0588*	0.1009***	0.1002***
2016	0.1944***	0.1276***	0.3610***	0.2463***	0.1145***	0.2563***
2017	0.4566*	0.3250***	0.0972***	0.2481	0.2142***	0.2375***

注:***、**、*分别表示影响力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从表3可知,开放程度、地理位置、产业结构3个因素在2008—2017年均表现为非常显著;技术创新仅2013年为不显著,其余各年为非常显著;思想意识在2011—2014年期间以及2016年为非常显

著,其余各年为显著性较差甚至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在2012年以及2014—2016年间为非常显著,其余各年为显著性较弱。从各年各因素耦合协调度空间匹配结果来看,2008—2011年主要受到开放程度

影响,影响力达到 0.40 以上,其余显著因素影响力相近,差别不大。2012 年各因素均非常显著,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思想意识、技术创新、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2013 年主要受产业结构与开放程度影响,其余因素影响较小;2014 年虽然各因素均呈现非常显著,但影响力均不大;2015 年主要受开放程度影响,其余各因素影响较小;2016 年各因素也呈现出非常显著,受地理位置与技术创新影响力较大;2017 年非常显著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开放程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地理位置。

五、结论与建议

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存在着复杂的时空演变,本研究基于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对 2008—2017 年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规律展开分析,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对影响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因素进行探测,试图深入揭示其驱动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从 2008—2017 年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时间变化来看,全国均值大多数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主要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中西部地区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其演变剧烈,呈现出先缓慢上升,后起伏波动,反复发展,而东部地区相对平稳。总体来说,各年份耦合协调度离散程度小,增长率也呈现出 2009—2013 年大体缓慢上升,后期波动剧烈的态势,在 2016 年达到顶峰,却在 2017 年跌入谷底。

(2) 从 2008—2017 年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空间演变来看,2008 与 2012 年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2008—2012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不大,大多数省区市耦合协调度保持不变,相对稳定发展。2016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集聚,西部地区最高,而中东部地区较低,大多数省区市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2017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分散,由东南—西北递减,大多数省区市耦合协调度下滑,首次跌入轻度失调阶段,空间演变较大。

(3) 从 2008—2017 年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来看,开放程度、地理位置、产业结构 3 个因素在 2008—2017 年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持续显著,2008—2011 年主要受到开放程度影响,2012、2014、2016 年各因素均呈显著,2012 年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而 2014 年各因素影响均小,2016 年受地理位置和技术创新影响力较大,2013、2015 年分别受产业结构与开放程度影响,其余因素影响较小。总的来看,3 个显著因素中,开放

程度影响力最大,其次为产业结构,最后为地理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旅游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环境问题也日益显露,如何协调城镇化—旅游—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本文从影响因素入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在旅游规划中不但要重视对国内旅游者的吸引,也要打造国际旅游小镇,国际旅游品牌,加强对国际旅游者的吸引力。在交通设施,景区服务等方面要更加丰富与便利,提高开放度,促使旅游者引进来,旅游品牌走出去。第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传统旅游发展方式,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对污染大、能耗大的旅游企业进行处置与关闭,鼓励低能耗、低污染的企业与旅游活动,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旅游的数字化。第三,构建资源禀赋优势。地理位置对耦合协调度也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要立足实情,构建自身特有的资源禀赋,成为自身竞争力的法宝,同时对于生态脆弱区加强保护,在城乡过渡带注重特色开发,科学理性开发,不能盲从。

参考文献:

- [1]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 [2] Russo A P. The "Vicious Circl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ritage C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165-182.
- [3] Medina L K. Commoditizing Culture - tourism and Maya Ident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2): 353-368.
- [4] Zhang R Y, Xi J C, Zhang N. Study on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Dalian Jinshitan National Holiday Resort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7, 5(3): 518-527.
- [5] Tao H, Liu J M, Deng Y, et al. Tourism Sectoriz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Model and Space Parti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rea: a Case of the Mayangxi Ecotourism Area, Fujian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7, 14(3): 595-608.
- [6] Tan X J. Study on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China[J]. Agro Food Industry Hi-tech, 2017, 28(1): 1813-1815.
- [7] Naidu Suwastika. Exploring the Dynamic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n Tourism Output of Singapore[J]. Tourism Analysis, 2017, 22(2): 185-200.

[8] Ding A Q. The Coupling Effect Measure and Countermeasures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Guanzhong area[J]. *Agro Food Industry Hi - tech*, 2017, 28 (3): 1286 - 1290.

[9] 王琴梅, 方妮. 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 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7, 32(1): 77 - 88.

[10] 赵磊, 张晨. 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 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J]. *旅游学刊*, 2017, 32(10): 57 - 66.

[11] 张广海, 李晶晶. 城镇化与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的空间差异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6(21): 118 - 121.

[12] 钟家雨, 柳思维, 熊曦.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14, 34(2): 187 - 192.

[13] 唐鸿, 刘雨婧, 麻学锋.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 以张家界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2): 216 - 223.

[14] 王凯, 李悦铮, 江海旭. 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6): 658 - 661.

[15] 张玉萍, 瓦哈甫·哈力克, 党建华, 等. 吐鲁番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J]. *人文地理*, 2014, 29(4): 140 - 145.

[16] 周成, 冯学钢, 唐睿. 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 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3): 186 - 193.

[17] 吕越, 陈忠清. 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经济—环境耦合发展与动态计量[J]. *水土保持通报*, 2016, 36(5): 261 -

[18] 高杨, 马耀峰, 刘军胜. 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发展类型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44(5): 109 - 118.

[19] 吴旭晓. 新型城镇化效率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 *商业研究*, 2013(3): 44 - 51.

[20] 邓洪波, 陆林. 基于DEA模型的安徽省城市旅游效率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2): 313 - 323.

[21] 陈梅, 赵炜涛. 新型城镇化下的旅游业与生态效率关系: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J]. *旅游学刊*, 2018, 33(3): 89 - 97.

[22] 王劲峰, 胡艺.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环境健康风探测[J]. *环境建模与软件*, 2012, 33(7): 114 - 115.

[23] 刘军胜, 马耀峰, 吴冰. 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动态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93—2011年面板数据[J]. *经济管理*, 2015, 37(3): 33 - 43.

[24] 刘艳军, 刘德刚, 付占辉, 等. 哈大巨型城市带空间开发—经济发展—环境演变的耦合分异机制[J]. *地理科学*, 2018, 38(5): 662 - 671.

[25] 王淑佳, 任亮, 孔伟, 等. 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经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 32(10): 61 - 69.

[26] 王维.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9(5): 81 - 8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 Tourism - Ecology in China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CHENG Hui, XU Qiong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taking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ing the DEA model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coupling degree of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tourism efficiency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are calculated, revealing the laws of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 tourism - ecology in China,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analyzed by means of geographic dete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8 to 2017, the mea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 tourism - ecology efficiency in China is mainly in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coordination state is pleasing. The eastern region is mainly in a good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table,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ainly in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stage, which has steadily increased in the early stage, while the fluctuations in the later period have been violent and fluctuating. (2) During the research, the spatial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 factor efficiency has little evolution,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east - middle - west stepwise decline.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2012 - 2016 is large, and the degrees of most provinces have risen and densely distributed. In 2017, the degrees fell sharpl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scattered. (3)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order of increasing influence, are degree of openn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 tourism - ecology; space - time coupling coordination; geo - detector

基于低碳经济理念的食品安全路径新探

向媛秀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与加工的全链条,即从土地到餐桌的一系列环节。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原料安全难以保证,加工污染时有发生,民众食品安全知识匮乏等问题,以低碳经济理念为指导,有针对性地在每个环节采取相应的低碳路径来控制食品安全,如生态种养、土壤生物修复、清洁生产、专业教育和培训等,从而增强我国食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食品安全;低碳经济;低碳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6

中图分类号:F062.2;TS2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28-05

一、引言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于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加剧,低碳经济的理念已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食品行业而言,不但要求高品质、高安全,而且还要求绿色环保低能耗。

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此,食品行业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之一,其能源消耗相当惊人,由此引起的碳排放量也居高不下。通常,根据食品加工与否将食品分为原料食品和加工食品两大类,本文重点讨论加工食品。根据加工技术和方法的不同,可将食品分为罐头食品、冷冻食品、发酵食品、膨化食品、烘烤食

品、腌制食品、熏制食品、辐照食品等。而根据加工食品原料的不同,又可将食品分为粮油制品、果蔬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禽制品、乳制品、蛋制品等。无论哪种食品,无论其加工方法如何,其底线都是“安全”二字。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行业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稳定等多个方面。当前,食品安全仍是我国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为确保食品安全,高强度的热处理往往成为食品加工的首选方法,防腐剂往往也被滥用,这无疑与低碳经济理念形成了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加深理解低碳经济理念,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无论直接或间接一切可以降低能源消耗的手段和方法均可称之为低碳经济路径。为此,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不能仅局限于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关键点,而是要从原料到废弃物处理全过程来考量,即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并且是低碳控制。

基于低碳经济理论,世界上发达国家推出了碳标签,将食品从原料、加工、储运、废弃到再循环全过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化于标签,告知消费者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目前,美、日、韩等国已开始在产品上加贴碳标签,我国也有学者^[1]专门研究

收稿日期:2019-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低碳城市新兴产业培育的制度联动机制研究”(16BJL118)

作者简介:向媛秀(1974—),女,苗族,湖南邵阳人,硕士,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了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中的碳排放及低碳生产,还有人 对乳业低碳经济问题进行了探究^[2],以低碳经济理念指引食品产业的发展也逐渐成为行业共识^[3]。本文对食品安全的低碳路径进行探讨。

二、食品生产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原因分析

通过对食品生产流程风险因子的分析,结合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知我国食品生产中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原料安全难以保证

由于食品原料受到农兽药残留污染,以及重金属、激素、生物毒素、微生物等的污染,导致食品一生产出来就不合格,浪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或是为了消除其污染或掩盖其缺陷而不得不采用各种附加处理方法,在损害品质的同时,加大了能源消耗,增加了碳排放。

1. 种植养殖过程带来的安全问题

首先是化肥过量使用使得果蔬品质下降。消费者感叹“现在的蔬菜水果越来越不好吃,口感和过去差远了”,其重要原因是化肥用量过高。据了解,目前我国果树的亩均化肥用量 37.4 公斤,约是日本的 2 倍;蔬菜亩均用量 47.6 公斤,约比日本多 12.8 公斤;我国农业化肥使用量占到全球用量的 1/3。过量使用化肥,会增加果蔬中硝酸盐含量,降低果蔬中糖、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极大降低了蔬菜品质,同时也使果蔬也更易腐烂。为掩盖这些缺陷,往往通过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来实现。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一开始就背负了高碳农业^[4]的沉重包袱,而加工过程当中,又要额外添加物品,相当于又额外增加了碳排放。如果果蔬品质优良,无疑就能大大降低这种风险。其次是集约化生产带来的农兽药残留和其他各种化学投入品的残留问题。目前我国农药消耗量超过 140 万吨,每亩农田使用近 1 公斤农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每年饲用抗生素消耗量大于 10 万吨,占全球使用量的 30% 以上。对如此高的碳排放带来的安全问题,传统途径几无解决的可能。

2. 土壤污染带来的安全问题

过去唯 GDP 论的发展模式,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灾难。化肥农药重金属、固体废物洋垃圾,严重毒害了我国的土地,以致其损失无法估量。据统计,我国现有耕地约 1.3 亿 hm^2 ,其中约 0.2 亿 hm^2 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已十分严重。化肥的过量使用导致土壤中积累了大量的硫酸根离子、氯离子等酸性离子,并破坏

了土壤正常微生物区系,使得土壤出现酸化、板结现象,且日益加剧。据调查,有的土壤高酸化,以致 pH 降到 3.8 以下,导致各种土传病肆虐,就笔者所知,目前因为土壤酸化导致了“香蕉癌症”——枯萎病在南方大面积发生,以致成千上万亩的香蕉地被抛弃。为了对付各种病虫害,人们使用更多的药物,而更多的药物又带来了病虫害更强的抵抗力,由此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解扣,而这些药物又 99% 进入到了生态系统,相当一部分被植物吸收,进而影响食品安全。重金属、固体废物除了自身的污染外,也会因循环肥污染途径,通过毒化土壤来毒化农产品,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当然,水体污染也与此类似,只是其解决的途径不完全相同,重点在于严密管控。

(二)加工污染时有发生

加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的安全问题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在我国,由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在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中占比最高。据了解,2011—2014 年,我国所有食源性致病事件中,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占 29.5%,患病人数则占到 46.3%。原料清洗不干净、操作工人不注意卫生、工器具不洁净、车间环境不卫生、加工后处理措施不当等,都有可能造成微生物污染,从而导致整批产品失去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直接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流入市场,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为了防止这样的重大损失,企业往往会把高强度热杀菌作为食品加工的安全阀,个别企业甚至会违规添加各种食品添加剂以达到防腐护色等各种目的,无形当中,损害了产品的品质,同时也增加了碳消耗。

以一条年产万吨低酸罐头食品生产线为例。其杀菌公式以 D 值 4min, $F_0 = 5D$ 为基础来计算,在原料清洗不当或杀菌前堆积超时的情况下,杀菌前的污染将急剧上升,一般可达到 1000 倍以上甚至 10000 倍,此时,若要达到原有杀菌标准,热力指数递减时间 (TRT) 就得延长,即延长杀菌时间至少 16min。实际上企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负担不起超时杀菌带来的品质下降。所以只能选择按原有公式,则变质风险将急剧上升到 1%,食品安全全面失控。事实上,微生物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且多由料、机、人、法、环等因素控制不好而致^[5-7]。

(三)民众食品安全知识匮乏

首先是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匮乏。食品生产企业大多数为小型企业,作为传统行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生产工艺相对简单、行业平均利润率和员工薪酬不高,难以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从业人员素质普

遍较低,食品安全知识相当欠缺。根据一项对 303 名从业人员的调查^[8],发现食品加工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高中和中专为主,食品安全知识知晓一般,对食品加工原理和卫生知识一知半解,操作行为不规范。另据调查^[9],在深圳市有近 30% 的不合格批次食品是由于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造成的,除极个别是企业故意滥用外,大部分是因为从业人员不了解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管理规定,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

其次是消费者食品安全知识匮乏。由于以前确实出现过三聚氰胺毒奶粉、红心鸭蛋(苏丹红)、孔雀石绿水产品等食品安全事件,加上一些媒体为博眼球推波助澜,使得消费者人心惶惶,既深度关注食品安全,又无法系统得知相关知识,以致塑料大米、塑料紫菜等谣言满天飞,食物相生相克表成为居家主妇的法宝。同时,新生代追求新奇口感的心态,外卖的流行,又使得香精、色素、调味剂等食品化学添加剂大行其道。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有 23 个类别,2000 多个品种,包括着色剂、甜味剂、增味剂、防腐剂、增稠剂等。正常使用情况下,食品添加剂可以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但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却摧毁了年轻一代味蕾的正常味觉,加剧了食品安全的严重性。更为可怕的是,从网上多次报道小学周边店黑心食品事件来看,培养下一代消费者正确的食品安全意识任重而道远。当然,回头来看,这也与我们这个时代食品原料安全问题丛出有关。

三、食品安全的低碳路径

根据上述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运用低碳经济理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食品安全进行控制。

(一) 采用低碳技术控制原料安全

业内共识,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来自原料安全问题。为生产高品质的农产品,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自然农法,纯粹利用自然界太阳光、雨露、土壤的力量,生产出高品质的果蔬。由于产量不高,在我国并未得到大面积推广,但却为我们生产绿色有机食品原料提供了借鉴的样板,并迅速发展出生态种养。生态种养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或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在种植方面,核心是有机肥和生物农药。2017 年 2 月,农业部为深入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制定了《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力争到 2020 年我国果菜茶优势产区的化肥用量减少 20% 以上,

核心产区和知名品牌的生产基地要减少 50% 以上。根据农业部的介绍,目前提出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使用有机肥的果园,果实的外观和内在品质均有明显提高,即口感好,商品价值高。这一方案的特别意义还在于极大推动了食品加工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如发酵工业废水单细胞蛋白生产或蒸发浓缩喷雾干燥后零排放制成有机肥,鱼虾加工下脚料提取胶原蛋白或者酶解后制成氨基酸肥料等,从而降低了生态种植成本,提升了生态种植效益。而以苏云金芽孢杆菌(Bt)为代表的生物农药的应用,更加固了原料的安全。苏云金芽孢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芽孢杆菌,它能通过伴孢晶体的作用,杀死鳞翅目或双翅目等多种昆虫,应用于农业,对 100 多种害虫有不同的致病和毒杀作用。目前,我国已大规模应用于棉、粮、果蔬及林业害虫的防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大力推广应用。^[10]在养殖方面,可以应用益生菌控制兽药残留的理念,加大益生菌发酵饲料或菌物的制作和使用。在畜牧养殖中常用的有乳酸杆菌、芽孢杆菌、酵母菌等。饲喂益生菌可增加动物肠道有益菌,抑制病原菌,保持肠道健康,同时通过分泌生物酶,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吸收率;此外,还可大幅减少氨氮、腐胺、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益。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低碳环保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益生菌的应用前景必将十分广阔。^[11]

消除土壤污染,恢复土壤地力,是事关食品安全的基础工作。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土壤修复工作,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开始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和应用。土壤修复是指利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或将有毒有害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包括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和动物修复)等三大类。其中化学修复开展较早,常用的有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淋洗技术、氧化—还原技术、光催化降解技术和电动力学修复技术等;物理修复主要有土壤蒸气浸提、微波加热、热脱附等;生物修复广义上可分为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和动物修复三种,狭义的是指微生物修复。由于生物修复具有低碳、环保、安全、高效的显著优点,已成为土壤修复最活跃的领域。^[12]例如,某些假单胞菌可降解 DDT、呋喃丹、艾氏剂和敌敌畏等农药;一些担子菌可降解苯环类农药和塑料;一些光能异养菌能转化利用土壤中的化肥残留离子,调理土壤的 pH,使之向中性转变,从而

根除有害菌的生长土壤,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并促进作物的生长;还有一些枯草芽孢杆菌,可以拮抗镰刀孢子菌等植物病原菌,从而减轻土壤用药负担,从源头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二)采用低碳技术控制加工过程

食品安全的加工过程控制核心是清洁生产技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清洁生产定义为: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便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简而言之,就是实行工业生产全过程控制,将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清洁生产对保证食品安全有重要意义。^[13]一般而言,清洁生产包括节约原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并减少最终排放物和废弃物。低碳经济视野下的清洁生产技术与传统的定义和要求有所不同,其方法是改进生产工艺,采用经济有效的消毒灭菌措施,提升自动化水平;其核心是通过低能耗措施,大幅减少微生物污染程度,从而保证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生产工艺的改进包括原料清洗工艺的改进,如在流水清洗过程中,将洗涤过的轻污水回流到首端来清洗沾泥带土的原料,可减少50%以上的用水量;在池水清洗过程中,定期更换池水,并保持一定的余氯,是减少微生物初始菌数的简便有效的方法;在定型包装灭菌冷却时,注意冷却水的卫生,可防止杀菌后污染,大幅降低腐败风险。经济有效的消毒灭菌措施可采用生物技术方法,如在环境卫生控制中,特别是粉状食品生产过程中,可研究采用“病毒导弹”,用噬菌体技术将混悬在车间空气和附着在工器具上的细菌杀灭,从而减轻食品的后续杀菌强度,使食品质量和安全得到双重保障。当然,定期清洗集中送风系统,并适时检修,防止高效滤材的破漏,也是非常有效的“四两拨千斤”的食品安全低碳路径。当有条件时,可引进先进设备,如管道式封闭式生产设备,减少物料与空气和操作人员的接触,从而在硬件上为食品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三)加大教育培训,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在所有的低碳经济路径中,教育培训是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一项活动。与本文有关的培训应包括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和低碳经济理论的培训。笔者认为接受培训的群体应有四大类,即大众、从业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应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对广大民众,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树立全民教育与培训的理念,许多国家通过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来引导民众即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的理性行为。^[14]如美国,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消费者教育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政府计划实施食品安

全教育,教导民众了解食品安全、食品准备和食品分配等知识,还把每年9月设为食品安全教育月,各地通过开展不同的活动来增强民众对食品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同时,美国还非常重视对中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其教育已经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其教材切合青少年的行为特点,知识趣味性并茂。在我国,各级政府和食品安全主管部门要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工作,尽快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健康饮食、安全消费、环境保护及消费维权等意识,利用消费者选择的力量,倒逼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和转变;同时,可利用每年一度的食品安全周活动,让食品安全走入学校,走入机关,走入社区。针对普通食品从业者,在强调获证上岗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培训实效^[15],有的放矢,缺什么补什么,特别是要让从业者了解食品技术原因,掌握卫生知识,熟悉操作规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从而能防患于未然,主动做好食品加工过程的安全工作。对技术人员,则着重进行专业知识培训,能全面掌握本行业的相关标准、HACCP体系,能识别食品安全的关键控制点,并能提出措施有效控制;特别地,还要加强低碳经济理论的培训,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将二者深度结合起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对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注重进行法律法规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真正把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落到实处,切实承担法律义务,确保食品安全,做到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

四、结束语

表面看来,低碳经济与食品安全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从实质上来看,低碳经济与食品安全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低碳经济对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起到保障作用,如好的原料可减少整个环节的风险,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倒逼原料安全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对低碳经济的推广和实施具有推动作用,显然食品行业从低碳经济中的获益将促进低碳经济的深入推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食品安全涉及政、学、研、企等多个组织,也涉及管理者、消费者、从业者等多个群体,同时涉及法律、金融、农业、工业、科技等多个行业,非常庞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存在什么灵丹妙药,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从低碳经济视野出发,提出采用生态种养、土壤生物修复、清洁生产、专业教育和培训等低碳路径来控制食品安全,为食品安全的控制引出一条新思路,期待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晓莉, 吴林海, 童霞, 等. 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中的碳排放及低碳生产[J].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0): 281-286.
- [2] 郑泽华. 我国乳业低碳经济问题研究[J]. 中国商贸, 2011(5): 237-238.
- [3] 孙滔. 低碳经济对食品安全的推动作用[J]. 产业经济, 2013(12): 53-55.
- [4] 孙滔. 低碳农业: 食品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14, 35(18): 183-185.
- [5] 杜红利, 刘畅. 罐头制品腐败变质的原因及检测方法[J]. 江苏食品与发酵, 2008(3): 24-26.
- [6] 郝庆功, 冷启成. 酵母菌引起鲜葡萄汁饮料腐败变质原因的实验探讨[J]. 食品科学, 1991(5): 55-58.
- [7] 孙翠焕, 王艳华, 朱万芹, 等. 肉制品腐败变质原因分析[J]. 微生物学杂志, 2011, 31(3): 106-109.
- [8] 侯万里, 黄玮, 王云霞, 等. 食品加工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分析[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08, 25(6): 367-369.
- [9] 邓小国, 傅江平. 从“短板”入手提高食品从业人员素质[N]. 中国质量报, 2009-04-30(2).
- [10] 高成华. 微生物杀虫剂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研究现状及应用[J]. 农业工程技术·温室园艺, 2015(6): 64-66.
- [11] 江科, 李和刚, 戴正浩, 等. 益生菌在动物养殖业中应用的研究进展[J]. 中国畜牧兽医, 2013, 40(12): 90-94.
- [12] 周际海, 黄荣霞, 樊后保, 等.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 水土保持研究, 2016, 23(3): 366-372.
- [13] 孙东升, 钟仙珍. 论农产品“清洁生产”与食品安全[J].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2(4): 13-16.
- [14] 彭海兰, 刘伟. 食品安全教育的中外比较[J]. 世界农业, 2006, 331(11): 56-59.
- [15] 于磊, 张金贵. 目前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铁道劳动安全卫生与环保, 2010, 37(6): 309-31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New Approach to Food Safe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ow – Carbon Economy

XIANG Yuanxiu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Guangxi Economic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concerns with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serial processes of “from – land – to – table. There are some food – safety problems in modern China,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guaranteeing material safety, the pollution happening in processing,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food safety among civilians, etc.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and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low – carbon approaches directed at every links to control the food safety, such as ecological breeding, soil bioremediation, cleaner produc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 words: food safety; low – carbon economy; low – carbon approach

我国电竞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堕距”问题探讨

李大伟¹, 鞠增平²

(1.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我国电竞产业发展已经进入爆发期, 占据了我国游戏产业三分之一的份额, 但其制度文化部分的发展却严重滞后, 导致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试图以“文化堕距”理论为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通过总结归纳我国电子竞技产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展现了我国电竞产业物质文化高度发展、制度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精神文化发展严重滞后的现象。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后, 揭示出政府监管职责范围割据、电竞游戏生命周期短、我国大众对于游戏认识的惯性以及媒体话语权对失衡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并从政府职能、政策法规、媒体建设、俱乐部模式、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电子竞技; 文化堕距;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7

中图分类号:G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33-07

电子竞技是网络游戏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包含了网络游戏的技术特征、趣味性和竞技体育的对抗性、经济性。2004年我国将电子竞技运动列为第99项正式体育项目。在之后的十多年中, 电子竞技产业曲折发展, 时至今日电子竞技产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占据整个游戏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成了游戏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电竞选手也在国际赛场上体现了昂扬向上的竞技体育精神, 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重要途径。但在高速发展、极度繁荣的电竞产业物质文化背后, 其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却分别处于相对落后和严重滞后的状态, 产生了鲜明的“文化堕距”问题。

一、我国电竞产业概念与界定

(一) 电子竞技定义

目前, 我国学界对于电子竞技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官方“竞技体育”为代表的观点, 即电子竞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各种软、硬件作为器械或者是设备, 在其营造的虚拟环境中, 按照统一的竞赛规则为提高成绩而进行的体育游戏活动”^[1]。另一种观点主张将电子竞技回归到“游戏本质”, 杨芳指出:

“电子竞技应回归游戏的本质, 游戏到竞技体育是依据玩耍—游戏—竞技体育的演变趋势”^[2]。

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爆炸式发展, 单一视角的定义已经难以适用于电子竞技产业的实践。本文认为应该把握住电子竞技最核心的三个特点: 虚拟空间、公平规则、竞技精神, 并据此将电子竞技运动定义为: 符合竞技精神、以网络技术和软硬件为支撑、以虚拟空间为平台、按照统一公平的规则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活动。

(二) 电子竞技与网络游戏之区分

电子竞技与一般网络游戏的区分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不仅关乎电子竞技的正名, 还牵扯到之后区分于一般网络游戏, 建立电子竞技产业自身的管理标准和发展方式。而伴随着电子竞技发展和游戏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两者区分标准的建立更加困难。

本文认为电子竞技主要应从两个方面与一般的网络游戏进行区分。一是用户参与后的体验不同。一般的网络游戏带给人们的是“虚拟角色”的成长体验或是“虚拟世界”的探索体验, 而电子竞技带来的是与竞技体育相同的对抗体验与竞技体验。二是

收稿日期: 2019-05-22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CZJW02); 山东大学“双一流”人才培养专项建设项目(BKSYL20170303)

作者简介: 李大伟(1979—), 女, 山东青岛人, 博士,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文化产业管理。

规则不同。一般的网络游戏往往没有参与的时间限制和胜负条件限制,玩家的角色状态和能力在动态的发展中一定是不平等的;而电子竞技则有着严格的经济规则和时间限制,具有唯一的胜负标准,同时在竞技开始时,玩家间的状态是平等的。

(三)我国电竞产业范围

我国电竞产业是跨界文化和体育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脱胎于产业大融合的背景当中,产业范围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多维视角进行考量。

从产业链角度来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链已较为完善。具体来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的上游主体包括:硬件提供商、软件开发商、游戏运营商、网络服务商以及赛事运营企业;我国电子竞技产业的下游主体包括:平台提供方、传播媒体、终端用户,以及相关的其他产业(如衍生品开发、影视制作公司等)。其对应的市场规模包括:电竞赛事收入(门票、广告、周边衍生品等)、电竞衍生收入(包括直播、代言等赛事外的收入)、电竞游戏收入(游戏购买、游戏增值服务狭义电竞游戏消费)。^[3]

从产业内容角度来说,电竞产业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狭义的电子竞技创作业,包括电子竞技产品的创作、生产、管理运作等各种活动;第二个层面是电竞赛事和电竞传播业,通过专业化的职业联赛,将电子竞技升华为专业化的竞技表演业并呈现给受众,推动之后电竞衍生内容的生产;第三个层面是电竞衍生内容生产,将电子竞技文化元素和文化形象附着在具体的衍生品上进行售卖。

以上两个角度可以较全面地界定出我国电竞产业的产业范围,但由于在具体实践中网络游戏与电子竞技的特殊关系,不同机构做出的产业统计也不尽相同,仍然需要国家的指导与规范。

二、电竞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堕距问题

文化堕距是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因落后于其他部分,进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也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美国社会学家 W·F·奥格本在 1923 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堕距”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在社会变迁中,由于社会各部分变化的速度不同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不难发现,文化堕距问题一定是由两个或数个部分发展速度的不同而引起的。在本文中,我国电竞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堕距问题体现为电竞产业物质文化迅速发展,而电竞产业制度文化相对落后和电竞产业精神文化严重滞后。

(一)我国电竞产业物质文化高度发展

根据艾瑞咨询对我国电竞产业发展的分期,我国

电竞产业从 2017 年起随着移动电竞的兴起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爆发期(如表 1)。^[4] 电竞产业的物质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表现为:

表 1 我国电竞产业发展分期

阶段	时期	标志
探索期	1998—2008	第一批电竞游戏进入中国
		第三方赛事主导市场
		政策影响行业发展停滞
发展期	2009—2013	中国电竞俱乐部开始萌芽
		《英雄联盟》等电竞游戏开始在国内流行
		电子竞技俱乐部联盟成立
平台期	2013—2016	游戏厂商主导电竞比赛,赛事奖金逐步攀升
		天价奖金提升电竞关注度
		直播平台进入电竞市场,丰富电竞产业形态
爆发期	2017—至今	移动电竞市场启动,规模迅速增长
		大量资本涌入电竞产业链上游,行业发展驱动力转移
		LPL 首先进行联盟化改革,推动各地电竞市场发展
		鸟巢举办 S 赛全球总决赛,提升电竞社会关注度

1. 产业基础成熟

首先是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给我国电竞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7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827122 亿元;全年国民总收入 825016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7%;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比 2016 年增长 9%。^[5]

其次是受众基数巨大。根据 CNNIC 数据,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0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较 2017 年底提升 3.8 个百分点。^[6] 艾瑞咨询统计显示,2017 年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达到 2.6 亿,2018 年有望达到 3.2 亿,从 2015 年起,每年的电子竞技用户增长率都超过 20%。^[4] 数量巨大的受众和潜在受众群体是我国电竞产业发展的前景和希望所在。

最后是软硬件建设不断提升,新技术不断涌现。作为与电竞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软硬件建设,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为 23555 块/32,国际出口带宽为 8826302Mdns,网民上网速度更快,网络质量更优^[6];国产计算机、手机、网络软硬件设施不断更新换代,逐步追赶国外企业产品水平;作为电竞线下活动重要载体的网吧也在国家规定的指引下,开始转向提升服务的内涵式发展。与此同时,网络直播技术、移动电竞和 VR 等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给电竞产业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

2.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首先,我国电竞市场规模不断增长。我国电竞产业市场规模 2016 年达到 504.6 亿元,占据同年游戏总市场份额的 30.5%,近年电竞市场规模、游戏总市场占比及市场规模增长率具体情况如表 2:

表 2 近年我国电竞产业市场规模

年份	市场规模(亿元)	市场规模增长率	游戏总市场占比
2014	226.3	-	19.8%
2015	374.6	65.5%	26.6%
2016	504.6	34.7%	30.5%

由此可见,我国电竞产业从 2014 年之后一直处于爆炸式增长,已经成为我国游戏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起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的,是不断增长的电竞用户,而伴随着移动电竞的兴起,2017 年电竞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 650 亿元人民币^[7],电竞产业的发展势不可挡。

其次,我国电竞产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在电竞刚进入我国的时候,其产业链极不完善,组成产业链的主要是一些游戏代理商,没有电子竞技赛事、自己的电竞游戏平台、相关的媒介等,但随着电竞产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涵盖了产业上下游主体和监管部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善的产业链有助于我国电竞产业的内生性发展和利益共享,丰富了电竞生态,增强了我国电竞产业在世界中的竞争实力。

(二)我国电竞产业制度文化发展相对落后

与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相比,我国电竞产业的制度文化发展显得相对落后,虽然在近 20 年的发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还是存在着诸多不足。

1. 管理体制不顺畅

首先是外部管理不顺畅。目前我国有十多个政府部门、组织、协会参与电竞产业的监管,这就导致在电竞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沟通不顺、责任不清的问题。立法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产业部、体育总局都出台了相关文件,但大多倾向于本部门管辖领域,与电竞产业相关的法规不仅数量少而且更新慢、强制性低;执法方面,因为部门职责划分不清,而且缺少明确的法规条例和强制性的法律文件,导致出现各部门间相互推诿,执法力度不足;管理方面,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作,管理存在漏洞,直播平台色情暴力问题、电竞游戏内容分级问题、电竞赛事管理问题等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是电竞产业内部管理混乱,缺乏自我约束。目前我国电竞俱乐部、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规章制度,普遍存在问题。各俱乐部为了取得成绩互挖墙脚恶性竞争,对于职业选手的管理缺乏经验和长远规划;电竞直播平台前所未有的繁荣背后,是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虚假泡沫,缺乏主播入驻的门槛和对直播内容的监控,许多主播素质难以控制,出现了很多违反电子竞技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丑闻,而直播平台往往只能在问题发生后通过封杀等方式进行止损。而其中很多主播还是曾经的电竞选手,例如之前被斗鱼封杀的五五开,他们代表着电子竞技运动的形象,他们的丑闻无疑严重损害了电竞产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2. 赛事制度建设不健全

2004 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电子竞技运动会(CEG),之后更是由不同部门牵头建立了 CIG、WCG、GOC、CCG 等一系列官方赛事,电竞代理商、电竞游戏生产商以及民间也举办了各类赛事。人们看到这些赛事取得的成绩,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电竞赛事制度的建设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赛事内容同质化。由于缺乏沟通与统一的赛事规划,各主办方主导的不同赛事都处于孤立状态,比赛项目高度相似,大量重复的赛事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与媒体资源,消磨了广大电竞迷的观赛热情,也不利于电竞项目多样化发展。

其次是政府对于电竞赛事的认识与支持仍然不足。政府对于电竞的态度一直较为模糊,一方面推动了许多赛事的运营,另一方面并未取消如《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等不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极大地影响到电子竞技的推广宣传。在赛事建设上,政府的掌控能力也不足,过分放任赛事运营商,导致电竞赛事始终不能像篮球、足球联赛一样登上“大雅之堂”。

最后是对职业选手的培养存在问题。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电竞职业选手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大多数职业选手都是从业余玩家转化过来的,其自身素质难以把控;在培养方面,缺乏系统的科学的长远的培养计划,很多职业选手因为伤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选手因为抵挡不住直播利益的诱惑荒废训练,还有选手缺乏体育竞技精神打假赛、消极比赛,这些都不利于电竞赛事的健康发展。

3. 各方面标准化程度不够

任何一项竞技运动的健康开展都离不开完善的规则与标准。这些标准一方面是竞技项目自身的规则,另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外部规范与标准,而在我国,电子竞技运动的国家标准还远远没有建立成型。

首先在电竞产品生产方面,缺乏版权保护,同质

化产品、抄袭产品不断出现,在移动电竞产品《王者荣耀》大获成功后,雷同的电竞产品在应用商店里达到了十余款,鱼龙混杂的产品市场严重压抑了国产电竞产品的创新。其次在赛事运营方面,赛程赛事规则、俱乐部、运动员管理、设备及场馆规范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完全依赖行业的“自我监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电竞俱乐部资质如何认定,职业联赛如何引进外援以及如何保障不同队伍的平衡,职业选手薪资标准怎么规定,赛事公平通过哪些硬性指标来保证,比赛设备的配置指标如何,这些都难以在现在的电竞规则中找到权威的官方解释,因此电竞赛事难以真正发展到 NBA、欧冠联赛等竞技赛事的正规程度。

(三)我国电竞产业精神文化发展严重滞后

相比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我国电竞产业精神文化的发展更显严重滞后,人们对于电竞产业的认知存在极大偏差与误解,而电竞媒体严重不足和电竞产品精神内涵缺失使得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1. 社会认可度低

尽管在 2004 年电子竞技就被列为正式的体育项目,尽管目前电子竞技在我国已经拥有超过 2 亿用户,但全社会层面对于电竞概念与电竞产业范围的界定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明确与宣传。对一般大众,甚至是一些电竞玩家而言,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他们对网络游戏“精神鸦片”“容易沉迷”“荒废学业”的固有印象很自然地就转移到电子竞技身上。对于一些成功的电竞职业选手,社会主流态度是“不务正业”,甚至在电竞选手参加世界大赛获得高额奖金后,还要批判他们给青少年树立了不良榜样,导致青少年滋生拜金主义和不劳而获的想法,对待电竞主播更是各种批判,认为是一种“网络乞讨”。而事实上,很多选手和主播对于电竞运动的认知也不清晰,将其也看作一种网络游戏而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往往出现违反竞技精神的问题,更是加剧了社会偏见。虽然近年来随着电子竞技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人们对电子竞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于电子竞技误解的惯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弭,甚至还有随着电子竞技玩家和电子竞技直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愈演愈烈的趋势。

2. 电子竞技产品缺乏精神内涵

电子竞技作为一种竞技运动,应该能够在竞技过程中体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精神,这离不开作为电子竞技载体的电子竞技游戏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胡俊等指出电子竞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长远的

发展前途来源于这一项目有着能够让所有参与者兴奋的内涵。^[8]然而目前很多电子竞技游戏缺乏足够的精神内涵,虽然拥有宏大的叙事背景和精彩的故事设置,但在游戏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出良好的精神文化风貌,女性人物衣着过于暴露、故事背景篡改历史、台词设计血腥暴力或者带有性暗示,这些问题在一次次的电子竞技赛事、玩家对抗中和直播解说里暴露出来。这不仅令电子竞技对人们脑力、反应能力和竞技精神的培养作用大打折扣,更让社会大众对于电子竞技的误解与偏见进一步加深。

3. 电子竞技媒体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电子竞技媒体主要集中于网络平台,例如网络 TV、直播平台、电子竞技游戏门户网站等,虽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电子竞技缺乏发声渠道的问题,但因为缺乏监管,很多信息虚假、不负责,反而给电竞产业带来不良影响。而电竞产业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建设却因为各种原因严重受阻,特别是国家在 2004 年出台了《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后,风头正劲的电视电竞媒体受到致命打击,从此销声匿迹。缺乏这一重要渠道,电子竞技在当时主流媒体中关注度极低,难以展现自身真实面貌,优秀的形象和例子(例如李晓峰)在我国得不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三、我国电竞产业“文化堕距”问题成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论断,但我国电竞产业的“文化堕距”问题的出现表明在经济基础高度发展的同时,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落后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一)制度文化落后原因

1. 政府监管职责范围割据

我国对于电竞产业的管理是由多部门共同进行的,一个统一有效的产业管理委员会性质的组织尚未成立。当下,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以及相关的协会如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等,依据不同的职能领域对电竞产业都有权力进行管辖。^[9]各部门在具体问题上的权力与责任划分不清楚,在没有问题时放任自流,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在出台政策法规时,又向各自分管领域倾斜,导致管理错位、政策偏离。近年来,与电竞产业直接相关的只有《全国电子竞技竞赛规则》《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全国电子竞技运动员积分制度实施办法》《全国电子竞技裁判员管理办法》《全国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等 5 部“试行”的规章^[10],并且

都是多年前颁布的,已经难以适用于当前快速发展的电竞产业了。这样的管理格局不仅直接导致国家无法有力地在立法、监督和执法上对电竞产业进行有效管理,也使得电竞产业缺乏自我约束。而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电竞产业,在游戏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都屡见不鲜,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2. 电子竞技游戏生命周期短

电子竞技在制度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短暂的黄金生命周期。黄金生命周期是指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成长期和成熟期,因为积累了大量的用户,在两个周期内产品获得的回报最多。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因为规则稳定、种类固定,所以可以在长时间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管理标准,也可以设立固定的管理部门,俱乐部和竞技赛事的开展也更加便利和容易,比如 NBA、CBA 等职业篮球赛事,依据一套赛事体制和商业模式,就可以经营数十年。

而电子竞技运动的载体——电子竞技产品一是种类和数量众多,规则和要求各有不同,难以建立完善的统一管理标准,而且黄金生命周期皆为短暂,DOTA 作为最经典的电子竞技项目之一,其黄金生命周期也只有短短的十年左右。较为稳定的客户端电竞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移动端电竞。事实上,移动端电竞已有的现象级产品黄金生命周期最长不到两年半,最短的仅仅半年,整个移动电竞样本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只有 16 个月。^[7]这让很多俱乐部在建立时就抱着圈钱的目的,恶意挖墙脚、恶性竞争,力争在几年的黄金周期内利用职业选手赢得更多比赛、接受更多广告、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忽视了对于职业选手长远职业生涯的规划,电子竞技的职业化道路也因此受阻——一个电竞项目的生命周期只有几年,电竞职业选手又有几年职业生涯? 一个项目就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从头培养职业选手? 可能还没培养出来,这个项目就已经被人们抛弃了。总的来说,短暂的黄金生命周期对于电竞的影响主要有: 单项电竞赛事难以长久、深入地发展; 俱乐部追求短期利益、恶性竞争、自我纵容; 职业选手培养难以正规化,对自我要求不高; 统一的项目行会和行业行规难以建立。而这一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忽视,更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机制。

(二) 精神文化严重滞后原因

1. 我国对于游戏的认知惯性

我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对于娱乐业持有贬低的态度,乐、射、御算是我国最早的娱乐活动了,但它们能列入六艺之列更多的是为了通过这些活动去提升自

身情操、维系礼仪制度。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为了维系生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生产活动中,游戏作为一种娱乐并不能生产物质资源,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一种奢侈品。而传统的游戏中又有很多是与博彩业相关的,比如斗鸡、斗狗、赌牌、赌棋等,要么会占用一定的时间精力,要么会让人上瘾乃至赔得倾家荡产,所以人们对于游戏就有了“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精神毒品”的说法与态度,而这种说法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而网络游戏作为当今社会游戏的一种崭新的、主流的形态,也受到了传统观点的批判。从网络游戏发展而来的电子竞技也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人们将对网络游戏的排斥带到了电子竞技身上。而且这种偏见并不会简单地因为物质文化的发展而改变,比如网游和博彩业,发展得越大批判的声音越多,如果我们不能把电竞产业的精神文化价值向社会大众阐释清楚,物质文化发展得再好,电竞产业还是会遭到误解与排斥,不可能像传统的体育竞技运动一样在社会上获得公正的待遇与地位,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物质文化发展解决电竞精神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也在于此。

2. 媒体话语权对抗失衡

社会大众对于电竞产业的偏见与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电竞概念的认识不足和大量负面新闻的接收,人们既不了解电竞和网游有什么区别,又不能从主流媒体上得到电竞的正面新闻,这种现象源自目前电竞产业领域媒体话语权对抗失衡,而这种失衡由两个层面组成。

第一层面的失衡是电竞媒体话语权与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失衡。从渠道角度来说,电竞媒体现在主要集中于网络,包括网络 TV、直播平台、电竞游戏门户(资讯门户和游戏商官网)、公众号、散见于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的稿件等,而缺乏了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支撑,这就严重限制了电竞产业发声的渠道,在众多敏感问题中始终处于其他主流媒体的围攻之下。从内容角度来说,以网络媒体为主的电竞媒体内容主要围绕着自身赛事新闻、产品更新发布、游戏趣闻等,并没有对自己的正义性和积极性进行严肃的探讨,对李晓峰这种积极的榜样人物的宣传也力不从心,而面对新闻媒体对电竞(包括网游)的污名化处理时,回应因为可信度不够高,渠道不够宽,声音也很难被人听到。

第二层面的失衡是电竞用户话语权与主流大众话语权的失衡。我国电竞用户的群体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部分中年,这部分人群在经济上

处于弱势地位,在话语权上缺乏自己的发声渠道,他们了解到的电竞以及自己对于电竞的理解都很难传达到自己的父辈那里,而他们被新闻媒体污名化贴上的标签在主流大众心中却难以磨灭。燕道成等讨论过新闻媒体对于网游少年污名化的构建^[11],而这一机制同样被使用在电竞用户上。

四、我国电竞产业“文化堕距”问题解决对策

(一) 理顺产业管理体制

我国目前对于电竞产业的管理是分行业管理的模式,造成的问题前文已有讨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当向其他电竞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例如韩国、美国等学习,调整自身管理思路,理顺产业管理体制。

理顺电竞产业管理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理顺关于电竞产业管理的权力分割问题。目前我国多部门管理的权力是按照“专业分工—行业分工”的模式进行划分的,属于“同权分割”,也即同等权力的部门间分割,你可以出台相关规定,我这里也可以出台,最后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会出现部门之间规定的冲突。这种模式应当逐步向“异权分割”方向改变,逐步构建“党政分工、管办分离、企事分开”的“大文化部”体制^[12],简单来说就是立法、管理和执法分开,经营管理和监督监控分开,这种分割不再是按照行业或者专业进行,而是按照权力的形态进行。同时,在协会建设方面,可以成立类似韩国 KeSPA 的全国性电子竞技协会,对电竞产业各领域问题统一规定、统一管理、统一处理。

(二) 建立相关法规标准

目前,我国对于电竞产业的相关法规标准极其不完善,主要的几部试行规定也主要集中在电子竞技赛事上,对于电子竞技产品生产、电子竞技直播平台、电子竞技引进来与走出去、电子竞技产业投资等方面都没有任何的专门法规或者标准,也没有专门的扶持政策。电竞产业如今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国家的重视,对电竞产业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发展中存在的需求,根据这些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并制定电竞产业长远规划。

国家还应该引导建立一些电竞行业自身难以形成的规矩。例如,指导电竞俱乐部建立起自己的行业标准 and 行规,形成一个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建立拥有更多的比赛时间和比赛场次的全国性统一赛事来代替大量内容重复的各地区举办的孤立赛事;对直播行业的入驻门槛作出硬性规定;等等。

(三) 增强电竞媒体建设

国家既然已经支持电竞的产业地位,并将其列为正式体育项目,就不应再阻碍其正常的宣传渠道,应当放开对于电竞产业在电视媒体上的管控,努力促进建立立体化的电竞媒体布局。以韩国为例,电竞主流媒体即电视媒体,而平面媒体则用来刊登新闻、赛事介绍、文字战报、选手采访等,网络媒体还可以提供视频直播及相关视频产品。^[13]而从电竞产业角度来说,拥有立体化的媒体结构后,也应该利用好这些资源,多进行自身概念的讨论,多进行正面榜样的宣传,打造出正面的阳光的电竞体育明星,这样才能更好地被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才能通过明星作用和电竞精神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作为极具影响力和富有话语权的公众媒体应当从更加客观真实的角度去看待电竞产业,减少固有宣传思维和偏见对报道的影响,看到电竞产业更多的积极方面,帮助弥合电竞受众中的断层。比如,近期我国在亚运会上获得了首枚电竞项目金牌、2022年亚运会电竞将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等,这些新闻应该作为一个正向的宣传材料,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电竞对人的思维、反应方面的培养作用,来引导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

(四) 改进俱乐部建设模式

我国目前的电竞俱乐部基本上是以单项电竞项目和职业选手为基础建立的,这种模式使得电竞俱乐部的生命周期完全取决于其对应的电竞项目生命周期,不仅时间短,而且容易产生“圈钱”心态,与其他俱乐部产生恶性竞争,不利于职业选手和职业赛事的长远发展。在未来俱乐部可以建立一种跨项目战队的综合管理模式,即将竞赛规则、能力要求相近的项目进行整合,培养不同队伍进行统一管理,在一个项目衰落时职业选手可以进入另一个项目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事实上我国已经有这样的尝试,比如“皇族”战队旗下就包含着英雄联盟、炉石传说、守望先锋、王者荣耀和街头篮球5个游戏分部,其他如VG、WE等豪门战队也有着各自的多支电竞队伍。

(五)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电子竞技要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不能仅仅靠华丽的画面和有趣的游戏规则,更需要在自身产品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而对于我国电竞目前主要依靠引进国外电竞产品,自身电竞产品缺乏内涵和竞争力的现象,首先要对电竞的自主创新进行扶持,例如设立专项基金等举措,让电竞企业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去深化锤炼自身

产品;其次要注重对于电竞人才的培养,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游戏学科或课程,与电竞相关的专业著作严重匮乏,更没有建立起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而韩国早在1993年就拥有2所独立的游戏学院,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建立起一支自己的电竞创作、电竞管理、电竞赛事人才队伍;最后要加强研企合作,让科研机构与网络经济巨头、游戏商有更多的合作,达到技术与经济的互补,生产出更多具备竞技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电竞作品。

综上所述,我国电竞产业发展的“文化堕距”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政府监管职责范围割据、电竞游戏生命周期短、我国大众对于游戏认识的惯性,以及媒体话语权对抗失衡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该问题必然会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解决,但在解决的同时,也需要通过理顺产业管理体制、建立相关法规标准、增强电竞媒体建设、改进俱乐部建设模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多举措的共同努力,单纯依赖物质文化的发展,忽视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设,问题反而会愈演愈烈。

参考文献:

[1] 李宗浩,王健,李柏. 电子竞技运动的概念、分类及其发展脉络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4(1):1-3.
[2] 杨芳. 电子竞技应回归游戏的本质[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1):35-37.
[3] 艾瑞咨询. 2016年中国电竞内容生态报告[R/OL]. (2016-04-11)[2019-02-15]. <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604/2570.shtml>.

[4] 艾瑞咨询. 2018年中国电竞行业研究报告[R/OL]. (2019-02-02)[2019-02-15]. <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802/3147.shtml>.
[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2-28)[2019-03-0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18-08-20)[2019-03-0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hlw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7]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 2016中国电竞产业报告[R/OL]. (2017-02-28)[2019-03-08]. <http://www.cgigc.com.cn/gamedata/8514.html>.
[8] 胡俊,余庆东.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9,23(2):51-53.
[9] 黄璐,张玉明. 电子竞技运动若干理论问题商榷[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2):6-8.
[10] 陈亮,于文谦. 我国电子竞技发展中的“文化堕距”问题及对策[J]. 山东体育科技,2016,38(4):22-26.
[11] 燕道成,黄果. 污名化:新闻报道对网游青少年的形象建构[J]. 国际新闻界,2013(1):110-117.
[12] 傅才武,纪东东,姜文斌. 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与文化行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因应策略:基于《魔兽世界》网络游戏主管权两部委论争事件的分析[J]. 江汉论坛,2010(5):129-134.
[13] 杨敬研,李颖卓,张平,等. 韩国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与启示[J]. 经济导刊,2010(9):10-1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La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sports Industry

LI Dawei¹, JU Zengpi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e-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has entered an outbreak period and occupied one third of the game industry, but there is still a serious lag existing in the culture part of the system, which has been marginaliz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in e-sports industry with the “cultural lag” theory. By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sports industry, the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industry has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culture, whereas it has relatively-lagged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eriously-lagged spiritual culture. An in-depth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eparated scopes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duties, the short life cycle of e-sports games, the inertia of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games, and the imbalance of media power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via governmental function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media construction, club model, and product innovation.

Key words: e-sports; cultural lag; system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刑法规制和治理

陈禹衡¹, 尹航²

(1. 东南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2. 山东大学法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屡禁不止, 主要是跨境电商业务如火如荼地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和使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免税利益所导致的。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跨境电商平台和“信息掮客”, 其侵犯国家关税法益、侵扰国家经济秩序、侵害个人信息法益、侵犯个人财产法益, 并且应该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一种信用财产, 其各个环节的行为分别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和逃税罪。对于该行为的治理应该加强个人信息的监管、规范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 并由海关加强对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保护。

关键词:个人跨境电商额度; 信用财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盗窃罪; 逃税罪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8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40-06

伴随《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8〕49号](以下简称《完善通知》)的发布, 其中第一项就是将2016年颁布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18号](以下简称《税收通知》)中规定的单次跨境消费电商额度由2000元提高到5000元, 并且将年度交易限值由20000元提高到26000元。此举虽然能够促进跨境电商消费, 让利于民, 但与此同时, 提高后的跨境电商额度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对象, 在2018年的《完善通知》颁布之初, 央视记者就曝光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不法分子出于偷税漏税的角度, 盗窃他人的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申请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用于购物, 很多消费者并未海淘却在名下出现多条海淘消费记录, 而依据消费记录进行追溯时, 却仅能追到几家空壳的跨境电商公司。^[1]除此以外, 在2017年9月18日《法制晚报》的报道中, 指出这种窃取他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是“灰色通关”^①的新变种, 已经有30多人发现自己的信息被盗, 额度被用, 产品主要集中在奶粉、化妆品等。^[2]这种行为的存在, 对于我国的海关关税以

及个人信息及财产利益的保护都是极大的威胁。

一、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侵害的法益

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 所侵害的法益涉及的范围较广, 并且对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这一概念的性质尚存争议, 因而在探讨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所侵害的法益时尚存争议, 总体看来, 关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国家关税法益、国家经济秩序、个人信息法益、个人财产法益。

(一) 侵犯国家关税法益

根据《税收通知》中的规定, 对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内的消费, 关税税率为0, 而对进口环节的消费税、增值税, 则取消了旧有的50元免征税额, 征收原有消费税和增值税总和的70%, 对于超过限额的, 则采用一般的贸易方式征税。在《税收通知》出台前, 商务部从扶植电子商务产业的目的出发, 对跨境电子商务予以税收优惠, 商品进入海关保税, 以个人用品的名义出关, 缴纳行邮税, 免去了“关税+消费税+增值税”, 这一措施在促使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导致了我国关税的相应损失。在未发布

收稿日期: 2019-04-29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边界及体系构建研究”(18BFX10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疑难问题研究”(18BFXJ04)

作者简介: 陈禹衡(1994—), 男, 江苏淮安人,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刑法学。

《税收通知》前,2014年我国对所有行李和邮递物品的行邮税总额尚不足10亿元,这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局面格格不入,并且未经缴税的国外产品也对我国本土的商业发展造成了冲击。有鉴于此,国家相继出台了《税收通知》《完善通知》,希望能够填补此项关税上的漏洞,与此同时也留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这个渠道供消费者个人使用,方便群众生活。某些跨境电商平台盗用他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做法,隐瞒了其本应该正常缴纳的贸易关税,这种公然的偷税漏税的做法,不仅较为隐蔽,而且使国家海关损失了大量税收。

(二) 侵扰国家经济秩序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除了侵犯国家关税法益之外,还侵扰了国家的经济秩序,这里所侵扰的国家经济秩序包含两个层面的经济秩序,一是对于商品市场流通秩序的破坏,二是对于国家税收秩序的破坏。对于经济秩序说的概念,国内有学者提出反对,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前行方向,容易引起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3]综合来看,采用经济秩序说违反法益的基本原理、使刑法工具主义死灰复燃、丧失经济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忽视了秩序自身具有的属性差异,但是在实际上,经济秩序说不等于经济管理秩序,其具有存在的价值和土壤,如果单纯只提倡利益和自由,则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反法治主义。^[4]以此处的经济秩序为例,如果单纯提倡利益和自由,则关税在这里便不应该存在,商品应该随意流通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但是这明显是不合情理的,无论是早期的开放跨境贸易的扶植措施,还是近期对海淘贸易的加强监管,都体现了现阶段国家意志力在这一领域的作用,伴随国家意志力的体现,经济秩序这一概念便必然存在,其是国家意志力在这里的具化形象,以“自由”这种观念上的法益取代实际存在的秩序,只会瓦解法益概念在刑法中的界定力量,进而贬低其效能。^[5]

1. 对于商品市场流通秩序的破坏

对于商品市场流通秩序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不法的跨境电商盗用他人的消费额度进口商品,在进口商品偷缴、漏缴税款之后,降低了商品的价格成本,从而进行倾销,对市场上其他类型的正常缴税的商品或者国内生产的商品形成不正当的价格优势,从而扰乱了商品市场流通秩序,跨境电商的交易额度年年升高,2018年的交易额度较上一年增加了50%,达到了200亿美元,如果对其中存在的“灰色通关”不加以管控,这样体量的商品进入市场对于正常的商品市场流通秩序破坏巨大。

2. 对于国家税收秩序的破坏

对于国家税收秩序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其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偷缴、漏缴税款,对于通过合法贸易途径入关的商品来说,其主要是在报关环节破坏了税收秩序,按照正常的报关程序,将会对商品自用和商用进行区分,并计算其价值和应缴纳的税额,盗用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之后伪装成个人自用,则可以在额度内免缴海关关税。^[6]除此以外,在税制改革之后,原有的50元免税政策被取消,奶粉、化妆品等属于低价物品的税率为15%,这便意味着对于此类商品以“个人海淘”的方式走行邮税成本要远低于按照正常贸易缴纳的税款,即使在个人的免税额度用完之后,盗用他人的消费信息以“个人海淘”的名义进口低价物品仍然是具有成本优势的,这种“李代桃僵”的换税种缴税的方法也是对国家税收秩序的破坏。^[7]

(三) 侵害个人信息法益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前提就是获得他人的个人信息,并且以此申请海淘的账户或者购买物品时以“个人海淘”的名义购买,这种前置行为本身便构成了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其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第一是通过信息中介以地下黑市的方式购买个人信息,在报关时以该名义申请报关,并且将物品分别寄往不同的仓库以逃避追踪。第二是利用用户在其自身设立的“钓鱼网站”,诱骗用户登录后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并且未经允许擅自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第三是对用户进行欺瞒,巧立名目,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跨境电商交易。

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概念的确定有赖于201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決定》,在该决定中,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分成“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由于其组成复杂,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人身属性+财产属性+相关法益关联属性”的结合。^[8]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法益都有损害,对“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的损害体现在利用公民的个人身份,诸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侵犯了公民的可识别性,公民的身份价值被利用,其所被赋予的社会属性遭到侵犯,进而周延到其人身、财产权利。^[9]对“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的损害则体现在侵犯了用户的个人的购物记录和消费属性等隐私,公民在未知的情况下被盗取了跨境电商额度并用于购物,则附随的用户的消费记录等也被公开,此类信

息虽然属于个人隐私的外延,但是这种泄露的生活痕迹,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10],导致个人隐私在网络社会的“无处遁形”。

(四) 侵犯个人财产法益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中,犯罪对象是个人电商跨境额度。个人电商跨境额度是指国家规定的,用于个人跨境电商购物消费的一年中可以免交关税的额度。这种额度是由国家天然赋予的额度,并且在被盗用之后用户跨境海淘就必须缴纳相应的关税,所以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所侵犯的财产的性质,目前尚无定论。

1. 虚拟财产说

“虚拟财产说”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网络虚拟财产,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在实际上仅存在于个人所对应的海关总署的消费额度规定中,并没有实际的载体可供参照,其具备虚拟财产所要求的无形性,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储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非物理空间,并且具备法律授权的合法性。^[11]但是如果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虚拟财产,则存在虚拟财产有可供交易的属性的漏洞以及价值确定的漏洞。虚拟财产在多数情况下在网络空间可以自由交易,其由劳动者付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从而赋予了自由流通的属性,但是此处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是由国家统一授予,并且禁止自由流通,其财产属性有欠缺。除此以外,虚拟财产的价值确定一般波动较大,受到网络市场的影响,其本身并没有一般等价物予以参照,价值确定不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却是对应国家货币,价值恒定。由此看来,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虽然具有虚拟财产的某些属性,但是不宜视为虚拟财产而加以保护。

2. 信息财产说

“信息财产说”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个人的“信息财产”,波斯纳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需要具有三个属性:第一是普遍性,要求有价值的资源普遍为人们所用;第二是排他性,即,排除他人使用资源和所有权本人使用资源的绝对权;第三是可转让性,财产是可以让渡的。^[12]齐爱民教授将信息财产权视为受权利人直接支配的,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信息财产的所有权。^[13]这一说法较为符合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性质。一方面,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信息数据,其实际存在的载体依旧是信息数据的代码,从形态上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符合信息财产的要求。另一方面,采用信息财产说也契合

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财产属性,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合理使用能够给用户带来经济效益,具有经济价值。但是这一观点依旧不能涵盖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不可让渡的特殊属性,由于国家赋予并且和个人信息识别挂钩,因而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绝对不允许在市场上交易流通。

3. 信用财产说

“信用财产说”是将此处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类比成个人的信用卡的授信额度。一方面,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和个人授信额度一样,和个人信息紧密挂钩,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不允许用户进行交易和转账,而授信额度也不可以进行交易。另一方面,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也是虚拟的,授信额度由银行和征信机构联合授予个人,而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由海关授予个人,其背后都有国家强制力的背书。由此看来,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信用财产恰如其分,不仅可以解释其不可转让这一特殊属性的来源,并且可以依据对授信额度的监管经验来完善对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监管措施。

二、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主体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主体,就现在的案例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跨境电商平台,另一个是倒卖个人信息的“信息掮客”。这两者相互配合,前者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报关,后者以各种非法手段攫取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并贩卖,共同构成了这一条黑色产业链。

跨境电商平台是实施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主要行为人,考虑到通过盗用他人电商额度所能获取的巨额利益,其倾向于以此种方式逃避关税,其行为模式所侵害的法益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关税法益的侵害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我国的跨境电商主要分为B2B和B2C两种模式。B2B模式包括信息平台 and 交易平台,主要负责交易相关信息的中介服务,本质上是一种中介平台,其一般不涉及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B2C模式则负责商品的销售和运营,分为开放式销售和自营式销售两种模式。^[14]开放式销售是指B2C平台提供“网络贸易市场”,愿意进来销售者在付了佣金之后在平台上进行销售,平台在自身不参与商品销售和进口的前提下一般也不会涉及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涉及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重灾区是自营模式的B2C平台,此类经营模式的平台为了在行业初期形成价格优势,便利用他人的额度进行报关,从而利用减免的关税来形成价格优势,使得即使是个人年度跨境电商额度已经消耗完的消费者依旧可以以免税的低价购买商

品,并且将入关的产品分别寄往不同的仓库以避免侦查。

倒卖个人信息的“信息掮客”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扮演的是辅助者的角色,其本身并不参与到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这一具体行为中去,但是考虑到其是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前置行为的帮助者,其同样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法益和个人财产法益。倒卖个人信息的行径泛滥在于公民个人信息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公安机关仅在2016年一年就侦破此类案件1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00余人,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300余亿条。^[15]有鉴于此,应该将“信息掮客”也纳入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主体,并且根据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做的行为加以刑法规制。

三、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的定罪

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主要分成三个环节“非法获取个人用户信息——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利用盗窃的额度偷逃关税”,这三个环节分别触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逃税罪。

(一)非法获取个人用户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在非法获取个人用户信息的阶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主要是侵犯用于个人识别的信息,此处的信息获取不涉及个人用户在海关网站上存有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也不存在交易的必要。由于该罪的定罪需要符合情节严重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信息解释》)中的规定,对于征信信息、财产信息、通信内容、个人轨迹信息等,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50条以上就构成情节严重,对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交易信息等则要求达到500条,其他的信息则是5000条。对于此处获取的个人用户信息,虽然没有在《信息解释》中予以规定,但是其内涵上和征信信息相似,并且与财产信息挂钩,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视为一种信用财产,所以应该执行50条构成情节严重的标准。除了“信息掮客”可能构成该罪外,某些跨境电商平台出于牟利的考虑,将在自己平台登录的用户信息予以搜集后另作他用,借以申请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在达到50条的标准时,也构成该罪。

(二)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构成盗窃罪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观点首先需要厘清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根据上文的论述,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所侵犯的法益认定为是一种信用财产而非虚拟财产或者信息财产。现阶段可供参考的案例分别是“祁文强、高俊盗窃罪”^②和“沈岳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③,前者是将网络点券视为虚拟财产加以保护,认为行为人构成了盗窃罪,后者则是将网络游戏货币视为信息财产加以保护,认定行为人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虽然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不同于上述两个案件中的网络货币,其不可以自由流通,但是两个判决体现出了司法机关对于虚拟类财物定性的困难以及导致的定罪疑难。张明楷教授认为以计算机犯罪来规制此类行为存在局限性,因为计算机犯罪所保护的公益与此处法益的个人属性相冲突,并且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因而建议将此类犯罪行为认定为财产犯罪。而对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性质,虽然被认为是信用财产,但是其实际上与虚拟财产的属性相类似,在流通性方面有所区分,对于盗用用户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定为盗窃罪较为妥当。^[16]原因有二:第一,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本身并不涉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其是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架构下非法利用信息获取额度而非暴力破解,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并无破坏,适用计算机犯罪加以规制则存在法益的缺失和模糊。第二,有人指出“财产性利益不是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张明楷教授对此进行了批判,持此观点者从德日等国的刑法典出发,认为盗窃财产性利益不构成盗窃罪,则此类侵权行为也不构成盗窃罪。^[17]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将虚拟财产视为一种财产性利益,那么其可以作为诈骗罪、抢劫罪的对象,则为何单独不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呢?所以依据财产和财产性利益的区分认为盗窃虚拟财产不构成盗窃罪的观点不成立,推及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其作为信用财产,虽然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但是同样可以构成盗窃罪。

(三)利用盗窃的额度偷逃关税构成逃税罪

利用盗窃得来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进行偷逃关税的活动构成了逃税罪。逃税罪要求纳税人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这里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既包括免税额度也包括免税额度耗尽之后的正常使用额度,因此跨境电商平台偷缴的税款也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利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进行的零关税的进口,

另一部分是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用完之后,使用个人的名义进口商品,对于低价物品而言,缴纳行邮税的成本仍然低于正常贸易所需缴纳的税款,所以其以“个人海淘”的名义进口低价物品。这两部分所逃避缴纳的税款类型不同,是否构成逃税罪应该分开讨论。

对于直接利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进口货物并且不缴纳关税的行为,在行为方式上符合逃税罪规定的以欺骗、隐瞒等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并且在偷缴税款达到数额较大且占应缴纳税款的10%以上时,就构成逃税罪。对于在利用完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中的免税额度之后,又利用个人的海淘额度进口货物的,本文认为不应该认定为逃税罪,理由有二:第一,对于这种行为,其避税的性质大于逃税的性质,避税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利用选择性条文避税、利用不清晰条文避税、利用伸缩性条文避税、利用矛盾冲突性条文避税,而此处的行为更近似于利用矛盾冲突性条文避税,其利用个人额度进行避税的方式,前置行为虽然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侵犯,但是后置行为则是利用条文的冲突之处进行避税。第二,根据逃税罪的相关规定,要求构成罪名的偷缴税款达到数额较大且占应缴纳税款的10%以上,在很多情况下此种方式减少的关税数额并不能达到10%,所以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18]综合来看,对于利用盗窃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偷逃关税行为,如果利用了免税的额度进行进口,则构成逃税罪;如果在免税额度耗尽之后,利用个人账户的非免税额度进行进口,依旧构成对税法秩序的破坏,但是不能视为逃税罪。

四、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的治理

关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该行为所获的利润丰厚之外,市场监管的缺失以及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空白也是此类行为猖獗的诱因。有鉴于此,对于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行为的治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加强个人信息的监管

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监管,是治理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的前置性预防措施。在个人信息领域加强监管,可以有效地避免个人信息的外泄,而当跨境电商平台获取不到个人信息或者所付出的成本要高于缴纳关税时,其自然会倾向于走正当的贸易措施缴纳关税。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国家经济秩序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在大数据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所蕴含的价值远远未被发掘完全,必须尽早地进行治理,防止问题的扩散,

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 规范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的滥觞的直接诱因就是早期对于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不力,出于扶植跨境电商平台的目的考量,早期对于海淘的关税并不进行征收,从而导致跨境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在经历了野蛮扩张之后,为了形成价格优势,其必然会从各个方面入手降低成本,而《税收通知》的出台则杜绝了他们的这一设想,从而使某些不法的跨境电商平台不惜铤而走险,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以降低关税。规范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应该从严格管控平台进口商品的来源途径入手,要求平台出售的商品可以追溯完整的进口流程记录,尤其是报关领域,必须有缴纳相应的关税的证明,要加强对B2C平台的监控,防止出现虚假申报的情况。

(三) 海关加强对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保护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重要原因在于海关对于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保护不力,在现阶段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难度较低,只需要利用个人的身份识别信息就可以进行盗用,并进行海关申报,这也是不法分子前赴后继的原因。涉及巨额的关税利益,应该尤为注意对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保护,使用动态密码制度,并且在进行跨境消费之后,应该给消费者发送信息进行提醒和确认,对于多次购买并且将物品寄往不同地方的账户,应该重点关注其账号是否被盗用,对于被盗用账号应该立刻予以冻结。

五、结束语

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出于群众旺盛的消费欲望和方便群众生活的角度考虑,国家授予公民个人每年的个人跨境电商额度,减免了相应的关税,可是这种个人的信用财产却被不法分子所觊觎,甚至很多消费者在被盗用了个人跨境电商额度之后依旧不清楚自身的额度已经被盗用。综上所述,分析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行为的行为主体、行为手段、侵害法益,并且对于其中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加以刑法规制,才能够更好地捍卫公民的合法权利,完善我国的海关税收体系,在“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促进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注释:

①“灰色通关”是指在海关税收征管不健全时期,进口商通过隐藏货物、虚构货物价格等手段避免通过海关申报税款,或虽然缴纳税款,但是进关货物与报关单不符,借此避税,此处的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做法可以视为“灰色

通关”的新变种。

②参见(2011)浙金刑二终字第32号。

③参见(2015)珠中法刑一终字第46号。

参考文献:

- [1] 吴迪. 让冒用个人信息牟利者无处遁形[N]. 工人日报, 2018-05-23(3).
- [2] 韩佳鹏. 神秘电商网站盗用客户海淘额度, 受害者维权之路艰难[N]. 法制晚报, 2017-09-08(15).
- [3] 何荣功. 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 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4, 32(3): 44-56.
- [4] 涂龙科, 李萌. 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经济刑法法益[J]. 经济刑法, 2018(00): 3-14.
- [5] 克劳斯·罗克信, 樊文. 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J]. 刑事法评论, 2006(2): 146-165.
- [6] 赵滨元.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及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以小额跨境网购为例[J]. 改革与战略, 2017, 33(1): 133-135.
- [7] 王文成, 闫安, 常楠楠. 税制改革, 跨境电商何去何从?[J]. 税务与经济, 2017(1): 103-107.
- [8] 于冲.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与入罪边界[J]. 政治与法律, 2018(4): 15-25.

[9] 曲新久.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超个人法益属性[J]. 人民检察, 2015(11): 5-9.

[10] 齐爱民. 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 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7.

[11] 石杰, 吴双全.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J]. 政法论丛, 2005(4): 33-40.

[12]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 蒋兆康,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42.

[13] 齐爱民. 捍卫信息社会中的财产[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98.

[14] 郁宇. 谈我国跨境电商的模式与创新路径[J]. 商业经济研究, 2018(22): 130-133.

[15] 李忠勇. 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须多管齐下[N]. 人民公安报, 2016-12-22(3).

[16] 张明楷.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J]. 法学, 2015(3): 12-25.

[17] 陈云良, 周新. 虚拟财产刑法保护路径之选择[J]. 法学评论, 2009, 27(2): 144-148.

[18] 张明楷. 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811-81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ealing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CHEN Yuheng¹, YIN Hang²

(1.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2.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for the embezzlement of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are the huge demand brought by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and the tax-free benefits of using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The main actors of stealing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are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information brokers”, which infringe upo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ariff law, invade the state economic order, infringe upon the legal interes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nfringe upon the legal interests of personal property.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credit property. Each link of the actions of those main actors separately commits the crime of violating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crime of theft, and the crime of tax evasion. The governance of this behavior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by the customs.

Key words: person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quota; credit property; the crime of violating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crime of theft; the crime of tax evasion

养老保障地方立法与执法思考

祁雪瑞¹, 张书占²

(1.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2. 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 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养老保障的良好运行是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善治的前提是良法,只有首先完善立法,才能使养老保障事业健康稳定地发展。而该领域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法律法规缺少,法律规定模糊,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并存,政府责任履行随意性大。建议各地根据《立法法》的要求和养老保障的现实需求,以创新性和实施性的地方立法的技术形式,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和受益人参与监督的制度安排,创制和完善政府责任履行、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服务需求满足、养老保险、护理保险、养老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制度体系,改观政府责任履行的随意性,改造单位行政人员克扣涉老权益的难以救济状况,改变养老院所规避法律的畸形运作,助益养老保障相关的立法和决策。

关键词:养老保障;地方立法;地方执法;养老事业;养老产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09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46-05

养老是重大民生问题,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养老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给政府带来了很大难题。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已经陆续进入老年,已占老龄人口的30%以上,近年来新增老龄人口中一半以上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上海更是达到了80%以上。^[1]失独老人处境更加典型,农村留守老人处境更甚。困难老人如何满足养老基本需求,一般老人如何相对较好地养老,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十三五”时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目标实现期限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养老事业和产业都处于初级阶段,要完成2020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等目标任务艰巨,老年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已经规划十年尚未落地。养老保障的现实运行亟需完善立法并严格执法,以良法行善治。

一、强化养老保障地方立法的必要性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专设了“养老保障”一章,突出了养老保障的重要性,也彰显了养老保障法治化的大趋势,各地都同步进行了法规

的修改,强调了养老保障内容,但是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制定养老保障的专门立法。相对来说,地方立法的各项成本会比中央立法低很多,所以地方立法应承担起历史重任。养老保障立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成熟的政策制度和实践经验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提升制度的位阶,以法律的强制性约束政府责任履行的随意性,强调责任的刚性要求和后果承担。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和各省民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到了法治民政,养老保障作为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必然要求强化立法。养老保障领域制度建设已经探索多年,政策和行业标准已经体系化,现实又迫切需要规范运作,强化立法提升制度正当其时。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我国法律体系包含地方政府规章,所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也是立法。另外,《立法法》还规定,政策实施一年后如果有必要延续,就应该上升为法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2018年发布的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状况显示^[2],这一项政策转化的立法工作普遍比较薄弱,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法律问题研究”(2018B10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试点项目“河南养老保障法律问题研究”(19A30)

作者简介:祁雪瑞(1963—),女,河南滑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行政法、社会法。

养老保障领域更是如此。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保障和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疾病陪护、养老设施建设、法律援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规范。如何让有限的政府资金投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如何助益养老产业健康发展,都是地方立法的任务所在。

二、养老保障地方立法的现状与问题

(一)制度形式以一般规范性文件为主,法规规章稀缺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是养老金制度,支柱是政府强制养老保险制度,辅以对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和救助制度,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是当前主要的养老保障实现方式。我国目前采用的制度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共同体下的责任不均衡共担,制度形式是以规范性文件为主,配以少量部门规章,法律几无。全国人大制定的只有2018年修正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吸纳了国务院的养老服务规划,《社会保险法》涉及基本养老保险。各地方行政层级也一样,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当家,法规阙如,制度层次低,强制性弱,制度运行欠规范,亟需进行立法提升,并加强责任明晰制度和实质性监管制度,增强法律体系性和操作性。

立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基本法。中央和各地都没有基本法和专门法,只有少量附带性立法和部门规章,规范运行主要靠政策和行业标准,制度层次低,强制力弱,难以追责。比如,当前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某省2002年制定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到2018年已经“暂行”16年仍然有效,其中未包含养老服务。2018年该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未明确包含养老服务。因为欠缺具体的法律规定,使得养老事业出现行政随意性,运作不规范,养老产业出现优惠难兑现象,平等成奢望。另外,区分营利性质和非营利性质也给养老产业发展造成了困惑。^[3]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省域内各地各区的差异巨大。另外,医养结合模式是养老保障设施的发展方向,却遭遇到政策衔接不畅,养老机构往往享受不到与卫生服务机构相应的财政支持,而医疗机构的养老护理床位也难以享受到政策优惠。^[4]

以河南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为例,河南没有制定全省性法规,《河南省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施办法(试行)》(豫财综[2018]60号)作为政策于2018年11月发布。据河南省老龄产业协会工作报告显示,其培训评估咨询专业委员会受省民政厅老龄处委托,起草了养老机构的两个工作规范:《养老机构老

年人膳食服务规范》和《老年人精神关怀服务规范》。目前,河南已经发布的涉老民政地方标准有6项,正在报主管部门评审的有1项。以上制度规范推进了河南的养老服务标准化水平,但是制度层次偏低,没有形成系统的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

(二)制度运行随意性大,强制性弱,责任性差

执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行政监督浮于表面。相关部门的工作报告显示,执法侧重事前的审核、许可、形式性的备案、标准的制定等前期工作,运行性监督无暇顾及,违法经营常见而行政处罚案件很少。比如,某养老院对自理老人和卧床老人进行混养,还在大门口悬挂多个“教学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的牌子,持续数年,没有任何人进行干预。在2018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行政许可代之以备案登记之后,监管薄弱更加明显,执法仍然因循旧例。观察全国,养老领域的制度执行呈现出责任下压的趋势,有些超出了基层的负担能力,造成执行政策雷声大雨点小。相比教育和医疗,民政工作者有个说法:教育和医疗都是一件事情一堆机构在管,而民政是一堆事情一个机构在管。

政府补贴资金的分配具有随意性,欠缺透明度。比如,2018年某涉老单位向上级申请活动经费,某领导答应给20万元,后来换了一位领导,答应给10万元,最后一分钱也没给。福彩公益金也没有规范的发放制度,通常以领导批示为准。再以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为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明确要求,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做到或者基本没有做,上级只奖励不处罚,除了少量人头资金外,大部分是奖补资金,资金投放采取锦上添花的方式,做得越好,得到补贴越多。而那些做得好的地方一般是地方财政资金比较充裕的地方,地方配套资金也很到位。如此,造成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换一个说法是,试点运行成效显著,大面运行落差极大。

在行政给付方面,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养老设施的投入比例不明确,各地的差距有5倍之多。比如,在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地区差异、城市差异非常大,一些城市做得比较到位,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一些城市基本没有做这项工作;一些城市在应付差事,某市辖区内政府普遍零碎性地拨付社区养老场地导致经营者难以有效使用,而表面看政府却是按照法规要求的面积给足了,致使业界广为传言,贬损了政府信誉,伤害了养老保障事业和市场。

在养老院合同监管方面,一些养老院与送养人签订合同后以需要备案为由骗走送养人应该留存的

合同,为要赖做准备,送养人反映到民政部门,因工作人员太忙而无暇顾及。据某省前老龄委官员介绍,该省养老院使用的合同在全国比较先进,因为他力主公平,立场持中,不偏向养老机构。但是合同本身再好,老人维权的时候用不上,也是枉然。在监管理念方面,还是传统的事后惩处模式,在宽松行业入口的大背景下,没有把精力放在事中的动态监管。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完全执行。

在纠纷调解的过程中,没有侧重制度的改进和行业综合环境的协调改善,而是就事论事,把纠纷压下来为成功,案结即了,一了百了。比如,某养老产业协会副会长名下的某中心养老院,院医被辞退的时候拿走了老人的贵重药品,养老院不承认,因为养老院保管老人的药品没有登记制度和用药记录,主管部门也不要求养老院完善制度。养老院所包括社区站点,普遍没有张贴监督举报电话。一些养老院老板只是负责收钱,其他一概不管。经营负责人也不给入住老人及家属提供养老院老板联系方式,被服务一方无法与老板直接对话,诉求与建议难以被采用。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太少无法满足工作需要。比如,基本上城市的区民政局负责老龄工作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有些还是兼职。某市某区老龄人口14万多人,区老龄办只有一个人负责这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时间和精力只够应对上级布置的重点工作,疲于奔命,生病住院还得应付工作杂务,难以充分休养。

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养老企业三方的沟通没有形成常态,主管部门对行业协会的重要桥梁作用认识不足,故而利用不足。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主管部门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较好,但在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空白,山东青岛走在了前面,其经验值得总结。另外,行业协会也远未成熟,搭台服务较多,规范制约较少,服务结构不均衡。

三、国内省市和国外立法与制度借鉴

(一) 养老保障国内地方立法经验

上海、西安、青岛和沈阳做得比较好。他们都系统地出台了法规和规章,对养老保障的各个方面规定得比较详尽。上海的政府投入较多,基本保障和普惠福利做得比较好,这也成为城市吸引人才的亮点。曾经有一位河南籍女博士在比较了上海、北京和郑州的相关待遇之后,最终选择了在上海工作。西安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比较出色,整体规划已经做到了2030年,社区嵌入式微型养老院、虚拟养老院都比较先进。青岛的政府购买养老产业协会服务做得比较好,成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全国性

先进典型,其意义在于发掘了行业协会的巨大潜力,事业与产业互动共赢。《沈阳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在全国尚属先进。

(二) 养老保障国外立法经验

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德国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社会护理保险法》,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增加了护理保险,使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达到全民覆盖。目前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护理保险5个部分组成,呈现全面化、多样化、人文化、社会化的特点。护理保险的受益群体主要是老者,中国在这方面是个短板,日本详尽的《护理保险法》(2018年修改)可以作为我们制度建设的蓝本,它把护理分为5个等级,个人负担比例10%—30%,并设置了上限。新加坡的养老保障规定非常细致和人性化,比如,子女如果和父母或者独居老人共同居住,可以优先购买或者租赁政府组屋;如果三代同堂,可享有优先选择权并享受优惠价格;如果子女与丧偶的父或母共同生活,政府会给予减免征收遗留房屋遗产税的优惠。^[5]韩国的养老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实行税收优惠。对与老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房产税进行减免。家庭每供养一个老人,政府即减免其遗产税3000万韩元;如果三代同堂家庭赡养老人超过5年,政府减免继承人90%的遗产税;对于赡养60岁以上男性和55岁以上女性且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纳税人,每年予以免除48万韩元的个人所得税。^[6]

四、对养老保障地方立法与执法的建议

养老保障法治化转型是法治民政的应有之义,地方工作要从红头文件治理转向法规规章治理。建议根据《立法法》的要求和养老保障的现实需求,以创新性和实施性的地方立法的技术形式,尝试解决养老保障领域存在的法律问题,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和受益人参与监督的制度安排,创制和完善政府责任履行、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服务需求满足、养老保险、护理保险、养老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制度,改观政府责任履行的随意性,改变单位行政人员克扣涉老权益的难以救济状况,纠正养老院所规避法律的畸形运作,助益养老保障相关的立法和决策,促进我国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养老事业由特殊到普惠,养老产业由紧缺散乱到充裕规范,良好实现养老保障政府目标。

(一) 以地方立法促全国立法

养老保障的主要内容是行政给付,是地方立法自由度比较大的领域,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来解

决。应以地方立法确认养老保障的各项具体工作,从政策的模糊转变到立法的精准,从行业的指导转变为法规的强制。立法要以保基本、重落实和促提高为出发点,保基本要求全覆盖,促提高倡导多元化。同时,还要辅之以有效的行政监管和有力的侵权救济。

(二) 秉持救助公平和保险高效立法理念

在立法理念方面,应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救助制度应注重公平,公平性体现在为低收入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实现社会共济。而作为覆盖面广泛、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则应注重效率,应强调其保险属性。立法原则应遵循公平性,统一性,安全性,规范性,全覆盖。应理顺各层次养老保障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

(三) 规范政府责任,实现良法善治

应将政府责任的规范化作为执法制度重点,以规范化解决明晰性,以程序化形塑公正性。在我国养老保障法律关系三主体中,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严格执法保证地方财政安排中养老投入的公平性、效益性和规范化,以对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促效益,以对民政部门的履职评价优行政。养老保障领域的政府责任可以划分为宏观设计责任、运行管理责任和财政投入责任三大类。政府在履行好财政供给责任的同时,还要履行好制度建设责任,标准设定责任,基金安全责任,保值增值责任,分级比例责任,资源分配责任,资金效益责任,投入与需求匹配责任,市场监管责任,等等,责任多而复杂。应明确责任主体、责任内容,明示不作为和作为不当的法律后果,有后果才是完整的责任概念,才能约束当事人把事情做好。比如,关于社区养老设施配套的法规执行,要切实吸取配套建设学校的教训,预防法律白条。针对变相抗法的现象应及时纠正,比如对政府拨付社区养老设施用房时只计总面积不顾实用性的行为,应通报明确其违法性。对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应制定管理办法严格遵照执行,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违规责任。

(四) 全面着力完善法律体系

应在立法强制确保特殊人群基本需求的基础上,确立养老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助益的思路,在此前提下立法协调各部门的行政行为,解决养老保障财政投入不足和不公的难题。养老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可以市场养市场,以产业促事业。比如,运用类似《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定,寻求事业与市场的

双赢。应以养老保障领域的法律需求为导向,以法治政府、法治民政、法治养老保障的高度站位,突出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和购买产业协会服务法治化的重点,化解医养结合优惠政策落实的难点。

以河南省地方立法为例,建议重点完成以下立法工作:①省人大出台《河南省养老保障条例》,作为养老保障领域的地方基本法,也为国家层面的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条例应该参照《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相关规定和政府规划,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原则,提高养老服务保障能力。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满足。通过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长期护理权益。立法协同支持医养结合落到实处,应参照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系统性、协同性整合,并提升为地方立法。创设老年人监护服务制度,对无法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无监护能力以及对监护人确有争议的老年人,由其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②尽快出台《河南省政府采购条例》,设定专章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进行规范,要注意对《河南省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的吸收借鉴,注意与《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衔接。③针对很多民办养老机构遇到的土地、人力、融资等方面的难题,制定《河南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建立对民营企业管理部门的问责制,建立对民营企业首次轻微违法容错机制,为养老产业健康发展护航。《郑州市资助民办养老机构实施办法》2018年3月修改,加大了养老机构扶持和奖补力度,取消了诸多限制条件,可以作为省级立法借鉴。④立法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养老保障受益人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工作,是服务也是监督,其独立性尤为重要,需独立于政府部门,以保障其评估的客观性真实性。⑤把成熟的养老政策及时提升为约束性更强的政府规章,以利于严格执行和司法适用,践行法治化。

(五) 执法制度建设需要明晰的主要事项

第一,明确界定养老保障中的各项事宜。第二,统一政府责任种类和责任程度。第三,明确责任履行的程序要求、时限要求、公开要求、程度要求、效果要求等,以及不履行责任或者责任履行不当的法律后果。第四,政府投入基本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和投入额度在财政收支中的占比应该明晰。第五,拓

宽受益人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有权利必有救济。第六,强调被服务方的法律关系主体地位,评价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受益者群体的评价意见应该占到明显的比重。第七,破解医养结合中遭遇到的协调障碍,加强卫生与民政部门协作。第八,社区养老服务的重点在于综合协调,应明确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和站点运营商各自的责任与权利,让各方凝心聚力,遇到问题不推诿,不逃避。

(六)构建养老企业市场信用体系

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在养老用地、养老物业和养老服务等方面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养老服务机构(含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经营范围和组织章程中包含养老服务内容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及人员实施联合惩戒。养老服务机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检查结果等信息按经营性质分别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并公示。养老用地供应时应使用信用信息,将企业信用度列为竞争条件。

(七)实行执法责任清单制度

制定“履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的责任清单,制定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相关政策文件,建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健全“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惩戒力度,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市场执法部门要将企业登记基本信息共享至省级共享平台或省级部门间数据接口;民政部门要及时

下载养老机构相关信息,加强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管。

(八)强化动态监管机制,注重监管及时有效

应以行政合同和监管协议为依据,以信息化和信用化为依托,进行动态监管。在省级层面,通过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进行日常监测工作,对系统内各地上报的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和研判。对于发现的疑似违规、违约信息,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在市县层面,将养老服务企业纳入动态巡查日常工作范围,明确责任单位,及时发现和处置违规、违约行为。对于投诉控告,必须专人负责,全程实时反馈处理结果。

参考文献:

- [1] 俞金尧. 关于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的提案[EB/OL]. [2019-05-28]. <http://tougao.12371.cn/gaojian.php?tid=1247290&yulan=yes>.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 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16(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 吴炜娅,黄熙熙. 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探析[J]. 南方企业家,2018(2):188-189.
- [4] 刘松辉. 医养结合制度性障碍的破解路径[J]. 中国集体经济,2019(15):86-87.
- [5] 景日泽,章湖洋,方海. 国际经验对我国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启示[J]. 中国卫生经济,2017(7):89-93.
- [6] 吴国平. 我国老年人赡养保障立法问题研究[J]. 学术探索,2019(3):110-11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oughts on Local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the Guarantee for the Old

QI Xuerui¹, ZHANG Shuzhan²

- (1. Institute of Law,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2. Henan Shuzhan Law Firm, Zhengzhou, Henan 450015, China)

Abstract: The good operation of old-age secur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governmental social management. The premise of good governance is good laws, because the old-age security develops steadily and healthily only if the legislation is perf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However, the biggest problems in this field are exactly the lack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vague legal provisions, ina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 law, and the difficulty to comply with the law, besid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is largely arbitrary. It is suggested tha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for the olds' basic life guarantee and services, pension insurance, nursing insurance, and pension industry should be improved and innovated, with the form of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local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egislative law and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pension guarantee. The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phenomenon of arbitrary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at administrators skimp on old-related rights should be terminated, the laws-avoiding deformity operations of endowment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hese actions all benefit the legislation and decisions of pension guarantee.

Key words: old-age security; local legislation; local law enforcement; pension business; pension industry

河南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刍议

胡永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打造中原文化高地是习近平“文化自信”治国理念在河南的具体化。进一步挖掘中原重要文化史实,展现它的丰厚底蕴;加强优秀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持续凝铸河南精英文化;推进河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交融,不断打造特色文化,是打造的关键。传统主流媒体做大做强打造文化高地的专栏,做好精准宣传;引导新兴媒体健康有效传播,大力推进“互联网+河南文化传播”模式;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推行融合输出;利用民间联谊群体,做好做活文化传播,是实现的渠道。助推文化高地建设各方面的同步发展,实现文化发展带来的互惠共赢,是构筑的目的。

关键词:打造;中原文化高地;河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0

中图分类号:K244;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51-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文化自信”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2016年,中共河南省委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重大战略部署。随后,省委宣传部等主要党政职能部门围绕着“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这一主题,相继召开座谈会,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同时各相关社会科学研究者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参与其中,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在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近来,笔者较为关注这一热点问题的发展势态,并对这一问题作出解读,以期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继而推动该项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一、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持续打造精品

进一步挖掘中原重要文化的史实,深刻展现它的丰厚底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河南重要文化史实的开掘已较为充分,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业绩。^[1]随着时代的发展,之前不被看好或因受时代因素影响而未被揭示的史实,在今天看来,或别具一定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重加审视,在已有史实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展现出它原本丰富多彩的面貌。比如红旗渠精神,我们通常认为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等方面,这种精神基本上通过档案(如文字、图片)、新闻报道,以及实物来体现或通过我们当前看到的壮观场景来感悟,譬如我们翻检当时的党报发现,一些红旗渠建设劳模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人们了解红旗渠建设盛大热烈的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当今传承红旗渠精神提供了历史依据,但在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些劳模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面貌不免有言过其实处,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其内涵显得不够。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源出发,深入挖掘仍被忽视或不被重视的口述史料,即根据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当年参加红旗渠建设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将他们在建设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所想等,在口述的基础上,整理成文字或保存录音视频等资料,从现身说法的角度再现当时的盛况。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对于受访者来说,由于是回忆,经过时间的发酵,

收稿日期:2019-06-15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持续打造中原文化高地的对策建议”(192400410230)

作者简介:胡永启(1973—),男,河南嵩县人,文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文献学研究。

口传史料与事实或有不符,由于当时的视域,一些重要的内容未必看到,也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或来自自身的主观因素影响,一些口述并不一定客观、准确,而且即便是同一受访者的不同次的口述也会有出入,这就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口述史料加以比勘,甄别是非曲直,还原或部分还原历史真相,借以推动它的内涵建设,展现它的丰厚底蕴。当前,开展这项工作已显得刻不容缓。红旗渠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修建者中的年轻一辈若按20出头来算,至今已年逾古稀,更别说当时年龄稍长者了。抢救性挖掘这一史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再过若干年,随着这批人的逝去,这段口述史料将不复存在,再想还原一些历史事实、丰富它的内涵,将无可能性。其实,河南重要的文化,也可通过相应的方式,深入挖掘史料,推动文化内涵建设。此外,一些流行于民间的民风习俗等,同样可以类似方法加以采集、整理,为保存一代史料、为将来进一步打造相关河南地域文化奠定文献基础。

加强优秀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持续凝铸河南精英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它也在不断地吸收一些有益的成分,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时段的优秀文化。当前,我们正处于奔小康的决胜阶段,社会文明的组构已达到了当前阶段的高水平,且在互联网发展模式下显得尤为明晰。在打造中原文化高地的有利形势下,我们应遵循优秀文化自身成长的规律,主动推动河南优秀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融合,以便凝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精英文化。河南优秀文化如少林武术之所以能够名扬于世,除了它的功夫绝天下外,还在于它一贯坚持的潜心研创的精神,这是它在历代风雨变换中能够经久不衰的内在根本。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作为佛教信仰与禅宗智慧的结合体,少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甚至与当前主流意识相抵牾的现象,在这一状况下,应不断吸纳当代文明中的科学观念,以便进一步优化禅宗智慧,同时融入当代文明中的守法观念,使它能够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凝铸新时代的少林精英文化。又如郑州合记烩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逐渐发展成为河南美食中的佼佼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同样需要不断融合现代文明中的普适理念,如吸纳最佳管理思想,提升它的管理水平,吸纳守信观念,增进企业品质,吸纳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它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这样不仅可使企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可聚集一些有效力量,进一步凝铸在河南美食文化中的

品牌。可以看出,不断融合现代文明,不仅是优秀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打造河南精英文化的内在需求。^[2]

推进河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交融,不断打造特色文化。实践证明,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不仅不会被异化,相反,在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的过程中,更容易形成鲜明的特征。因而,推进不同优秀传统文化间的交融,也是打造中原文化高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河南传统文化中的河南地方戏,共有豫剧、越调、曲剧等20多个剧种,其中的豫剧已发展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综观这些地方戏,它们主要以传唱传统内容为主,虽然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上作出了贡献,但是缺乏反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内容,不利于它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打造中原文化高地的当下,应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发动一批文化精英,将那些反应河南人民一贯淳朴踏实、勤劳奋进和当下创新创业等等传统与时代特征的喜事趣事写入剧本,同时有意识地把河南地方戏中诸多剧种进行融合,凝聚各剧种的精华,并仍以河南特色方言唱颂河南时代风貌,努力打造河南戏剧特色文化。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当属豫剧《焦裕禄》,曾作为建国65周年向祖国献礼的河南省唯一入选剧目,上演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近年来豫剧中的典范之作。可见,以河南方言唱响河南当代精神,将成为河南地方戏融合发展继而打造时代特色剧种的一种范式。这样做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可培养一批剧本创作者,进一步丰富社会文化的内容,造就一批艺术表演人才,不断推动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我们的时代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德艺双馨的戏曲艺术工作者,而且,只有在量足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相对较多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之作。另外,在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当下,以河南方言传唱的河南地方戏,也更突显它的个性化特征。

二、创新载体,有效宣传

传统主流媒体做大做强打造文化高地的专栏,做好精准宣传。在构筑河南文化高地的过程中,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河南地方戏之所以能够红遍海内外,除了自身的艺术魅力外,与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20年如一日的推介是分不开的。这一实例告诉我们,坚持进行专栏建设,定位明确,瞄准目标,才能更好地打造出品牌效应。但总的来看,在河南近百家传统主流媒体中,真正开设构筑文化高地专栏的非常有限,或者已开设专栏者缺乏精细化的宣传定位。其原因之一在于对文化建设的内容把握不够准

确。^[3]文化建设包括文明探源、文化思想、古代文化、现当代文化、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打造中原文化高地风尚的助推下,相关传统媒体可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做文章,已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的媒体可努力朝纵深方向发展,尚未开设相关专栏者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选择地开设专栏。如地方电视台,可有目标地推出《河南特色美食》等系列栏目,邀请名家现场制作,同时从历史、现况、制作工艺、特色、传播诸方面展开解读,延续《舌尖上的中国》之文化,打造特色栏目。结合已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的媒体推知,它将有较为广阔的市场,一是制作者不同,具体细节又有所差异,二是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内又有不同的受众。既展示了才艺,又传播了知识,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饮食文化。影响度的不断扩大,是精准宣传取得成效的基本表现。精准宣传、讲究效果才是开设专栏追求的目标。

引导新兴媒体健康有效传播,大力推进“互联网+河南文化传播”模式。新兴媒体主要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支撑下而发展起来的传媒形态,它具有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等特点,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作为一种新型事物,其管理滞后、规范度有限,下一步要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其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协同推进河南文化传播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将河南文化及其相关内容发布在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及微博、微信、手机短信、App、qq上,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比起传统媒体它突破了地域限制,凡关注河南文化者,即使在境外也可随时看到,并及时进行互动。如近时《河南日报》客户端上有一文《奋力谱写我省文艺事业更加绚丽的新篇章——河南省第七次文代会以来全省文艺事业发展综述》,经微信朋友圈分享,在短短的40分钟内,就有超过100人次的浏览量和10次的点赞。经调查发现,当天该版的《河南日报》刊登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文章有五篇,唯独此篇得到特别的推崇,首先在于最初发布到微信上者的选择,所选择内容不仅是他本人认为是值得推介的内容,重要的也是其他读者所普遍关注的内容,这是获取高点击率的关键,否则就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瞬间即逝。这告诉我们,以互联网传播河南文化已是大势所趋,在充分把握这一发展机遇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文本双重选择所起到的作用这层因素,做到有效传播。

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推行融合输出。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新和旧总是交织在一起,而且二者长期共生并存,既照顾

到传统,又考虑到趋新,将更能促进问题的解决、更好地推动事态的发展。就当前情况而言,受众中年龄长者习惯于接受传统媒体,而年轻一代,则更易于接受新媒体。在这一现状下,推行新旧媒体相融合的输出势在必行。在这方面,一些传统媒体已做出了探索,较显著者如少林武术通过多种新媒体制作,将宏大的场面通过2019年央视春晚这一传统媒体推出,迅间传遍全球,收到了绝佳的收视效果,精准高效地宣传了少林武术精神。此外,一些报刊、电视等或推出网络版,或设置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努力推进融合输出。据有关数据显示,一些传统媒体在较为明显的地方印出二维码,便于通过手机用户扫码等方式进入阅读,这种探索融合输出的思路值得肯定和推广,但目前来看,整体效果不是很明显。下一步,需要不断探索融合输出的新机制,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它的宣传效益。^[4]

利用民间联谊群体,做好做活文化传播。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如老乡会、校友会、同宗会等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这些群体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差距大、文化程度各异,因有某种亲近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故而相关的话语更能引起群体的关注,是个传播文化不可忽视的路径。由于他们来自各地,相关人员有着了解各地不同文化的优势,他们可将所熟知的地域文化带给其他成员。由于年龄上存在的差异,可以形成传帮互补,年龄长者,可将其知道的为外人少知的文化讲述给其余成员,不至于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年轻一代,可以发挥他们更易于接受互联网的优势,将获取的新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年长者,让他们也能得到由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不同的文化红利,两类人群形成互补并进,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当前,该群体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但真正有效宣传、进而成为助推中原文化发展的又一渠道,尚需不断地引导和规范。

三、同步发展,互惠共赢

助推文化高地建设各方面的同步发展。在打造中原文化高地的过程中,需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等方面着力,三者间有着较大的关联性。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不断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文化消费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文化消费的层次也在逐渐提升,这为文化产业的建设和文化事业的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需要不断加大文化产业建设的力度,持续打造精品工程,同时进一步转变文化管理部门的

职能,适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优化管理模式,推动文化高地各方面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是构筑文化高地三个主要方面同步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宣传文化的媒体,传统媒体已有了较成熟的发展,而作为新媒体及融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管理和保障机制还相对落后,接下来,在不断学习、充分调研以及适度借鉴传统媒体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制定顶层设计、法律法规等,既保障高速迅猛发展的势头,又保证它的规范有序发展,使它们能够逐渐成为担当推动文化高地建设的得力助手。^[5]

实现文化发展带来互惠共赢。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它在河南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在不断满足消费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经济效益的增长,转而推进整个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三者间的互惠。同样,传播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借助文化宣传,促进平台建设,推动自身快速发展,实现两个效益的并进共赢。

总之,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持续打造精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创新载体、有效宣传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步发展、互惠共赢是解决问题的目的。三者联动,以更好地完成打造中原文化高地这一艰巨而又光辉的时代重任。

参考文献:

- [1] 仇霞. 河南传承传统文化高地的价值研究[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8(4):30.
- [2] 李庚香,等. 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 创造中原文化新的辉煌[N]. 河南日报, 2017-07-06.
- [3] 王守国.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N]. 河南日报, 2017-09-21.
- [4] 刘兰兰. 坚定文化自信 构筑新时代全国重要文化高地[N]. 河南日报, 2017-11-29.
- [5] 侯菊英. 坚定文化自信 加快构筑河南文化高地[N]. 河南日报, 2018-04-3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Discussions on Henan's Creation of Central Cultural Highlands

HU Yongqi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central cultural highlands is the concretiza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Henan. Henan's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excavate the essential cultural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show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Henan; it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consistently build the unique Henan elite culture. The multi-fusion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s of Hen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re the key links of creating central cultural highland.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should make bigger and stronger columns to create cultural highlands, conduct accurate propaganda, guide healthy and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new media, vigorously promote the mode of "Internet + Hen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implement fusion output, and make good use of folk friendship groups i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Promoting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cultural highland construction and realizing the win-win situation brought by 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the aims of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reating; central cultural highland; Henan

海南疍家人的民俗文化及其旅游开发

黄丽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的疍家人,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以及其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特殊的民俗文化。通过探究海南疍家人的起源、主要的民俗文化、疍家文化的没落与发展,以及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疍家文化等,来研究疍家人独具魅力的现代生活、现古老风俗文化的结合。

关键词:海南;疍家人;民俗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55-04

海南岛长时间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海南岛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文化,疍家人文化就是海南岛诸多特色文化中的代表。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热带岛屿,有着许许多多的海湾,其中三亚湾就是海南岛众多海湾之中的代表。三亚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贸易海港。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亚港被现在的高楼大厦和拥挤的现代化道路所包围。但其仍然保留了一丝质朴民风,而这份难得的质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数百年来以船为家的疍家人。

几百年来,疍家人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海上捕鱼生活。直到近年,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部分疍家人才开始陆续迁徙至陆地生活。尽管与陆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还是有部分疍家人不愿意进入陆地,继续维持着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以前的疍家人,受捕鱼技术的限制,只能在近海打鱼,海上气候多变,疍家人练就了一身劈波斩浪的捕鱼技术,也会夜观天象来确定是否适合出海捕鱼。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疍家人勤劳勇敢、坚韧顽强的性格。同时,为躲避海上恶劣的气候,疍家人的船与船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使得疍家人养成了睦邻友好、

互帮互助的民族特性。

一、海南疍家人的起源

据清朝《崖州志》记载,疍家人有着近四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起源,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疍家人也可能不是单纯的民族,也可能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最后形成的。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疍家人可能是蒙古族成吉思汗的后代。元朝末年,战乱不休,一部分蒙古人为了躲避战乱,南下迁徙,其中一部分做了海盗,另一部分依海而居的就是今天疍家人的先民。根据沙田疍家人文化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从元朝末年到清朝,疍家人一直受当地人的欺凌,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部落,靠海而居的原住民甚至不允许他们上岸居住,不允许他们读书习字,参加科考,更不能与岸上的原著居民通婚。后来,为了更好地在海上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一部分疍家人开始慢慢地向岸上发展,最后演变成成为独具特色的“两栖疍民”^[1]。

据人类学家考察分析证实,疍民不属于一个独立民族,而是我国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属于汉族。疍民祖籍多为阳江、番禺、顺德、南海等县

收稿日期:2019-07-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南建设自贸区(港)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导游培训策略研究”(HNSK(ZC)18-24);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南渔民《更路簿》抢救性调查、征集与综合性研究”(17zda189)

作者简介:黄丽华(1967—),女,湖北武汉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南海旅游开发、南海可持续发展。

的水上人家。现在主要分布在广东的阳江、番禺、顺德、南海,广西的北海、防城港,海南三亚、陵水等沿海地区。而海南岛的疍民据传则是由广东和福建等地迁徙而来,后经过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疍家人文化。海南省陵水县是疍家文化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陵水新港村散落着 600 多个疍家渔排,居高俯瞰,船与船之间的网状木板犹如海上阡陌,远望仿佛威尼斯,被冠以“海上街市”之称,是陵水为人称道的“八景之一”。

二、海南疍家人的主要民俗文化

截至目前,海南省陵水、三亚的疍民人数只有 1.2 万个。海南疍家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咸水歌与疍家婚礼、疍家棚、疍家服饰等,下面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说明疍家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

(一) 疍家婚礼与咸水歌^[2]

海南疍家人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风俗,其中以疍家婚礼和咸水歌为代表。由于海南疍家人过去是以海上生活为主,平时的沟通交流受到环境的影响需要大声呼喊吆喝才能达到说话的目的,慢慢形成了咸水歌。海南疍家人的咸水歌唱法简单而形式多样,不仅可以单人哼唱,还可以双人对唱和多人合唱,是海南疍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哼唱的小曲,咏唱男女恋情,感叹生活艰辛,没有固定的歌谱,基本上就一个调。咸水歌没有固定的曲谱和曲调,也没有人专门去学习和教授,疍家人用古老的流传方式将这个特色文化传承了下来。咸水歌是疍家人最具特色的文化习俗之一,而将咸水歌运用最具神韵的就是疍家婚礼了。

在婚礼前期,亲朋好友会将制作疍家衣的布料赠送两位新人,以表示祝贺。新娘子就会从这些赠送的布料中选取红色的来亲手制作新服。据了解,按照当地风俗,每一个疍家出嫁女,娘家人会赠送六尺的布料作为嫁妆。疍家婚礼一般是晚上举行,所有的亲朋好友会驾驶着自家的渔船齐聚到男方家赴宴。几十只船,船头相对,停泊在一起。新娘会边唱咸水歌,边敬茶,新郎则会拿着茶盘收取红包。

尽管受到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但至今,疍家婚俗中仍然保留着新娘出嫁时所唱的“叹家姐”和“喃伴郎”两大咸水歌系列^[3]。在接亲时,船工会故意将船摇来晃去,来证明新郎有着良好的海上行船能力。

(二) 疍家棚

疍家人是一个在海上生活的群体,过去疍家人以船为家。大部分疍家船是上面有顶的篷船,篷的

大小与船的大小相近,船篷是由竹篾织构成,弯成拱形,做成瓦状,漆以桐油,起到遮风避雨的效果。船尾用橹,拖着橹为舵。一般一个疍家棚有两只船桨,外出打鱼时,将船桨架在船体上支撑,称为“掉桨”。到了夜间休息时,疍民便将船篷放下到船舱,就成了休息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南疍家人的地位慢慢提高,被当地原住民允许在近海地方活动,疍家人就在水边搭建棚寮居住,被称为“疍家棚寮”。棚寮一般是使用原木、竹子、茅草等制作而成。这种茅屋冬暖夏凉,居住舒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疍家上岸居住,疍家人耕种沙田,或组建渔业合作社,疍家人分得土地,他们依海边河涌的高处而居,改住砖瓦房,现在多建小楼房。

(三) 疍家服饰

海南疍民的服饰与汉服差别不大,最具特色的就是妇女的竹笠和短裤了。他们一年四季皆喜顶戴上高下宽的筒式竹编斗笠——疍家帽,这种用竹篾竹叶做成的斗笠,直径约 40 厘米,帽檐会微微下垂 5 厘米左右,帽子顶部是一个正六边形,这样的设计可以防雨水,起到遮风避雨的效果。出于美观的需要,疍家的姑娘们还会在疍家帽上面点缀各种佩件,材质各异。此外,疍家帽还会配置一个四耳笠带。该做法不仅使斗笠不易被吹落,而且还能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疍民妇女还有专门的短裤,长度只到膝盖上,蓝色或灰色的色调显得质朴而纯美。裤子的后面则是往外翘,以免下田或者下海捕鱼把裤子弄湿。妇女一般还在裤子上系着银腰带,腰带上雕刻着美丽的图案,银腰带的作用主要不是美观,而是疍民出海的时候,海上潮湿的空气容易使腰部沾上水气,引起风湿。银腰带避免风湿,美观而实用。

(四) 疍家信仰

由于疍家人靠海而生,而海上天气变幻莫测,出海打鱼吉凶难料。因此,疍家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疍家文化,他们认为“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信仰神仙鬼神的传统保留至今。疍家人主要信仰与“水”相关的道教神仙,例如:妈祖是海上救难之神、北帝是调水之神,龙王是水族之神等。疍家人希望这些神仙保佑自己出海打鱼顺利平安,鱼鲜满获。疍家人在进行祭祀活动时,主要集中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疍家人会让族中的巫祝一边唱咸水歌,一边撒三杯烧酒。烧酒的寓意是:一杯保佑子孙生满地,二杯保佑出海顺利,三杯保佑白头偕老。疍家人对妈祖有着独特的信仰,他们在陆地上建妈祖庙,船上放妈祖神龛和神像,妈祖的神恩在疍家文化中已

深入人心。长期以来,疍家人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疍家人在海上遇到危难时,只要焚香叩拜,就会看到有红灯或者红鸟出现,甚至还有部分疍民看到民女装扮的妈祖降临来解救他们。可能是由于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疍家人的忌讳也十分多。例如:疍家人认为水中存在水鬼,每当有人溺水时,大部分疍民不敢营救;疍家人认为妇女的身体是污秽的,不允许妇女到船头去,唯恐触怒神灵,招致灾祸;疍家人害怕船毁人亡,吃鱼时不允许将鱼翻过来吃另一面,他们认为“翻鱼”会导致“翻船”。疍家人将诸多的禁忌统称为“棹忌”,是行舟的同义词。后来这一特殊的俗语,逐渐融入疍家人的方言中,泛指生活中的“不好”“麻烦”“糟糕”等。

三、海南疍家文化的没落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疍家人也紧跟时代潮流,上岸居住、生活,现代疍家人已经不再过祖先传统的生活。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和国家对海洋渔业的保护,单纯的捕鱼为生已经不能满足疍家人生活的需要,所以上岸居住成了疍家人的必然选择。疍家人主动融入时代的大环境中,他们不再时刻哼唱咸水歌,不再以舟为家。同时,西方的文化习俗和本土汉族文化也不断地冲击着疍家文化,加上疍家文化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只是用古老的方式进行传承,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也没有人对咸水歌等疍家文化进行研究、记录,导致了疍家文化的不断没落。为了使疍家文化不在未来中国民俗文化中消失不见,应该加强对其保护与传承,使其焕发生机,用以丰富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

四、疍家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

(一) 从新视角研究疍民

随着保护民族本土文化政策的提出,没落的疍家文化也引起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注意,尤其是近几年,成为研究的热潮。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都比较广泛,包括疍家人的起源、历史、经济、分布等,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突破与创新,只是将疍家文化进行了总结与归纳。所以,为了使疍家文化更好地流传下去,运用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方式来保护和传承疍家文化是十分必要,也是刻不容缓的。很多知名历史学家和研究疍家文化的学者,也曾倡议过将疍家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系统和理论的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没有文献记载的独特的民族,成为一门单独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提升疍家文化价值

尽管疍家人没有成为我国 56 个民族之一,但不

能否认也是我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内涵。疍家文化重要的标志之一的咸水歌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疍家文化,彰显疍家文化的魅力,应该提升疍家文化其本身的价值,让疍家文化真正成为人人耳熟能详的、深入人心的文化。疍民作为一个有着特殊文化和民俗的族群,它的发展必须从疍家人自身开始。

当地政府应该积极支持疍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重视疍民的教育,加大宣传力度,为疍家文化走出去提供政策保障。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将疍家文化作为文化产业进行外销,将文化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从根本上解决疍家人经济问题。最后,政府应该积极保护疍家人的文化栖息地,保护疍家人的利益,保障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环境。

(三) 开发中传承疍家文化

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尽管疍家人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但是疍家文化还是可以作为单独的文化产业来进行宣传和发展旅游。近几年,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个大潮流下,疍家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旅游产业来寻求适合自身文化发展的途径。在开发中保护和传承疍家文化,不仅可以解决疍家人的经济问题,还可以将疍家文化推广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疍家文化,这样疍家文化才能实现复兴,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至没落。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一些疍家文化体验区,先对疍家文化进行初步的推广和宣传。同时,成立疍家文化博物馆,使更多人走近疍家文化。最后,鼓励中外学者积极为疍家文化的复兴献言献策,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让疍家文化“活起来”。

(四) 结合“一带一路”把疍家特色文化推广出去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近几年提出的重点倡议之一,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而三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之一,有着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优势。海南疍家特色文化本身的独特魅力,借助“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可以使疍家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走向国际。历史悠久的疍家文化,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更是我国优秀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咸水歌作为疍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从咸水歌中我们可以感

受到疍民先祖广阔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可以说不会咸水歌的疍民就不是真正的疍民,但是现在年轻疍民会咸水歌的寥寥无几。疍民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疍家文化有可能就会被历史的大潮流淹没。所以,只有将疍家文化进行良好的内部传承,才能走出去,变成大家所了解、熟知的文化。其次,疍家文化也应该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的发展是不能闭门造车,保守守旧的。在保留优秀疍家文化的同时,也应该为疍家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文化才能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借助“一带一路”这个发展契机,疍家文化有了“走出去”的条件,只有积极推广疍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疍家文化,才能使疍家文化更好地保留和传承下来。

(五) 疍家饮食文化的旅游开发

尽管在疍家文化中,美食不是其最为突出的部分。但是作为“海上吉卜赛人”,疍民也有着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别具一格的美食,例如:钵仔禾虫煲、蒜蓉薄荷蒸桂虾碌、大奶鱼焖酸菜等。疍家文化将特色的海洋美食文化与其传统的疍家棚结合来进行开发。比如将海南疍家饮食文化与传统景点开发相结合,游客在游览景点之余可以在疍家海上渔排品尝海鲜,感受渔排风情。

海南疍家饮食文化与海洋休闲活动的结合也是发展的路径之一。目前海南海洋休闲活动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以海上观光、垂钓活动为主。可以开拓一些参与性、趣味性、文化性较强的活动,把疍家风

情、疍家饮食文化引入其中,形成一条龙产业化服务,例如游客可以参与捞鱼、出海,还可以欣赏疍家人展示的赶海、哭嫁、唱咸水歌等民俗内容,最后学做疍家菜,品尝疍家菜。让海洋休闲活动与海南疍家饮食文化和风俗有机结合。

五、结语

疍家人,一群神秘的生活在水上的民族,被认为是除黎族和苗族等海南少数民族外最早来到海南岛生活的汉族居民。日月如梭,弹指之间,代表着原始海洋渔民文化的疍家文化慢慢地面临着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命运。尽管现在我们在不停地积极推广和宣传疍家文化,但是疍家文化的复兴之路仍旧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种原始传统的渔港文化已经很难跟上现今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谁也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对于疍家人来说,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努力收集和保护好疍家人传统的风物风俗,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祖文化。

参考文献:

- [1] 陈光良. 岭南疍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探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2): 18-22.
- [2] 卫敬星. 广西北海咸水歌的风格特征与疍家文化变迁[J]. 法制与社会, 2011(22): 11-14.
- [3] 蒋炳钊. 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J]. 广西民族研究, 1998(4): 44-4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olk Culture of Danjia People in Hainan and Its Tourist Development

HUANG Lihua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572022, China)

Abstract: Danjia people, called "Maritime Gypsy", have their special life style and living condition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special folk cultures in our country. By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Danjia people in Hainan,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njia culture, and studying on ways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Danjia culture, the researchers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nd unique modern life of Danjia people.

Key words: Hainan; Danjia family; folk culture

“诗意栖居”塑造中小城市文化品位

——以宣城为例

王建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00)

摘要:“诗意栖居”是人们追求城市共同体生活的理想状态。诗意具有超越语言表达力的境界、情感和意蕴,能够以诗境规划塑造宣城城市形象,以诗情培育提高宣城市民素养,以诗蕴传承打造宣城文化个性。建议重交通、饰市容、美生态,塑造宣城诗意形象;拓两馆、振诗教、缮古迹,培育市民诗性素养;凝特色、展古貌、酿品牌,推动城市个性发展。

关键词:诗意栖居;命运共同体;城市品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2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59-04

海德格尔曾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一诗,试图通过人生艺术化和诗意化来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以及生活的刻板与碎片化。在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实施绿色生态发展的新时代,“诗意栖居”已成为人们追求城市共同体理想生活状态的重要理念。城市品位是一个城市所展示的审美情调,涉及一个城市是否“缺乏个性、缺乏绿色、缺乏精细、缺乏历史的厚重感”^[1]。以“诗意栖居”理念塑造城市文化品位既是时代发展的理想要求,也是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

“诗意栖居”是城市永恒的价值追求!^[2]宣城地处江南,山水湖林,亭台楼阁,古韵诗风,理道浸润,透露出浓浓的“诗性”气质,在扩城拓市的当今中国,就像一首小诗镶嵌于江南丘陵,与“诗意栖居”理念相契合。诗意是诗人用文字构建的集意象与具象、韵律与节奏于一体而又升华为现实的意境,具有超越语言表达的境界、情感和意蕴,进行诗境规划,诗情培育和诗蕴传承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基本路径。

一、诗境规划塑造宣城城市形象

诗境即诗的意境。诗的魅力来自人的精思与灵

慧的闪光,意境来自诗歌所体现的悠久、普遍、深沉而又生动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诗境就在千古流芳的诗学中繁育并衍生至绘画、园林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3]诗境规划就是遵循诗歌的审美规范进行城市的布局和建设规划,营造城市的诗意环境和审美境界,兼具功能性、审美性和舒适性的融合,塑造富具诗意的城市形象。

(一)结合区位特征进行城市准确定位,体现功能性

城市规划的准确定位是建设高品位城市的前提。一些城市规划的定位由于历史原因缺乏系统设计,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日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在充分掌握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切合实际的设计和科学恰当的定位,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确定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宣城制订城市建设的“双百”方针,即城区建成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达到10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努力成为苏皖浙交汇区域中心城市,这一定位和设计符合宣城城市发展的区域身份,指明了城市和谐发展的合理目标。

收稿日期:2019-05-17

基金项目:2018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18CX010);2016年度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博士产学研启动专项(第20号)

作者简介:王建(1972—),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和谐哲学。

(二)结合自然资源进行城市合理规划,体现审美性

诗境是心境的再现,源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应该是自由、休闲、和谐和优雅的。黑格尔曾论述建筑与音乐的关系:两者都“靠各种比例关系的和谐”,建筑是“冻结的音乐”^[4]。诗境规划就是将城市建设成一首“流动的旋律”,赋予城市“艺术”品位。“诗意栖居”就是要塑造城市和谐、流畅与温馨的诗境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城市文化之魂与城市山水有机融合起来,将自身的山水地形条件整合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之中。宣城努力打造“十里诗山笔入城、半月宛水六弦形”的城市形象,以“一山(敬亭山)、一湖(宛陵湖)、一江(水阳江)、六河(宛溪河、道叉河、解放河、泥河、梅溪河、清溪河)”构建山水园林城市,塑造“山、水、城”一体的特色景观风貌。

(三)结合发展进行城市设施和产业布局,体现舒适性

诗意是诗人用艺术方式表达感受,描述现实与想象,给人以诗一样的美感。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向追求“美好生活”,这就要求城市建设不仅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满足人们审美体验的需求。宣城市注重人们的生活体验,强化区域衔接和交通网络贯通,即将开通的连接沪杭宁肥的高铁线路将支撑起宣城追逐“诗和远方”的脚步;注重城市美化建设细节,在城市生态景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建筑、雕塑、广场等艺术规划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宣城的诗性气质;制订“生态立市、创新活市、工业强市、文化名市”的战略,努力将“诗意栖居”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布局之中。

二、诗情培育塑造宣城市民素养

“诗”是语言的精华,“情”来自人的内心世界,诗情通过诗歌方式表达人们的内心世界。诗情培育是提升市民的“情、趣、雅”文化素养的必要方式,而宣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诗情培育提供了基础。

(一)创建诗词之乡,为诗情培育营造氛围

振兴诗教,繁荣诗词创作对“山水诗乡”的宣城城市品位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宣城诗词资源十分丰富,素有“相看两不厌”的“江南诗山”——敬亭山耸立城边,谢朓、李白、韩愈、白居易、杜枚、沈括、杨万里、文天祥、汤显祖、石涛等诗界泰斗、文人墨客都曾游历、寓居或守政过。李白先后七次来到宣城,留下诗词80余首。宣城本地也有庞大的诗人群体,使宣城诗风世代绵延。宣城市提出申创“中华诗词之乡”的目标,2017年成立诗词学会,制订学会章程,发掘诗

词人才,为“诗教”宣传搭建平台,营造了浓郁的诗情环境。

(二)开展诗教活动,提升市民诗性素养

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品位是众多市民文化素养的聚合,市民文化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城市品位的高低。每一个人所言所行都展现着自己的文化品位。^[5]在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精神走在了物质之后,亟需一种易于被民众接受的方式培育一种精神、情怀和担当,克服现代城市文化存在的诸多弊端。首先,宣城积极兴办诗词大会,开展诗教培训,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诗教活动,2016年承办省诗教先进市、县工作会议,交流创建“中华诗词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路径和方法。其次,学习型社会建设使阅读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图书馆已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宣城加强城市文化公共设施建设,全市已拥有了3家一级图书馆,4家二级图书馆。最后,积极倡导全民品质阅读,举办“书香宣城”全民阅读以及互联网读书有奖征文比赛等市民喜闻乐见的活动,^[6]在活动中培育市民诗性素养。

(三)弘扬城市精神,激发民众奋斗情怀

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时代风貌,陶冶公民的精神情操,强化公民素质教育,在浮躁喧哗的时代中找到心灵的皈依成为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汇聚,充满着爱国爱乡的情感,如红线贯穿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过程,和区域文化一起,浸润在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推动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宣城凝练出“创新、拼搏、合作、奉献”的宣城精神,这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积淀的城市人民热情淳朴、勤劳智慧、重信守诺、开拓进取等优秀品格的当代淬炼。通过城市精神的弘扬,凝聚着区域力量,引领城市民众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开放合作,无私奉献。

三、诗蕴传承塑造宣城文化个性

诗蕴就是指诗歌中蕴涵的诗意品位,是诗歌的个性特征的表现,反映诗人的独特的个性。以诗蕴传承文化个性其实就是将曾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诗人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思维理念传承下去,保持城市的独特风格。诗蕴传承能够通过城市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展现个性,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展示与众不同的气质。宣城在传承诗蕴,塑造个性方面,主要体现为对宣城诗文的解读与整理,对城市历史人物和古迹的展示,对宣城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和创新等方面。

(一)整理古代诗词,丰富诗蕴传承资源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闪耀着先贤们思想的光辉和智慧的精华,给现代城市精神的孕育提供了

肥沃的思想土壤。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展现,城市个性的塑造根植于城市传统文化之中。历史文化遗产几千年的宣城拥有丰富的诗词美韵,为宣城城市个性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宣城以谢眺、梅氏等历史人物、景观、诗文作为诗蕴传承的历史载体,《宣城古代诗词全集》收录上至东晋下至清末民初 26000 多首描述宣城的诗歌,诗人 2200 多名。

(二) 展现地方博物,普及历史文化

博物馆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奋斗与发展、自豪与屈辱、成功与失败,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桥梁。宣城 1988 年建成博物馆,基本陈列 17 世纪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梅文鼎生平业绩,包括《梅氏丛书》和《绩学堂诗文抄》等,以及《梅文鼎年谱》《梅氏宗谱》和国内外研究论文。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天文数学,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是宣城文化的重要代表。同时陈列的还有宣城出土文物 2000 多件,展示城市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博物馆结合时代需要,经常开展一些主题性临时展览,传承诗蕴。

(三) 塑造文化品牌,创新城市发展名片

诗蕴是历史与现实整合的结晶,宣城文房四宝精雕细琢,千锤百炼,刚柔相济,百折无损,自古以来就是“山水诗乡”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成为诗蕴传承的显性载体,其中以宣纸产业最为典型。宣城以宣纸为城市名片,努力拓展宣纸产业,走“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大户+农户”等方式,年产宣纸 600 吨左右,占宣纸行业产量 80% 左右,被授予全国影响力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宣纸生产一方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使民族文化品牌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将宣纸文化园和宣纸博物馆相融合,形成占地 2.36 平方公里的景区,突出非遗特色,努力打造富具江南意韵的文化小镇。

四、宣城文化品位的塑造路径探索

“诗意栖居”理念正在塑造宣城城市文化品位,但由于基础设施、市民素养、文化建设等诸方面原因,这一进程面临着诸多问题,以“诗意栖居”理念引导宣城文化品位的塑造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重畅通、饰市容、美生态,塑造宣城诗境形象

城市内部交通拥堵现象逐步显现;城市面貌缺乏美感,标识设计尚需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尚未完成,亟待发展壮大。这些是崛起中的中小型城市存在的普遍问题。

1. 前瞻性探索畅通之道。城市建设的诗性化体

现为诗一样通畅的流动、优美的生态和轻盈的律动。目前节假日期间时常拥堵的街道尚能维持,而随着向百万人口的城市迈进,市内交通“梗阻”现象将日益显现。宣城在交通城市病问题上应该进行一些积极探索,既符合国家中小城市建设的需要,也符合宣城目前发展的实际。

2. 诗性化建设城市容貌。市容建设是城市品位的外在表现,应赋予其诗性内涵。宣城虽无高楼大厦,但可在一门一店的设计上精心修饰,渗透“人”的理念,伴随着“诗”的韵律而凸显精致;也可在街道旁、楼宇间呈现诗迹,透露出浓浓诗意。海滨重镇的海滨重镇的海、江南水乡的苏州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

3. 生态化布局新兴产业。物质发展是“诗意栖居”的基础。当前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曙光初现,传统行业以其高能耗、高污染而面临被淘汰的边缘,“工业强市”的内容必须在“生态立市”的前提之下做出选择,这涉及宣城“诗意栖居”的未来发展走向和前景。

(二) 拓两馆、振诗教、缮古迹,培育市民诗性素养

诗歌教育与功利主义的博弈正在进行中,人们仍多满足于“眼前的苟且”而忘却“诗和远方”,或把“诗和远方”纳入了功利的范畴之内;书店、影院、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在路上,诗词文化的展示与“中国诗词之乡”的美誉尚未匹配。

1. 强化“两馆”建设。相较于其他一些新兴城市,宣城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书香浓郁,更应该扩大“两馆”建设,展示宣城笃修好学的古朴民风 and 古今文明历史遗迹与艺术造诣,培育人民的爱国爱乡情怀。

2. 振兴诗教文化。打造诗词碑林景区能够繁荣诗歌创作,营造诗乡意蕴,熏陶市民情操,提升诗意情怀。如敬亭碑林凸显江南诗山风采;宣纸诗词碑林彰显古宣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宛陵湖诗廊展示多彩宣城的独特风貌,同时,也让宣城的古迹风貌借诗风词韵而弥散开去。

3. 深化古迹整理。2000 多年的历史留下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值得深入地挖掘和整理。除梅氏家族、谢眺轶事等外,还可以不断拓展新内容,如一代清官,留下九龙夺水的张路斯曾为任宣城,留下众多佳话,进一步探讨和挖掘,结合当前的清风正气廉政建设,赋予其当代价值,展示其现实意义。

(三) 凝特色、展古貌、酿品牌,推动城市个性发展

新兴中小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千城一面”,城市没有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导致身在

城中而辨不清城为“何”城。宣城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文化都有自身的独特,突出特色,个性发展是宣城发展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凝炼特色“宣文化”。宣文化与徽文化相交但不完全重合,宣城处于徽文化、巢文化区的衔接地带,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宣文化应该体现“创新、拼搏、合作、奉献”的城市精神,以宣纸为代表的文房文化,以敬亭山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胡、梅等几大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文化,以谢眺等为代表的诗词文化是宣文化的主体,应利用高校与地方文化平台资源,共建“孔子学堂”或“诗词学堂”,凝炼宣文化自身特色,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

2. 展示特色古貌。宣城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和生活图景,可以根据历史沿革锻造不同时期的文化悠闲街区。如修建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街区,把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面貌多层次展示出来,尤其将不同时代的诗词歌赋曲剧、宣纸制作文化等内容融汇其中,既可以普及地方文化,服务民众享受古韵流芳的街道文化,又可以营造氛围,塑造城市个性,提升城市品位。

3. 打造特色品牌。特色品牌是城市外宣的重要标识。宣城除敬亭山、宣纸园之外,宣酒集团的日益崛起也为宣城增添了新名片。宣酒集团在小窖古法酿造技艺进行改进的基础上,酿制酒韵悠远、幽雅飘逸、绵柔醇厚的系列白酒,努力铸造江南名酒品牌,区域影响力逐步提升。宣酒定位中度酒,与世界白酒消费的主流相合。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推进,中国白酒终将大

规模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搏击,宣酒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通过品牌塑造,既能展示城市个性,又能发挥其宣介效应,提高城市知名度。

宣城历史深远,文化厚重,是一座诗韵悠长的城市,也是一座日益现代化的新兴城市。“诗意栖居”理念总揽宣城城市品位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契合宣城自身实际。塑诗境,育诗情,传诗蕴,“诗意”宣城将为人们提供一个“诗意栖居”之地。

参考文献:

- [1] 谢禄生. 城市品位的内涵及塑造[J]. 河北城市研究, 2011(8).
- [2] 叶晓楠. 诗意栖居: 城市永恒的价值追求[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06-29.
- [3] 刘晓晖, 李先逵.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诗境规划思想及其方法实践[J]. 城市发展研究, 2006(4).
- [4] 黑格尔. 美学: 第三卷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5] 吉卫华, 磨勇莲. 细处入手彰显历史文化特色[N]. 西安日报, 2014-11-22.
- [6] 刘畅. 宣城文化事业发展综述: 以“文”塑城, 以“文”名市[N]. 宣城日报, 2018-08-20.
- [7] 李金路. 思辨体悟诗意栖居[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8] 孙福婷, 杨晓霭. 语言规范与城市品位: 雅言[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 [9] 倪鹤琴. 文化致远: 深圳建设高品位文化城市研究[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许峻)

“Poetic Dwelling” Shapes Cultural Taste of Small – medium Cities

—A Case Study of Xuancheng

WANG Jian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Abstract: “Poetic habit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people to pursue the ideal life state of the city. Poetry has the realm, emotion and meaning beyond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language. Poetry shapes the image, cultivates the morality, and creates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Xuancheng.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available for promoting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Xuancheng.

Key words: Poetic Dwelling; urban construction; city taste

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的溺婴现象

李俊丰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晚清至民国时期,溺婴现象在广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代地方官员常将溺婴视作一种恶俗,故其应对措施侧重于劝诫、慈善而不是法律严禁。到民国时期,在“男女平等”“强国保种”等思想和话语影响下,观照溺婴的视角从地方层面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广东本地的禁溺实践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溺婴的一系列行动中的组成部分,政府应对溺婴的措施也变得更强调“严禁”。另一方面,来华西人在观照广东溺婴现象时,多将溺婴视为中国人道德低下、文化落后的表现,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必要性、正当性也由此而被建构出来。

关键词:溺婴;广东;晚清;民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3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63-06

一、问题提出

所谓溺婴,顾名思义,即指将初生婴儿淹死,泛指父母或其他负有抚养义务的近亲施行的危害婴儿生命的一切行为。^[1]

在传统中国,溺婴的行为和风俗,很可能比今人所想象的要普遍得多。^①明清时期,福建、江西、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区,便常被认为是溺女风气蔚然之地。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亦是一个被认为溺婴之风较为盛行的地区,同治年间,御史林式恭便曾奏“近来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2],甚至把广东放在了这个不光彩的名单之首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在史料中读到不同的意见,例如,曾任港督的德庇时根据他在广州等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杀害女婴的事情确实存在,但这只是偶然现象,而且,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大城市”^[3]。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林式恭奏报皇上的时间其实相差得并不远。

那么,当时广东溺婴的情况究竟如何?溺婴问

题关涉到一地的风俗、文化、宗教、法律、经济、人口等诸多层面,实可作为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惜就笔者所见,目前学者们对传统中国溺婴现象的研究,虽有不少选择从地方的视角出发来进行,^②但专门聚焦于广东的却未曾见,旁涉到广东情况的亦不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史料的充足与否。如福建、江西等地留存下来的相关记载相对较多,故更易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不过,广东的相关史料亦未缺乏到不足以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的程度。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尽力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广东的溺婴现象作一概要的描述和分析。基于史料及焦点集中等考虑,本文的考察将主要集中于晚清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期。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溺婴现象概况

从现有史料观之,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关于广东溺婴现象的记载都不时可见。笔者试分别以地方志、政府公报这两类史料为中心,以见晚

收稿日期:2019-05-19

基金项目:2017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文社科类)“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视域下的溺婴现象研究”(2017WQNCX117);2018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近代中英文报刊中的广州儿童史料整理与研究”(2018GZQN48)

作者简介:李俊丰(1983—),男,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法学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中国近代史。

清、民国广东溺婴现象的概貌。此外,根据其他史料,海丰、^[4]新会、^[5]惠州^[6]等地区也存在溺婴现象。综合上述史料可见:其一,溺婴现象在当时广东多个地区均有分布,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从粤西到粤东均留下了溺婴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式恭奏

说“广东有溺女之风”似并非虚言。其二,从时间维度看,各地溺女风气的严重程度虽然可能因官员治理等原因而发生变化,但是在一些地区,溺婴现象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一直存在着。

表1 广东各地溺婴概况(1800—1949)

地区	晚清时期(以地方志为中心)		民国时期(以政府公报为中心)	
	主要内容	出处	主要内容	出处
广州	溺女之风,前数十年前频有所闻	《花县志》	奉国府令严禁溺女案	1927年《广州市市政公报》
			严禁卖淫蓄婢诱拐溺女案	1928年《广州市市政公报》
阳江	因之以女为累,至有溺之而不举者	《阳江县志》	布告严禁溺女恶风以维人道	1934年《阳春县政公报》
嘉应	向来不断恶习,溺女之风为甚	《嘉应州志》	\	\
饶平	饶俗,生女多不举	《肇庆府志》	\	\
英德	任英德时,俗生女不育……(后)溺女之风顿革	《香山县志》	\	\
韶州	粤东溺女之风所在皆然,而韶属尤甚	《韶州府志》	\	\
东莞	恶习相沿,每因生女过多……相率溺毙,视为泛常	《东莞县志》		
茂名	\	\	茂名县政府训令飭遵办查禁溺女案	1934年《茂名县政季刊》
	\	\	茂名县政府训令严禁溺毙女婴恶习及收养办法	1935年《茂名县政季刊》
汕头	\	\	训令公安局奉飭严禁溺女打胎仰转飭遵照由	1930年《汕头市市政公报》
	\	\	布告查禁暗自溺杀女婴由	1934年《汕头市市政公报》

从总体上看,当时的中国官员和来华西人都倾向于认为溺婴现象在广东确实存在,且情况亦比较严重。

在清代,广东不少地方被认为溺女之风“为甚”^[7]，“频有所闻”。^[8]聂亦峰主政新会时,便因当地“溺婴之俗,到处皆然”,和邑绅商讨,建起了育婴堂。^[5]民国时期,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鉴于本地溺婴现象严重,于1929—1930年和1934—1935年间两度发布命令,要求各地严禁溺婴。到1948年,粤穗各界妇女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仍“函请省府通令各县禁止杀婴”,并得省府采纳,^[9]这反映出在当时妇女界和政府看来,广东的溺婴现象仍在持续,且严重到应予以高度关注之程度。

来华西人对广东溺婴现象的持续关注,主要集中于19世纪。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约翰·巴罗在1806年出版的《巴罗中国行纪》中描述了一个发生在广州的例子,以论证杀婴在中国的存在:“我见过一个死婴,没有缚上葫芦,漂浮在广州河的舟楫间……”^[10]再如,1832年,《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讲,住在黄埔的王阿旗(音)的妻子生了三胞胎,但基于中国的“三胞胎是魔鬼的预兆”的迷信,估计至少其中一个孩子会被杀掉;^[11]1872年的一篇文章则转述了法国人Count de Beauvoir在广州的观察,Beauvoir说有一晚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7个弃婴,这让他相信关于溺婴的报道和数据是真的。^[12]有的西人则试图通过调查统计的方法来尽量准确地了解溺婴的真实情况,一如女传教士阿黛尔·菲尔德在汕头所做的那样。^[13]不过,更多的西人乃通过

广东地方官员的禁溺措施来得出结论,认为本地的溺婴现象盛行。^[3]晚至1905年,《北华捷报》上仍有关于广东官员如何应对在本省流行的溺婴问题之报道。^[14]

当然,也有少数文章表达出不同的观点。除了上文提及的德庇时外,1873年的一篇文章也试图指出,不应笼统地断言说广东的溺婴现象很常见,因为溺婴在本地人中很少见,^[4]但在客家人、闽南人中就很流行。^[15]然则,类似的观点远非主流。事实上,作者的观点很快便招来反驳:在下一期杂志中,便有一篇作者署名为J. N.的文章说道:“过去六七年我在本地人地区居住、旅行,我确信溺女在那里确实地且大规模地存在着。”^[16]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料中关于溺婴的记载很多,中西观察者也多倾向于认为广东的溺婴现象比较严重,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留存下来的具体案例却只有一件。1909年,《舆论时事报》载:

广东横陇乡郑氏妇,年三十许,连生七女,俱被溺毙。近又怀孕,到处求神问卜,俱言此次定是生男,不胜欢喜。诩前晚临盆,小孩甫出产门,收生婆接收在手,氏忙问:“男耶?女耶?”,收生婆回言:“女也。”氏大怒,即刻起身,将孩夺取验明,确系是女。气极,举手掷孩于地下,头破血流,登时殒命。其夫闻知,即赶回至家,救亦无及矣。^[17]

此文虽载明了事情的地点、人物姓氏等具体细节,但从整个叙事观之,“故事”色彩仍颇为浓厚。

这种“故事”性，部分解释了为何会存在时人认为溺婴问题严重和溺婴实例很少的矛盾，以及为何各种禁溺措施往往效果不佳：溺婴行为具有强烈的隐匿性，在家中即可实施，外人无从见晓，故溺婴实践的确通常难以被抓住，一般只能以“流言”的方式在人们之间相传。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广东的溺婴现象并没有时人笔下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当时的记录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例如，地方官员欲夸大自己的政绩，西人欲强调中国文化落后，有意无意地把溺婴的严重程度夸大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那些试图指出广东的溺婴现象并没其他人所说那般严重的少数观点，才更贴近现实的真正情形。

三、时人对广东溺婴现象的评判和应对

无论如何，在时人看来，广东的溺婴现象乃是一个确实存在且值得重视的问题。由此，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针对广东的溺婴现象发表自身的观点，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上文曾提及，在清代，溺婴常被视为一种地方恶俗。在地方官员眼中，改变这些不良风俗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便和这种视角密切相关。光绪年间东莞知县裘伯玉的《严禁溺女示》，便颇能说明问题：

为严禁溺女、以挽颓风事。照得天地以好生为德，父母以爱子为心，故诗垂鞠育之文，书重提携之训，良以亲之于子，属毛离里，痛痒相关，理宜保卫不遑，岂忍反加杀害？乃自人心不古，恶习相沿，每因生女过多，抚养惮劳惜费，遂不顾忍心害理，相率溺毙，视为泛常。淋漓血际，忍教毒手潜施；宛转盘曲，孰听呱声而泣。母胎甫出，鬼籀旋登。嗟！赤子其何辜，遭斯惨酷，岂慈亲而若此无乃伤残。言念及兹，殊堪痛恨。且溯观古，昔如缙縈上书救父，曹娥投江觅骸，列女传中固历有可征；即近阅邸钞，孝女割股疗亲，亦更仆难数，或名留竹帛，或身沐旌扬，皆于父母有光，生女何尝无益？况叠奉督宪文檄严惩溺女之风，设一文会、六文会规□劝办育婴。良法允宜奉行，实力痛改溺女前非。本县现同在城局绅妥筹经费，设堂收养，并查石龙原有育婴堂，绅商捐办，又太平墟亦奉提宪设立收养所。凡此保全生命无虞，养育艰难，用特诤诫重申，以冀浇漓共挽，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谕阖邑绅民人等知悉：尔等嗣后育

女之家务，宜善为保全，不准仍前溺害。若虑嫁资难措，则荆钗裙布胡不可为妆奁；若虑乳哺无人，则转送亲朋胡不可以畜养。况育婴堂之设，所在皆有，即使抚养维艰，则竟抱往堂中，亦可全其生命。倘敢复萌故智，定照故杀子女律科以刑章，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各宜凛遵。切切特示。^[18]

告示开宗明义，目的在于“以挽颓风”。虽然溺婴会给地方上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增加婚姻和性犯罪之发生、致使当地人口结构日趋畸形，等等，^⑤但在裘伯玉眼中，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整篇告示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这些社会问题，没有试图通过向民众指出这些问题来警示他们切勿溺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告示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进行道德说教，显然，在裘伯玉看来，溺婴的本质问题在于有违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故充分对民众予以道德训诫，让民众认识到溺婴的不道德性，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裘伯玉的《严禁溺女示》写得似乎过于阳春白雪，普通老百姓未必全能看明白。另有一些劝诫溺婴的文章则更为通俗易懂。如《时事画报》上的一篇文章先指出“粤俗，家贫而儿女众多者，生女径行溺毙；或有家非甚贫，而以所生皆女，不获一男，望男益切，厌女益甚，则亦有溺毙其女者……此风何可长也”，后直接以粤语方言来告诫民众：“儿女一样，造乜系女就佢嫌多”，^⑥“如果人唔生女，又边处得你两公婆”，^⑦等等。^[19]

除了道德训诫外，地方官员也明白贫穷是民众溺婴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设建育婴堂等慈善事业，也是应对溺婴的重要途径。聂亦峰、裘伯玉都是如此为之。刘坤一访闻得知“粤东颇有溺女之风”后认为：

……溺女之风，而嘉应惠州为尤甚，因恐女多为累，往往堕地不留。同此人情，孰无天性，岂共甘于捐弃，竞相习于凶残？无非忧食指之难供，遂为此忍心之过举。即使绳以官法，接其初生，而饥寒疾疢之交侵，药饵衣襦之下备，虽复少延岁月，暂活微莖，究之不耐风霜，终成枯落。是欲计保全之法，必先谋鞠养之方。……^[6]

和裘伯玉不同，刘坤一认为，既然民众溺婴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经济考量，那么法律严禁没用，道德劝诫的话也不必多说，关键是设立育婴堂，用更实际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法律严禁的方法，虽也常被广东地方官员

作为禁溺措施之一,但相较训诫和慈善而言却并不受重视,上引裘伯玉和刘坤一的话语中便鲜明地反映出这一点。

到民国时期,虽然仍有少数文章沿用清时的观点,从“不良风俗”“旧习”的角度来理解溺婴现象,^[20]但在国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溺婴开始被置于“男女平等”和“强国保种”的话语下来予以阐释。时人针对广东溺婴现象而发的论调,亦是如此。例如,1934—1935年间广东政府的禁溺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的文章认为“近今潮流所趋,在此高唱男女平等声中,此一陋习,已逐渐革除”^[21];有的文章则强调,“从民族方面说,则溺婴之风既息,民族的繁殖,自然减少了一种阻力,当然也是为民族前途图谋发展的要务”^[22]。因此,禁溺的意义极大,“上所以体天地好生恶杀之德,下所以开国家丁两旺之机。”^[23]换言之,在民国时期,观照溺婴的视角从地方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层面,溺婴被赋予了更重要、更宏大的意义。

与此相关,和清代相比,民国时期官府应对溺婴的措施更强调“严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旋即“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而训令严禁溺女,且将溺婴定性为杀人,强调“倘有此等行为,即将溺女之人送交法院,按律处罪”;^[24]广东省也遵此而饬令各地方政府及公安局一体遵行。^⑧如前所述,陈济棠主政广东时,至少两度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 and 此前国民政府的命令,指示各县市严禁溺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陈氏向中央提议的禁溺办法中,^[23]还是在《严禁溺毙女婴恶习及收养婴孩办法》中,^[25]“送法院论罪”都被作为第一位的应对措施,列于设托婴所、孤儿院等之前。

19世纪来华西人在观照广东溺婴现象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刘坤一等地方官员的观点,即“贫穷是民众溺婴的重要原因”。例如,阿黛尔·菲尔德承认,那些溺婴女性所承受着的贫穷的压力是真实存在且确实沉重的;^[13]一篇作者署名为 K. N. G. 的文章也认为,“在溺婴的众多原因中,贫穷是最主要的”^[26]。但基于传教的目的和文化批判的出发点,来华西人还会将溺婴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的迷信,^⑨更重要的是,归结于中国人的道德。例如,施美夫认为,中国人对于杀婴“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熟视无睹,他们的道德感觉已经麻木不仁”;^[27] K. N. G. 在向读者介绍杀婴的方法时进行了颇为细致具体的描述,中国人的残忍便在字里行间被明确地表达了出来。^[26]还有一篇文章甚至这样说道:

关于溺婴现象在中国的普遍程度,我们相信不可能给出任何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溺婴一般不会被中国人看作奇怪、少见和可怕的事情。^[28]

这段表述显然存在逻辑矛盾,但对作者而言这似乎并不重要;只要中国人的恶劣本性能被“显露”出来,这便足够了。如果说中国地方官员对溺婴的道德批判在于其违反了儒家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话,那么西人对溺婴的道德批判便在于直指中国人的本性。

由此,虽然西人也和中国人一样,会以慈善之方式来应对溺婴,在广州、香港等地开办了育婴院,但他们始终认为,向中国人引入基督教的福音才是治本之道。有西人认为,溺婴现象加强了数百万中国人对福音降临并带来仁慈影响的渴求;^[29]当他们尝试回答“如何才能劝阻父母溺婴”这一问题时,答案最终也是落到福音上。^[28]换言之,只有基督教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本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溺婴的问题。在当时的来华西人看来,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开始发生转变而不再溺婴。^⑩如此一来,传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便被建构起来了。

当然,西人通过观照广东溺婴现象而对中国所得到的了解和评断,并不局限于文化、宗教的方面。例如,他们也会试图由此而去考察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一篇文章认为,虽然溺婴在中国是违法的,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执行者实际上根本不会关注这种犯罪;^[28]另一篇文章则认为,官员时不时发布禁溺告示,但从不真正采取行动落实。^[15]不过,也有论者并不赞成这种在当时的西人中占据主流的想法。古伯察曾引用了1848年广东的一份《禁杀婴令》,力图向那些“深信不疑地认为,整个中华民族生性野蛮,政府和舆论对虐杀婴儿的罪行置若罔闻”的人证明,其实“行政当局和公众舆论并不赞成此类罪行”^[30]。这些禁令也许不一定能发挥很好的禁溺作用,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某些意料之外的效果,直接影响了西人对广东甚至中国的认识 and 了解;广东作为当时中西之间的重要“接触区域”之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四、余论

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记载和反映了广东溺婴现象的史料相对较少。但是,通过搜集多元史料、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等方式,我们仍可在相当程度上描述出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溺婴现象的概貌。

在这一时期,溺婴现象在广东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清代的广东地方官员常将溺婴视为一种恶俗,认为其有损地方道德风气,故需予以禁诫;至于溺婴可能导致的负面社会影响,则并非他们所主要担忧的。由此,这些地方官员应对溺女的着重点在于“诫”而不在于“禁”,在他们眼中,道德劝说或以办育婴堂等方式来引导民众,远比法律禁止更重要、更有效。到民国时期,在国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溺婴开始被置于“男女平等”和“强国保种”的话语下来予以阐释,此时严禁溺婴的意义已不局限于地方,广东本地的禁溺也成了全国性禁溺运动的其中一环。与溺婴的这种从地方上升到民族、国家的意义变化相应,政府应对溺婴的措施也更强调“严禁”的方面。

整体而言,来华西人同样认为广东的溺婴现象颇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和中国地方官员一样,认为贫穷是民众溺婴的重要原因,但他们更多地将溺婴视为中国人道德低下、中国文化落后的表现,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必要性、正当性也由此而被建构出来。

由本文的分析可见,对广东溺婴现象的探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溺婴本身,也可让我们从一前人较少注意的角度,认识和理解广东的风俗、文化、宗教、法律、经济、人口等方面。此外,这一研究也能为今天的社会现实提供一些历史经验和借鉴。民国时期,在强国保种等话语下,人口繁殖被视为与国家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故需得到国家的重视和介入,此时期政府的禁溺,正是国家干预生育的其中一个方面。当时这种要求人口繁殖的观点和干预生育的做法是否正确,在此姑且不论;关键在于,政府的禁溺努力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不然,南京国民政府及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地方政府没必要在短短八年之间多次发布禁溺的命令,也不会有论者提出“仅仅禁止究竟不是根本的方法”“必须设法解除人民生活的困难”^[22]。如前所述,溺婴行为具有高度的隐匿性,非当事者难以确切获知,更不用说常常并未真正深入到基层的地方政府了。这反映出,生育乃一私密性非常高的“私人领域”,至少在某些层面上,国家权力难以用强制的方式来加以有效干涉。当前因面临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而希望提高生育率的中国,对此似有必要有所认识。

注释:

①溺婴的对象主要是女婴,故就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而言,“溺婴”“溺女”两词可视为是同义的。此外,虽然英文文献中的“infanticide”一词乃指广义上的“杀婴”,即并不

仅指“溺杀”,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一般也将“infanticide”一词翻译成“溺婴”。

②例如,见,甘满堂、杨雅达:《明清福建溺婴恶习形成的原因及影响》,《福建史志》,1997年第4期;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史林》,2001年第1期;杨剑利:《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刘昶:《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刘振华:《近代豫西南溺婴陋俗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例如,见,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温时幸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下)》,张子清,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

④这里的本地人应指“广府人”。

⑤参见,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风盛行探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刘振华:《近代豫西南溺婴陋俗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⑥意为:儿女一样,为什么是女儿就会嫌多。

⑦意为:如果人人都不生女儿,又何来你两夫妻。

⑧见,林云陔:《奉国府令严禁溺女案》,《广州市市政公报》,1927年第268期,第37页;林云陔:《严禁卖淫蓄婢诱拐溺女案》,《广州市市政公报》,1928年第298期,第52—53页。

⑨见,Remarkable Birt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Sept 1832, p. 208; Field, Adele M., Field, Adele M.; Infanticide in China,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vol. X, no. 10, 1879, pp. 224—225.

⑩见, J. N. Female Infanticide among the Punti Chinese;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II, no. 2, Sept—Oct, 1873, p. 131; FIELD, ADELE M.; Infanticide in China,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vol. X, no. 10, 1879, pp. 226.

参考文献:

- [1] 齐麟. 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J]. 西北人口, 2002(2): 22—24.
- [2] 光绪帝敕撰. 清穆宗毅皇帝圣训[M]//卷二十“爱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2005: 298.
- [3]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 崩溃前的大清帝国: 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M]. 易强,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186.
- [4] 吕半教. 戒溺女说[J]. 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 1926(46): 25.
- [5] 聂亦峰. 冈州公牒[M]//聂亦峰. 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牒. 梁文生, 李雅旺, 校注.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75.
- [6] 刘坤一. 做照三江两湖章程设会育婴示[M]//刘忠诚公遗集(附联语). 公牒卷二. 清宣统元年新宁刘氏刻本.
- [7] 吴宗焯, 修, 温仲和, 纂. (光绪)嘉应州志[M]. 卷十四.

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 [8] 花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M]//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688.
- [9] 省通令各县禁溺杀婴儿,举报者奖以重金[N].竹秀园月报(复兴版).1948(9):28.
- [10] 约翰·巴罗.巴罗中国行纪[M].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1.
- [11] Remarkable Birth[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 08 - 09(208).
- [12] Infanticide in China [N]. Methodist, 1872 - 11 - 23 (379).
- [13] FIELD, ADELE M. Infanticide in China [J].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879(10):224 - 225.
- [14] Infanticide [N].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05 - 08 - 18(53).
- [15] Female Infanticide [J]. from an Unpublished History of Amoy.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873(1):58.
- [16] Female Infanticide among the Punti Chinese [J].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873(2):130 - 131.
- [17] 掷毙婴孩之残忍[N].舆论时事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第9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4063.
- [18] 裘伯玉.严禁溺女示[M]//叶觉迈,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第19卷[M].1920(民国十年).
- [19] 周理.溺女[C]//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4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377.
- [20] 粤东不良习俗:或乖人道或触刑章[N].中央日报,1934 - 04 - 25(7).
- [21] 粤省禁止溺杀女婴[J].女铎.1935(23 - 9):78.
- [22] 杰之.严禁溺婴[J].民间周报.1934(92):3 - 4.
- [23] 新闻、书报、通信[J].华年.1935(4 - 3):55.
- [24] 林森.保障女权令(民国十七年内政部通飭各省民厅)[G]//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四编).上海:中华书局,1935:547 - 548.
- [25] 严禁溺毙女婴恶习及收养婴孩办法(二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奉省府令发)[J].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1935:9 - 10.
- [26] Infanticide in China [N].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1903 - 08 - 20(5).
- [27] 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M].温时幸,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358.
- [28] Prevalence of Infanticide among the Chinese [N]. Missionary Register, 1822 - 12 - 01(513).
- [29] Infanticide in China [N].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Chiefly Relating to the Mission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39 - 02 - 01(21).
- [30] 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下[M].张子清,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82 - 18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Infanticide of Guangdong from Late Qing to the Republic Era

LI Junfe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e Republic Era, infanticide existed in Guangdong to some extent. The officers of Qing, considering infanticide as an evil custom, took measures of moral persuading and philanthropy rather than law. Infanticide was observed and explained from national perspective during the Republic Era, and legal prohibitions were much more emphasized. Overall, the westerners in China believed that infanticide was a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s inferior morality and culture, which brought the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of preaching Christianity.

Key words: infanticide; Guangdong; Late Qing; the Republic Era

古代民间信仰的和谐语境:基于借鉴《周易》智慧

黄德锋

(江西行政学院,江西南昌 330108)

摘要: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经典和智慧经典,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和谐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民间信仰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传统文化的智慧,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易》和谐思想潜移默化地浸润。以《周易》智慧来审视古代民间信仰的和谐语境,这是我们了解古代民众生活状态的重要途径,是古代民众和谐生存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周易》智慧;古代民间信仰;和谐语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69-05

《周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对于《周易》阐述的这个“太和”境界,余敦康先生指出:“如果单从天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本然秩序和发展的归宿。如果联系到人道来看,则是蕴含了浓郁的人文主义价值理想,人类的各种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活动,都应以‘保和太和’作为自己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贯穿于《易传》义理内涵之中的核心观念或思想精髓是和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紧密结合,联为一体的,它的由天地人所构成的三才之道,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思想。”^[1]古代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和相应仪式,其主要功用在于通过构建和谐的人神关系来推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其中借鉴和吸收了《周易》的整体和谐智慧。古代民间信仰构建各种和谐关系,激发了民众追求和谐生活的现实需求,体现了古代民众对和谐生活的永续追求。

一、“生生不息”的人生目标

古往今来,人们对“生生”始终抱着极大的期望,以“生生”作为其人生重要的价值目标,这是由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

《周易·系辞上传》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曰:“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极盛,故谓之‘盛德’也;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注劝诫,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2]78}中国人从来都是赞美生,忌讳死,但中国人所讲究的“生”,并不仅仅在于人之生理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传承,正是这种建立在宏观视野下的整体生命意识影响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赓续不绝,传承至今。

“生生不息”的前提是阴阳和合、阴阳和谐。《周易·系辞下传》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我们知道,“天地”和“男女”皆分阴阳,它们之间的相互“絪縕”和“构精”,产生万物和人类社会。由此可见,阴阳和合所构成的阴阳和谐是产生万物的基础。《周易·系辞上传》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周易·乾·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周易·坤·彖传》亦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些就是说万物的开端、产生皆由乾坤阴阳之间的“生生”而来。“生生”是阴阳之转

收稿日期:2019-05-14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明互鉴下的原始儒家与早期基督教生命伦理比较研究”(17BZX100)

作者简介:黄德锋(1976—),男,江西抚州人,历史学博士,江西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

化,阴生阳,阳生阴,阴阳相生至于无穷,阴阳变化和阴阳和合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动态过程,由此万物和人类社会得于持续地繁衍生息。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生育的产生来自婚姻的完成,婚姻的完成来自男女之间的阴阳和谐,他们为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婚育信仰。自从人类有婚姻的那一天开始,人们以隆重的仪式、庄重的信仰来对待婚姻,视和谐的婚姻为生命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如古代传统婚姻中的烦琐的“六礼”、神秘的八字、隆重且庄严的“拜天地”和既热闹又富有内涵的“闹洞房”等,包括婚姻仪式当中物品的使用、时间的安排、颜色的表达等既有阴阳和合的意蕴,又有“生生”之愿景。古代人们把对和谐婚姻的追求当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而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传承,这种“向生而婚”的婚姻信仰是“视生命之创造历程即人生价值实现之历程。”^[3]

“生生不息”是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目标。《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蒙培元先生认为:“从宇宙论上说,人的生命价值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绝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4]由此可知,蒙培元先生将“生生不息”作为“天地之大德”的内在价值,而这个内在价值造就了前面所提到的“生命的创造”外,还包括由此产生的婚姻和谐和家庭和谐。在古代孝道意识重视“生”的整体社会氛围下,“生生不息”始终是维护婚姻和谐、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古代婚姻中的仪式除了阴阳和合的内容外,还有就是对“生”祝福,对“生”的希冀,似乎人类的婚姻就是为“生”而成的。在古代“男尊女卑”的夫妻的关系中,民间有“七出”之说,其中就有对不能生育妇女的惩罚,浸透了传统社会里对“生”的渴求和希望。因为“生”之重要,所以民间才会有不计其数的求子仪式和生殖崇拜,如春节期间江西宁都县石上村人热闹非凡的“割鸡”仪式和“添丁炮”,古代社会民间大造祠堂和大修族谱的盛举,传统建筑上的《百少图》,甚至民间祖先崇拜中对墓地风水的讲究等,人们似乎把人生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融入了这“生生不息”的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之中。古代民间信仰中所包含的行为,乃至那些迷信的活动,似乎也只有这无法超越的“生”来解释了。向生而婚,为生而求,甚至为生而活,这些为“生”而造就的古代民间信仰实际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生产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也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所浸润的人生观念。所

以蒙培元先生就指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生生之谓易”则“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底的说明”^[4]¹¹⁷。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几乎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间信仰中的各种仪式和活动渗透在百姓的内心里。这种“生生不息”的民间信仰不仅包含自然生命的繁衍,还包含文化生命、精神生命的传承,它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此紧密地交叉在一起,温暖着人心,化解人们内心与生俱来的恐惧,表达了古代社会人们深重、和谐的生命意识,是人们热切追求的人生目标。

二、“致命遂志”的人生精神

《周易·困·象传》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对此,高亨先生指出:“君子观此卦象,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愈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从而舍弃生命以行其志愿。”^[5]高亨先生所说的“致命遂志”,就是人应该拼搏进取,以自强不息、及时立功的人生态度和开拓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努力改变人生困境,把握人生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的和谐。古代民间信仰中的信仰者也需要从信仰的对象中来获取必要的精神激励,增强自信,提升战胜困难的力量,借以应对各种现实的挑战,追求和谐的生活。

有学者指出:“《易传》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及时立功的人生态度观一经推出,便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一脉、世代相传的精神动力,成为有识之士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6]³⁶在古代民间信仰中,蕴含着许多刚健有为的人生精神。如在古代的婚育信仰中,人们为了克服可能对婚育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各种手段和隐喻的象征,为生而求,保护婚育的正常进行和小孩的健康,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和子孙繁衍的希望。传统建筑在顺应自然、保持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同时,还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积极改造环境,在建筑的择址与规划、周边环境的选择、方位调节和吉祥的装饰等方面展现人们的价值理想,以改造自然的莫大勇气追求人生与生命的和谐。在古代的人神关系中更是体现出人们这种对命运抗争的不懈追求。如古代的巫术现象既是一种迷信,也是人类在神秘化自然面前的一种精神支撑,巫术的仪式和行为便带有了精神抗争的意味,它所关注的是人类面临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给人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勇气,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对古代人们而言,《周易》和巫术中的神秘主义也不是完全的消极和纯粹的迷信,显

出了人们企图通过一种超自然力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信心。人们信仰某种神秘主义,但并没有完全沉湎在神秘主义之中,而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追求和谐的现实生活。正是这些古代的民间信仰维持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平衡,调节了人们的生活秩序,缓解了生存的危机,这是人类追求精神和谐的重要象征。

“致命遂志”既与人的刚健有为精神有关,体现了人们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意识,同时也与人们的道德有关,处于穷困之时,是检验人们是否坚守道德的重要标杆,“困,德之辨也”(《周易·系辞下传》)。君子在穷困之时,仍不改当初之志向,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坚持自身的道德操守,这是人生获得发展与成功的重要基础,故“君子誓死守道,虽遭受困厄之世,也当不屈其志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故曰‘致命遂志’”^[7]。因此,《周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所表达的“困极则亨”就反映了“致命遂志”的人生精神。《周易》还用“进德修业”“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等来表达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描述“德”对“业”的影响力,揭示了“德”在君子人生成功中的重要作用。

古代民众认为,“德”与“业”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有“德”才有“业”,“进德”才能“修业”,“盛德”才会“大业”,“崇德”才有“广业”,“德”大“业”才大,追求大“德”而成就大“业”,始终是古代社会民众的一贯精神,也是古代民众安身立命的基石。古代民间信仰中民众所敬奉的神明是高尚道德品质的化身,是为民造福的楷模,人们通过周而复始的祭拜活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反省,“反身修德”“振民育德”,从而不断增强创业的激情,表达了人生的“德业”观。我国古代社会对“德之不修,业之不广”的忧虑,对“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周易·系辞下传》)的警示,实际上是告诫和敦促人们要大力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道德水平,强调道德在人生事业中的重要意义。道德是人们克服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重要途径,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

三、“惧于终始”的人生态度

《周易·系辞下传》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这里表达了古代先民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也具有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其源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联。朱伯崑先生指出:“《周易》作为上古时代算命的典籍,强调人的努力和智谋,不是一切都听命于天启,显然是我先民理性思维发展的产物。如果说,占筮为古代迷

信之一,但此种卜问吉凶的方式,确乎是一种文明的创造,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所没有的,体现了先民处于困境和逆境中,企图摆脱不幸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生活智慧,虽然披着神秘的外衣。”^[8]

在古代民间信仰中,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如在古代建筑中,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吉凶意识,这种对于建筑的吉凶认识其实就是人们在一定时空下对于生存的忧虑。为了实现趋吉避凶的目的,人们以丰富多彩并富有生活气息的手段来营造心理安全和吉祥的居住空间。如建筑中符合文化吉祥的方位、数字、形象和颜色,像“商家建筑不朝南”“丁兰尺”和溪陂古村的“船形建筑”、钓源古村的“棺材路”等,建筑中所采用的像“太极阴阳图”“泰山石敢当”“吞口”等各种辟邪的手段,还有在建筑的装饰中以隐喻或谐音的形式来表达人生理想,人们把对命运的忧患融进了建筑的设计和经营之中,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种忧患意识的主旨在于,人们要以戒惧而沉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时刻抱着警惕心和危机感,事业顺利时不掉以轻心,能透过升平气象来洞察背后的隐患,居安思危,居安如危,而遇到艰难困顿时不气馁、不屈服,要树立信心,通过反思自我来拨乱反正,化险为夷,使个人、家庭和国家求得光明前途,并从中锻炼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6]⁴⁰³在古代巫术信仰中,这种忧患意识就更加直接。张紫晨先生指出:“巫术是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巫术效力主要是心理信仰。”^[9]巫术的这种心理信仰表达最多的是忧患。在对自然的粗浅认识和命运的不确定情境之下,引发了人们心理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以各种巫术形式表露出来,巫术语言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述,既是自我本然的保护意识,也是一种制服各种“邪祟”的力量。所以,“语言符号一旦被赋予神化的魔力,它会左右人们的精神意志,不仅使人们心灵上有一种依赖感,而且在行动上会产生积极的诱导作用。它促使人们必须按照巫术语言的旨意行事,在言行上,要么必须这样做或这样说,要么禁止这样做或这样说。不然一旦违背巫术语言的规则就会失去语言的效力或遭到应有惩处”^[10]。古代江西人们在养育幼儿时,给儿童戴的长命锁、穿的百家衣、穿戴狮虎形鞋帽、逢九过生日、成人本命年穿红衣等,这些古代的民间信仰以无所不在的忧患意识,为传统民众适当减少了些许疑虑与不安,缓解了臆想中的人神冲突,提供了一个通过外界的沟通而实现人之身心平衡的心理安全空间,这是古代社会人

们追求和谐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

《周易》六十四卦中充满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居安如危,还要始终保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以道德内求作为防止各种忧患的途径。《周易·系辞上传》以“三陈九德”的方式告诫人们,当处于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以“德”来克服生活中的忧患。故《周易正义》指出:“以为忧患行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举以言焉,以防忧患之事故。”^{[2]89}《周易》认为,人生的占断吉凶还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有着直接的关联,故需要以“德”解忧、以“德”减忧。在古代民间信仰中,“德”在防止忧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人们极力推崇“福德一致”的观念。如人们日常行为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警示、婚姻信仰中有对女子“德”的要求、庙会信仰中对神明“德”的发挥、祖先崇拜中有对祖先“德”的尊崇、祭祖活动中有对“德”的规范和宗族关系中“德”的教化等,古代民间信仰始终以“德”作为其约束行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和谐心灵的重要手段,以民间信仰来追求人生的幸福感。因此,“重德”意识始终是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它告诫人们,道德行为始终是获取社会信任、促进人生和谐的重要途径,这也是避免或减缓人生可能面临忧患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四、“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天人关系是古代人们论述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认识。《周易·乾·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我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精湛的论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进而推及到“天人合一”的人生观。《周易》所表达的天人关系既包含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对古代“天人关系”的系统表达。孔颖达对此解释曰:“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2]17}陈梦雷亦曰:“大人与道为一,即与天为一,原无彼此先后之可言。其曰‘先天’‘后天’者,亦极言或先或后,皆与天合也。”^[11]不管是孔颖达所讲的“大人合天”“天合大人”,还是陈梦雷所讲的“皆与天合”,都是古代“天人合一”价值目标的实现。诚如张涛先生指出的那样:“《周易》是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藪,《易传》运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以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为基础,构筑了一个天

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6]104}“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人们处理各种关系重要的指导思想,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古代民间信仰所表达的人生观是古代社会最高的人生境界,它表达了天地人和谐共处的人生追求。

自然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环境和资源,自古以来,人类依赖于自然而得以生存发展,它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低下的时代,人类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道法自然,这是人类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极其朴素的生态环境意识。人们“确认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亲属关系”^[12],认为人类在生活生产中要重视与大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方面,古代的村落和建筑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无论是在村庄的择址、规划布局,还是具体建筑的设计和营造,都遵循了道法自然的原则。人们还设想出一种“风水”信仰来具体指导建筑的诉求,成为古代社会“集体无意识”行为。传统建筑无论是依山就势、山环水抱的格局,还是中轴对称、左右平衡的布局;无论是水口的规划、风水林的种植,还是建筑材料的选取、“四水归堂”的天井和气势宏伟的马头墙等,凡此种种,都是人们按照自然的形势赋予自己安全的生存空间,这是人们积极融入自然的生活智慧。

“天人合一”作为古人处理天地人各种关系的指导思想,在人与社会、人与神明的关系中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一种人们生活中的信仰。冯天策先生指出:“信仰是人类意识对自身生存背景、条件、历史和结局的整体审视与全面反映,是人类对自身存在与外界关系的自觉体认与主动调整,是对终极性人生目的确认与追求。”^[13]现在看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信仰,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与所处时代的民间百姓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其中蕴含着永恒的生存智慧。古代民间信仰是古代社会民众根据自己的生存需求而进行的精神表达,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人们在处理信仰中的各种关系时,总是从他们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这种功利性的思考是我国古代民间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建立在这种生存需求之上的人生观,无一不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因此,古代民间信仰所追求的人生观就是一种和谐生存的意识,他们希望获得心理慰藉和情感支撑,这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精神力量。所以,“民众的信仰企图是趋福避祸,从而得到精神上的一种安慰。民俗信仰是他们的一种世界观,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他们的人生观,

以解释人之生死、人与人的关系”^[14]。我们从古代民间信仰中可以获知,人们在处理与信仰中的神明关系时,都是从这种需求出发的,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如民间的婚育信仰,是为了婚姻的和谐美满从而生生不息、香火旺盛;古代建筑中的吉凶观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安全的生活空间;人们日常生活的巫术行为,是为了以自我的力量驱除可能危害自己的邪祟,虽忧患不已却不失进取意识,这是百姓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民众为了加强生活的信心,还举办各种庙会信仰活动,企图在这种来自生活中的神明保佑下获取更多的生存勇气;祖先崇拜作为古代民众信仰的象征,人们按照风水原则寻墓地、建祠堂、修族谱、祭祖先,是以团结宗族、凝聚人心,似乎祖先给予了后代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此,人们似乎看见了未来的希望,为和谐的生活而持续追求,从而不断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黑格尔曾经说过:“《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余敦康先生认为《周易》的这种智慧主要是“和谐”的人生智慧。他指出,《周易》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思想。古代民间信仰所表达的和谐人生智慧,绝不是盲目的乐观自信,也不是无意识的追求,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切体认,是古代民众精神的寄托、生活的希望,它以其“慎于终始”的忧患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人们“致命遂志”的人生精神,激发了他们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实现其“生

生不息”的人生目标,这是古代先民追求和谐人生的深刻展示。

参考文献:

- [1]朱伯崑.周易知识通览[M].济南:齐鲁书社,1993:176.
- [2][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292.
- [4]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300.
- [6]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36.
- [7]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413.
- [8]朱伯崑.周易知识通览[M].济南:齐鲁书社,1993:代前言第7页.
- [9]张紫晨.中国巫术[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37.
- [10]邵英.古代语言崇拜的文化心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04.
- [11][清]陈梦雷.周易浅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25.
- [12]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77.
- [13]冯天策.信仰简论[N].光明日报,2005-07-12(8).
- [14]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0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Harmonious Context of Ancient Folk Beliefs: Based on the Wisdom of *Zhouyi*

HUANG Defeng

(Jiangxi Administrative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108, China)

Abstract: Harmony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Zhouyi* is an important culture – wisdom classic in ancient China. It contains a very rich idea of harmony and has a far – reaching impact on our ancient society. As a way of people’s daily life, ancient folk beliefs absorbed and borrowed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were inevitably infiltrated by the harmonious thought of *Zhouyi*.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harmonious context of ancient folk beliefs with the wisdom of *Zhouyi*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spiritual harbor of ancient people.

Key words: wisdom of *Zhouyi*; ancient folk beliefs; harmonious context

年轻父母的晒娃习惯 及其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认知调查

祁 涛,景聪会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以往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研究,更多关注网络法规的完善和网络伦理建设等内容,而忽略儿童监护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隐私保护能力的影响。通过对年轻父母的晒娃习惯及其对儿童网络隐私问题的认知进行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年轻父母们晒娃时处于随机感性状态,未经处理即将儿童的身体、形象等信息在网络上直观呈现,可辨识度很高。多数调查对象对儿童是否愿意被晒注意不够,也未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隐私设置功能。研究发现,年轻父母的隐私保护意识与他们学历水平的高低有关,多数父母对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不够重视,而是更倾向于要求政府完善网络政策和法规。结论认为,更有效地保护儿童隐私安全,改变年轻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网络使用习惯非常必要。

关键词:社交媒体;儿童网络隐私;媒介素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74-05

一、研究缘起

社交媒体的发展为网民提供了方便快捷、丰富多样的展示舞台,基于交流需要,儿童日常生活成为社交媒体用户分享的重要内容,“晒娃”甚至成了某些年轻父母的日常网络使用行为。但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无序状态之下,晒娃背后隐藏着儿童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隐患。现实生活中,因晒娃引发的安全事故比较多,如2019年3月19日东方网报道了一则新闻,上海的李先生经常在朋友圈晒富、晒娃,被自己的高中同学绑架了孩子并勒索170万元。由此可见,当儿童网络信息与成年人的财富状况、社会地位等一同被他人掌握时,一些不法行为对儿童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在目前我国对儿童网络隐私问题的研究中,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网络法制的完善和网络伦理建设层面,如蒋玲从法律、网站自律和安全港模式3个方面对美国儿童网络隐私的保护措施进行了分析,以

供我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参考。^[1]孙亚芹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提出的5条建议,即网络行业自律、网络分级制度、专门针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官方网站、过滤软件和立法保护,多数属于法制与伦理视角。^[2]对于儿童监护人的网络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有的只是强调儿童监护人应对儿童的网络使用行为进行监督,对监护人在网络上展示儿童信息并未予以关注。有鉴于此,本调查旨在通过对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的晒娃行为以及隐私保护意识的调查,探究受访群体在晒娃时的社交媒体使用状况、信息呈现方式、交流互动习惯及其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认知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的确定

我国相关法规对儿童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与儿童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保护对象是年龄未满十八周

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舆论中的话语乱象及其净化研究”(2017BXW002)

作者简介:祁涛(1977—),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新媒体。

岁的公民。一般而言,儿童时期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到青年初期之前的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在生理上完成了身体的初步发育,在心理上则初步实现了个性品质的培育。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少年期以前(即十一二岁以前)是真正的幼稚期或儿童期,包括乳儿期、婴儿期、幼儿期(3—7岁)和学龄初期(7—12岁)。考虑到网络隐私对幼儿和学龄初期的儿童影响同样重要,而且儿童的主要监护人是年纪相对较轻的父母,他们也是智能手机的主要使用者和在社交网络空间晒娃的主要群体。因此,本调查将儿童界定为0—12岁的孩子,并将他们的监护人即年轻父母们作为调查对象。

(二) 调查问卷的设计

基于研究目标和对调查对象的认知,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有30个问题,前6个问题主要是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年龄、学历、性格特征和孩子的年龄,8—23题主要对年轻父母的晒娃习惯进行了询问,主要追问了年轻父母利用社交媒体晒娃的频率、内容、表现形式、动机、交流互动等方面的内容,24—30题着眼于了解年轻父母对儿童网络隐私安全保护的认知状况,如他们对自身的晒娃行为对儿童隐私和人身安全造成的风险是否知晓、是否知道媒介素养这个概念以及媒介素养会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发挥积极作用、父母对社交媒体平台责任的看法等,这些问题有助于掌握年轻父母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所持的主要观点。

(三) 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次调查的起止时间是从2019年4月4日至23日,持续19天。4月4日到10日进行问卷的预填写,之后,根据被调查对象反馈的问题、选项设置的漏洞以及初步的分析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4月14日至23日,开始正式发放问卷。采取发放网络问卷的调查方法,利用问卷星将设置好的问卷在微信平台进行转发扩散。转发扩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利用身边的家庭关系网络,选取平常晒娃频率较高的年轻父母进行调查。同时运用这部分人的网络社交圈,将问卷发放至朋友圈以及儿童所在班级的家长群中进行问卷的二次传播。为了增强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全面性,研究者随机选择了一家教育辅导机构,抽取不同年级的部分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活动共收回了78份有效问卷。

(四)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78位调查对象中,女性有67人,占比85.9%,男性有11人,占总调查对象的14.1%。调查对象的年龄在31—35岁的较多,有31人

(39.74%),年龄在26—30岁之间的,有25人(32.5%);调查对象的学历分布比较均衡,专科学历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均有24人(30.77%),为本科学历的调查对象有23人(29.4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有7人(8.97%);认为自己的性格兼具内外向双重特征的最多,为48人(61.54%);其余的分别有15人(19.23%)认为自己属于内向型或外向型性格;在生活状态方面,工作与带娃兼顾的居多,有35人(44.87%)。

三、对年轻父母晒娃习惯的调查数据与主要发现

(一) 年轻父母晒娃时处于随机感性状态

晒娃频率的调查结果见图1。调查对象中频繁晒娃的现象并不多见,每天发送有关儿童表现的内容超过3条的为0。41位调查对象(52.56%)是处于随机分享的状态。同时,17人(21.79%)为隔几天晒1条,还有15位调查对象(19.23%)从不在社交媒体上晒娃,其余的5位是以每天1—2条的频率来分享儿童信息。调查表明,目前绝大部分儿童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儿童信息是随机的,即处在想晒就晒,或者说感觉到有意思的信息就晒娃的状态,多数没有经过对孩子网络形象管理的理性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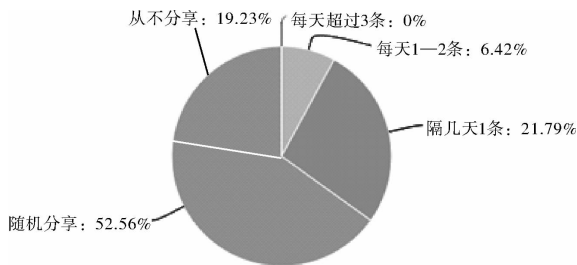


图1 晒娃频率分布图

(二) 晒娃视频化倾向明显

随着社交媒体发送短视频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再加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兴起,可视化、场景化的信息呈现方式逐渐被更多用户青睐。短视频以拍摄的随机性和便捷性,使儿童信息的展示更加多样化,丰富的镜头语言也更能吸引受众的关注和互动。根据图2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抖音也逐渐成为用户晒娃的“舞台”,有32人(50.79%)在抖音上分享过有关儿童的内容。加上快手,在短视频类APP上晒娃的达到53.96%。短视频是非常直观的晒娃方式,可辨识度非常高,是泄露儿童隐私的主要渠道。

除此之外,儿童信息还有一个独特的呈现方式,即外部链接。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规定的各种打卡、投票活动在微信朋友圈随处可见。而被调查的对象用户中,有12.7%的用户曾在社交媒体上推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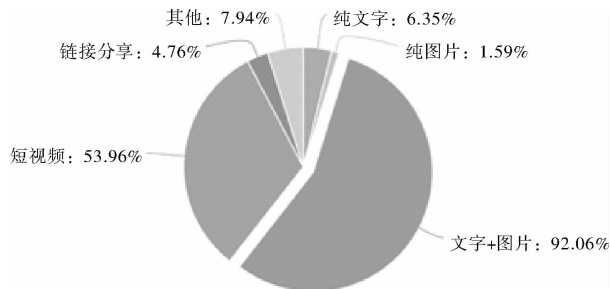


图2 晒娃内容的呈现方式分布图

过打卡、投票链接以及其他内容。这些链接内容很多情况下常包含儿童的姓名、年龄、肖像等个人信息,在转发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不被他人不当使用。

(三)晒娃的回复率和互动性强

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人们建立社交关系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无论是微信还是微博,无论是强社交关系还是弱社交关系,“晒娃”都会提供一个双方乐意参与的沟通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具有共通性质,互动和回复率都比较高。调查显示(结果见表1),在晒娃之后,会选择一一回复的有19人(30.16%),选择个别回复的有34人(53.97%)。对其他人的晒娃内容将会进行互动的用户达到90.48%。引发互动的首要原因是内容有趣,其次是关系亲近或者互动捧场,所占比例分别是60.42%和37.5%。由此可见,与晒娃有关的信息流量较大,可见度较高,社交用户的互动意愿比较强烈。

表1 晒娃的互动情况分布表

项目		N(人)	比率(%)
是否评论、点赞、转发他人内容	会	57	90.48
	不会	6	9.52
与他人晒娃行为互动的原因	关系亲近	36	63.16
	内容有趣	36	63.16
	单纯路过	10	17.54
	互动捧场	20	35.09
	其他	4	7.02
回复他人评论	一一回复	19	30.16
	个别回复	34	53.97
	浏览但不回复	10	15.87

(四)社交媒体平台的隐私设置功能和潜在泄露渠道易被忽视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多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强关系建立起来的,媒体上的好友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用户的现实社交圈层,包括亲友、同事、同学等等。网络社交圈层与日常生活圈高度契合,很容易给人们营造出一种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同样安全的假象。随着虚拟环境越来越日常化、环境化,人们很容易忽视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隐私保护措施。

根据图3 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对象中,有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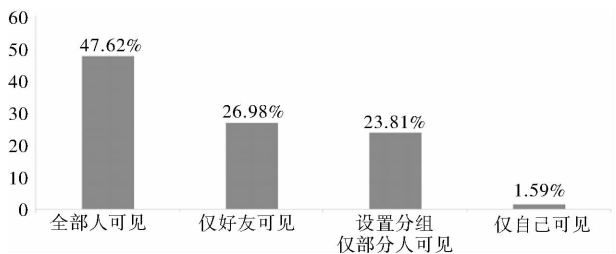


图3 隐私设置功能的使用情况分布图

个人(47.62%)并没有使用分组设置功能,而是选择将分享内容不加区分地设置成全部人可见;将分享内容设为仅好友可见的占26.98%;将好友进行分组设置并选择部分人可见的用户所占比例为23.81%;设置仅自己可见所占比例为1.59%。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平台的隐私保护功能日益完备,但是具体到用户个体身上,不能保证其功能设置能完全发挥效果。

除了用户主动分享动态可能会对儿童网络隐私安全造成威胁之外,用户的个人资料往往会被他人忽视,而这一潜在的泄露渠道是隐私设置功能也很难防护的。据图4显示,有晒娃习惯的63个用户中,在头像、个人界面上使用儿童照片等信息成为普遍现象。在头像上显示儿童信息的占总人数的61.9%,使用包含儿童肖像的图片作为个人界面的达到34.92%。儿童隐私信息在用户个人信息上呈现得更具有持续性,所能接触到的受众范围也更加广泛。同时用户个人信息与个人账号直接相连,又没有相应的屏蔽措施进行防护,在接触陌生用户时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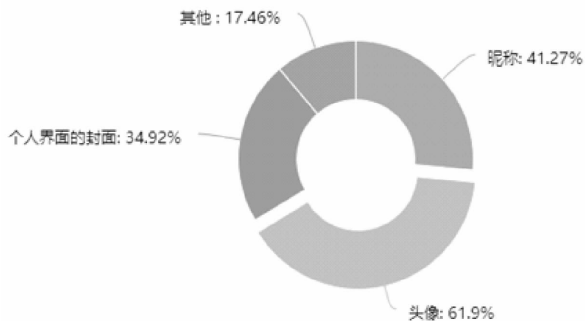


图4 儿童信息在用户个人资料中的呈现分布图

(五)在晒娃时征求并遵循儿童主体意愿的仅在少数

处在3—12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虽然不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开始具有初步的判断能力和个人事务处理的自主意识。当家长沉浸于分享的喜悦的同时,却很少有人考虑儿童的意愿。在63位有晒娃习惯的家长中,有36位家长的儿童是在3岁以上。在这其中,仅有5位家长(13.89%)征求并

且完全遵循儿童的意愿,有 24 位(66.67%)在晒娃时没有征求过儿童的意见。儿童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被动地位不仅体现在法律上行为能力的限制性,还体现在其监护人对儿童自身信息表露意愿的忽视。而在现实生活中,对儿童的影像制作和分享行为更需要建立在尊重儿童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才有助于维护儿童隐私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

(六) 年轻父母晒娃多是基于自己的认同需求

一个独立的成年个体的身份认同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事业、爱好、两性关系等等。中国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关切程度高,分享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亲子生活等内容,是父母对在教育上陪伴和付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满足,是基于为人父母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形成的自我意识。通过对父母晒娃的内容和目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亲子关系在父母自我认同中所占的重要比重。

如图 5 所示,在 63 位有晒娃习惯的社交媒体用户中,日常的亲子活动和儿童的学习和兴趣培养成为晒娃的主体内容。而针对出于什么原因晒娃这一问题,有 47 位用户(74.6%)表示是为了更好地记录儿童成长;有 33 位(52.38%)认为是为了表示对儿童的喜爱;有 16 位(25.40%)表示是为了分享趣味、娱乐大众;而选择“获得自豪感和认同感”的用户仅有 10 位(15.87%)。父母由于子女表现优异而获得自豪感,其自我认同感的加强一部分就来自于网络社交圈层中他人的点赞、评论、转发等一系列行为,再加上社会评价体系对儿童外貌、成绩、特长等的多样化期许,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使得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被内化为父母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基于自身需求的晒娃习惯不仅忽略了儿童的意愿,更是在展示中将儿童的个人信息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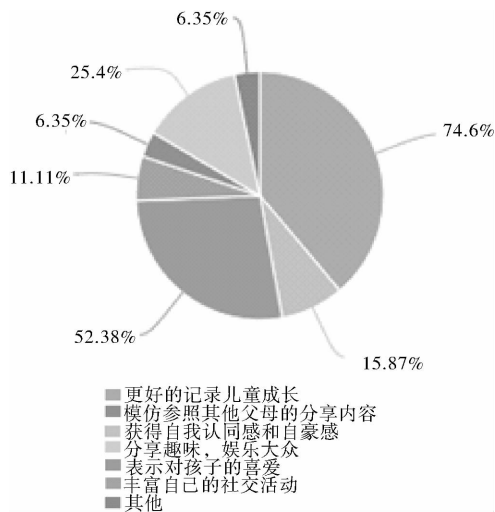


图 5 在社交媒体上的晒娃原因分布图

四、年轻父母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意识的调查数据与主要发现

(一) 学历水平高的父母对儿童网络隐私问题的关注度更高

以被调查对象的学历为自变量,以是否考虑过晒娃对儿童网络隐私造成的不良后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学历越高的人对儿童网络隐私的关切程度越高。如表 2 所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用户中没有考虑过由晒娃带来的儿童隐私风险这一问题的有 12 人,占有一半比重,而仔细考虑过安全风险的仅有 5 人(20.83%)。而专科和本科学历中,偶尔会想到隐私风险的占多数。虽然调查对象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仅有 7 位,但是仔细考虑过晒娃行为中潜在的隐私风险的比重最高,所占比例达到 57.14%。由此可见,人们对儿童网络隐私的关注与学历有显著关系,更进一步讲,教育特别是对新媒体传播知识的培训决定了人们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

抛开学历水平的差异,针对晒娃行为是否会对儿童隐私和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个体认知,有 44 人(56.41%)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自己分享的内容并不会对儿童隐私安全产生损害。剩余的 34 人(43.59%)认为自己的晒娃行为伴有隐私风险。与此同时,在 58 位了解到相关的负面新闻的父母中,仍会选择继续晒娃的用户有 28 位,所占比例接近 50%。这说明,与潜在的隐私泄露威胁相比,很大一部分人更愿意感知和接受社交网络带来的便捷和益处。

表 2 学历与关注儿童隐私泄露风险程度的交叉分析表

X/Y	仔细考虑过	偶尔会想到	没有考虑过	小计
高中及以下	5(20.83%)	7(29.17%)	12(50%)	24
专科	6(25%)	17(66.67%)	2(8.33%)	24
本科	5(21.72%)	16(69.57%)	2(8.70%)	23
研究生及以上	4(57.14%)	1(14.29%)	2(28.57%)	7

(二) 年轻父母对自身媒介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认为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应是政策和法规问题

在 78 位调查对象中,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媒介素养这个概念的分别有 40 人(51.28%)和 8 人(10.26%)。对于从哪些方面入手保护儿童网络隐私安全,有 51 位用户(65.38%)求助于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有 49 位(62.82%)倾向于社交媒体平台要担负起儿童网络隐私安全保护义务。而认为需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约束晒娃行为的有 43 位(55.13%)。而实际上,“曾经有专家及一些非政府机构指出,家长要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在儿童对父母晒娃行为缺少安全防护

能力的背景下,年轻父母们必须重视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教育,理性看待自己的晒娃行为,更加合理地使用社交媒介平台提供的传播资源。

(三)社交媒体平台的隐私设置必须通过用户的使用才能发挥功能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的呈现和传播平台,对儿童隐私信息保护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社交媒体平台自身应该承担的保护义务,60.26%的被调查对象寄希望于社交媒体平台能够采用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来保障儿童信息不被第三方服务平台或者个人窃取。有30.77%的父母表示需要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的行业自律和相互监督,自觉承担隐私信息管理的义务;25.64%的父母认为对非法使用儿童隐私信息的救济请求渠道和删除制度有待完善。据此可得出结论:父母大多期待社交网站的技术措施和隐私设置来保护儿童隐私安全。但是因儿童年龄的不同,以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隐私观的差异,把儿童隐私边界的法律界定和分级保护付诸实践存在一定的难度。

与此同时,对于单个媒体平台而言,隐私声明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行业自律形式,既可以规范平台自身的行为,又可以对用户进行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指导。但应当注意的是,用户在下载社交媒体客户端和注册账号时,对隐私声明有所关注的用户并不多。在78位调查对象中,有48位(61.54%)表示没有了解过社交媒体的隐私声明。这也说明隐私声明除了确定平台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之外,其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如果未对用户的媒介使用行

为产生有效的指导和规范作用,隐私条例就会沦为社交媒体平台规避责任的格式文本。

五、结语

由于成本及时间所限,本论文更多属于资料收集性质的研究,意在通过对于当下年轻父母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和儿童隐私保护意识的问卷调查,探究在作为儿童监护人的年轻父母在网络空间展示儿童形象时的信息安全防护意识和网络隐私保护能力,发现该问题域的现实状况。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受最初设定的研究目标的局限,调查存在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取样的范围以个人的社交圈为主要范围,样本抽取的数量有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综合控制性别、学历等因素的比重,使调查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我们愿以此仅供覆瓿之作,供学界进一步探讨监护人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参考。该问题对于网络时代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 [1] 蒋玲. 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概况及其启示[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9(5).
- [2] 孙亚芹. 我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研究[J].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1).
- [3] 李嘉, 刘洋. 儿童网络隐私问题研究综述[J].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018(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Habits of Showing Their Children's Life for the Young Parents and Their Cognition of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QI Tao, JING Congh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children's network privacy protection mainly focused the improvement of network regulations and network ethics construction and ignored the network security awareness and network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of the guardians of childre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young parents' habit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issues, it can be found that young parents usually display the unprocessed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ir children on the internet at will. These information are highly recognizable. Most respondent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whether children are willing to be exposed to the social media, nor do they fully utilize the privacy settings of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awareness of privacy protection of young parents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ost parents do not take their media literacy seriously and prefer to ask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network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children more effectively and to change the network usage habits of parents and guardians.

Key words: social media;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media literacy

“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设计及实践路径探析

林璐,刘杨*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从“顶层设计”入手,设计符合国际传播环境与中原文化具体发展特点的本土化战略、差异化战略、长效化战略和统筹化战略,提出配合战略实现的实践路径,包括:“企业+政府+群团+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的多元主体合作路径、“内容+产业+品牌”的产品培育路径、“国内+海外”的区域统筹传播路径、“融媒体传播+线下交流”的渠道联动传播路径,以及“政策+人才+资金+法律”的长效保障路径,进一步提升中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设计;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6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79-04

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诞生的历史摇篮。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具有其他地区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过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河南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1341.8亿元,比上年增加129亿元,增幅为10.6%,占全省GDP的比重为3.01%,增加值总量在中部六省中首次位居第一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积淀深厚和内涵丰富的中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2015年,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将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作为六大重点任务之一。中原文化“走出去”,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符合国际传播环境与中原文化具体发展特点的战略设计,提出配合战略实现的实践路径。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设计

(一)本土化战略

本土化战略要求“走出去”的主体要将自身当作

目标受众的固有一员,而非“文化入侵者”,本土化战略有利于避免当地法律法规的屏障,消除文化壁垒,并利用当地受众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具体战略主要包括内容本土化、人员本土化和渠道本土化。

具体来说,内容本土化强调中原文化在传播中不能忽视当地市场的特点和受众的信息消费偏好,要立足于本土内容,与本土内容进行结合,打造符合沿线国家国情的中原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产品的销售促进中原文化的传播。人员本土化从“人”这一“走出去”主体要素出发,强调中原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需要一批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人才,使传播行为符合沿线国家国情,最大程度上消除文化隔阂,更好地“入乡随俗”,以保证中原文化更好地被传播和被接受。同时,人员本土化也能保证中原文化传播人员的稳定性,保证传播的持续性。在渠道本土化方面,最新的调查显示,国际受众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而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仅为22%。^[1]中原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依靠国内媒体的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体系构建、战略设计与实践路径研究”(2018B403)

作者简介:林璐(1995—),女,黑龙江绥化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刘杨(1982—),女,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

对外传播,也要依托线下传播渠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媒体,比如2017年8月,应斐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平顶山市5名非遗传承人赴斐济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斐济太阳报》《斐济时报》《斐济日报》和斐济FBC电视台等当地媒体相继做了宣传报道。^[2]

(二) 差异化战略

首先,理念差异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6》指出,通过设置“差异化战略支点”,以支点辐射周边,由支点联结成网络的方式,在不同地区展开差异化、定制化的建设。^[3]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根据沿线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和受众情况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战略支点”传播理念,以沿线文化基础相似的中心国家为支点,辐射周边国家,联结成文化传播网络,展开差异传播。其次,手段差异化。在中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要注意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比如花木兰是代表着中原文化的经典形象之一,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对花木兰IP进行多种方式开发,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比如绘本出版、动漫作品、影视作品等。另外,除线上手段外,会展业也是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差异化手段之一,河南可以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特色的地域文化开展会展活动,如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封菊花展、洛阳牡丹花会等。最后,内容差异化。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差异化内容的生产,不仅要针对沿线国家的国情和进行差异化内容生产,还要根据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特点进行内容上的差异化传播。

(三) 长效化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国家长期战略,建立“一带一路”长效推进机制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原文化“走出去”也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建立长效化战略保障。具体来说,长效化战略包括规划长效化和资源长效化。

规划长效化指中原文化“走出去”需要制定长效性总体规划,以《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作为总体性规划,河南也需制定针对性和长效性的总体规划。资源长效化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通过对沿线不同国家的国情与中原文化结合的现状整合沿线国家资源,建立中原文化资源传播的长效机制,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了解中原文化的“前世和今生”。

(四) 统筹化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国家、多主体,中原文

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统筹化战略,从微观层面的传播主体到宏观层面的国家统筹,让中原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得更快、更远、更深入。

首先,传播主体积极开展统筹合作。近年来,中原文化的传播主体进一步多元化,不仅有企业和政府,还包括群团、高校与研究机构和媒体等。要以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为主,积极培育市场化的文化企业,组建海外推介、传播公司,注重意见领袖的传播作用。高校与研究机构应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多主体统筹合作将中原文化推向国内受众和世界舞台。其次,中原文化“走出去”,只靠传播主体发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开展国际统筹合作,积极寻求与沿线各国和地区的统筹合作。比如,在两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下,2017年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率先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建立了中原文化交流中心,这个集图书、艺术品、展演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交流平台”,是中原文化走向中亚地区的重要阵地。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实践路径

(一) “企业+政府+群团+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的多元主体合作路径

从企业角度来说,针对中原文化“走出去”的现状,河南需要培育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参与全球文化产品市场的竞争,塑造中原文化品牌,提升中原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份额和市场占有率;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对中原文化“走出去”进行支持,河南省文化旅游厅发布的《2018年全省文化工作要点》提出,“统筹规划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4]。

从社会群团角度来说,社会群团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主体之一,应该利用其特色优势进行产业拓展,推动中原文化更好走出去,比如河南创意产业协会,以综合性、全覆盖的创意产业平台,在推进创意理念提升、创意产业理论研究、创意产业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多本传播中原文化的书籍和杂志。从高校与研究机构角度来说,高校与研究机构作为中原文化的研究主体,对中原文化的内涵和传播进行理论探索,为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活动奠定理论基础。河南大学作为中原地区具有厚重历史和研究基础的高校,在中原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下设中原文化与民俗研究所,对中原文化的历史和内涵等进行系统研究。另外,高校也可以通过一些实践活动进行中原文化

“走出去”活动,比如留学生交流项目,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派留学生来传播中原文化。从媒体角度来说,媒体作为中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需要立足传播优势对中原文化进行全面推广。每一个传播主体各司其职的同时,也要注意通力合作,形成多元合作体系,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

(二)“内容+产业+品牌”的产品培育路径

文化产品的开发、传播和销售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原文化在产品层面“走出去”,要靠品牌塑造、内容表达、产业链开发共同合力。

中原文化“走出去”,本质上其实是承载着中原文化内容的产品“走出去”,开发中原特色产品,用传统内容配合现代表达。依托优质内容产品,构建中原文化产业链,实现多种产业全面对接。例如,将旅游产业和文创产业相结合,构成旅游消费和文化传播联动的产业链。多种产业相结合,打造中原特色文化产业品牌,用精品意识塑造中原文化品牌。实施中原地区文化品牌打造工程,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河南丰富的文化资源,围绕重点文化产业,打造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文化产业品牌体系。以精品意识为基础,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文化产业品牌。充分挖掘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和谐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资源,突出产业化发展导向,打造一批区域文化产业品牌。

河南本土文化创意品牌“豫游纪”于2013年创建,“豫游纪”植根优秀中原传统文化,并为中原文化寻求世界表达。“豫游纪”从朱仙镇木版年画、青铜吉祥纹饰和生肖文化中挖掘创意元素,从民俗文化、非遗文化中寻找灵感,为传统元素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产品涵盖包饰、日用品、家居饰品、旅游产品等40多个大类数百个品种,各种产品配合形成了富有中原特色的文创产业。除了文创产业之外,特色出版产品也是中原特色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发行业要积极构建数字出版平台,加快数字出版产业转型,依托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等大型国有文化集团积极开展中原特色出版产品开发,以出版物的传播为基础传播中原文化。

(三)“国内+海外”的区域统筹传播路径

中原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走出中原”,进行国内传播,以国内传播为基础,再进一步“走向世界”,让中原文化走到世界舞台。

以国内传播为基础,让中原文化深入人心,培育坚实传播力量。中原文化“走出去”首先走向国内,每年举办的中原文博会吸引了晋冀鲁豫四省共24个省辖市参会,着力推动中原文化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

界。^[5]除在大陆地区传播外,中原文化也走向了港澳台地区。自2014年开始,举行“情系青春——两岸青年中华行”活动,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增进台湾青年对中原文化了解,密切两岸青年情谊。以海外传播为拓展,让中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认同中原文化。2016年,河南文化艺术团赴乌克兰进行演出,并进行武术大师班交流活动,让乌克兰群众了解中原文化,两国文化关系实实在在更近了一步。

(四)“融媒体传播+线下交流”的渠道联动传播路径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充分利用新的传播生态,通过融媒体传播和线下交流的方式,讲好河南故事,传播河南文化,在打造文化高地的过程中形成强势传播地位。

传统媒体渠道是中原文化传播的基本渠道,传统媒体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打造精品内容,传播优秀中原文化。河南卫视立足“文化中国,文化卫视”的新定位,全力打造《梨园春》《华豫之门》《汉字英雄》《成语英雄》《知根知底》等展现不同文化类型的精品栏目,并借助网络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一步扩大传播,打造立体化的传播格局。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也要积极利用网络、影视、微信微博等更具亲和力、互动性强的新媒体,利用融媒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格局;线下交流也是中原文化“走出去”的渠道之一,通过线下的接触和体验更直观地感受和传播中原文化。2018年10月,首届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洛阳举办,博览会设置“一带一路”(国际)展区,吸引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加。2017年8月,应斐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平顶山市5名非遗传承人赴斐济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当地进行剪纸、泥塑、魔术、面塑等非遗技艺展示,通过互动向当地民众展示富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2]

5.“政策+资金+法律+人才”的长效保障路径

为保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原文化顺利“走出去”,需要各方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包括政策保障、资金保障、法律保障、人才保障等。

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在中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的支持为中原文化提供了政策上的利好。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于2017年启动了对口合作项目,河南方将为斐方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展示,艺术培训,文物、图书的交流合作,以及地方戏曲、少林功夫、河南民间音乐、舞蹈、杂技等方面的交流培训等。^[6]通过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原文化从走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逐渐走向世界。从资金层面来说,资金保障是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保障。2017年,河南省财政厅下达资金1.1亿元用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其中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类项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或社会效益突出的内容文化产业项目等。从法律层面来说,法律支持为中原文化“走出去”扫清障碍。文化“走出去”,会涉及当地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意识形态及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文化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国外政策法律环境,提升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有效规避和防控法律风险。因此,文化企业“走出去”,法治保障很关键,法律服务要先行。

从人才层面来说,需要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人才教育培训计划,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教育机构的作用,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设立文化产业专业院系,打造优势学科,培养文化产业人才。人才培养由技能型人才培养转型为智能型人才培养,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开发新的智能化文化产品,让承载着中原文化的“中原智造”更好地“走出去”。语言人才方面,目前“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7]而我国能够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人才却比较紧缺,语言是沟通的基本工具,语言人才的培养可以更好地为中原文化“走出去”消除沟通和传播障碍。

三、结语

拥有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原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正焕发着新生机,各传播主体应依托国家政策保障和新媒体技术对中原文化进行多层次传播,积极开发文化产品以及展开对中原文化的深入研究,让中原文化“走出中原,走向世界”,让中原文化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何艳萍. 互联网时代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J]. 青年记者, 2017(14): 17-18.
- [2]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走出去、请进来”做好文化交流工作[EB/OL]. (2019-06-28) http://gov.hawh.cn/content/201801/25/content_411046.html.
- [3]马莉莉,王颂吉,李侨敏. 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 2016[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39-42.
- [4]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8年全省文化工作要点(讨论稿)[EB/OL]. (2019-06-28) http://gov.hawh.cn/content/201803/08/content_412057.html.
- [5]杨晓东. 让中原文化绽放独特魅力[N]. 河南日报, 2017-11-03(9).
- [6]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7年河南省文化厅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对口合作项目全面启动[EB/OL]. (2019-06-28) http://gov.hawh.cn/content/201705/15/content_405578.html.
- [7]陈力丹. “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J]. 对外传播, 2015(10): 25-2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Design and Practice Paths of Zhongyuan Culture's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

LIN Lu, LIU 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Top Design”, experts are devoted to design strategi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cluding localization strategy,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long-term strategy and coordination strategy, proposing practical paths to achieve the strategy, including multi-agent cooperation path of “enterprise + government + group +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 media”, product development path of “content + industry + br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path of “domestic + overseas”, channel-linking communication path of “melt media communication + offline communication”, and long-term guarantee path of “policy + talent + funds + law”. Strategies and paths above are design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 Zhongyuan culture; globalization; strategic design; practice paths

打通最后一公里

——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思考

邓帅杰

(安阳广播电视台,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我国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的核心要求。但是在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语境下,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个人传播能力的激活使得主流舆论占据主导地位难度加大、网络内容生产的自助化导致把关难度增加、网络舆论的脱域化传播使得其时空控制难以实现。要解决这些问题,打通网络舆论管理的最后一公里,需要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打造主流舆论引导新阵地,强化公益性传播管理使正面舆论引导占据主导地位,提高宣传质量,优化信息结构,促进主流舆论内容的自生产。

关键词:网络舆论管理;社交媒体;全媒体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7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83-05

在网络空间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道理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关键是落实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网络舆论导向的管理工作做得并不尽如人意,最根本的是没有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合通道,权威话语难以有效到达网络用户。“许多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兴,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网络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震颤’”。^[1]究其原因在于,人们

对于新媒体的传播特征掌握得不够充分,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网络舆论引导的要求认识不够明确,从而使得目标和引导方法之间产生了距离。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特征的认识,同时为权威意见被网民接受找到良好的渠道,打通意识形态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路程。

一、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及其对舆论管理的影响

新媒体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当前主要指基于互联网络技术进行传播的媒体形态,其核心则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终端、依赖社交手段和病毒式传播的新型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和广谱覆盖、Web 1.0网站的海量信息集纳与用户分类聚集不同,以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以及诸多细分媒体为代表的Web 3.0网站的主导模式则是社交式延伸和病毒式蔓延,这为网络舆论形成带来新的形态,使网络舆论呈现为螺旋式上升和瞬间涌现的特征。

(一)个人传播能力的激活使得主流舆论的主导地位难度加大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工具的普及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接触、搜集和传播信息的自主性,社交媒介

收稿日期:2019-04-28

作者简介:邓帅杰(1976—),男,河南滑县人,安阳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资深媒体人。

的迅速崛起进一步为重构社会资源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个人作为传播的主体有机会直接成为社会资源的使用者和操控者,由此带来了个人实现自主表达权利的能力极大增强和内容生产能力的泛众化。”^[2]特别是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中国网民数量剧增。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8 年 8 月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02 亿,手机网民规模 7.88 亿,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间为 27.7 小时,每天近 4 小时。数亿网民每天在网络空间提供信息、交流感情和表达意见,爆发出巨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在我国催生了新浪微博、腾讯微信、快手,以及头条号等媒体平台的兴起,在国外则催生了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网站的快速发展。2018 年 1—6 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累计达到 266 亿 GB。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6 年底的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有 35 亿网民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着 40 亿泽字节(泽字节指的是十万亿亿字节)信息总量的制造。

这种海量信息与个人生产的结合,给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关于正确引导舆论,我们通常的说法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或者是主流舆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数亿网民无限的内容生产能力面前,仅靠传统媒体的内容供给,想要在内容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就是付出巨大努力也可能做不到。这是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用户处于集体消费状态之下,传统主流媒体控制着几乎全部的内容生产空间,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优势注意力资源。但是在移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创办一个新闻客户端,“需要与 415 万款各类客户端竞争注意力;创办一个官方微博,需要与 3 亿多月活跃用户竞争;创办一个微信公众号,则需要与 1000 万公众号以及朋友圈、个人注册用户竞争”^[3]。因此,除非正面宣传和主流话语能够在网络空间推动网民自传播、自生产,想要获得流量的简单多数异常困难。

(二)网络内容生产的自助化导致把关难度增加

正确引导舆论的内在运行逻辑是通过对内容进行审核、选择,使事件的议题符合传播者倾向和价值规范。这意味着,新闻舆论工作能够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正能量,是基于对新闻内容的把关之上的。我国传统媒体的把关机制主要包括党委领导、党委宣传部门具体指导,新闻媒体内部建立的记者、编辑直至总编辑的层层审核。在美国,把关机制则包括美

国总统新闻办公室等行政体系内的信息控制机构,新闻媒体内部的科层化管理以及新闻传播职业规范所形成的内容采制规则。“‘把关人’已经成为报纸和其他传统媒体运营的关键角色,以岗位角色定位和流程规范为基准、行使内容‘把关权’为核心的把关活动已成为传统媒体新闻人的高度自觉。”^[4]

但是网络空间内自媒体的勃兴,对传统新闻的把关机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首先,自媒体数量庞大,虽然仍然受网络平台的管理和内容主导机构的影响,但是自媒体拥有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中心化的控制,形成了节点化传播模式,即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制作和传播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了编辑部,就掌握了信息传输和意见形成的龙头,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管理部门很难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想说些什么,当然也很难判断闸口应当设在何处。其次,社交媒体的病毒性传播使得网络舆论的形成速度以指数级别增长。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通过报纸等爆出加上受众反馈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滞后,舆情事件当事者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设计应对方案。但是在社交媒体语境下,“行动和反应几乎同时发生”,麦克卢汉的总结是“我们似乎生活在神奇的一体化时间中”^[5]。这意味着社会热点事件的发生往往由网友直接发布、朋友圈即时讨论和转发,网络舆论可以在电光石间瞬时生成。传统的先调查再公布、甚至先压制住相关信息再寻求解决方案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这种变化。最后,传统媒体时代存在着有组织的责任主体,他们通过相关法规以及职业规范对自己的生产负责,同时也进行了严格的事前核实和检查。但是在自媒体时代,特别是在网民媒体素养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这种责任意识和把关能力尚未形成,传统媒体力图建构的真实、公正、理性的舆论氛围受到了冲击。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若有不利遭遇,若通过报纸、电视反应情况,媒体会依据公正性原则下进行全面调查访问,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他们则会直接把自己的际遇和感受发布到网络空间,我们很难期望他们还能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态度。而这往往引发非理性情绪的吸聚效应,使网络舆论呈现出非理性状态。

(三)网络舆论的脱域化传播使得其时空控制难以实现

在前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都是区域化的,受空间的控制。也就是说,如果当地发生了热点事件,只要当地媒体没有公开报道并引发其他媒体转发,由于知道消息和提供消息的人只有在

某个具体角落里面交流,其舆论效应只会当地发酵。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机构只要将热点事件的信息传播及其谈论压缩在特定空间内,其舆论影响就会被消解在特定的社会角落。这是世界未被网络全面连接时空分割所造成的舆论有效管理的条件。但是互联网的产生,则通过开放互联将世界真正压缩成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即信息的产生和传播,特别是意见的表达在理论上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这意味着,如果当地发生热点事件,很容易就会有网友直接通过自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传播出去,进而在整个互联网络空间发酵,使得某人所做的某事,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的热点。这种脱域化的舆论形态,使得禁止型舆论管理特别是地方机构的禁止型管理难度加大。这是因为网络用户不再仅仅是地方媒体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是跨越地域的。他在当地所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可能是通过注册地为北京、上海的网络平台上传播,而转发和评论该事件的网民,可能仅有1/10的为本地网民。这种舆论形态超越了国家和地方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的权限。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是有着明显的时间节奏的,报纸基本上是每日出版一次、电视和广播新闻最快也是整点节奏。只要控制住其截稿时间,舆论的生成过程可能就会中断。正是基于这一节奏,美国总统新闻办公室经常在截稿时间之后发布新闻,以阻碍新闻内容的顺利传播。但是网络即时传播的特性则使得舆论管理摆脱了时间节奏,成为全天候的事务。研究证明,网络热点事件传递效率最高的时间段为晚上11点到夜里1点之间,但是不排除其他时间段为热点舆情累积注意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朝九晚五的舆论应对体系已经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有全天候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的决策机制。而这,需要对当前的新闻舆论管理工作进行系统的调整。

二、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改进的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管理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很多是社会治理层面出现的问题,使得矛盾爆发而成为社会热点,要解决这些问题,调整社会治理手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当是新闻舆论管理工作做好的前提。但是其间也有很多属于新闻宣传管理不到位、管理政策落实不充分、执行不深入,特别是不适合互联网舆论生成模式的变化。这就需要新闻舆论管理部门探寻科学的管理途径、找到适宜的管理办法、梳理顺畅的管理渠道,打通网络舆论管理到达受众的最后一公里的路程。

(一)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打造主流舆论引导新阵地

面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于舆论引导阵地的重构,党中央非常重视新媒体阵地建设和全媒体宣传格局的形成。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这是党中央再次对推进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发展发出的政治动员。在人们接受信息、发布内容和交流沟通完全以互联网为主的情况下,如果主流媒体还抱着传统内容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不与人们的信息接收和转发路径融合,网络舆论管理工作就会变得南辕北辙。正是因为如此,推进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发展不仅是个业务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在Web 3.0条件下推进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发展,需要着力解决3个问题,第一是定位问题,要理清全媒体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近年来各级主流媒体都在推进媒体融合,但是成功的模式不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定位不准。有的以经济收益为目标,有的以扩展渠道为目标,有的甚至做成了形象工程。当然有的目标非常重要,但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目标,当是成为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通道。以此为目标,可以发现媒体融合的许多空间和领域,比如网络问政、比如建议献言、比如公共服务。目前主流媒体在此空间开掘不足。

第二是改革理念,真正按照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学界公认,互联网带来了平等交流、共享互助的传播理念,但是当前部分新闻生产管理部门始终不能放下架子和面子,仍然以传统的会议新闻模式报道主流新闻内容,而且不能接受不表扬的评论,基本上对于网民的评论不回应不互动,结果使得这些平台有了框架没有内涵缺少流量。

第三是建立多维度的发展框架和多素养的人才队伍。基于传统媒体竞争时技术条件相同的市场格局,传统媒体始终认为内容为王,而忘记了新媒体技术条件的多层次化,以及新媒体内容产品往往是创意、技术和渠道的有机结合。只有将创意、技术和渠

道优化组合,才能完成真正的新媒体产品,也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二)通过公益性传播管理使正面舆论引导占据主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说明,在推进媒体融合,强化主流舆论阵地的基础上,强化新闻舆论管理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在中国已经拥有 544 万个网站,8 亿多网民,网络新闻用户近 7 亿,网络直播用户 4 亿多,特别是重要社交媒体平台掌握在商业公司的前提下,仅仅靠自建平台已经远远不能实现网络舆论管理的目标。在商业网络平台坚持正面宣传占据主导地位,是网络舆论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调整网络舆论管理思路,在建设自有平台的基础上,对于商业网站进行分类指导和法制化管理。其思路可以调整为,不再简单地将媒体平台分类为公益性平台和商业性平台,这既不符合具体运营状况更难以发挥管理效用,而是依据内容的提供将网站内容分为公益性内容和商业性内容。针对商业网站,可以提供相关优惠政策,要求并激励其在网页显著位置提供由各地新闻宣传管理部门指定媒体生产的正面宣传内容,这些内容作为要求商业网站和社交媒体作为社会责任来承担,同时对其产生的成本进行经济补偿。而主流新闻媒体则需要根据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社会的迫切需要,生产内容精致、传播高效的主流权威内容。党委宣传部门可以成立相关的评议委员会,对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和商业网站的公益性宣传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向相关部门提出政策优惠建议。

与过去基于自有平台开展的新闻舆论管理工作不同,充分利用商业平台提高正面舆论的到达率和覆盖率,是解决网络舆论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网络平台中,在当前主流媒体的发展状态下,自有媒体的覆盖率始终只在整个网络空间占据部分的位置,而商业平台往往处于核心平台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仅仅在 App Store 创建了新闻客户端,怎么可能获得超越 App Store 的流量?主流媒体仅仅在新浪微博开设了官方微博,怎么可能拥有超过新浪微博平台的影响力?主流媒体仅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设了服务号,仅仅可能吸引到超过微信平台的注意力?主流媒体仅仅开设了头条号,怎么可能比头条平台获得更多用户?建设自有媒体是成

本较高但是收益并不充分的管理模式。如果把正面引导舆论的要求和激励措施直接施于商业平台,由商业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更快捷地使主流内容找到自己的目标受众,从而打通主流内容流向网民的渠道。

(三)提高宣传质量优化信息结构,促进主流舆论内容的自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需要从 3 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新闻正确舆论需要通过提高传播力、引导力等方面的效果才能实现,效果是判定新闻舆论工作实效性的根本标准。其次,当前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在针对性和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方面还有待提高,其成效并不令人满意。最后,党中央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新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新闻舆论管理部门进一步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提高新闻传播效率。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层面做了诸多创新,起到了良好效果,如 2017 年推出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等累计点播量突破 2 亿人次,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制作的《我们一起走过》,为受众讲述了 107 个典型故事,播出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但是目前总体而言,我国主流媒体的内容多是单向度的传播,对受众积极转发和评论的吸引力不足,传播力不足。而这就需要新闻生产管理部门调整话语形态、探寻适合网络传播的内容制作规律。

提高主流话语的传播力,一是需要主流媒体优化内容结构、丰富产品类型、扩展服务领域,特别需要在舆论监督和网民评论领域强化服务能力。近年来我国部分新闻舆论管理部门误以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是坚持表扬、压制批评,不仅损害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压抑了主流媒体工作者的积极性,引发了受众对新闻舆论管理科学理念的不信任感,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失序事件的定义权和建议权,使得部分网民对某些事件任意发挥。做好新闻舆论管理工作,需要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上公布事实、明辨是非、澄清利害、讲清大局、揭示趋势,但是现有的管理模式恰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二是改进表达方式,当前的正面引导舆论主要集中在成就报道、经验报道等领域,虽然换了很多种产品制作模式,但是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习惯于概念和数字等宏观性的描述,而无法解决这些内容与网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无法说明对用户来说

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主流媒体在内容制作过程中着力解决,只有真正打动人心、说明利害、提供资讯,即按照新闻本质来说能够消除人们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主流内容才能变成网民爱阅读、爱转发、爱评论的内容,主流舆论才能在网络空间流动起来,从而入脑入心,进而转化为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

[2] 喻国明. “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6).
[3] 喻国明. 超级个体与利基时空: 一个媒介消费研究的新视角[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12).
[4] 杨清波. 网络媒体的内容把关和舆论引导[J]. 当代传播, 2009(3).
[5]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1.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吕志远)

[1] 徐世甫. 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缺场生成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11).

Getting Through the Last Kilometer

——the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of How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s of Network News

DENG Shuaijie

(Any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 Adhering to correct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s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news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especially the self – media and social media, however,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activation of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makes the dominance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harder; difficulty in web content control increases because of the self – support of productio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o take off the domain of communication makes the space and time control difficult to achie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get through the last kilometer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media integration, build a new front for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ake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ake the leading position through public welfare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improve publicity quality and optimize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self – prod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content.

Key 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social media; omnimedia development

融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韩燕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分析融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特征、舆情演变过程,提出高校要从五个方面做好应对:建立预警机制,做好网络监管工作;掌握舆论主导权,积极发声;整合资源,建立多媒体、多功能的信息发布平台;更新理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媒介素养,加强教育引导;等等。

关键词:融媒体;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8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88-04

一、引言

《Technologies of Freedom》(《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最早提出“融媒体”(media convergence)概念。即利用各种媒介载体,将报纸、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不同媒体进行充分而全面的整合,实现资源融通、内容兼容、形式交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各种媒介博采众长,新闻报道形式更加“丰富化”、内容更加“多元化”、传播载体更加“多样化”,新闻报道的速度、传播速度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提升。技术革新是把“双刃剑”,近年来,在爆发的突发事件中,以微博、微信、QQ、移动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依靠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内容碎片化的特征,对突发事件进行了及时、多角度的报道。但是也带来了突发事件报道虚假性、误导性、情绪化等诸多问题,容易形成网络舆论。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6小时。微博、微信、QQ、抖音、头条等新媒体被广泛使用,而这些媒体更为当代大学生所青睐。大学生学历高、知识丰富、网络互动性高,但社会阅历不足、经验缺乏,容易陷入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论中。高校突发事件一经网络传播,很容易演变为网络舆情,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师生的正常学习、生活。所以,研究新形势下高校突

事件网络舆论引导策略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融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特征

(一)传播者参与度高

高校网络舆论传播者主要是大学生,属于知识层面高、思维活跃人群,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并且有很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融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参与到学校建设、校园文化、校园热点等方面,打破了学校掌握绝对话语权的传播模式,成为高校突发事件的传播主体。

(二)传播内容随意性、情绪化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可以即时发布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复合形式的舆论信息,把关人的缺失,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态度和意见。尤其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件,学生在网络中活跃度更高,但大学生自控能力较差,道德标准模糊,容易夸大突发事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使高校突发事件在传播中舆论泛化,增加舆论控制的难度。

(三)传播渠道更加多样

如今,传播媒介呈现多样化态势,尤其是以微信、微博、QQ、抖音、头条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成为大学生发表言论的主要平台。这些打破时空限制、交互性强的媒介平台,一旦突发事件发生,信息会得到迅速传播,迅速成为一个舆论中心。

收稿日期:2019-06-18

作者简介:韩燕飞(1985—),女,河南焦作人,新闻传播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

(四)传播对象思维活跃,从众心理明显

高校突发事件主要影响群体是大学生,他们比较活跃,好奇心强,但是思想单纯,容易冲动,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比一般人更强烈,情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另外,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往往不能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从众心理明显。

(五)传播效果范围广,影响远

融媒体背景下,依靠手机、PC 终端,通过微信、微博、贴吧、QQ 等平台,学校突发事件会迅速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传播。在校师生接收信息迅速,转发、跟帖较快,网络舆论传播范围扩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急切关注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一旦处理不好,容易造成网络舆论漩涡,并会引起社会关注,从而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及在社会中的形象。

三、融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舆情演变过程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所谓“沉默的螺旋”是指个人公开表达意见时,为避免在交往中陷入孤立,会对周围意见气候进行评估、判断。当发现个人观点与优势意见趋于一致时,他们往往会主动积极地表明本人观点;反之,他们会根据意见气候自动调适并选择“潜水”观望或以言徇物。^[1]由于突发事件事发突然,在开始阶段,学生很难获全信息,主要通过观察意见气候采取的信息,评估自己的观点,采取沉默或表明观点。另外,由于个体对于社会孤立的恐惧感,个体会受到群体带来的压力,使得学生会按照网络社区的主流观点来发表观点。

前期: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很短时间内由知情人在网络上爆料,引起学生群体的关注转发。在此阶段,信息相对少,传播范围也较小,学校还没有发布官方消息。尤其当突发事件与学生利益无关时,学生群体中,参与主体少,“潜水”关注的多,参与讨论的少,转发猜测的多,许多学生往往选择沉默,此时少数意见往往代表主流意见。

中期:信息不断多样、丰富,不利因素逐渐显现,突发事件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置。由于思想观念不同,关于突发事件,网络上形成不同的舆论场,并且通过相互碰撞,形成新的意见气候。大学生根据新的意见气候,作出判断,选择沉默或者发表言论。优势意见在快速传播中,意见变得更为丰富、饱满,并最终以动态的形式成为舆论主导。

后期: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处置,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原因逐渐明朗,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获得公众普遍认可,网络舆论也逐渐淡化。

高校学生传播媒体目前以微博、微信为主,线下熟人关系搬到线上,在高校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由于群体压力、从众心理驱动,学生在表达观点时候对舆论正确与否容易忽略判断,缺乏理性,只是对“优势意见”的趋同与选择。而如果“优势意见”偏离主流价值或者表达失真,会影响到突发事件处置、网络舆情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四、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一)建立预警机制,做好网络监管工作

虽然很多突发事件不可预知,但是仍有一部分突发事件是高校内部矛盾长期累积得不到解决而爆发的。当代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增强,对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会通过网络形式进行发泄,因此高校要下大力气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充分利用新浪“舆情通”等商业舆情平台的舆情监测、预报、追踪等功能,广泛收集新媒体平台上有关社会和校园的最新、最热信息,把握好舆论风向,通过挖掘、汇总学生普遍关注的敏感、热点话题,分析出大学生思想的异常动态,及时处理负面舆论趋势,防止矛盾激化。还要密切关注并主动收集广大师生对于学校工作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对贴吧、微博、微信、QQ 群等学生关注比较多的平台进行舆情监督和预警,从源头上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高校可以建立专门的舆情监督部门,要求网络监察人员定期审核、排查官方网站、官方微博、论坛,牢牢掌握主动权。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舆情预警工作带来了便利。高校应加大资金、技术投入,自建或购买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及软件,构建舆情实时监测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搜索引擎,依托大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征兆、苗头,评估事态的发展趋势,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扼杀在萌芽阶段。

(二)掌握舆论主导权,积极发声

1. 及时介入,做好舆论引导

快速反应,及时介入是应对网络舆情的关键。过去媒体应对舆论有“黄金4小时”之说,现在这个时间点要缩短为1小时甚至更短。^[2]融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爆发后,会即时通过网络播出,渐渐形成一个小舆论场。高校越早介入,越能将事态控制在掌握之内,有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突发事件刚爆发时,信息不完善,关于事件存在很多猜测,也正是谣言泛起的时候。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

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引导人们关注哪些事情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3]高校在遇到突发事件后,要重视“首发效应”,提供议程设置,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将主流声音第一时间进入公众视野,引导舆论走向。

另外,应对网络舆情,要重视“前10效应”。“前10效应”指对网络上出现的某些新闻或社会现象,前10位网民的意见和评论决定了后续的数十甚至成百上千的意见和评论的内容与态度,从而形成网络舆论。^[4]高校要主动筛选和培养有思想、敢发声的优秀学生干部充当“意见领袖”,面对突发事件舆论,能够统一口径,积极发声,能主导网络舆情的意见气候,形成“优势意见”。

2. 公布事实,勇于承担责任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在《Crisis Management》(《危机公关》)一书提出3T原则,强调危机处理时把握信息发布的重要性。高校是社会公共单位,面对突发事件,公众有知情权,高校有义务及时公布事情真相。信息公开透明,才能减少公众的猜疑,防止出现舆论乱象。通常突发事件爆发后,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调查出事件发生原因,此时,高校要本着快报事实、慎报原因、重报态度的原则,统一宣传口径,动态公布事件进展,满足公众知情权。

知名危机公关专家、关键点公关董事长游昌乔先生提出“关键点危机公关5S原则”,其中两条是承担责任原则、真诚沟通原则。高校作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方,对于高校突发事件都应该负有一定责任,所以面对突发事件,高校要直面危机,勇于承担责任,这样才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谅解。同时,在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舆情引导时,用语必须亲切,用网络语言与网民进行平等交流,忌用官话、套话,以免造成网民的反感,造成负面影响。

3. 正面宣传,做好善后工作

在网络舆情消退期,虽然舆情逐渐恢复平静,但稍有不慎则会复燃,造成衍生事件。高校要做好突发事件善后工作,对突发事件相关人员做好安抚及跟踪评价,使其尽快步入正常的学习轨道。

宣传部门要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事件说明,加强正面宣传,尽快恢复学校形象和名誉。

(三)整合资源,建立多媒体、多功能的信息发布平台

1. 做强、做好高校官方信息发布平台

官方网站是高校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权威渠道,高校要做好学校门户网站的建设工作,提升整体的论坛能力。这样,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学生乐于从

官方网站获取信息,避免在网上道听途说、信谣传谣。这就要求高校提高整体的网络编辑能力,做好论坛管理工作,提升网站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简称“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网民沟通对话的新通道和重要舆论场所。目前,高校大都开通了“两微一端”平台,要加强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的联动,形成传播矩阵。凭借微信用户范围广、微博信息传播广、客户端权威声音高的优势,高校要强化“两微一端”在舆情应对方面的影响力,使其在第一时间传递正声音,集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氛围,将网民引导到正确舆情方向上来。

2. 整合学校二级学院媒体平台

打通学校媒体和二级学院媒体,整合现有资源,形成一个官宣为主、其他为辅的多头发声的传播矩阵。除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高校中每个学院几乎都开通了学院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虽然粉丝量有限,但因为是本学院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渠道,因此本学院师生关注度高,在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要做好二级学院媒体平台备案,明晰各平台负责人及编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统一口径,第一时间在各平台发布信息,迅速扩散到师生群中。

微信群、QQ群作为日常班级师生沟通的主要渠道,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作用不容小觑。要建立从学校到各学院辅导员的信息通道,通过微信群、QQ群加强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舆论动向,引导学生舆论走向。

3. 根据媒体特点,动态进行报道

融媒体时代,我们要根据媒体各自特点,选择相应的载体表现形式和发布时间。面对突发事件,首先在信息公布上要抢占时机,利用网络媒体的有效性,努力抢占舆论制高点。“两微一端”、官方网站应秉承“重报事实、慎报原因”的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情真相,并随着事态发展,动态进行报道,满足师生急于知道事情真相的心理。通过网络媒体平台交互性强的特点,加强与师生的交流与互动,积极回应师生的疑问,拉近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使信息更加透明,抢占舆论宣传的话语权、主动权,避免谣言传播。

待突发事件基本情况调查清楚后,学校报纸、报刊等传统媒体应发挥其权威性特点,可以从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态度、措施,事件发展的起因、结果等设置选题,进行深度报道,将真实权威公正的信息传

递给师生。

(四)更新理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1. 打造一支理论知识、专业技能过硬的宣传团队

应对突发事件舆情,高校宣传部门责无旁贷。融媒体时代,高校宣传团队要同时“玩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类媒体在内容要求、传播、发布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特点,要求高校宣传团队要真正弄懂、弄通新旧媒体,尤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结合新旧媒体特点,编辑新闻发言稿,对外发声。因此要定期开展业务知识培训,邀请专家前来做讲座,增强宣传团队的整体业务素质。

2. 建立一支独立的应对突发事件评论员队伍

除了专业的宣传团队,学生也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尤其是在新媒体运用方面,学生具有先天的优势。善于从学生干部、学生社团负责人中挑选、培养网络舆情参与度高的优秀评论员,建立一支包含高校宣传部门、学院辅导员、班级班干部在内的评论员队伍,在应对突发事件舆论时,能够充当意见领袖,共同参与舆情信息共享和舆情事件引导工作,发挥中坚力量。定期通过开展讲座、举办论坛等形式进行培训,提高队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可以增强教师、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五)提高媒介素养,加强教育引导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影响范围的关键点在于大学生,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是防止网络舆情恶化的重要手段。融媒体时代,大学生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高校在学生入学前,可以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加强新生网络舆情教育和培训,同时可以通过讲座、班会、散发传单等形式,向大学生讲解网络舆情案例、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及如何正确参与网络舆情。让大学生明确中央网信办等新媒体主管部门对微信、微博等媒体的管理要求,加强学生法

律法规教育,从而使学生了解作为传播者,尊重客观事实,尊重个人隐私,尊重社会公益,尊重国家利益;作为受众,要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对于网络传播内容要有辩证思维和批判思维。

另外,教育引导学生认清新媒体传播规律,正确认识“沉默的螺旋”理论下的优势意见,是在群体压力、从众心理影响下形成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要增强辨别能力,不信谣传谣。积极倡导大学生树立高校网络舆情危机意识,面对网络舆情要主动出击,正面引导,努力营造健康、和谐、清朗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融媒体时代,高校要善于借助技术带来的便利,大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占领好主流舆论宣传阵地,面对突发事件,积极作为,真正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构建良好的校园网络舆论生态。

参考文献:

- [1]毛宇锋.“沉默的螺旋”理论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机制[J].中国成人教育,2018(9).
- [2]刘媛.网络视域下高校公共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策略[J].高等教育在线,2016(10).
- [3]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2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4]李良荣,于帆.网络舆论中的“前10效应”:对网络舆论成因的一种解读[J].新闻记者,2013(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Guide Strategy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e Age of Integration Media

HAN Yanfei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media integration, putting forwar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work on the following give areas: establish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do a good job in network supervision, master the domin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actively sound,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multi-media and multi-functional information release platform, renew the idea and strengthen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media literacy and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guidance.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university emergenc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纳入学生培养全过程的探索

汪 菁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在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结合不同教学环节和不同课程,有目的地加强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经过土木工程安全认识和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的培养阶段、形成阶段和巩固阶段,树立学生牢固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有效提高土木工程项目的安全性,杜绝土木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土木工程;安全;意识;专业;学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19

中图分类号:TU714;G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92-04

土木工程项目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性,体现在投资额度大、不可移动以及对环境和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也对土木工程的安全性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普通的土木工程事故往往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的工程事故还会伴随重大的人员伤亡,并造成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土木工程是一项包括勘察、设计和施工等综合性很强的工程技术活动,涉及钢材、混凝土等多种工程材料技术和勘察、设计、施工组织与管理等生产技术活动,具有覆盖面广、技术环节和从业人员多等特点,造成了土木工程安全事故容易发生、安全控制难度大、事故危害严重等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是未来从事土木工程技术活动的骨干,如何把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的培养与专业知识教育结合起来,值得探索。

一、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是土木工程安全的保证

土木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缺失是关键。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W. H. Heinrich)认为,工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98%可归纳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以占到88%,物的不安全状态只占到10%。

工业事故主要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引起的。人

的不安全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人的心理特征相违背的行为,属于非正常的行为,具体表现在不安全的动作、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等现象。

安全意识是人在大脑中形成的生产必须安全的观念,是对各种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的外在条件的戒备警觉的心理状态。在土木工程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尤为重要,良好的安全意识,可以使从业人员具有工程安全的自觉性,有效保障土木工程各项技术活动的安全,从而实现土木工程整体项目的安全。

二、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安全意识培养的必要性及存在不足

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是保证土木工程项目安全的基础。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是未来土木工程行业的主力军,如果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能形成牢固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土木工程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意识与客观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的头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人的意识不是先天固有的。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安全意识是一个由认识、感觉、心理到意识的复杂过程。

在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系统的专业学习过程中,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汪菁(1964—),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从事建筑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把土木工程安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结合多门课程和多个教学环节有目的地实施土木工程安全意识教育,可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

学校在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方面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土木工程安全教育的系统性不强。土木工程专业保证工程安全的概念存在于人才培养的多个环节,在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中都有关于工程结构安全的概念、理论和措施等内容,如工程力学中的平衡、强度和稳定,专业课程中的概率极限原理和安全储备等。但教学实践中通常将工程安全作为专门知识内容利用课程的形式实施,落脚于保证安全的规范、规程与措施,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形成系统性,导致学生对工程安全理解的片面和不连续,不利于安全意识的形成。

二是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人文教育不到位。工程实践证明,责任心不强、安全意识淡薄和麻痹大意是造成工程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环节的腐败漏洞也是造成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土木工程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由于利益所驱,建筑行业的腐败时有发生,如招投标中暗箱操作、滥用发包权、行贿受贿、非法转包工程、弄虚作假等,造成施工质量粗劣、偷工减料、材料以次充好等。因腐败引起的建筑质量安全事故不容忽视,在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有目的地开展人文教育,使学生敬畏生命、敬畏法律,自觉抵制各种非法诱惑,在内心深处形成遵纪守法的防线,将有效降低土木工程安全风险。

三是对土木工程安全没有从感性认识形成理性认识。在土木工程专业教育中,没有将安全教育贯穿于专业学习的各环节和课程,使得学生对土木工程安全的理解是感性的。如技术要求只是技术要求,规章制度只是讲规章制度,没有完全弄懂吃透,只是机械地执行要求,不能主动地在设计与施工及管理活动中把保障土木工程安全上升到行动和思想上的自觉。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安全意识的培养,是在系统专业学习过程中,结合不同的课程和教学与实践环节,使学生从直观认识逐渐形成系统理解和理性认识,最终形成头脑中固有意识,把保障土木工程安全的自觉性落实到土木工程具体活动中。

三、将土木工程安全意识教育纳入学生培养全过程

(一)安全意识的组成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可以由技术安全意识、管理

安全意识和法律安全意识组成。

技术安全意识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以技术保障安全的意识,是科学的安全观。通过对技术与安全关系的深刻理解,从科学的范畴认识理解技术是保证土木工程安全的基础。形成尊重科学、依靠科学的自觉性,是土木工程安全的技术保障。

管理安全意识是在管理活动中的安全意识,土木工程管理包括计划决策、组织协调和控制等活动,其主体是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管理者安全意识决定整个工程活动的安全性。土木工程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体现在严格执行标准和制度的自觉性,是土木工程安全管理的保障。

法律安全意识是以遵守法律为底线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土木工程活动中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约束,只有坚守遵纪守法为底线意识才能确保土木工程活动的合法合规,避免不正当利益交易等违法行为发生,是土木工程安全的法律保障。

(二)安全意识培养的四个阶段

土木工程人才培养包括基础课、专业课、课程实践和专业实践等环节。在土木工程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把土木工程安全意识作为一个完整的线条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充分利用人才培养的不同环节,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安全意识,使学生从对土木工程安全的认识开始,经过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阶段、形成阶段和巩固阶段,最终形成较为牢固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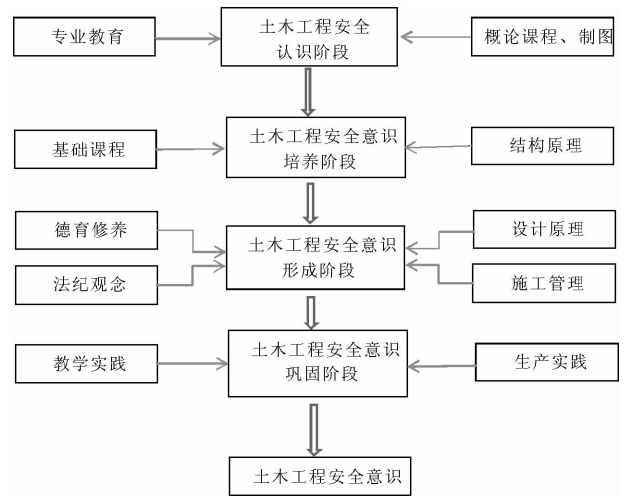


图1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的形成

1. 土木工程安全的认识阶段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认识阶段是使学生对土木工程安全有初步的认识,了解土木工程安全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充分认识到土木工程从业人员在保证土木工程安全上所承担的责任。

在新生中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学生预防各类安全风险的意识,提高一般风险处置能力,做自己安全的主人。大学生只有首先成为自己安全的主人,才能担负起保护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这也是培养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的基础。

利用土木工程典型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入专业教育和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是学生了解专业现状、发展前景、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的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环节,有目的地向学生介绍土木工程抵御各种自然风险的作用以及人类同各种灾害抗争的努力。利用不同类型的土木工程事故案例,特别是重大土木工程安全事故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以及人类在事故中的渺小无助,使学生充分认识从业人员的麻痹大意、违法违规对土木工程安全的影响,让学生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深刻意识到自己在未来所担负的责任。

使学生了解自己未来工作与土木工程安全间的联系。结合专业基础课使学生认识自己在防范土木工程安全事故中的作用。如学生通过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认识到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图纸中的一丁点错误都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甚至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使学生认识到土木工程安全就掌握着自己的手中,自己是保证土木工程安全的主人。

2. 安全意识的培养阶段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阶段是发挥课程教学作用的重要阶段。学生在学习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掌握土木工程安全的基本原理,了解影响土木工程安全的因素以及牢记土木工程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提高学生土木工程安全的思想认识。

专业基础课和结构原理课程是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要载体,通过专业基础课和结构原理课程的学习,逐渐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使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安全对土木工程的重要性。将安全意识的培养引入到力学、测量、建筑材料等专业基础课和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结构原理课程,培养学生掌握保证工程安全的专业技术能力。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作风。可以利用力学课程的精确计算、平衡原理,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结构安全的概念。例如材料力学课程中保证结构和构件正常工作的强度条件、刚度条件和稳定性条件,是工程结构正常工作的基础。使学生认识到结构安全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单个杆件的破坏能造成杆系的破坏,懂得单个杆件安

全是保证结构系统安全的基础,为学生建立土木工程安全的清晰概念并使其对结构安全有直观认识。通过测量课程中误差的传递与积累,认识到小的差错如何可以引起大的危害,使学生懂得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作风的必要性。

认识土木工程安全的复杂性。通过建筑材料课程的学习,学生了解工程材料的不稳定性以及选用的合理性和检测量的准确性对土木工程安全的影响,认识不同课程中安全知识储备的必要性。如混凝土结构原理和钢结构原理等课程,均分别针对材料的特性、破坏形式和连接失效等问题而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保证结构构件安全,使学生较全面地认识到土木工程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充分认识保障土木工程安全的难度。

3. 安全意识的形成阶段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把工程安全作为一种专业自觉,是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形成重要表现。这个阶段就是让学生充分理解影响土木工程安全因素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把土木工程安全同专业技术结合起来。

建立土木工程整体安全概念。利用结构设计原理、施工设计、施工组织和施工管理等课程,将前期学生所掌握的对土木工程安全的认识有机整合,形成土木工程整体安全意识。如通过工程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能使系统掌握常见的工程结构的计算原理和设计方法,构造要求是从不同角度设置的保证土木工程安全的补充措施,设计规范、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等有效保证了土木工程项目各环节的实施,这样可以较全面地认识土木工程安全保障体系。

有针对性地开设工程安全相关课程,提高学生的专门知识。如土木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课程,通过向学生介绍大量工程质量事故产生的原因、预防措施,增加学生预防土木工程安全事故的能力。建设工程法规课程涵盖建设工程基本法律知识、施工许可、工程安全生产、工程发包、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工程质量、施工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等方面内容,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在今后工作中能知法、守法、用法。

加强人文教育,培养人文精神。在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开设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哲学、文学、法学等人文教育课程,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有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自觉把保护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崇尚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拥有严谨的工作作风,严

格执行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尊重法律,形成的抵制腐败的自觉力量,杜绝土木工程行业中的腐败现象,消除土木工程安全隐患。

4. 安全意识的巩固阶段

通过高年级的实践教学环节,结合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巩固学生的工程安全意识,时刻把土木工程安全放在首位,使土木工程安全成为学生专业活动的思想自觉。

结合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同学们掌握了土木工程(土方工程、地基基础、模板、脚手架、施工机械、防水工程,抹灰工程等和各种常见结构)建设全过程的施工方案、施工方法、施工组织计划、工程质量管理 and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安全保证措施、项目风险预测与防范,全面了解土木工程各生产环节保障工程安全的一些标准、规范、规程及工法。毕业设计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除运用所学专业技术基础知识,还要具备正确使用国家规范、条例和规程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同学们掌握了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结构选型以及结构布置、构件和结构的设计计算,以及构造措施。通过实习和设计,学生对学校学习中所掌握的安全理论基础和形成的安全意识得到验证性的提升,实现由认识、实践到再认识的过程,使学生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更加巩固。

四、结束语

在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加强土木工程安全教育,树立土木工程安全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可以有效提高土木工程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降低土木工程安全事故风险。充分利用土木工程专业培养的循序性、连贯性、系统性,有效树立学生的技术安全意识、管理安全意识和法律安全意识,在土木工程活动中自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确保土木工程安全实施。

在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过程中,一是要建立清晰的安全培养主线,将不同教育教学环节和不同课程中的安全理念、安全措施和安全规范有机联系起来,实施全过程的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使学生对土木工程安全在技术、管理和法规等方面建立整体性理解和认识,最终形成牢固的安全意识。二是做到全体教师参与安全教育,每位教师都要重视土木工程安全教育,理解对学生开展土木工程安全意识培养的意义,自觉营造一个良好的土木工程安全培养环境,以实现对学生工程安全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30-335.
- [2]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编.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Safety Awareness in Civil Engineering in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WANG J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ivil engineering – majored students are the backbone of future civil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for college students,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safety awareness in civil engineering in diverse teaching sessions and courses. Through the nurture, 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safety in civil engineering, the following civil projects will be carried on in a safer way, and accidents in these projects can be exterminated.

Key words: civil engineering; safety; awareness; major; students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姚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教务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新工科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探讨了新工科视阈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定位和途径问题,分析新工科院校的教育现状,剖析其教育改革的困境,构建多维度的系列改革措施,广泛应用于人才培养,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良好。

关键词:新工科;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0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096-06

一、引言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教育部提出:高校要对学科专业实行动态调整,大力推动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高校有效提升专业性人才综合素质和集成化能力培养,形成教育与社会集成发展战略的核心优势,增强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国家战略,2017年2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新工科的出现建立在新兴经济、新兴产业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新职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而学科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的载体,必须顺应发展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新工科”的“新”是要培养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为此,地方高校必须走出学术导向的传统办学模式,着眼于努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路径的研究迫在眉睫。就现实状况而言,新工科建设无论是对于传统优势工科院校,还是立足于地方发展的一般工科院校,都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因此对于工科院校,尤其是地方工科院校,要做好新工科的建设,实现新工科建设的目标,就必须准确理解新工科建设的思想内涵,找准自己的定位,设计出符合自身院校特色和发展思路的新工科建设蓝图。

本文通过对“新工科”理念的深度剖析,提出地方工科院校新工科建设的具体举措。主要研究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问题,重点研究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所需人才的地方新工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改革举措的问题。

二、“新工科”的内涵

(一)何为“新工科”

“新工科”针对传统工科发展存在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违背,人才输出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等诸多问题,在传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上凸显了一个“新”字。“新”即新结构、新质量、新理念、新模式、新体系。“新工科”旨在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特征表现为战略型、创新性、系统

收稿日期:2019-06-1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资助项目“新工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17SJGLX506)

作者简介:姚瑶(1982—),女,湖南保靖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务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和高等教育。

化、开放式。“新工科”，“工科”是本质，“新”是取向，那么在兼顾“工科”的同时，如何阐释“新”、怎样实现“新”？可以理解为，在传统工程学科的基础上引入了新思路、新元素，并推动该学科的发展，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需求^[2]。“新思路”和“新元素”是重点，用什么样的“新思路”引领地方本科学校的人才培养，添加什么样的“新元素”？首要任务要明确目前社会的人才缺口是什么。

表1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统计(人才总量/人才单位:万人)

序号	十大重点领域	2020年		2025年	
		人才总量预测	人才缺口预测	人才总量预测	人才缺口预测(个)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800	750	2000	950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750	300	900	450
3	航空航天装备	68.9	19.8	96.6	47.5
4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118.6	16.4	128.8	26.6
5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38.4	6	43	10.6
6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85	68	120	103
7	电力装备	1233	411	1731	909
8	农机装备	45.2	16.9	72.3	44
9	新材料	900	300	1000	400
10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80	25	100	45

从表1看出,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人才缺口预测达到950万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人才缺口预测达到450万个,新材料领域的人才缺口预测达到400万个。

三、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新工科的大环境下,大部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遇到诸多问题。

(一)教育理念不够“新”,人才培养定位模糊

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是本科教育的主体部门。办学定位是导向,地方本科院校应明确其人才培养定位重在“立足地方”,根本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质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但目前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不准确,工程教育理念不够明晰。尤其是在确立本校的办学类型和人才培养层次的定位上表现得“不伦不类”,拼凑明显,并且在如何把培养目标落到实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例如,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完全结合校情,缺乏对自身办学条件、办学特色的充分考虑,在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方面显得畏手畏脚。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对“地方性”“工程教育”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未做到深层次挖掘地方经济需求,未曾考虑到本校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培养的人才社会不需要,出现“学生毕了业就失业”的尴尬局面。其二,在于地方本科院校往往是新建的本科院校,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缺乏对地方高校工程教育

(二)社会人才需求预测

《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教职成[2016]9号)提出,到2020年形成与制造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建设格局,重点推进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改革,加快实现产业和教育深度融合。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参见表1所示。

的建设经验,故而存在盲目“照搬照抄”的现象,对本科教育成熟的重点高校实施“拿来主义”,导致人才培养缺失特色,出现教学实施模式同质化,“邯郸学步”,丢掉了专业优势。

(二)专业设置缺乏前瞻性、科学性

科学的专业设置决定着一所高校人才输出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河南省本科院校开设工科专业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工科门类专业下共有31个专业类,加上特设专业共有212个专业。经调研河南省55所本科高校(包含民办院校),45所高校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占整体的81.82%,位居第一;36所高校开设电子信息类专业,占65.45%;32所高校开设土木类专业,占58.18%;30所高校开设机械类专业,占54.55%;28所高校开设电气类专业,占50.91%。相反,力学类、水利类等专业的覆盖率不足4%。可见,学校开设专业类覆盖不均衡。另外,50%以上的高校申请了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60%以上的学院申请了物联网工程、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从统计数据来看,地方高校之间开设专业的重复性过高。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关注了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可是仍然存在通病。重复性和稀缺性共存,特色专业不成体系,与地方经济发展脱节。大部分工科学院尤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有着专科建设基

础,升本之后,在“转型”之际遇到瓶颈,例如过分强调“本科意识”,往往热衷于追求“高大上”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定位向一流大学看齐,课程体系“条块化”,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授课难度都热衷于学习研究型大学培养模式,过于关注学生的理论知识传授,片面追求考研率,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培养。

(三)课程体系内容过于“标准化”,缺乏特色化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第一,随着高校纷纷“综合化”,许多工科院校正在或已经失去原来的特色和优势,工科教育也更趋“标准化”。目前高校升本后立马对焦几年后的合格评估,有些高校“走在前面”,到处效仿他人的评估标准,生搬硬套回来,对着标准一条一条实施,采取条条框框的“标准化”管理。看似用心良苦,实则过于细致和严格,有失特色和灵活度。教学管理上,从教学大纲到教学日历,从教材到教学手段,必须和“规定”严丝合缝,过于僵化,不免缺失新鲜活力。教师授课时也要严格依据每一条每一点,增加了教师灵活施教的难度,不得不照本宣科。反过来,部分教师为了对焦本科,也过于倾向于对照着书本讲课的教学方式,缺乏实际操作的培养和锻炼,而这恰恰是工科教育最忌讳的。

第二,在通识教育模式的冲击下,部分院校因盲目侧重通识而“淡化专业”导致工科教育课程体系大而全,“撒胡椒面儿”,出现了“文科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以通识课、公共课为大,占用大部分的学时比例,许多专业课学时被经济管理类课程所挤占,迫使学生疲于应付公共课;专业课程体系设置过于千篇一律,缺乏特色,有的甚至“重文轻理”,仅仅介绍了专业发展概况,专业技术理论知识浅尝辄止,感觉上什么都学了,其实什么都没学会;课程教育方面曲解了实质性工程教育的本质,只是采用文科考查方式的手段,例如阅读文献、解答题卷、课程报告等。总之,上述问题可归结为教材选定、学时设置、教师授课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工科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不够科学合理。人才培养方案放眼望去,专业课洋洋洒洒一大片,而实质上学生所学内容被抽象化、简单化。学完一门课,只会对着公式理论解答计算题,做做期末答卷而已,遇到实际的工程计算、数据分析问题全然没了对策,学生常常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第三,实践环节弱化与形式化,校企合作形同虚设。对于实践类型的课程,教学设计和考核没有贯

穿教学完整周期,考查方式不够细化、不够严谨。学生学习时存在通过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蒙混过关的现象。对于实习类课程,存在实习“走过场”问题,实习质量大打折扣。不论是认识实习还是专业实习,内容往往以参观为主,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学校和实习单位很少能够让学生有动手锻炼的机会,更多采取边参观边讲解的方式,逐渐演变为形式上的实习。分散的毕业实习往往因为缺乏监管而不能很好地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学生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找到实习单位,最终以简单的实习鉴定交差,完全违背了人才培养过程中毕业实习的原本目的。

第四,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存在选题偏差和质量缺失的问题。选题上,部分教师根据自己科研方向命题,背离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方向。极度缺乏能以契合企业生产需求来命题的有企业经验、企业经历或者与企业合作的师资。论文抄袭的情况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已有个别高校要求本科毕业论文查重。

总之,工程教育无论是在教学过程上还是在教学手段上的这种过于“文科化”的现象势必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低劣,导致工程技术的空洞化。众所周知,新工科背景下工科学技术需要多种学科交叉融合,技术、经济、安全等多种关系协调处理,对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的学科知识要求甚高,但必须牢记,过硬的工程技术素质是根基、是核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科学生的课程体系重构至关重要。

(四)政府主导作用流于形式,不够细致化、具体化

地方高校在培养工科学生的时候,大多存在着“闭门造车”“埋头苦干”的问题,缺乏统一科学规划的有效联盟,信息互通机制不完善。政府在新工科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实际需要还存在偏差。政府对工科院校专业结构布局的合理性上、对工科教育的财政投入上、对工科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建设和监管等方面仍需要加大力度,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四、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

(一)办学定位系统化、多维化

学校发展的定位应从目标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教学定位、科研定位六个维度全方位展开探索。如图1所示。

目标定位是导向,指明了高校办学方向。

服务面向定位是根本,重在思考学校所在的省,

所在的市,所在的大区域,所处的行业等。例如,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立足郑州面向河南,应以加快河南省五大国家发展战略和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主动适应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战略发展,以及郑州市战略支撑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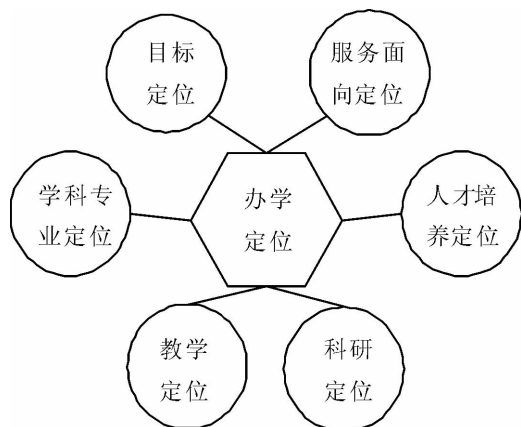


图1 办学定位框架图

学科专业定位是基点,决定学科专业结构的取舍。地方本科院校应清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所在,重点培育重点学科,进而发展成为优势学科。

人才培养定位是核心,直接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高等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地方本科院校定位是应用型院校,那么培养的就不再是“学术型”人才,而应该是一批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不过分要求掌握的知识有多深厚,而着重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教学定位是举措。学校通过教学这个平台为社会输出大批量人才,教学这个平台是联系师生的直接纽带,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选择是重视教学并探索科学的、新颖的教学模式。

科学研究是支撑。特别注意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不同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科学研究,这里的科学研究也是服务于教学的,围绕着应用型人才培养展开的。

(二) 专业设置科学化、前瞻化

从专业与学科建设角度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路径。首先需要明晰学术型专业和应用型专业之不同。学术型专业侧重学术性,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注重挖掘深层次的理论,甚至体现研究性。应用型专业则在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上不要求那么高,注重的是能够运用其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的问题。

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建设的依据,是培养人才的标准。发达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具有重视实践、突破本位课程、学科交叉等特点,值得借鉴。只有具备了科学正确的人才培养方案,地方本科院校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才有可能依据全面有特色的开展。本文指出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原则——立德树人、学生中心、特色培养、能力核心、注重对标、创新融入。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应体现出鲜明的应用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性。体现理论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度,加强专业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化实践教学,突出职业能力培养。各专业合理构建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强化学生创新思维和技术创新能力训练,做到理论与实践,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能力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4]。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路径。新工科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交叉与融合”是指知识的深层次、多领域、更广泛的交叉。为了培养学生掌握新技术,新工科专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改变传统的工科专业过窄过细的弊端,促进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加强复合型工程人才的培养,探索工程教育人才的新模式,建设工科专业的“新质量”和“新体系”。

(三) 教学实施新颖化、信息化

2019年4月,“六卓越一拔尖”2.0大会提到了工科建设的三项核心任务——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金专”配“金课”,是本科教育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新工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最核心要素。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教学实施,狠抓教学质量。高质量的教学实施决定着高质量的人才输出。2007年伊始,教育部出台教高〔2007〕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特别强调教学是高校的核心工作,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工作展开,服务于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在高度重视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加大投入,强化管理,深化改革,确保以教学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宗旨。

1. 课程体系应用型重构

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教学的第一战场——课程体系。需要明晰“学术本位”的学术型本科课程体系开发程序和“依托学科、面向应用”的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开发程序的异同。指出课程设置应做到三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统一性

与多样化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程体系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动力,针对不同的课程性质改革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公共基础课应加强与专业课程的衔接,同一门基础课针对不同专业就要有不同的课程设置。学科专业基础课应注重内容的精减和优化整合,专业课程开发要面向行业和面向地方的特殊课程,实践课程应以能力培养为主线,选修课程尽量突出模块化。

2. 教学手段丰富化、信息化

广泛采用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举办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专项培训,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举办新形态教学技能专项比赛,通过典型示范,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上课过程中合理利用信息化终端设备,倡导教师制作微课、MOOC、在线开放课程等,借助超星、雨课堂、云班课、课立方等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提倡时时刻刻学习,时时刻刻考核。只有脚踏实地、科学合理地构建先进的课程体系,才能有效地推动和促进教学效果,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四) 实践能力培养多途径

实践也是新工科的根本。深化校企合作融合度,更新教学理念,依托企业行业优势,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达到“共赢”的目的^[5]。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课堂教学案例化,工学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理论知识通过实践来领会、消化,进一步通过实践验证理论知识。注重二者的结合、逻辑关系,适当融入新行业的新技术。不同专业的实践课程内容和比例要有所区别。第二,课下实践教学充足化。课下,以实验室为中心,通过布置相应的实验室开放项目等为载体,拉动、填补学生课下的实践操作。第三,课外竞赛引导化。教师在教学过程应及时发现学生的专长,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应另外积极辅导,推荐参赛,以比赛促进教学促进实操能力。第四,尝试“成果导向”。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参与到教师的“成果”研究中,鼓励并奖励这样的学生。

(五) 应用型教师队伍建设多元化

古人云:“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学生是教师的影子,教师自身的素质结构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发展。新工科背景下的本科高校,应用型教师队伍是保障,是核心力量。应用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本质即是“双师双能”型队伍的建设,具体从建设原则、管理方法和培养路径三个方面着手。

1. 秉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基本原则

通过学校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引进来”学科带头人、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作为学校的建设的领头人。“走出去”表示把教师送出校门,送进著名高校,送进企业、行业等,定期、高质量地对自身的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2. 实施“分类管理,分层激励”的管理方法

应用型的教育体系如何较好地衡量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是关键,好的评价模式可以激励教师既能够潜心教学,又能有精力和平台去投身于创造性的工作,彰显应用型地方性的内涵和特色。分类管理指根据现有学校教师的情况分不同类型,例如学历不高的老师可以重点培养她们的实操性,学历较高的重点发挥他们的科研能力。分层激励指根据教师类型,把教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实践型。教学型的老师注重教学,专注于打造“金”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科研型的教师注重以科研项目带动社会服务;实践型教师注重实际操作,入企业培训常态化,可以把企业、行业、岗位的第一手经验传授给学生。

3. 内部、外部双向培养路径

新工科的地方本科院校大多前身是专科院校,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自身的转型问题。在众多转型之中,教师的转型出现摇摆不定、前后矛盾等诸多尴尬问题。课题组梳理出基于内部、外部的教师培养路径。内部路径,首先表现在教师注重自身的学习,提倡自主学习模式,实施基于教师自学习模式的评价方式。其次,建议探索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切入点,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教学与科研两手抓,探索二者的结合点,寻求相互促进的切入点。外部路径,体现在学校的政策、制度和平台的保障。

(六) 管理模式和机制方法创新化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就是投入与管理。本文提出应以管理机制与运行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地方本科院校战略管理的环境和条件,归纳其发展的特点,从而探讨地方本科院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外部适应性和内部协调性,形成竞争合作型发展模式,提升学校科学发展能力。实施制度化、规范化、全面化、制度执行过程规范化。学校要由专门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科学严谨地制定制度。制定过程要广泛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实行民主集中制。制度的制定过程要依据法律,不能随心所欲。健全管理制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事无大小,皆有据可依”。

执行过程,人人平等,没有特权,没有畅通票。

可从两个方面突破:第一,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为地方院校建设提供强大保障和资源共享平台,“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应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靠措施,解决影响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探讨创新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逐步完善质量评价体系。战略发展模式规划得当方可保证地方本科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结合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剖析了人才培养的困境所在,以服务地方新经济为导向,与社会人才需求预测相呼应,系统分析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路径和改革措施。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应以办学定位为基点,以专业优化为根本,以高质量的教学实施为重点,以政校企合作为依托,以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为驱动,以管理模式创新为保障,做足特色,做强优势,稳步跃升,持续发展。实践表明,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举措,适应了社会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需求,遵循了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的发展规律,完善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周世杰,李玉柏,李平等.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互联网+”复合型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5):11-16.
- [2]王强,姜莉,戴彤焱.“双一流”与“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科、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2):72-75.
- [3]章云,李丽娟,杨文斌,等.新工科多专业融合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2):50-56.
- [4]孟祥斌,张倩,田卫华,等.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工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6-119,130.
- [5]施晓秋,徐赢颖.工程教育认证与产教融合共同驱动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2):32-5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YAO Yao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 How to develop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entation and approach of talent training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new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the dilemma of its education reform and constructs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with multiple dimension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alent training and have the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新时代高校廉政档案建设研究

巩善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纪委,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环境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一体推进,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将监督关口前移,从制度化层面对党员干部加强监督和保护,是摆在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课题。以建立健全廉政档案为切入点,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纪检监察工作实践,详细论述了在新时代建设、利用廉政档案促进高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方法途径。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廉政档案;监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1

中图分类号:D262.6;G64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102-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历史环境下,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由部门规章上升为中央法规,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一体推进,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这一工作要求。作为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党内法规精神,充分履行监督第一职责,科学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将监督关口前移,把建立健全廉政档案与教育预防相结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意识,从而推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成为新时代摆在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新课题。

一、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目的及意义

(一)建立廉政档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具体措施

十九大报告对反腐形势作出判断并明确目标:“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督,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高校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十九大精神,协助党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职责,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并将监督措施、监督成效以原始文件的形式保存下来,作为党员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据,这就形成了廉政档案。

(二)建立廉政档案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政治建设的具体措施

中共中央于2019年2月下旬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十五)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注重选拔任用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对政治不

收稿日期:2019-05-23

作者简介:巩善鑫(1978—),男,河南尉氏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纪委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

合格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已经在领导岗位的坚决调整。”纪委是政治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高校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干部选拔任用这一重大政治监督责任，必须依规依纪，形成客观可信的原始文件材料，为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三)建立廉政档案是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干部选拔任用严把廉洁意见回复关的有效措施

2019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纪检监察机关对于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严把廉洁意见回复关的监督职责，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是新时代党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严格要求。可以说建立廉政档案，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日常廉洁自律情况真实记载，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廉洁自律回复意见的最客观有效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四)建立廉政档案是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的有效手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廉政档案是加强党员日常监督、开展廉洁教育的有效手段。高校党委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廉政档案建设工作，贯彻执行中央反腐败工作部署，将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档案作为贯彻落实反腐败斗争由治标向治本转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具体措施；高校纪委要积极协助党委，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将建立健全廉政档案作为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加强对党员干部开展廉政提醒教育的具体方法；党员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到建立廉政档案的重要意义，认真开展廉政工作、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加强廉洁自律的有效途径，自觉支持和配合建立健全廉政档案。

二、高校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具体途径

(一)明确纪检监察机关的主体责任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监督执纪规则》(2019年1月1日)第十七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1]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的层面上首次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建立廉政档案的主体责任。对于高校纪检监察机关来说，在新时代，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既是法定职责，又是责任义务，责无旁贷，应当主动树立责任意识，毫不迟疑地承担起这一使命担当，把建立完善和动态更新廉政档案作为党

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年度计划，与履行监督“第一职责”统筹推进，与开展廉洁自律、廉政提醒教育、校内巡察、信访举报，以及案件查办等工作相结合，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为学校中心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为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提供有效载体。

(二)明确有关部门的主动配合责任

高校组织、宣传、人事、审计、财务同样也具有业务范围内的监督责任，通过开展本职工作、健全工作规范、公开业务流程、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接受群众建议来履行监督职责。高校纪委对此负有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责。为便于协调推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建设工作，高校应当建立廉政档案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配合责任，在制定廉政档案管理制度中按照职责范围明确有关职能部门需要提供的档案内容、材料制作的规范标准、提交的时限等。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纪委要负主体责任，起到牵头作用，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树立建立廉政档案工作“一盘棋”意识，积极提供协助，同心协力建好廉政档案。

(三)明确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报告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10月24日通过)第三十五条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在之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10月27日实施)第四章规定了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7年对其进行修订，并同时出台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保证本地区本部门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主体、事项、程序和方式，认真做好请示报告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主动学习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树立对党纪法规的敬畏之心,按时、如实、客观地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思想意识上不断树立和增强主动报告的责任意识。

三、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主要内容

结合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廉政档案收集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党规党纪明确规定应载入的廉政材料,二是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所形成的有关材料。

(一) 党规党纪明确规定的內容

1.《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应载入廉政档案的材料有:

干部任免情况、人事档案情况、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受到处理的情况等;

巡视巡察、信访、案件监督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移交的问题线索和处置情况;

开展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审查调查,以及其他工作形成的有关材料;

其他反映廉政情况的材料,廉政档案应当动态更新。

2. 其他党规党纪规定应载入档案的材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三条:述责述廉报告应当载入廉政档案,第三十条: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综合日常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一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者档案。^[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九条: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4]《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第二条:反映干部个人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以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5]

(二) 高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所形成的有关材料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材料,主要包括党员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责任、开展廉洁从业防控工作以及校内开展作风建设、纪律检查等工作所形成的承诺书、责任书、廉政工作手册、述责述廉报告等。

按照上级党委和纪委部署开展有关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自查材料,以及围绕违规经商办企业、“帮圈文化”、兼职取酬、出入隐蔽会所、领导干部亲属从业情况、违规持证等所组织开展的专项治理活动所填报的自查表和签订的承诺书也应载入廉政档

案。

相关职能部门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所做出的结论性文件材料,包括组织部门按程序对党员干部开展的党纪处分、诫勉谈话、批评教育,以及组织处理材料;高校审计部门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人事部门按照学校行政决议对违规违纪教职工做出的处理意见;教学机构对党员教师有违师德师风行为或因教学事故做出的处罚决定等,均应载入廉政档案。

四、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建立的范围和方式

在初期,要考虑到廉政档案建设对象的覆盖面比较广泛,任务量艰巨,而高校纪检监察机关普遍缺少档案管理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在没有现成经验标准可以参照的情况下,如果开始就全面铺开则容易形成材料短缺、材料失真、整理混乱等情况,必然多次返工。为避免浪费时间精力,保证廉政档案建设质量,建议高校纪检监察机关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从处级领导干部入手,选取重要岗位上的重点廉政监督对象,建成廉政档案的样品工程。然后以此为模板制定廉政档案管理标准,出台相应的制度,再分级负责,逐次开展廉政档案建设工作。

(一) 以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向全体党员干部推广,最后做到全覆盖

按照《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廉政档案建立的对象应是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但是由于高校党员数量庞大,而且又有在职教工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学生党员等不同类别,鉴于廉政档案建设的严肃性和复杂性,结合高校工作实际,建议在工作开展初期以处级领导干部为主。高校处级领导干部是学校的中层梯队,肩负着贯彻上级和学校党委决策部署、组织教工落实具体工作任务的重要责任,在学校工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作用。另外,在管理权限上,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归属本校党委任免,也是学校纪委在日常监督中的重点对象,处级领导干部在人员数量上也不是很多,在目前高校纪委普遍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负责建立完善这部分人员的廉政档案,工作量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待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形成一定规模之后,高校纪委应到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推而广之,为全体在职教工党员和科级干部建立廉政档案。

(二) 由样品形成模板,进而制定标准普遍推广

按照前述的思路,建立廉政档案应该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工作,以前所形成的材料需要重新整理,从零做起,由于涉及人数众多,建议高校纪委一开始就

按照“样品”的标准严谨细致地建立廉政档案,严把质量标准,严格按照建档范围、格式模板、内容建成廉政档案“样品”,报领导和专家指导定稿后,确定为模板,再以此建立标准全面推广。

(三)注重制度建设,形成廉政档案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根据廉政档案开展情况,前期可以围绕协调机制、建设对象、档案目录、档案内容、材料标准等初步商定廉政档案建设标准,然后结合打造“样品”工作实际,逐步修订完善各项指标,在取得一定工作经验后及时出台《高校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规定》和《高校普通党员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日常工作注重廉政档案内容的动态更新,逐步将廉政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上日程,然后再建立相应的廉政档案工作人员规范、保密制度和查借阅制度,在具备一定条件后编印《廉政档案管理手册》。

五、开发廉政档案的实用价值,为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服务

党中央、中央纪委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时”与“势”的变化,把握“稳”的内涵、强化“进”的措施,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通过廉政档案材料的收缴,潜移默化地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高校纪委应当不断规范自身工作程序,注重开发利用廉政档案的实用价值,在开展有关工作时,将廉政档案作为主要客观依据。

一是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廉洁意见回复关。《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具体明确规定了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职责,要求做实做细廉洁意见回复工作。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应将廉政档案所载原始文件为依据,综合日常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为考察、推荐、提拔、任用、调动、调整干部,提供拟任(调)干部廉政情况的书面意见。

二是科学运用“四种形态”,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监督。赵乐际同志在总结2018年日常监督工作时指出: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认真执行党纪处分条例,严格依法行使监察权,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使监督常在、

形成常态。廉政档案既是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做实做细日常监督的有效载体,也为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廉政谈话、提醒或诫勉谈话及采取组织措施等提供依据。

三是强化重要工作事项监督,为年度考核、业绩评定、评优评先、表彰奖励提供廉政证明。党政纪处分、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等情况通常会成为一票否决的先决条件,廉政档案真实记录了党员领导干部遵规守纪情况。高校纪检监察机关还应将开展有关党风廉政教育活动材料载入廉政档案,作为对党员干部严管厚爱的可靠依据,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进一步倡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者的清廉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高等教育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

四是履行执纪问责职能,为纪律审查和责任追究提供依据。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线索,为线索分析、研判、比对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提高成案率和时效性。在初步核实案件之前,可以依据廉政档案掌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找准调查取证和违纪违法案件的突破口。同时,廉政档案也为巡视巡察、执纪审查和责任追究提供依据,为精准监督、提高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保障,可以进一步提高廉政档案服务纪律审查工作的能力。

六、人员素质、工作纪律和责任追究

廉政档案属于重要涉密资料,一旦失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明确档案管理员的素质要求,廉政档案工作人员应由中共正式党员担任,具备政治坚定、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甘于奉献、严守纪律的基本素质。由于在目前条件下,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普遍人员较少,因此建议档案管理员可以由纪委内设科室负责人兼任,其他在编纪检干部协助,负责廉政档案的建立、管理和更新工作,严禁借调、临时人员经手廉政档案资料。同时,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注重加强廉政档案管理工作硬件建设,建设廉政档案库房,配备专用保密文件柜和专用计算机、打印复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廉政档案建成后存入专用保密文件柜,明确保密标识,存储相关信息的计算机要专人专机管理,严禁连接互联网。

廉政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参加档案专业的业务培训,提升档案管理工作业务水平,积极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等法规制度,不断增强法律责任和保密意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高校纪委应当加强廉政档案工作纪律建设,不断完善廉

政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出台相应的保密纪律和查借阅制度,强化对廉政档案管理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严肃查处廉政档案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杜绝泄密情况的发生。

七、结束语

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是新时代高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任务,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关于廉政档案的有关规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廉政档案作为新时代党的重要执政资源。要着力完善管理体制、健全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标准、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提升廉政档案工作质量,持续推进廉政档案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服务,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献。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 [2]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 [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 [4]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M]. 北京:方正出版社,2016.
- [5]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 [6] 赵乐际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EB/OL]. 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 http://www.ccdi.gov.cn/special/sjzyjwscqh/tt/201902/t20190221_188865.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corruptible Archiv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GONG Shanxin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k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stringent Party governance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dare not corrupt, can't corrupt, don't want to corrupt" system and mechanism are promoted as a whole. How to move forward the supervision gate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protec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from the institutionalized level for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rgan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every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 Based on th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of incorruptible archives,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with years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author detailedly discusses the way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corruptible archiv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orruptible archives; supervise

非常规条件下骨架 隔墙饰面板裂缝的对策研究与应用实践

焦 涛,袁新华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轻钢骨架隔墙是当前建筑装饰工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隔墙形式,但是在大型项目中常遇到非常规条件下的作业环境及条件改变,相应施工工艺随之变化与调整,从而造成饰面板裂缝问题突出,严重影响装饰工程质量和观感效果。以某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室内轻质隔墙工程为例,分析非常规条件下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成因,研究相应对策,并应用实践,以期对非常规条件下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2

中图分类号:TU765;TU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107-05

1 轻钢骨架隔墙施工质量现状及其影响

轻钢骨架隔墙是当前建筑装饰工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空间分割的隔墙形式。轻钢龙骨隔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火性好、通用性强、安装便捷、性价比高等特性,其设计标准化、施工装配化、构配件生产工厂化程度高,能与多种轻质板材配合使用。常用的饰面板有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硅钙板及各种吸音板等。

随着城市建设提质及城乡一体化的集约、高效发展,以装配式为先导的建筑科学技术手段的推广与应用,大型公共建筑、高层、超高层为主的民用建筑日益增多。轻钢骨架隔墙作为建筑空间分隔普遍采用的隔墙形式,常规条件下的轻钢骨架隔墙的施工工艺已经比较成熟。通过对多家建筑装饰施工企业及其装饰工程项目的实地调查发现,一般在施工过程中,框架结构建筑中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率在6%左右,钢结构建筑中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率达到8%~10%左右。但是在一些复杂的非常规施工环境下,如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层高较大或跨度较大,隔墙密集、施工空间狭小、作业面狭窄等,

如果仍按照传统施工工艺,施工难度较大;创新的诸多施工工艺中,由于工艺开发的成熟度尚需要大量工程实践验证,个体项目中饰面板裂缝问题突出,带来大量的返工和修补工作。

2 非常规条件下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2.1 工程概况

某市电视塔,建筑总高度286.57米。主体结构由塔座3层、核心筒18层和塔楼4层组成。塔身一至十八层核心筒井道内主要有电梯、消防楼梯、管道井(强电、弱电、通风、给水、排水、消防等)及检修平台组成。

18层核心筒的检修平台以及部分管道井设计为轻钢骨架隔墙封装方式,构造方式采用75系列轻钢龙骨、双面12mm厚镁加板,隔墙内填50mm厚 100 kg/m^3 岩棉板。由于主体结构在作业空间内承重柱较少,作业空间层高8.85m,加之隔墙自身的长度过大、转角多等因素,都要求对隔墙的自身强度、刚度、抗倾覆性等要素的构造设计及关键施工工艺进行科学规划,因此在门洞口两侧、丁字交接处、转

收稿日期:2019-06-25

作者简介:焦涛(1968—),男,河南沈丘人,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教学与研究。

角处、端部、沿墙间距不大于4米及墙体高度3米等位置埋置60mm×40mm×2.5mm镀锌方管,以增加轻钢骨架隔墙的整体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由于装修施工现场条件限制,如果采用常规隔墙做法,施工难度极大,预期效果难以实现。因此,施工方案确定了定尺加工拼装的施工工艺,即结合现场采用CAD辅助放样、定尺式工厂化加工拼装,配套组装成单元体整体装配式安装。定尺加工拼装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轻质隔墙施工工艺的不足,有利于模块化设计、生产与装配,不仅可以有

效克服施工场地狭小和大层高、大跨度带来的施工难题,还可以提高作业效率。

2.2 存在的问题

作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本工程质量标准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但由于现场作业条件限制多,构造复杂、施工难点多,在轻钢骨架隔墙施工过程中发现饰面板出现了大量裂缝。

通过对现场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部位进行质量检测,并与类似工程进行了裂缝率的比较,相关数据见表1。

表1 类似工程裂缝率比较表

项目	本工程	本企业类似工程		其他企业类似工程	
		某科技馆	某商会大厦	某市高层塔	中原某高塔
工程类型	超高层钢结构	框架结构	钢框架结构	超高层钢结构	超高层钢结构
结构部位	钢骨架轻钢龙骨双面轻质隔墙	轻质隔墙	轻质隔墙	钢骨架轻质隔墙	钢骨架轻质隔墙
主材选用	轻钢龙骨保温岩面玻镁板	轻钢龙骨保温岩面石膏板	轻钢龙骨保温岩面玻镁板	轻钢龙骨保温岩面玻镁板	轻钢龙骨保温岩面玻镁板
裂缝率	15%	5%	6.5%	9%	8%

从表1的比较结果来看,超高层钢结构工程中的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率高于普通框架结构,而本项目中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率明显高于同类型

工程项目。因而项目部组织专项技术团队对施工现场的施工情况及质量进行深入的检查,并对检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详见表2。

表2 轻钢骨架隔墙技术指标现场检查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检测点数	不合格点数	累计频数	累计频率(%)
1	支撑卡安装	50	28	28	27.18
2	竖龙骨与顶、地龙骨固定点(每处以三个固定点三角分布为合格)	50	22	50	48.54
3	单元板块固定点	50	18	68	66.02
4	钢骨架焊接质量	100	13	81	78.64
5	板缝质量	50	12	93	90.29
6	钢骨架起拱率	20	6	99	96.12
7	填充岩棉	30	4	103	100
8	合计	350	103		

影响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主要技术因素有:支撑卡安装、竖龙骨与顶地龙骨固定点、单元板块固定点、钢骨架焊接质量等。

2.3 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成因分析

项目部组织专项技术团队深入分析轻钢龙骨隔墙设计、加工及施工过程,对照裂缝的多发部位,分析裂缝出现的原因。

通过对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成因分析,发现影响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材料、主体结构、构造与施工工艺、施工操作、施工管理等方面的因素,每一方面又有诸多因素,非常繁杂。因此,必须根据本工程的具体情况,找出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主要成因,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防治。专项技术团队通过施工现场检查等技术手段,对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主要成因进行了

分析和确认。确认的方法、内容及结论见表3。

由此可见,本工程中影响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主要因素为以下5个方面:

- (1)变形缝设置数量、位置、构造设计不当;
- (2)制作工艺不完善,CAD放样后下料精准度、制作工艺关键细节待调整;
- (3)模块骨架制作工艺不规范;
- (4)施工人员技术成熟度低而导致操作不当;
- (5)自攻丝数量、固定位置、紧固方式不到位。

2.4 对策研究

2.4.1 对策研究与优选

针对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5个主要成因,专项技术团队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并运用价值工程方法等进行科学分析和比较优选,从而确定出最行之有效的对策。详见表4。

表 3 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主要成因的确认分析表

影响因素	确认方法	确认内容	是否要因
原材料检测不足	材料检验	原材料出厂证、合格证,材料运输、堆放,成品及半成品保护,针对进场材料按照规范批次复试检测;检测结果符合要求。	否
技术交底不彻底	现场调查、抽查	针对构造节点、关键施工工艺对技术人员及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了技术交底抽查,检查技术交底资料;掌握程度达到 93%。	否
主体结构变形量要素耦合,变形缝设置不当问题	现场测量、查验	构造设计与主体结构自身位移变形的当量耦合度;横向钢方管在焊接时起拱精度及曲率控制;隔墙构造设计、关键施工工艺过程中变形缝设置位置、节点构造、安装精度、质量要求。	是
自攻丝强度、位置、紧固度不足	随机抽样	检查确认自攻丝数量、位置、固定强度、稳定性。	是
施工人员操作缺陷	现场检查	检测 30 个点,只有 18 个点满足设计强度要求;大部分位置存在紧固强度不足,同时固定点位相应偏少;对隔墙板安装人员技术成熟度培训、考核,施工措施及固定方法进行检验;施工人员隔墙板安装方法不正确,固定点数量不足,板缝控制不精确。	是
制作工艺缺陷	现场检查	采用的定尺加工拼装工艺,存在技术参数设置不精确,CAD 放样、参数设置交底等环节有偏差,核心筒隔墙现场红外线放线控制精度控制。	是
轻钢龙骨骨架设计、加工、装配缺陷	内业抽查与现场检查	对施工现场轻钢龙骨骨架进行现场抽查发现诸多不足;抽查结果发现轻钢龙骨骨架制作尺寸与设计尺寸偏差控制不精准,安装接头通缝控制把控不严格,局部加筋不到位,支撑卡存在松动或未设置支撑卡的情况,同时还存在封板时自攻丝数量分布不均等。	是
现场技术人员配置不足	现场调查	对现场技术人员数量、岗位说明书进行调查;核查结果发现负责内装施工技术人员 3 人,满足管理要求。	否
无明确施工技术指导书	现场检查	制定了轻质隔墙施工技术指导书,但关键施工工艺、技术参数等严谨度局部需要微调。	否

表 4 相应对策要素分析表

序号	主要成因	可选择的对策	及时性	有效性	可操作性	功能 F	成本 C	价值 V (V = F/C)
1	变形缝设置不当问题	在隔墙板单元之间设置必要的变形缝	1	3	5	9	2	4.5
		骨架连接时应采用柔性连接或与主体结构变形缝一致	1	1	3	5	3.5	1.4
2	制作工艺不完善问题	制定详细的技术指导书,规范操作流程,提高 CAD 放样后下料精度,调整制作工艺的关键细节	5	5	3	13	5	2.6
3	模块制作工艺不规范问题	精准放样率、制作流程及工艺参数,管理人员加强现场技术指导	1	5	1	7	4	1.8
4	施工人员技术成熟度低而导致操作不当问题	加大对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规范施工操作,并规范检查	3	5	5	13	3	4.3
		调整施工人员,安排技术成熟度高的作业人员	1	3	5	9	5	1.8
5	自攻丝数量、固定位置、紧固方式不到位问题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操作,制定规范的施工措施	1	5	1	7	4	1.8
		技术交底明确自攻丝数量、固定位置及间距、紧固方式及要求,并规范检查	5	3	3	11	3	3.7

2.4.2 制定措施 的对策研究,进一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并根据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 5 个主要成因 见表 5。

表 5 对策研究与具体措施

序号	主要成因	对策	具体措施
1	变形缝设置不当	在隔墙板单元之间设置变形缝	1. 饰面板单元之间设置变形缝; 2. 板缝宽度 10mm。
2	制作工艺不完善	制定详细的施工技术指导书,规范施工操作流程	1. 完善定尺加工拼装工艺,调整相关技术参数,制定详细的施工技术指导书,细化施工工艺,检查关键环节; 2. 规范技术交底及过程资料。
3	模块骨架制作工艺不规范	规范骨架制作,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	1. 制定详细的模块骨架制作工艺,明确模块骨架制作标准; 2. 调配技术成熟度高的施工人员; 3. 加大现场技术指导力度。
4	施工人员操作缺陷	规范施工人员施工操作	1.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尤其是施工工艺的关键环节,规范施工人员施工操作,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成熟度,并严格检查; 2. 现场指导其规范化操作。
5	自攻丝固定不到位	对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并加大现场监督力度	1. 分析隔墙板固定不牢的原因; 2. 明确自攻丝数量、固定位置及间距、紧固方式及要求。

3 非常规条件下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对策实施与实践效果

3.1 对策实施

针对轻钢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5大要因,技术团队制定出针对性技术改进实施措施,从资料到现场全面技术交底,并技术跟踪支持。

针对变形缝设置不当问题,在各单元板块之间相应位置均设置10mm变形缝,并采用修缝补胶满缝修补、外封加封装饰木线条的方式解决。

针对制作工艺不完善问题,完善关键构造节点图、进一步精确细部设计与构造尺寸、定尺放样、再加工制作,设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施工技术指导书,同时挑选专业精细施工人员进行制作,技术人员跟踪指导,紧盯关键环节、关键细节、关键尺寸,整体提高工程质量。

针对骨架制作不规范问题,一方面加大对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其技术成熟度;另一方面加大对作业者的技术指导,同时结合技术参数不定点进行抽查,促使后期隔墙骨架制作标准化,要求合格率达到98%以上。

针对施工人员操作不当的问题,对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细化关键施工工艺、规范关键工艺流程,突出关键环节,确保施工人员完全领会技术参数要求,并现场指导其规范化精准操作。

针对自攻丝固定不到位的问题,重点分析饰面板安装时关键工艺的问题,主要是饰面板采用两边飞边的制作形式,加长自攻丝固定后板子是否仍然存在晃动现象。因而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在现场加工制作时增加饰面板加固支撑点点数,明确自攻丝数量、固定位置及间距、紧固方式及要求,使饰面板与主骨架结合严密,并对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

3.2 实践效果

项目部技术评估团队对轻钢骨架隔墙施工质量进行现场施工抽样检测,对检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详见表6。从表中可见,进行针对性整改后,轻钢骨架隔墙制作合格率从原来的70.5%上升到92%。项目中饰面板板缝裂缝率由15%下降到8%。

表6 轻钢骨架隔墙施工质量抽样检测数据分析

序号	项目	整改前		整改后		合格率(%)	
		检查点数	问题点数	检查点数	问题点数	整改前	整改后
1	钢骨架焊接质量	100	13	100	6	87	94
2	钢骨架起拱率	20	6	20	2	70	90
3	龙骨架固定点	50	22	50	6	56	88
4	岩棉填充	30	4	30	2	86	93.3
5	支撑卡安装	50	28	50	3	44	94
6	单元板块固定点	50	18	50	5	64	90
7	板缝质量	50	12	50	4	76	92
	合计	350	103	350	28	70.5	92

通过上述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实施,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这一难题得以解决,提高了整体建筑装修工程项目的质量和观感效果。核心筒隔墙单价由原来的200元/平方米下降到170元/平方米,总成本节约20余万元。同时,促进定尺加工拼装工艺的完善和技术推广,创新了标准设计,精化了装配式施工工艺,改进了技术措施,缩短了工期,积累了施工经验,促进了管理手段的提升,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结论

“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最美乡村建设及“百城提质”战略的实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建筑科技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一定区域空间内高层、超高层、大跨度、大体量、民生类公共建筑越来越多,轻钢骨架隔墙的非常规条件下的运用逐渐增多。传统的轻钢骨架隔墙施工

工艺在作业复杂的情况下无法满足质量及观感要求,因此,必须加强定尺加工式的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等环节技术创新,深入研究施工工艺关键细节,才能不断拓展新工艺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和施工水平。

在一系列项目中,应综合分析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材料原因、构造与设计原因、加工制作原因、规范施工原因、施工管理原因等系列问题,找准原因制定相应措施。在非常规作业条件下,由于施工难度增加,施工技术创新的成熟度尚需大量工程实践验证,加之不可预见的问题较多,尤其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深入分析,科学合理地查找要因并制定对策,而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工艺或以往工程经验来解决问题。

在同类的工程实践中,应充分认识大跨度建筑和高层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的主体结构变要素产生

的影响,以及对后期实施的骨架隔墙衍生的约束条件。具体轻钢骨架隔墙施工工艺的创新项目中,充分深入研究施工工艺关键细节,制定详细的施工技术指导书,规范施工操作流程,详细充分地技术交底;同时应规范设计、制作、安装等关键环节技术标准和验收规范,设立放样制度。在此基础上,加强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等环节的工法、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

参考文献:

- [1] GB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2] 陈晓波. 超高层建筑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节点优化[J]. 施工技术,2013(5):17-19.
- [3] 刘振永,李智强. 超高轻质隔墙施工技术[J]. 建筑技术,

2014(10):912-913.

- [4] 董志国,孙长礼,叶建,等. 天津高银117大厦轻钢龙骨隔墙井道系统关键[J]. 施工技术,2016,45(19):7-9.
- [5] 孙春祥,骆娜,魏月钢,等. CH龙骨管井轻质隔墙体系在高层钢结构建筑中的应用[J]. 新型建筑材料,2007,34(8):53-56.
- [6] 黄雷,杨鹏飞,魏丹,等. CH系列轻钢龙骨隔墙应用实例[J]. 建筑施工,2017,39(11):1645-1647.
- [7] 张丹. 室内装饰工程石膏板裂缝成因及处理方法研究:以北方高寒地区鸡西为例[J]. 鸡西大学学报,2012(4):37-38.
- [8] 李东彬,王建军,陈勇,等. 轻钢骨架轻混凝土隔墙关键技术研究[J]. 建筑科学,2018(3):145-15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Skeleton Partition Panel Cracks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Conditions

JIAO Tao, YUAN Xinhua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64, China)

Abstract: Light steel skeleton partition is a partition widely used in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ngineering. However, in large projects,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conditions are often changed, so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processes are also changed and adjusted. These reasons caus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 of decorative panel cracks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decorative engineering and visual effects. This essay takes a super high-rise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interior light parti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of skeleton partition panel cracks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conditions. It puts forward some useful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in order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skeleton partition panel cracks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skeleton partition; panel cracks; practice

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的应用

于德国,郑敏丽,张彬,宁亚瑜,徐鑫哲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分院,辽宁 盘锦 124000)

摘要:复合地基在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可以处理欠固结土、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土质情况。通过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在盘锦体育中心网球馆的应用,介绍了复合地基的设计方法以及技术要求,表明该方法具有缩短工期、稳定可靠、节省造价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工程前景。

关键词:地基处理;水泥土搅拌桩;碎石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3

中图分类号:TU5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112-04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增强体,或者同一类型增强体所采用的材料、工法不同,或者同类增强体工法相同而采用不同长度或不同直径与桩(增强体)间土组合形成的复合地基称为多桩型复合地基。多桩型符合地基适用于处理不同深度存在相对硬层的正常固结土,或浅层存在欠固结土、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土,以及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较高的土^[1]。用于处理可液化土或软黏土地基可以采用“碎石桩加CFG桩”复合地基、“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塑料排水板或砂井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

1 工程情况

盘锦市体育中心位于盘锦市东南部辽东湾新区金帛湾水城中心地带,4号路南侧的近海区域。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48公顷,总建筑面积愈13万m²,总座席数46225位,其中网球馆建筑面积8890m²,座席数2452个,是辽宁省全运会场馆^[2]。工程建成后可举办地区性比赛和全国单项比赛。由于盘锦体育中心场地土为吹填土,工程开工时,吹填仅完成几年,地基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并且地下土含有粉砂夹粉质黏土层,为液化土层,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2 地质情况

勘探深度内所揭露的地层岩性主要为素填土、粉质黏土、粉砂夹粉质黏土、粉质黏土粉砂互层、粉

质黏土夹粉砂及粉细砂等^[3],根据其时代、成因及工程地质性质,划分为几个工程地质层,工程地质剖面图如图1所示。

(1)素填土(Q4mc):灰色、黄褐色,土质松散,主要由粉质黏土、粉土、粉砂等组成。该层零星分布于场地表层,层厚0.50~2.20m,层底埋深0.50~2.20m,层底标高2.67~0.64m。

(2)粉质黏土(Q4mc):黄褐色,呈软塑~可塑状,黏性较强,无摇振反应,无光泽,韧性及干强度中等,可见铁质浸染,局部为黏土。局部夹少量粉砂或粉土,底部粉土、粉砂夹层较多。该层分布普遍,层厚0.50~4.40m,层底埋深0.50~6.00m,层底标高1.83~-3.26m。

(3)粉砂夹粉质黏土(Q4mc):灰色,饱和,松散,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夹粉质黏土薄层,呈软塑~可塑状态,黏性较强,层理较明显,局部含少量贝壳。该层分布不连续,层厚1.10~6.00m,层顶埋深0.70~5.70m,层顶标高1.71~-2.89m^[4]。

(4)粉质黏土粉砂互层(Q4mc):灰色,粉质黏土软塑,局部为黏土;粉砂饱和,松散,互层厚度多在3~10mm,层理明显,干强度及韧性低~中等,无摇振反应,含少量贝壳,局部夹淤泥质粉质黏土,呈流塑状态。该层分布普遍,层厚3.40~15.90m,层顶埋深0.60~9.30m,层顶标高1.83~-5.94m。

收稿日期:2019-04-20

作者简介:于德国(1982—),男,辽宁盘锦人,硕士,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基基础、施工技术。

(5) 粉砂夹粉质黏土 (Q4mc): 灰色, 饱和, 稍密, 局部松散, 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 夹粉质黏土, 呈软塑~可塑状态, 黏性较强, 层理较明显, 局部含少量贝壳。该层分布较普遍, 层厚 1.80~10.70m, 层顶埋深 9.60~18.50m, 层顶标高 -7.05~-16.34m。

(6) 粉质黏土 (Q4mc): 灰色, 可塑, 黏性较强, 局部为黏土, 无摇振反应, 韧性及干强度中等, 刀切面较光滑, 局部夹粉砂薄层。该层分布较普遍, 层厚 1.40~7.50m, 层顶埋深 12.70~21.70m, 层顶标高

-10.48~-19.69m。

勘察期间各孔均见地下水, 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赋存于粉砂层中, 微具承压性, 其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入渗及地下水侧向径流, 以蒸发及地下径流形式排泄。地下水位受海水潮汐作用影响较大, 涨潮时地下水位明显上涨。勘察期间实测, 地下水位埋深 0.35~1.40m, 平均 0.9m 左右, 最高水位高程 2.15m, 因此抗浮设计水位可按高程 2.15m 考虑。该区地下水位变幅一般在 1.0m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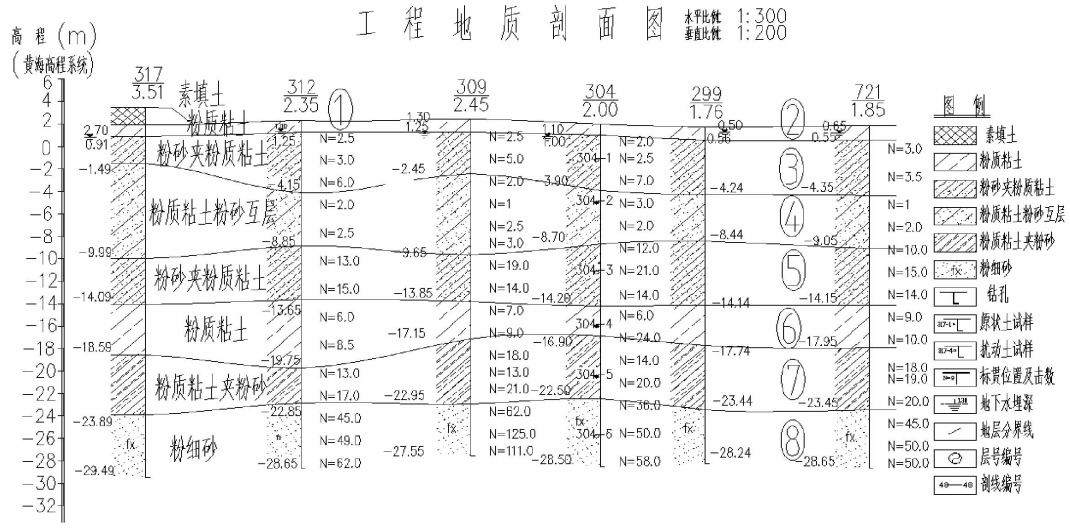


图 1 工程地质剖面图

3 地基处理

3.1 处理方法

由于地质情况不良, 难以保证比赛场地的地基承载力。因此, 网球训练馆比赛场地的地坪采用碎石桩+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处理, 处理范围为尺寸为 55.38m × 39.45m, 处理后复合地基承载力不小于 80kPa。打桩施工在现状地表进行。碎石桩以及水泥土搅拌桩的桩径均为 500mm, 碎石桩的桩长为 16.5m, 并且应保证碎石桩穿透粉砂夹粉质黏土的液化土层, 桩端进入下部的粉质黏土层, 碎石桩总计布桩 4305 根。水泥土搅拌桩的桩长为 13.5m, 桩端应进入粉砂夹粉质黏土层, 水泥土搅拌桩总计布桩 1256 根。碎石桩桩体材料为碎石, 碎石粒径为 2.0~4.2cm, 含泥量小于 5%。水泥土搅拌桩的桩体材料水泥采用 PSA32.5 水泥, 水泥掺入量为 50kg/m, 水泥浆水灰比为 0.5~0.6。桩位剖面示意图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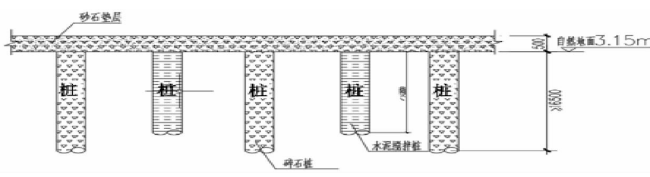


图 2 桩位剖面示意图

桩施工完成后, 清理表层虚土并进行碾压处理, 最后在桩顶以上铺设 500mm 厚砂石垫层并夯实。

3.2 桩体间距

桩体的间距不宜大于桩直径的 4.5 倍, 对于松

散粉土和砂土地基, 桩体间距应根据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隙比确定。对于正方形布桩,

$$s = 0.95\xi d \sqrt{\frac{1+e_0}{e_0-e_1}}$$

式中: s —桩体间距;
 ξ —修正系数, 对于振动沉桩可取 1.1~1.2;
 d —砂石桩直径;
 e_0 —地基处理前砂土孔隙比;
 e_1 —地基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隙比。

确定碎石桩及水泥土搅拌桩的桩间距为 1.40m × 1.40m。桩位布置图如图 3。

水泥土搅拌桩及碎石桩的面积置换率为

$$m_1 = m_2 = \frac{\pi \times \left(\frac{0.5}{2}\right)^2}{(0.5 + 0.9) \times (0.5 + 0.9)}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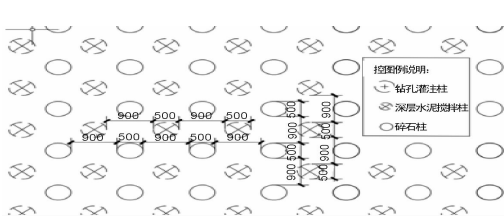


图3 桩位布置图

3.3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对于水泥土搅拌桩,按土层性质计算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为

$$R_a = u_p \sum_{i=1}^n q_{si} l_i + \alpha_p q_p A_p = \pi \times 0.5 \times [16 \times 1 + 18 \times 5 + 18 \times 6 + 32 \times 1.5] + 1.0 \times \pi \times \left(\frac{0.5}{2}\right)^2 = 411.53 \text{ kN},$$

表1 各土层力学指标

层号	岩土名称	天然孔隙比 e	液性指数 IL	含水量 ω/%	标贯 N/击	承载力特征值 fak/kPa	压缩模量 Es/MPa	Qsik/kPa
②	粉砂夹粉质黏土				3.7	90	4	16
③	淤泥质粉质黏土粉砂互层	1.028	1.58	39.6	1.2	70	3.26	18
④	粉砂夹粉质黏土				7.2	105	8	18
⑤	粉质黏土	0.862	0.68	34.6	4.9	110	3.83	32
⑥	粉砂夹粉质黏土				16.5	160	12.5	35
⑦	粉细砂				49.1	190	20	55

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为

$$f_{spk} = m_1 \frac{\lambda_1 R_{a1}}{A_{p1}} + \beta(1 - m_1 - m_2(n - 1)) f_{sk} = 0.1 \times \frac{1.0 \times 98.125}{3.14 \times 0.25^2} + 0.9 \times [1 - 0.1 + 0.1(2 - 1)] \times 160 = 194 \text{ kPa},$$

式中:λ₁—单桩承载力发挥系数;

β—仅由散粒体材料加固处理形成的复合地基承载力发挥系数;

n—仅由散粒体材料加固处理形成复合地基的桩土应力比;

f_{sk}—仅由散粒体材料加固处理后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

经过地基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194kPa,大于上部结构要求的80kPa,能够满足设计的要求。

4 技术要求及检测

4.1 碎石桩的施工

碎石桩采用振动沉管施工工艺,施工顺序为:移动桩机,对准桩位;启动振动锤沉管;向管内填料;边

式中:α_p—桩端阻力发挥系数;

q_p—桩端端阻力特征值;

q_{si}—桩周范围内第i层土的厚度;

l_i—桩长范围内第i层土的厚度;

A_p—桩底截面积。

按桩身材料强度计算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为

$$R_{a1} = \eta f_{cu} A_p = 0.25 \times 2000 \times \pi \times 0.25^2 = 98.125 \text{ kN},$$

式中:η—桩身强度折减系数,湿法取0.25;

f_{cu}—边长70.7cm的立方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90d期龄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kPa;

A_p—桩身截面积。

各土层力学指标见表1。取数据小的值,水泥土搅拌桩的承载力特征值为98.125kN。

振动边拔管;反插。孔内的碎石填料量通过现场试验确定,估算时可按设计桩孔内体积乘以1.2~1.4的充盈系数确定。施工前应进行成桩工艺和成桩挤密试验。施工时,在基础外缘的扩大宽度不应小于基底下可液化土层厚度的二分之一,且不应小于5m。在施工过程中,宜从外围或两侧向中间进行,施工时桩位偏差不应大于套管外径的30%,套管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处理完成后采用标准贯入试验来检测地基土的抗液化性。

4.2 水泥土搅拌桩的施工

水泥土搅拌桩采用湿法施工工艺,施工顺序为:搅拌桩机就位调平;搅拌至设计深度;边喷边搅边提升;复搅。全桩长上下至少重复搅拌一次,桩顶下三分之一要加搅一次,当水泥浆液到达出浆口后,应喷浆搅拌30s。在水泥浆与桩端土充分搅拌后,开始提升搅拌头,注浆泵的额定压力不宜小于5.0MPa。成桩7d后,采用浅部开挖桩头(深度宜超过停浆面下0.5m),目测检查搅拌的均匀性,测量成桩直径。检查量为总桩数的5%。成桩后3d内,可用轻型动力触探(N10)检查每米桩身的均匀性。检查数量为

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

4.3 地基承载力的检测

在地基处理完成后,对复合地基的承载力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图4。从检测结果来看,经过地基处理之后,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的承载力能够满足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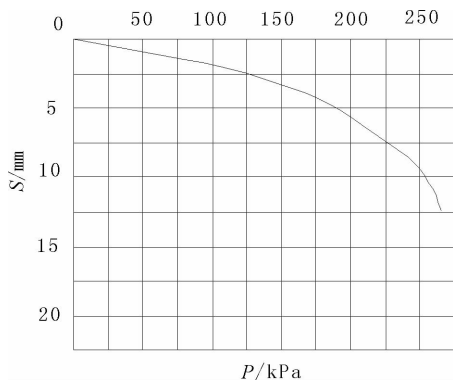


图4 复合地基静载荷试验 Q-S 曲线

5 结语

(1)由于本工程地基承载力不能满足工程的要求,并且存在液化土层,因此,采用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的地基处理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以上的问题,并且降低了工程的造价。

(2)由于本工程为全运会场馆,经过地基处理,加速了土体的固结,大大缩短了工期,保证了工程的按期完工,目前应用情况良好。

(3)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场地情况采用不同的桩径、桩长、桩间距进行调整,以满足工程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2] 于德国,李光军,艾永,等. 清水预制混凝土看台板制作及安装[J].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2014(11):37-40.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S]. 2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4] 于德国,宁亚瑜. 碎石桩复合地基在处理可液化地基中的应用[J].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4,24(3):74-76.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Application of Gravel Pile Combined with Cement Soil Mixing Pile as a Composite Foundation

YU Deguo, ZHENG Minli, ZHANG Bin, NING Yayu, XU Xinz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Panj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Panjin, Liaoning 1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posite foundation is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which can deal with the soil conditions such as unconsolidated soil, collapsible loess, and liquefied soi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method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using gravel pile and cement soil mixing pile as a composite foundation in Panjin Sports Center Tennis Hall and shows that this method has little shortening construction time and is stable and reliable and has a broad engineering prospect.

Key words: foundation treatment; cement soil mixing pile; gravel pile

聚二甲基硅氧烷杂化材料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豆高雅

(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 榆林 718100)

摘要:制备 PDMS/SiO₂ 杂化纤维,以正硅酸乙酯为原料,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硅溶胶,再加入 PDMS 溶液,通过静电纺丝制备 PDMS/SiO₂ 杂化纤维膜。通过加入不同量的正硅酸乙酯,比较 PDMS/SiO₂ 杂化纤维膜可电纺性能的改变以及 PDMS/SiO₂ 杂化纤维膜杂化纤维的平均直径变化趋势。制备 PDMS/SiO₂-TiO₂ 抽丝纤维,以正硅酸乙酯和钛酸四丁酯为原料,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 Si-Ti 溶胶,加入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溶液,通过提拉法制备 PDMS/SiO₂-TiO₂ 抽丝纤维。在制备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时,加入不同量的正硅酸乙酯和钛酸四丁酯,比较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平均直径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静电纺丝;杂化纤维;溶胶-凝胶法;表征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4

中图分类号:TB3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116-05

PDMS 是一种羟基封端的聚硅氧烷,由于 Si-O-Si 链结构具有较大的链角与链长,故不易结晶,透气性好,具有良好的耐热性^[1]。将 PDMS 与 SiO₂ 杂化,可以消除凝胶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应力,抑制脆裂,同时材料还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引入 TiO₂ 到 PDMS/SiO₂ 电纺纤维中,可以加强 PDMS/SiO₂-TiO₂ 纤维的光学性能。以羟基封端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低聚物为有机组分,正硅酸乙酯(TEOS)为无机原料,用溶胶凝胶法和电纺法制备 PDMS/SiO₂ 电纺纤维^[2-5],研究无机相与有机相之比、硅钛比及水硅比对凝胶时间、可拉丝时间、最大可拉丝长度、纤维形态及纤维结构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

正硅酸乙酯:分析纯,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α,ω-二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GY209-3,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盐酸:分析纯,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上海中试化工总公司;乙酰丙酮:分析纯,广东省汕头市西陇化工厂;钛酸四丁酯:化学纯,无锡市展望化工有限公司。

1.2 实验设备

85-2 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闵行虹浦仪器厂;C 型玻璃仪器气流烘干机: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GF-9140A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迈捷实验设备有限公司;DZF-6020 真空干燥箱: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公司;SHZ-D(Ⅲ)循环水式真空泵:巩义市英峪仪器厂;FA1104N 分析天平:上海民侨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过程

1.3.1 PDMS/SiO₂ 杂化纤维的制备

以聚二甲基硅氧烷、正硅酸乙酯为原料,改变 PDMS 和 TiO₂ 的比例制备不同组成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制备 PDMS/SiO₂ 杂化纤维的试样配比见表 1。

表 1 PDMS/SiO₂ 杂化纤维试样配比

试样编号	$n(\text{TEOS}) : n(\text{H}_2\text{O}) :$ $n(\text{HCl}) : n(\text{C}_2\text{H}_5\text{OH})$	$V(\text{TEOS}) : V(\text{PDMS})$
1	1 : 1.7 : 0.01 : 4	9 : 1
2	1 : 1.7 : 0.01 : 4	8 : 2
3	1 : 1.7 : 0.01 : 4	5 : 5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豆高雅(1990—),女,陕西榆林人,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师,从事复合材料研究工作。

1.3.2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的制备

以聚二甲基硅氧烷 (PDMS) 为有机相, 钛酸四丁酯 (TBT) 和正硅酸乙酯 (TEOS) 为无机相制备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配方见表 2。

表 2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配方

编号	TEOS/mol	HCl/(102mol)	H ₂ O/mol	TBT/mol	Ac/mol	VTEOS : VPMS	C ₂ H ₅ OH/mol
1	0.05	0.05	0.1	0.005	0.01	5 : 5	0.2
2	0.05	0.05	0.1	0.01	0.02	9 : 1	0.2
3	0.05	0.05	0.1	0.01	0.02	8 : 2	0.2
4	0.05	0.05	0.1	0.01	0.02	5 : 5	0.2
5	0.05	0.05	0.1	0.02	0.04	5 : 5	0.2
6	0.05	0.05	0.1	0.04	0.08	5 : 5	0.2

2 结果与讨论

2.1 PDMS/SiO₂ 杂化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固定 TEOS 的加入量为 11.2 mL, 改变 PDMS 的加入量, 制备一系列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凝胶时间见表 3。

表 3 杂化电纺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和对应的凝胶时间

试样编号	V(TEOS) : V(PDMS)	凝胶时间 t ₁ /h
1	9 : 1	30
2	8 : 2	42
3	5 : 5	81

由表 3 可知, 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增大,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的凝胶时间不断减小。无机相 TEOS 本身就可以先水解, 再在酸或碱的催化下发生缩聚反应而凝胶。有机相 PDMS 在凝胶过程中会与无机前驱体的官能团发生反应而生产一部分溶剂水^[6], 从而延长了凝胶时间。

2.2 PDMS/SiO₂ 杂化纤维的红外光谱

图 1 为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红外光谱, 波数 1 100 cm⁻¹ 是 Si - O - Si 基团的吸收峰, 图中 1 100 cm⁻¹ 处的透过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无机相与有机相之比为 9 : 1, 8 : 2, 5 : 5。纯的 PDMS 的透过率最高。由此可知 Si - O - Si 基团在不同无机相

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中所占的比例与制备过程中 PDMS 的加入量基本吻合, 证明 PDMS/SiO₂ 中无机相与有机相由 Si - O - Si 化学键连接而成^[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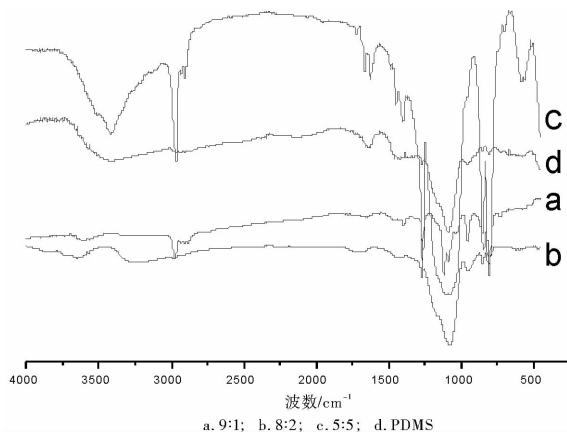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的红外光谱图

2.3 PDMS/SiO₂ 杂化纤维光学显微镜图

图 2 为 3 种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杂化电纺纤维膜在放大 80 × 16 倍下的光学显微镜照片。可以看出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为 9 : 1 的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的平均直径最小, 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为 5 : 5 的纤维直径最大。由此可知, 随着有机相 PDMS 的加入, 纤维直径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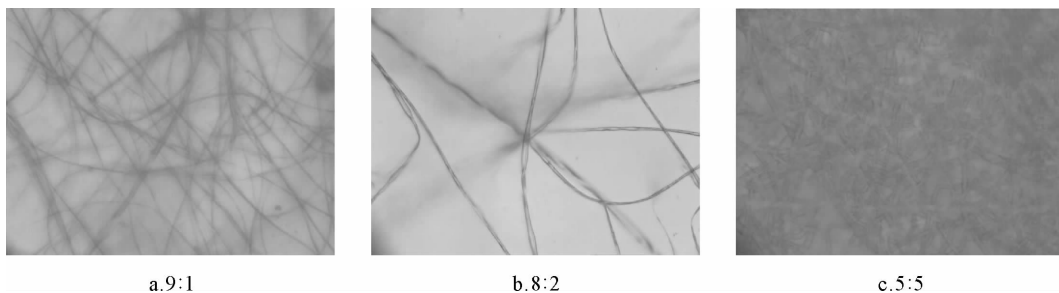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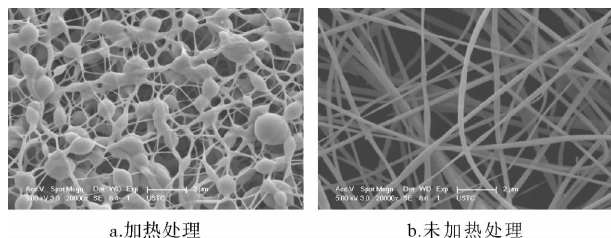


图 2 3 种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杂化电纺纤维膜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2.4 PDMS/SiO₂ 杂化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

图3分别为不同制备条件下的SEM照片,两样品的实验原料比例均为 $n(\text{TEOS}) : n(\text{H}_2\text{O}) : n(\text{HCl}) : n(\text{C}_2\text{H}_5\text{OH}) = 1 : 2 : 0.01 : 4$, $V(\text{TEOS}) : V(\text{PDMS}) = 9 : 1$ 。



a.加热处理

b.未加热处理

图3 制备过程加热和不加热的两组样品的SEM照片

由图3可知,制备过程中经过加热的纤维中有很多粘连的纺锤体,纤维直径不均一,个体差别较大;未经加热处理的纤维直径大小均一,纤维表面光滑。无机前驱体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反应时,加热会加快溶胶凝胶过程,但纤维交联混乱无规则。加热可以加快交联速度,降低交联的规整性^[8-10]。

2.5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改变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确定其对凝胶时间的影响。固定钛酸四丁酯(TBT)的加入量为3.4 mL,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及凝胶时间见表4。

表4 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及凝胶时间

试样编号	$V(\text{TEOS}) : V(\text{PDMS})$	凝胶时间 t_1/h
2	9 : 1	50.5
3	8 : 2	57.5
4	5 : 5	101

由表4可知,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增大,凝胶时间不断减少。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增大,TEOS含量增加,TEOS自身的水解缩聚反应相应增多,溶胶会形成微交联,黏度上升,凝胶时间变短。

2.6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对可拉丝时间的影响

不同的无机相和有机相的比例对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的可拉丝长度有明显的影。固定钛酸四丁酯(TBT),改变PDMS(有机相)与TEOS(无机相)的比例制备出一系列的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样品,可拉丝时间见表5。

表5 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和可拉丝时间

样品编号	$V(\text{TEOS}) : V(\text{PDMS})$	可拉丝时间 t_2/min
2	9 : 1	40
3	8 : 2	30
4	5 : 5	80

由表5可知,改变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会增

加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的可拉丝时间。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较小时,有机相PDMS含量增大,无机前驱体和PDMS反应会更加完全,这就减少了TEOS自身的水解缩聚凝胶反应,无机有机杂化体的凝胶过程黏度变化明显慢于TEOS的缩聚凝胶反应过程。若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较大,无机相TEOS的加入量增大,无机相自身水解、缩聚脱水反应增加,反应脱出的水量也随之增加,溶剂水会抑制黏度增大,从而延长可拉丝时间^[11-13]。

2.7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中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对最大可拉丝长度的影响

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改变,直接改变了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的分子量及分子结构。分子量及分子结构对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有决定性的影响。改变无机相与有机相的体积比必然会改变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不同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见表6。

表6 不同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与最大可拉丝长度

样品编号	$V(\text{TEOS}) : V(\text{PDMS})$	最大拉丝长度 L/cm
2	9 : 1	40
3	8 : 2	45
4	5 : 5	60

由表6可知,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减小,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不断变大。有机相PDMS加入量的增大会促进无机前驱体和PDMS进行反应,这会增加凝胶中无机有机杂化体的含量,由此提高了最大可拉丝长度。

2.8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中硅钛比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固定TEOS和PDMS的比例为5 : 5,制备不同硅钛比的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凝胶,硅钛比对凝胶时间的影响见表7。

表7 不同硅钛比及对应杂化纤维的凝胶时间

样品编号	$V(\text{TEOS}) : V(\text{PDMS})$	$m(\text{TEOS}) : m(\text{TBT})$	凝胶时间 t_3/h
1	5 : 5	10 : 1	87
4	5 : 5	5 : 1	90
5	5 : 5	5 : 2	93
6	5 : 5	5 : 4	98

由表7可知,凝胶时间随着硅钛比的增大而逐渐减小。由于TEOS自身会发生水解缩聚反应,TEOS含量越高,混和溶胶中发生的水解缩聚反应就越多,溶胶的凝胶时间则会减少。

2.9 PDMS/SiO₂ - TiO₂ 杂化纤维中硅钛比对可拉丝时间的影响

PDMS/SiO₂ - TiO₂杂化纤维中硅钛比对可拉丝时间有很大的影响。固定TEOS : PDMS为5 : 5,改

变硅钛比,测定不同硅钛比的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可拉丝时间,见表 8。

表 8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中硅钛比与对应纤维的可拉丝时间

样品编号	V(TEOS) : V(PDMS)	m(TEOS) : m(TBT)	可拉丝时间 t ₂ /min
1	5 : 5	10 : 1	50
4	5 : 5	5 : 1	80
5	5 : 5	5 : 2	67
6	5 : 5	5 : 4	15

由表 8 可知,当硅钛比为 5 : 1 时,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可拉丝时间最长。

2.10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中硅钛比对最大可拉丝长度的影响

硅和钛共同组成了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无机相,硅钛比例对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影响很大。表 9 列出了不同的硅钛比及对应的最大可拉丝长度。

表 9 硅钛比及对应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

样品编号	V(TEOS) : V(PDMS)	m(TEOS) : m(TBT)	最大拉丝长度 L/cm
1	5 : 5	10 : 1	45
4	5 : 5	5 : 1	60
5	5 : 5	5 : 2	25
6	5 : 5	5 : 4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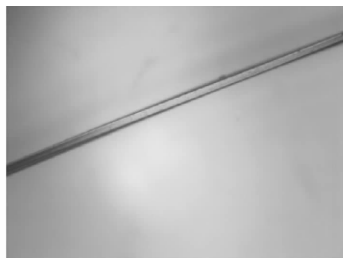
由表 9 可知,当硅钛比为 5 : 1 时,达到最大可拉丝长度。

2.11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红外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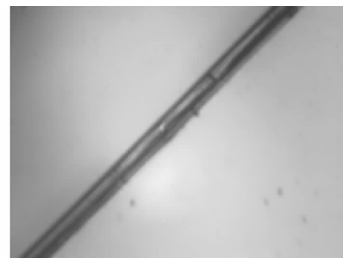
试验制得的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样品 1



a. 9 : 1



b. 8 : 2



c. 5 : 5

图 5 3 种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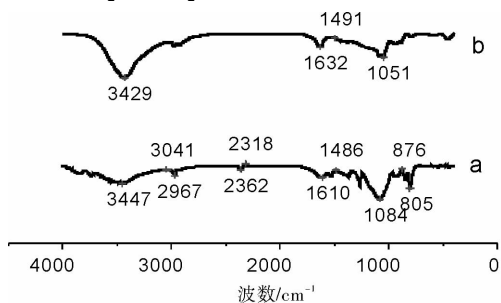
由图 5 可知,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增大,纤维平均直径不断减小。有机相含量的减小会削弱无机前驱体和有机相 PDMS 的反应,无机有机杂化体也会随之减少,这必然导致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直径减小。

3 结论

选用 TEOS 和 TBT 作为无机原料,以 PDMS 为有机原料,制备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电纺纤维,得出以下结论:

(1) 无论是 PDMS/SiO₂ 杂化纤维还是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溶胶的凝胶时间都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比例的增大而减少,在 PDMS/SiO₂-

号用 Nicolet-IR 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纤维的化学结构,测试时选定的背景为 KBr。图 4 为 1 号样品及 SiO₂-TiO₂ 的红外光谱图。



a. PDMS/TiO₂-SiO₂ 杂化纤维 (1 号样品); b. 纯 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

图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 1 号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由图 4 可知,在波数 1 100 cm⁻¹ 时,a,b 均有吸收峰,但 b 的吸收峰明显高于 a,1 100 cm⁻¹ 波数时的吸收峰正是 Si-O-Si 基团的吸收峰,表明 a 样品中 Si-O-Si 基团数高于 b 样品,验证了 a 中加入 PDMS 形成了 Si-O-Si 键基团。在波数为 3 400 cm⁻¹ 时,b 样品的吸收峰仍高于 a 的吸收峰,而这正是 C-H 的吸收峰,证明在加入 PDMS 后,形成了更多的 C-H 结构,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中的无机相与有机相之间通过化学键连接^[12-15]。

2.12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光学显微镜图

3 种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的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光学显微镜照片见图 5。

TiO₂ 杂化纤维中凝胶时间还随着硅钛比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2) 硅钛比为 5 : 1 时,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可拉丝长度和可拉丝时间均达到最大值。

(3)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的最大可拉丝长度随着无机相与有机相比的增大而增长。

(4) 随着 PDMS 的加入,PDMS/SiO₂ 杂化纤维和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中 C-O 基团数量增加,C-H 基团数量在 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中也明显增多。

(5) 随着有机相 PDMS 的加入,PDMS/SiO₂-TiO₂ 杂化纤维直径明显变粗。

参考文献:

- [1] 马海红, 史铁钧. PVA/SiO₂-TiO₂ 杂化电纺纤维膜的状态与性能[J].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09, 30(9): 1885-1890.
- [2] KIM Y B, CHO D, PARK W H. Electrospinning of poly (dimethyl siloxane) by sol-gel method[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09, 114(6): 3870-3874.
- [3] KIM Y B, CHO D, PARK W H.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iO₂/poly (dimethyl siloxane) composite fibers with thermal and mechanical stability [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0, 116(1): 449-454.
- [4] 杨华忠, 史铁钧, 翟林峰. PDMS/SiO₂ 杂化电纺纤维的制备与表征[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8, 24(1): 47-50.
- [5] 于兴华, 霍冀川, 李娟. 溶胶-凝胶法 SiO₂/PMMA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表征[J]. 有机硅材料, 2010, 24(2): 89-91.
- [6] 张启卫, 章永化, 陈守明, 等.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二氧化硅杂化材料制备与性能[J]. 应用化学, 2002, 19(9): 874-877.
- [7] 章永化, 龚克成. Sol-Gel 法制备有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进展[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1997, 13(4): 14-18.
- [8] 李照磊, 高延敏. 溶胶-凝胶法制备有机-无机杂化材料研究进展[J]. 胶体与聚合物, 2008, 26(3): 28-30.
- [9] 丁子上, 翁文剑. 溶胶-凝胶技术制备材料的进展[J]. 硅酸盐学报, 1993, 21(5): 443-450.
- [10] 徐珊珊, 王世敏, 董兵海, 等. 溶胶-凝胶法制备聚丙烯酸酯/纳米 TiO₂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的研究[J]. 上海涂料, 2006, 44(2): 15-19.
- [11] 柯昌美, 汪厚植, 刘兴重, 等. 聚丙烯酸酯/TiO₂-SiO₂ 纳米杂化材料性能的研究[J]. 塑料工业, 2005, 33(6): 9-12.
- [12] 张道洪, 刘传军, 吴璧耀. 溶胶-凝胶法制备有机/二氧化钛杂化材料[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3, 19(5): 191-193.
- [13] 李玉, 韩兆让, 翟永爱, 等. TiO₂/SiO₂ 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J]. 化学研究, 2007, 18(1): 19-22.
- [14] 宋秋生, 史铁钧, 王华林, 等. PVA/SiO₂ 杂化纤维的制备与表征[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7, 23(6): 216-219.
- [15] 张玲, 黄雁荣, 伍青.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SiO₂-TiO₂ 杂化材料的研究[J]. 功能高分子学报, 2005, 18(1): 28-31.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Poly(Dimethylsiloxane) Hybrid Materials

DOU Gaoya

(Yulin Hanting Chemical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Co., Ltd., Yulin, Shaanxi 718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paration of PDMS/SiO₂ hybrid fiber, TEOS was prepared as raw materials to produce silica sol by sol-gel method, and was then added with the PDMS solution. PDMS/SiO₂ hybrid fiber membrane was prepared by electrospinning. By adding different weight of TEOS, PDMS/SiO₂ hybrid electrospun fiber membrane performance of electro spinning and PDMS/SiO₂ hybrid fiber membrane hybrid fiber average diameter size was regularly changed. To prepare PDMS/SiO₂-TiO₂ hybrid fiber, TEOS and TBT was prepared as raw materials to prepare Si-Ti sol by sol-gel method, followed by adding PDMS solution. PDMS/SiO₂-TiO₂ hybrid fiber was prepared by pulling method. In the preparation of PDMS/SiO₂-TiO₂ hybrid fiber, by adding different mass of TEOS and TBT, PDMS/SiO₂-TiO₂ hybrid fiber average diameter was regularly changed.

Key words: electrospinning; hybrid fiber; Sol-Gel method;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降糖因子铬调素的制备

闵玉涛¹, 宋彦显¹, 马庆一², 刘鑫³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3.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部,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啤酒酵母经活化、种子制备, 接种于含铬培养基中培养, 制备富铬酵母, 再经离心、水洗、干燥、粉碎, 制备富铬酵母粉。Toepfer 法制备铬调素(LMWCr)浓缩液。以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TP 1B)为靶酶, 分光光度法测定 LMWCr 对 PTP 1B 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通过薄层层析和紫外扫描得以验证, 表明成功制备铬调素, LMWCr 对 PTP 1B 的抑制率达 13.60%。

关键词:铬调素; 制备; 糖尿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5

中图分类号: TQ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4-0121-04

糖尿病是由于代谢混乱造成的一种慢性疾病, 目前尚不可治愈, 糖尿病药物市场是当前价值最大和数量增长最快的医药市场之一。2017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糖尿病患者达 4.25 亿。中国是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达到 1.14 亿, 预计 2035 年糖尿病患者将达到 5.92 亿^[1]。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加, 受医疗条件限制, 未检出该病患的人数众多, 且有年轻化趋势, 已严重影响到人类健康。目前, 上市的糖尿病治疗药物以化学合成药物为主, 不可避免地给患者带来一定的毒副作用^[2-3], 对患者造成一定的痛苦。因此, 糖尿病药物的开发任重而道远。

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之一, 是体内葡萄糖耐量因子(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GTF)的重要组成成分^[4]。1957 年美国的医学科学家 MERTZ 和 SCHWARZ 提出了啤酒酵母中含有葡萄糖耐量因子 GTF 的假设, 并于 1959 年证实其重要组成成分是 Cr³⁺。MERTZ 后来证实了铬是葡萄糖代谢时胰岛

素发挥作用所必需的一种元素^[5]。铬与胰岛素两者缺一或单独存在都会影响到对葡萄糖的利用。1980 年科学家终于在动物的肝、肾中获取了类 GTF 物质 LMWCr(Low - Molecular - Weight Chromium), 被科学界重新译为“铬调素”。LMWCr 与胰岛素介导反应有关, 它可与胰岛素受体结合, 激活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 在胰岛素信号自动放大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LMWCr 是目前公认的铬的生物活性形式^[6]。

DAVIS 等^[7]证实 LMWCr 在激活胰岛素受体激酶活性过程中起关键作用。JAIN 等^[8]表明 LMWCr 可以增强胰岛素的结合力, 增加胰岛素受体的数目。它通过激活胰岛素受体激酶和抑制胰岛素受体酪氨酸磷酸酶来增加胰岛素受体的磷酸化作用, 从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吴扬等^[9]制备了鞣酸与铬的化合物并用于治疗糖尿病效果明显。DAVIS 等^[10]合成了铬的聚合物[Cr₃O(O₂CCH₂CH₃)₆(H₂O)]⁺, 实验表明此化合物可以激活胰岛素受体上的蛋白酪

收稿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52102310010); 2017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7GGJS184); 2017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18A150050);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科技创新团队培育基金(CXTD2018K3)

作者简介: 闵玉涛(1978—), 男, 河南南阳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功能性食品, 天然产物化学。

氨酸磷酸激酶,可用于Ⅱ型糖尿病的治疗。由此可见,铬调素对于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述的报道表明了从天然产物及其铬调素类似物中筛选新的降糖因子是一个颇具潜力的研究领域,但是目前此领域已完成的研究工作,无论从深度(对机制的探讨)还是广度(筛选对象)上尚嫌不足,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按照 Toepfer 法制得 LMWCr 浓缩液,以蛋白酪氨酸磷酸酶为靶酶,测定其抑制作用,可作为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抑制剂筛选的基准物,为铬调素类似物的筛选提供依据,为糖尿病药物的开发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PDA 斜面培养基:按照 GB4789.15 进行配制,用于菌种的复苏及保存;种子培养基^[11]:葡萄糖 2%,甘氨酸 1%,酵母粉 0.1%,调节至 pH 6.0,主要用于发酵菌种的培养;发酵培养基:由麦芽汁(12~13Bx)添加经预杀菌的三氯化铬(20mg/mL)组成,培养基配好后在 121℃ 下高温灭菌 30min;啤酒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实验室自制;工业专用粉状活性炭:江苏瑞晨碳业科技有限公司;GF254 薄层层析硅胶板:青岛邦凯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茚三酮:AR 级,北京吉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主要仪器

756MC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HYG-Ⅲ 旋转式恒温调速摇瓶柜:上海欣蕊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SXX-103 超净工作台:中国蚌埠净化仪器厂;LRH-150S 恒温恒湿培养箱:广东省医疗器械厂;YXQ.SG41.280 B 电热手提式

压力蒸汽灭菌锅:上海医用核子仪器厂;JA1003 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平厂。

1.3 实验方法

1.3.1 菌种的活化

将啤酒酵母接种到 PDA 斜面培养基上,置于恒温培养箱中在 28℃ 下培养,以恢复其活力。

1.3.2 种子培养

将啤酒酵母菌种接种于 50 mL 种子培养基中,180r/min,28℃ 下培养 18h,进行种子培养。

1.3.3 发酵培养^[12]

种子培养基按 10% 接种量接种于 50 mL 含铬发酵培养基中,28℃ 静置培养 6h 后,180r/min,28℃ 下摇瓶培养 18h,得到新鲜的高铬酵母。酵母菌培养液 3000r/min 离心 10min,沉淀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直至检测不出铬离子为止。富铬酵母于 60℃ 干燥,粉碎,得淡黄色的富铬酵母粉。

1.3.4 从酵母中分离 LMWCr^[13]

按照 TOEPFER 法^[14],将富铬酵母悬浮于 50% 的乙醇溶液中,搅拌,加热至沸后,冷却至室温过夜,过滤后去残渣,减压蒸出乙醇,水溶液调至 pH3.5,用活性炭吸附 LMWCr,过滤后弃掉滤液,依次用 95% 乙醇及水洗涤活性炭,滤液悬浮于 1:1 的浓氨水-乙醚液中,经洗脱、浓缩后,即得到 LMWCr 浓缩液。

1.3.5 LMWCr 对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TP 1B)的抑制动力学

底物浓度 27.22 mmol/L 时,取一定量的 LMWCr 浓缩液,在 37℃,pH7.20,Tris-HCl 缓冲溶液(10 mmol/L)所产生的离子强度下进行酶促反应,405 nm 处定时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每分钟增加 0.001 为 1 个相对活力单位。试验设计见表 1。

表 1 LMWCr 对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TP 1B)抑制活性的反应体系

样品	酶量/ μL	底物/ μL	缓冲液/ μL	LMWCr/ μL
标准	20.00	11.10	118.9	0
LMWCr	20.00	11.10	98.77	20.13

以第 9min 的吸光度计算各成分的抑制率,

$$\rho = \frac{A_0 - A_1}{A_0}$$

式中: ρ —铬酵母对蛋白酪氨酸酶的抑制率;

A_0 —无抑制剂时的吸光度;

A_1 —组分的吸光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LMWCr 水解液的薄层层析

取 LMWCr 浓缩液 1mL,加入 0.2% 茚三酮试液

2~3 滴,加热煮沸 4~5min,待其冷却后呈蓝紫色,表明有肽或氨基酸存在。

LMWCr 浓缩液用 6mol/L 盐酸回流煮沸 20h 左右,使肽完全水解,水解液硅胶板薄层层析,结果如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LMWCr 浓缩液经水解后,含有 4 种不同的氨基酸,这与刘亚明^[15]、李平^[16]等提到的 GTF 中含有 4 种氨基酸的结论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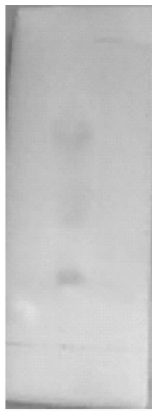


图1 LMWCr水解液薄层析图

2.2 富铬酵母的紫外吸收光谱扫描分析

对所得到的 LMWCr 浓缩液进行紫外扫描, 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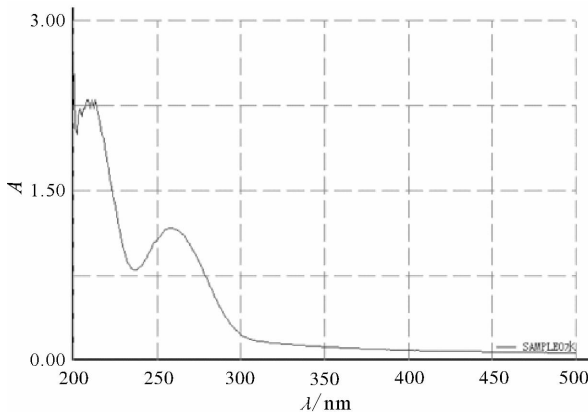


图2 LMWCr 浓缩液紫外扫描图

从图 2 可见, 浓缩液在 260nm 处有一明显吸收峰, 这与金婵等^[17] 研究富铬酵母时发现其在 260nm 有一紫外吸收峰、丁文军^[18] 和 HAYLOCK 等^[19] 报道 GTF 在 260nm 处有相同紫外吸收特征峰一致。同时, 测定三氯化铬溶液时无此特征吸收峰, 再结合薄层层析结果, 表明富铬酵母铬复合物已成功制得。

2.3 LMWCr 对 PTP 1B 的抑制活性

在底物浓度为 27.22 mmol/L, LMWCr 浓缩液为 20.13 μL 时, 以不加 LMWCr 为标准对照, 在 405 nm 处测定其随时间变化的吸光度, 绘制透析酶的时间-吸光度曲线图, 如图 3 所示。

在 405 nm 处测定第 9min 的吸光度, 计算抑制率为 13.60%。PTP1B 抑制剂通过削弱 PTP1B 对胰岛素受体的去磷酸化作用, 以提高胰岛素受体及其底物的磷酸化水平, 进而起到类胰岛素和胰岛素增敏的作用, 达到降糖的效果^[20]。LMWCr 对 PTP 1B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进一步证实了其可以作为降糖因子, 可以把 PTP 1B 的抑制剂制备铬络合物, 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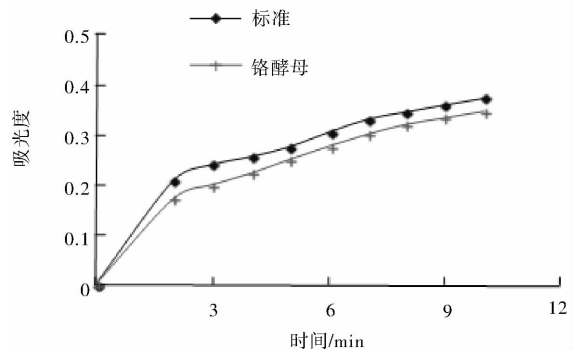


图3 LMWCr 对 PTP 1B 的抑制活性时间-吸光度曲线

步提高其降糖效果。

3 结论

LMWCr 是目前公认的铬的生物活性形式, 再加上酵母铬研究条件比较成熟, 因此, 本文选择酵母铬为筛选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抑制剂的基准物。按照 TOEPFER 法制得 LMWCr 浓缩液, 通过薄层层析和紫外扫描得以验证, 表明已成功从富铬酵母中制得了铬复合物。LMWCr 对 PTP 1B 的抑制率达 13.60%, PTP 1B 的抑制剂可制备铬络合物, 提高降糖活性, 为铬调素类似物产品的研发等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MARCOVECCHIO M, MOHN A, CHIARELLI F, et al.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Endocrinological Investigation, 2005, 28(11): 853-863.
- [2] LOW LC, MBCHBMD, CPCHFR, et al. The epidemic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 Pediatric Diabetes, 2010, 11(4): 212-215.
- [3] SUBRAMANIAN R, ASMAWIM Z, SADIKUN Z. In vitro α -glucosidase and α -amylase enzyme inhibitory effects of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extract and andrographolide [J]. Acta Biochimica Polonica, 2008, 55(2): 391-395.
- [4] ANDERSON RA. The role of GTF in human body nutrition [J].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1999, 26: 534-541.
- [5] 高步先, 夏耕田, 张乃生. 铬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动物体内的代谢 [J]. 动物医学进展, 2002, 23(6): 49-51.
- [6] 禹爱兵, 王加启. 低分子铬聚合物及其代谢机理 [J]. 中国畜牧兽医, 2005, 32(5): 3-5.
- [7] DAVIS C M, VINCENT J B. Chromium oligopeptide activates insulin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J]. Biochemistry, 1997, 36(15): 4382-4385.
- [8] JAIN S K, PTEL P, ROGIER K, et al. Trivalent chromium inhibits protein glycosylation and lipid peroxidation in high glucose treated erythrocytes [J]. Antioxid Redox Signal, 2006, 18(1/2): 238-241.
- [9] 吴扬, 胡志和. 铬及铬络合物与糖尿病的关系研究进展

- [J]. 食品科学,2008,29(12):774-779.
- [10] DAVIS. Synthetic Multinuclear Chromium Assembly Activates Insulin Receptor kinase Activity: Functional Model for Low - Molecular - Weight Chromium - Binding Substance [J].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97, 36 (23): 5316 - 5320.
- [11] 王盛良, 黄杰, 黄薇, 等. 富铬酵母的研制[J]. 食品科学, 2001, 22(2): 32 - 35.
- [12] 王晓兰, 顾天成. 富铬啤酒酵母发酵条件的优化[J]. 北京轻工业学院学报, 1998, 16(2): 34 - 39.
- [13] 刘永平. 葡萄糖耐量因子的提取及致突变活性研究[J]. 承德医学院学报, 1998, 15(2): 89 - 91.
- [14] TOEPFER EW. Preparation of chromium - containing material of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activity from brewers yeast extracts and by synthesis[J]. Food chem, 1977, 25(6): 1627.
- [15] 刘亚明, 牛欣, 冯前进. 葡萄糖耐量因子(GTF)研究概述[J].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003, 4(6): 367 - 369.
- [16] 李平, 梁世中. 微量元素铬作为功能性食品因子的研究进展[J]. 食品与发酵工业, 2000, 27(1): 74 - 77.
- [17] 金婵, 郝素娥. 高铬酵母的制备及其有机铬含量的研究[J]. 营养学报, 2002, 24(3): 282 - 285.
- [18] 丁文军. 富铬酵母的理化性质和氨基酸分析[J]. 微生物学通报, 1999, 26(1): 31 - 33.
- [19] HAYLOCK J, BACKLEY D, BLACKWELL F. The relationship of chromium to the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II [J]. InorgBiochem, 1983, 19(2): 105 - 117.
- [20] 张倩, 甘强, 刘霞, 等. 基于天然产物的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1B 抑制剂的虚拟筛选[J].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2018, 45(4): 442 - 452.

(责任编辑 姚虹)

Preparation of Low - Molecular - Weight Chromium As Hypoglycemic Factor

MIN Yutao¹, SONG Yanxian¹, MA Qingyi², LIU Xin³

(1. Chemical and Food Colleg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Food and Bio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3.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ubei Zhongyan industrial co., LTD,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Beer yeast was activated and seed prepared, inoculated in chrome - bearing culture medium, prepared chrome - rich yeast, and then centrifuged, washed, dried and crushed to prepare chrome - rich yeast powder. According to Toepfer's Method, the low - molecular - weight chromium was extracted from chromium enriched yeas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LMWCr on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PTP 1B) was determined by spectrophotometry with PTP 1B as the target enzyme.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nd uv scanning, indicating that LMWCr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and the inhibition rate of LMWCr on PTP 1B was 13.60%.

Key words: Low - Molecular - Weight Chromium; preparation; diabetes mellitus

基于 MATLAB 的汽车动力性参数的确定

李 静, 李晓锋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汽车作为一种高效率的运输工具, 运输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动力性的大小。汽车的动力性是车辆设计时的重要指标, 也是人们选择车辆时考虑的重要性能之一。对汽车动力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有最高车速、加速时间和最大爬坡度, 以这3个指标为标准, 推导所需计算公式, 并以某一具体车型为例, 通过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 得出该车辆的动力性能参数, 供有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动力性; 最高车速; 加速时间; 最大爬坡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4.026

中图分类号:U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4-0125-04

1 数学模型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 受到的阻力有滚动阻力、空气阻力、坡度阻力、加速阻力^[1], 分别用 F_f 、 F_w 、 F_i 、 F_j 表示, 驱动力用 F_t 表示, 可得汽车驱动力阻力平衡方程为

$$F_t = F_f + F_w + F_i + F_j, \quad (1)$$

式(1)的具体化形式为

$$\frac{T_{iq} i_g i_0 \eta_T}{r} = Gf + \frac{C_d A}{21.15} u_a^2 + G_i + \delta_m \frac{du}{dt}, \quad (2)$$

式中: T_{iq} — 发动机输出扭矩; i_g — 变速器传动比; i_0 — 主减速器传动比; η_T — 传动效率; r — 车轮半径; G — 汽车重量; f — 滚动阻力系数; C_d — 空气阻力系数; A — 迎风面积; u_a — 汽车车速; i — 道路坡度; δ — 汽车旋转质量换算系数; m — 汽车质量; $\frac{du}{dt}$ — 汽车加速度。

1.1 最高车速的计算

最高车速指汽车在水平良好路面上能达到的最高行驶速度^[2]。此时坡度阻力和加速阻力均为0, 平衡方程式(2)变为

$$\frac{T_i q i_g i_0 \eta_T}{r} = Gf + \frac{C_d A}{21.15} u_a^2. \quad (3)$$

汽车车速 u_a 与发动机转速 n 之间的关系为

$$u_a = 0.377 \frac{rn}{i_g i_0}, \quad (4)$$

发动机转矩 T_{iq} 与转速 n 之间的关系^[3] 为

$$T_{iq} = a_0 + a_1 n + a_2 n^2 + \dots + a_k n^k, \quad (5)$$

其中系数 $a_0, a_1, a_2, \dots, a_k$ 可由最小二乘法拟合确定, 拟合阶数 k 一般取3或4, 本文取4。

由上述关系式可知, 平衡方程式(2)可以转化为以车速 u_a 为变量的一元高次方程。

1.2 加速时间的计算

加速时间用来表征汽车的加速能力, 可以用原地起步加速时间和超车加速时间来表明汽车的加速能力^[4]。原地起步加速时间指汽车由1档或2档起步, 以最大的加速度(包括合适的换档时机)逐步换到最高档后, 到某一预定的距离或车速所需要的时间(本文指达到最高车速的80%所需要的时间)。超车加速时间指用最高档或次高档由某一较低车速加速至某一高速所需的时间。由驱动力阻力方程(1)(2)可得加速度方程(坡度阻力为0)为

$$j = \frac{du}{dt} = \frac{1}{\delta m} (F_t - F_f - F_w), \quad (6)$$

而 t 又可以写成积分形式

$$t = \int_0^t dt, \quad (7)$$

假定由低档加速到发动机最高转速时换入高

收稿日期: 2019-05-03

作者简介: 李静(1986—), 女, 河南商丘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讲师, 专业方向: 车辆工程。

档,对于普通 5 档变速器,式(7) 应分段表示为

$$t = \int_0^t dt = \int_{u_1}^{u_2} \frac{1}{j_1} du + \int_{u_2}^{u_3} \frac{1}{j_2} du + \int_{u_3}^{u_4} \frac{1}{j_3} du + \int_{u_4}^{u_5} \frac{1}{4} du + \int_{u_5}^{u_{max}} \frac{1}{j_5} du \quad (8)$$

对于装有手动变速器的汽车,因换挡时需要切断动力,发动机转速会下降,其下降程度和驾驶员的操纵熟练程度有关。为了描述不同驾驶人操作程度对下降转速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档位转速系数,计算公式^[5] 为

$$\beta = \frac{n_{gk}(k+1)}{n_{gm}(k)} \quad (9)$$

式中: $n_{gk}(k+1)$ — 换入 $k+1$ 档时的初始转速; $n_{gm}(k)$ — 前一档的终止转速。对于换挡熟练的驾驶员, β 可取 0.9 ~ 0.95。

1.3 爬坡能力的计算

汽车的爬坡能力用汽车满载(或某一载重质量)时在良好路面上的最大爬坡度来表征^[6]。假设汽车匀速爬坡,根据方程(1)(2),可得坡度阻力方

程为

$$F_i = G \sin\alpha = F_t - F_f - F_w \quad (10)$$

可得到 α 的表达式为

$$\alpha = \sin^{-1} \frac{F_t - F_f - F_w}{G} \quad (11)$$

2 实例分析

以国产某小型轿车为例,利用上述模型,借助 MATLAB 工具进行仿真输出^[7]。

2.1 车辆参数

发动机排量:1096mL;最大扭矩:87Nm;转速范围:800 ~ 5500r/min;满载质量:970kg;车轮半径:0.272m;传动效率:0.9;空气阻力系数:0.3;迎风面积:2.3m²;滚动阻力系数:0.012;旋转质量换算系数: $\delta = 1.03 + 0.04i_g^2$;主减速器速比: $i_0 = 4.388$;变速器速比: $i_g = [3.416 \ 1.894 \ 1.280 \ 0.914 \ 0.757]$;汽车轴距:2.335m;质心高度:0.71m;质心至前轴的距离:1.12m;路面实际附着系数 $\varphi = 0.7$ 。发动机输出转矩特性参数见表 1。

表 1 发动机外特性参数

转速/(r/min)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输出转矩/Nm	78.6	83.0	85.0	86.6	87.1	85.9	84.7	82.5	80.5

2.2 仿真结果

2.2.1 最高车速

表 1 中数据通过 MATLAB 曲线拟合得到发动机输出转矩 M 与转速 n 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1 所示。把车辆参数代入式(2),通过 MATLAB 仿真软件可得到汽车驱动力—阻力平衡图,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得到该汽车的最高车速(图 2 中交点) $u_{amax} = 153.5 \text{ km/h}$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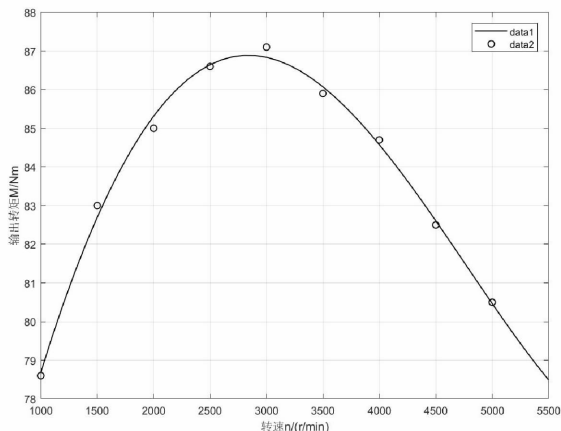


图 1 发动机输出转矩特性

2.2.2 加速时间

考虑到驾驶员操纵熟练程度这个因素,把档位转速系数 β 分别设为 0.9 和 0.8,可得到原地起步加速时间、行驶距离与车速之间的关系曲线,分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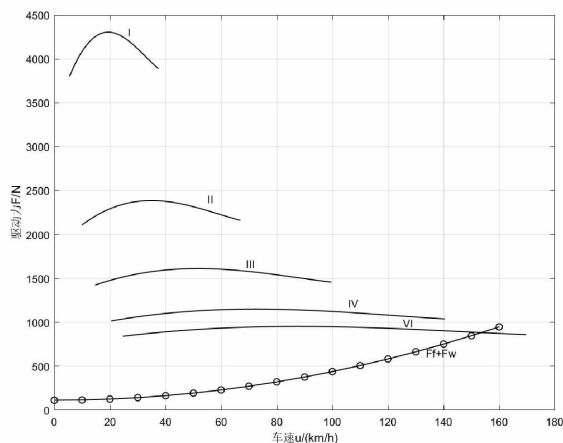


图 2 汽车驱动力—阻力平衡图

图 3 ~ 图 6 所示。可以看出驾驶员主观因素对加速时间和行驶距离有一定的影响。在实操中,应选择操纵熟练的驾驶员,并需多次实践,以减小误差^[8]。

(1) $\beta = 0.9$ 时的输出结果

由图 3 可得 $\beta = 0.9$ 时汽车原地起步连续换档(加速至最高车速的 0.8)加速时间为 40.93 s;由图 4 可得 $\beta = 0.9$ 时汽车原地起步连续换档(加速至最高车速的 0.8)行驶距离为 972.9 m。

(2) $\beta = 0.8$ 时的输出结果

由图 5 可得 $\beta = 0.8$ 时汽车原地起步连续换档(加速至最高车速的 0.8)加速时间为 46.77 s;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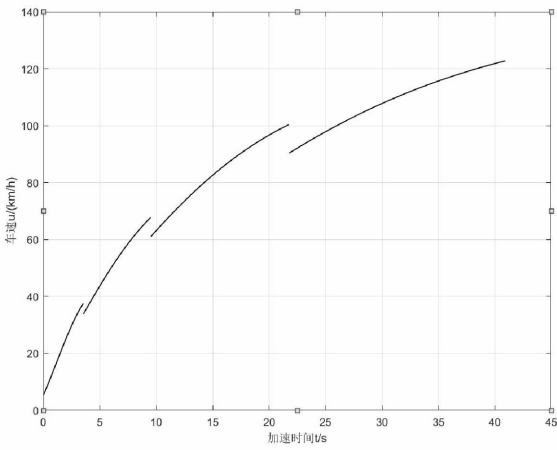


图3 加速时间与车速关系曲线($\beta=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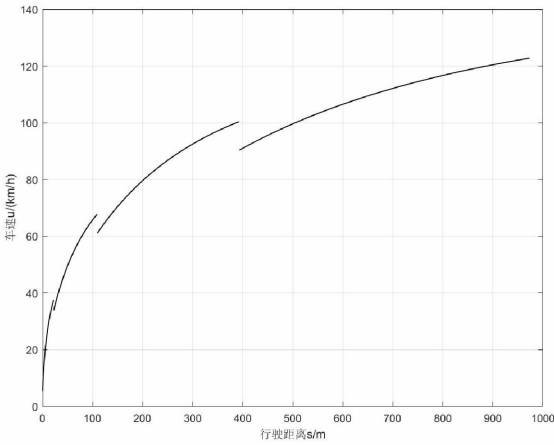


图4 行驶距离与车速关系曲线($\beta=0.9$)

6 可得 $\beta=0.8$ 时汽车原地起步连续换档(加速至最高车速的 0.8)行驶距离为 1091.6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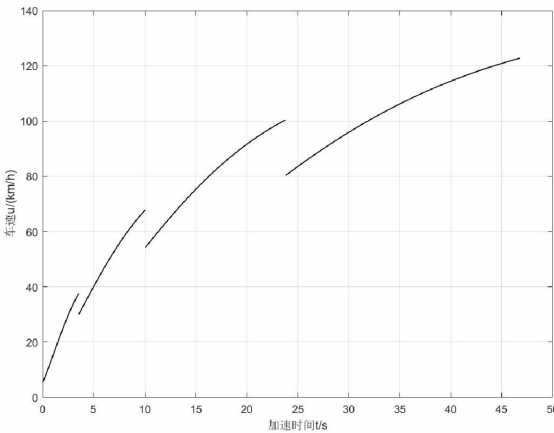


图5 加速时间与车速关系曲线($\beta=0.8$)

2.2.3 最大爬坡度

通过仿真输出得到该车辆爬坡度图,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该车辆的最大爬坡度为 I 档爬坡度 0.481,所需要的路面附着系数为 1.29。一般来讲,干燥、良好的沥青或混凝土附着系数为 0.7~0.8,路面附着系数大于此值时,0.481 的爬坡度不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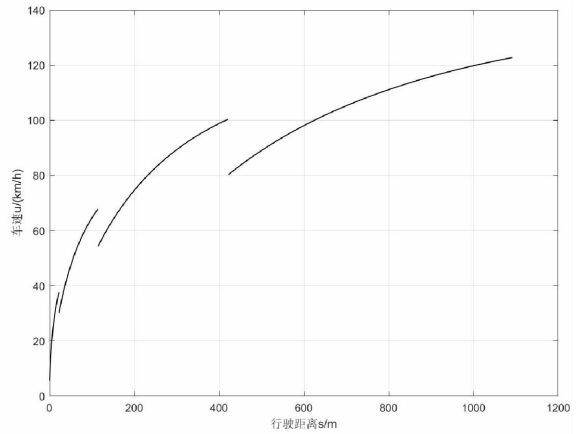


图6 行驶距离与车速关系曲线($\beta=0.8$)

现。因此,本文对实际的等效坡度进行了计算,假设该车为前驱车辆,路面附着系数为 0.7,得到的实际最大爬坡度为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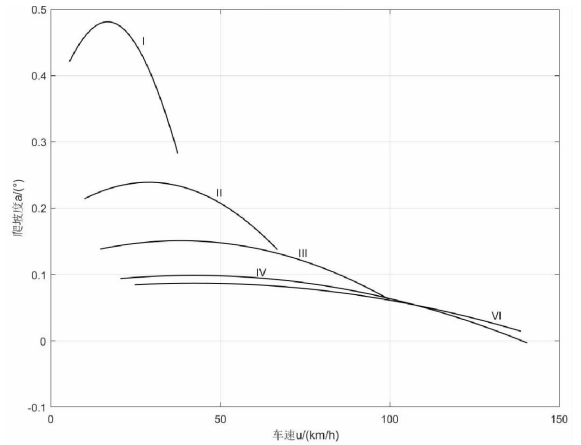


图7 汽车爬坡度图

I 档的最大爬坡度为 0.481,最大坡度角为 25.69 度,前驱汽车匀速上坡时要求的附着系数为 1.29。上述情况超过路面实际附着系数 0.7,重新计算,得汽车能通过的实际最大坡度为 0.30,汽车能通过的实际最大坡度角为 16.72 度。

2.3 手动变速箱和装有液力变矩器车辆的动力性比较

目前汽车上广泛使用的无级变速器是液力变矩器,通过发动机和液力变矩器的共同输入,使车辆既能充分利用发动机的最大有效功率,又尽可能工作在发动机比燃料消耗量最低值附近。本部分涉及的计算公式本文没有给出,仅由图8、图9进行简要说明。

从图8可以看出,在初使速度为 0 时,装备液力变矩器和 5 档变速器的汽车(实线)就能连续发出很大的驱动力,比装备手动变速器(虚线)的 1 档驱动力要大很多,这是配备液力变矩器车辆起步平稳、加速较好的原因。但是随着车速的提高,其驱动力

下降要比手动变速器车辆快得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车辆采用了带锁上方式的液力变矩器,如图9所示,提高了液力变矩器的传动效率,使车辆的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都得到了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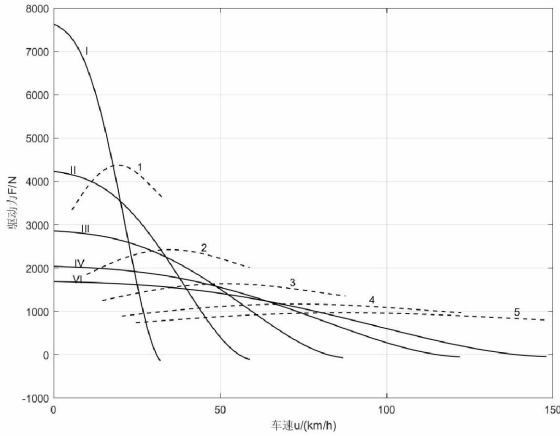


图8 装备液力变矩器与装备手动变速器的驱动力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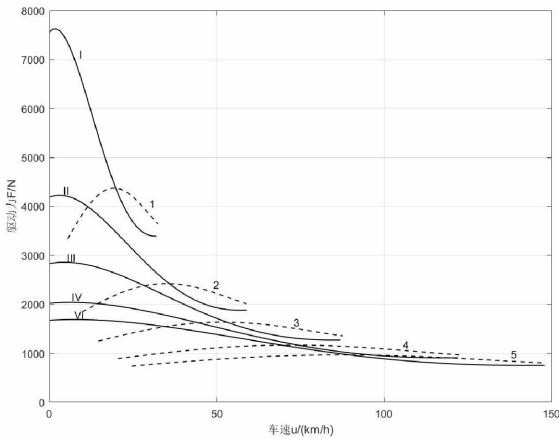


图9 采用锁止液力变矩器与装备手动变速器的驱动力对比

3 结论

通过对上述实例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论: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Determination of Automobile Dynamic Parameters Based on MATLAB

LI Jing, LI Xiaofeng

(School of Electro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ars, as an efficient means of transport, the level of its transport efficiency mainly depends on the size of its power. Power is an important index in designing a car, so is it an essential consideration for customers.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automobile dynamic performance mainly include maximum speed, acceleration time, and maximum climb. This paper takes the above three indicators as the standards, deduces the formula required for the derivation, and, with a specific type as an example, simulates through MATLAB and then obtains the vehicle's dynamic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hich ar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related personnel.

Key words: dynamic performance; maximum speed; acceleration time; maximum climb

(1) 该车的最高车速 $u_{\max} = 153.5 \text{ km/h}$;

(2) 在计算加速时间的过程中,引入档位转速系数来评价驾驶员的熟练程度这一主观因素,可得到 $0 \sim 122.8 \text{ km/h}$ 的加速时间为 $40.93 \text{ s} (\beta = 0.9)$ 、 $46.77 \text{ s} (\beta = 0.8)$ 。

(3) 该车的理论最大爬坡度 $i_{\max} = 0.481$,超出了路面的附着力。按实际路面附着系数 $\varphi = 0.7$ 重新计算,得到该车 1 档的最大爬坡度 $i_{\max} = 0.30$ 。

(4) 配备有锁止液力变矩器无级变速器的车辆与手动变速器车辆相比,因其传动系机械效率的提高,使得车辆的动力性、经济性都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 [1] 余志生. 汽车理论[M]. 5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 [2] 周遊. 汽车动力性影响因素研究[J]. 内燃机与配件, 2017(23):15-16.
- [3] 张志涌. MATLAB教程[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5.
- [4] 陈英楠. 汽车行驶动力性分析与研究[J]. 内燃机与配件, 2017(22):40-41.
- [5] 肖启瑞, 樊明明. 车辆工程仿真与分析[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 [6] 刘新磊, 程增木. 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匹配技术的研究[J]. 电源技术, 2018(3):367-368.
- [7] 尹侗博. 基于 MATLAB 编程绘制动力特性图分析汽车动力性[J]. 汽车实用技术, 2017(13):65-68.
- [8] 裴泽健, 周志强. 基于 MATLAB 的汽车动力性仿真研究[J]. 内江科技, 2018(4):76-77.